

追寻民族区的踪迹

Foot Prints In The Land Of Natives



友誼叢書之八
二零零七年正月十日

内容简介

历时三十多年艰苦卓绝、此起彼伏、前赴后继的民族工作中有许多重要文件记录，也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事迹。这是一部记录北加英雄儿女为当年的民族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的史诗。

其中有多少热血青年的诚心实意热爱人民、服务民族的精神，已为当时与现今社会促进民族团结树立了光辉典范。

本辑丛书中的篇篇字字都流淌着那火红年代里的年青志士们的时代责任感、奋不顾身的精神和崇高的抱负，流淌着他们欢愉或悲壮的泪水和鲜血！希望本书的出版能给有意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追寻民族区的踪迹

《友谊丛书》

友谊之花永远芬芳

友惠存

献给亲爱的新、老朋友们



《友谊丛书》编辑出版处敬

二〇〇七年二月十日

艾草的生态与栽培



艾草的生态与栽培《艾草的生态与栽培》

二〇〇二年十月

追寻民族区的踪迹

第8辑《友谊丛书》

编者的话

目录

◆ 民族工作历史性文件

- 统一战线中的土著民族工作 (1963年)
—引自《北加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 当前的革命中心任务 (1963年)
- 关于兄弟民族的问题 (1973年)
- 有关边区伊班民族解放同盟的工作指示 (1969年3月28日)
- 十几年来伊班民族工作发展 (1977年9月4日)
- 伊班民族工作的展望 (1980年)
- 对伊班民族斗争的探讨 (1981年8月19日)
- 关于伊班民族工作的若干问题 (1981年10月1日)
- 关于加强开展伊班民族工作的办法
—引自《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 (1982年2月24日)
- 我们必须将民族工作进行到底 (1983年5月)
- 要重视民族工作的开展 (1984年2月)
- 拉让江中游的斗争 (1987年7月12日)
- 当局对付民族工作的策略 (1988年8月)
- 边区伊班民族解放同盟的章程
—引自《边区伊班盟章程》
- 北加伊班兄弟党(仁达党)建党宣言总纲 (1979年)

◆ 回顾民族工作历史

- 早期的民族工作 一怀远
- 当年开展第一、二省边界民族工作的回顾 一杨传兴
- 砂罗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的民族工作 一张亚华
- 回忆第二支队民族工作点滴 一忆林
- 为唤醒民族兄弟不惜流血牺牲

◆ 民族工作回忆

我的民族工作经历

参与第二省与中游民族工作的回忆

向巴里河流域进军

洒里街民族区战斗经历

在马罗河开展民族工作

逊空达雅人

缅怀当年印尼边区民族工作

我在民族区的日子

OMT 民族工作的片段

上民族区

记拉让中游“6.20”事件

磨不去的记忆

回忆在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搞民族工作的片段

—曾忠口述

—老温

—刘义忠口述

—斌口述

—李山口述

—刘思珍口述

—小李

—珍娜口述

—李红口述

—学军

—实学

—山林

—叶晓阳

◆ 特写

伊班人反抗拉者王朝之战

平凡的人，不平凡的经历

—记 OMT 民族区开路先锋三明友

—蔡宗祥

—丹心

◆ 新区民族

来自“乌鲁”的一股暖流

美里省本南人的点滴

军民鱼水情

情意绵绵源水长

头一遭接触汶莱伊班群众

—雁飞

—李华健

—雁飞

—雁飞

—雁飞、勘探

◆ 苦难的伊班群众

苦难的伊班妇女

急待救治的族群

介绍两位伊班群众

—小溪

—伊民

◆ 编后话

编者的话

在《追寻民族区的踪迹》里，我们刊登了民族工作的史料和民族工作者的亲身回顾与回忆，这使读者更能了解过去民族工作的全貌，并提供了具体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在过去的革命年代里，不论是砂盟或北共，对于民族团结和民族工作都是很重视的，不仅口头强调，实际上也是以主要的人力物力投放到这方面的工作里。应该说，这个时期的革命组织，是怀着对民族工作重要性的理念和抽象的工作信心，就决定动员和开展工作的。因此，民族工作的政策与活动形式，只能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摸索与形成。

在过去的民族工作中，民族工作者们的不怕苦，不怕死和敢冲、敢闯、敢创的革命精神与风格，不断地推动了工作的开展，树立了民族团结与民族和睦的典范。对于所有为民族工作献身的英烈们，我们永远的怀念着他们，并以为光荣的榜样。

从 1958 年开展民族工作到 1990 年为止，我们共坚持了约 30 多年的民族工作。工作形式以非武装（公开合法和秘密非法的）和武装的形式动员民族群众。不论通过非武装或武装的都能达到一定的动员群众和促进革命斗争的发展，但当遭到政治镇压或军事围剿时，都不能很有效的打退进攻，从而更好的保存和发展工作。这是一个致命伤的历史难题，很值得加予关注、研究和剖析的。

我们开展艰巨的民族工作是必然要付出代价的，但由于我们没有工作经验和指导上犯了“左”的冒进错误，以致造成了过多的牺牲损失，作为领导者是应该反思的。

在我们这个多元民族的国家里，深感民族团结和民族和睦是极其重要的，也深感其长期、曲折和艰巨性，所以我们必须以不屈不挠、长期、不断地，在新时期以新形式坚持下去！

在今天的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里，我们的国家，内有种族问题的阻碍，外有全球化的巨大挑战。我们要接受挑战，赶上潮流，民族团结和民族和睦的旗帜就更须高举，再高举！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日



封面说明：

上图：一群当年民族工作者於 2005 年重返六十和七十年代活动过的重要民族区 Ulu Pasai Engkabang，探寻当年走过的路和桥，回忆那难忘的峥嵘岁月。远方朦胧处还可见到当年的长屋。

下图：1959 年人联党成立后，积极到各地开展民族工作。这是当年的民族工作者和民族兄弟姐妹们在长屋的珍贵黑白相片留影。

统一战线中的土著民族工作

艾文斯

（一九四二年）

由于客观的地理原因，目前在土著民族中，普遍地存在着隔绝的现象。他们不仅居住着不同的地区，而且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在他们的生活中亦往往可以缺少的。他们过着原始的生活，因此他们不参加任何活动，不参加土著民族中的工作。这一工作不但是任何形式的工作都将受到阻碍。但真正的工作，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必须做的。目前我们比较重视的是一部分民族的工作，土著民族的工作，我们是不应该忽视的。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必须做的。

民族工作歷史性文件

（在土著民族中的工作）

（一）在土著民族中建立：

（二）帮助土著民族有自身的能力和斗争，并帮助他们取得斗争成果。

（三）帮助土著民族扩大土著民族组织，并帮助他们取得斗争成果。

（四）帮助土著民族扩大土著民族之斗争，并帮助他们取得斗争成果。

（一九四二年）



统一战线中的土著民族工作

—文铭权—

(一九六三年)

由于英帝的挑拨离间，目前在土著民族中，普遍地存在着混乱的现象，他们对革命抱着怀疑的态度，对其他民族有所顾忌，在他们之中进行工作困难是可以想象的。但是目前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迅速展开各种活动，加紧在土著民族中的工作。这一工作不展开，任何其他形式的斗争都将受到限制，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是最薄弱的一环。因而我们必须积极地尽一切力量展开发动土著民族工作，保证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在土著民族中的工作和在华族中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在他们中，我们要充分体谅他们的历史和社会条件所造成的落后状态，要特别注意耐心地等待他们觉悟。这就是说，我们如果不积极地发动他们，工作就不会有进展。不耐心等待就会脱离他们，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做好工作。这就是说，我们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要有策略的耐心。

在土著民族中的工作，基本的步骤是：

- (一) 在土著民族中生根立足；
- (二) 带领土著民族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并且必须要取得积极成果；
- (三) 把组织扩大到土著民族中去，树立起组织在他们之中的领导地位；
- (四) 做好准备，把武装扩大到土著民族之中去，动员起他们联合其他各民族争取政权。

—引自《北加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当前的革命中心任务

—文铭权—
(一九六三年)

北加由接受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革命组织领导的革命运动是首先在砂拉越发展起来的，而这个革命运动又首先在华族中发生的。在华族中革命运动已普遍展开，并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土著民族中，我们的工作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力量还小得很。虽然通过公开政党，我们在土著各民族中的工作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这仅仅是属于合法的公开一面。

在汶莱，革命运动在起义之前几年发展非常迅速，但是革命的核心领导还不成熟，以致遭到这次的挫折。现在汶莱的革命运动急需重建一个领导中心，以便迅速恢复公开活动，以配合武装形式的活动。

在沙巴，不论在华族中或土著民族中，革命运动都开展得非常迟缓，直到现在为止，这种局面还没有改变。

在北加受压迫人民最惨重的土著民族中的工农。一般的说，在土著民族中，除了极少的工人以外占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处于原始社会中的农民，生活极端贫困。这些人的总和约占全人口的三分之二，是最迫切要求革命的一群。

华族和马来族的工人、农民和渔民所受到的压迫仅次于土著民族。他们也迫切要求革命。


其他各阶级各阶层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要求改革现实。

目前客观上存在的严重情况就是民族间隔离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即过去汶莱苏丹对各邦的残酷统治，使得土著民族对马来族有很大的疑惑；由于英帝的长期挑拨，土著民族对华族也有一定的戒备。

此外英帝的长期统治也使土著对这些豺狼具有一定的幻想。华族和马来族的上层对英帝的幻想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革命不争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支持是不行的，否则，我们会失败，我们因此不能不等待土著民族的觉悟，不能不打破人民对英帝的幻想。

这样，展开合法和非法、公开和秘密、和平和武装斗争就成为两种不可分割的斗争形式。由此也规定了我们目前革命运动最重要的中心任务是：到土著民族中去。北加的革命前途主要地也以土著各民族人民对革命的态度为转移，他们支持革命，革命就一定能取得胜利，反之革命就一定要失败，打破上层分子对英帝的幻想也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个问题，必须配合土著民族的工作来解决，必须以土著民族工作的发展情况拟定具体方针和任务。



—引自《北加革命问题研究》

关于兄弟民族的问题

文铭权
(一九六三年)

关于兄弟民族的问题—主要是指伊班族及社会发展阶段处于相似情况的其他民族问题。

帝国主义利用“分而治之”的手段统治了我们一百二十多年。在各民族心里都造成了对其他民族的不信任和猜疑。帝国主义正利用各民族之间的这种不信任和猜疑才得以维持他们的统治。今天反动统治集团仍然利用那样的手段来瓦解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以达到它统治的目的。

百年来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近十年来一脉相承的反动封建官僚买办的统治采取所谓“怀柔”和拉拢收买的政策代替暴力统治手段，一方面使得各兄弟民族自生自灭，一方面通过资本主义文明掠夺（物质上）和奴役（精神上）使他们处在极为贫困和落后的景况中。长期以来，英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这种统治造成了兄弟民族和所谓“文明社会”的隔绝。两者之间俨然成为在同一反动统治者下的二种不同的社会。在他们的社会中到目前为止，作为普遍现象来说，社会分化还是不很明显的，内部阶级矛盾也还不是很激烈。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了他们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这些特殊的情况，也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了他们在当前的特殊心理状态。因此，在革命过程中，他们有着和其他民族不同特殊的要求，这是很自然的。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受到其他民族的压迫和剥削；作为一个阶级（阶层），他们还是属于比较贫困的农民，受到其他阶级（主要属于其他民族）的压迫和剥削，这样他们的问题既是民族问题又是阶级问题，这两者密切的关联，而当前突出的明显的问题则是民族问题。当然，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问题。只有阶级的最后解放，民族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但是我们是革

命阶段论者又是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革命即要分阶段进行又要不断进行，绝不可停顿。

从国家的整体来看，我们主张先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最后实现共产主义。

在民族问题上，我们要历史地看问题，也要从实际出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有他们自己特殊的要求；从实际来看，当前的革命形势已经把他们的特殊要求和全国革命人民要求密切联系在一起。他们要革命，要解放，这点我是坚定不移的。他们长期以来受到挑拨，受到欺骗，渴望摆脱控制和愚弄；他们长期以来深受压迫和剥削，渴望改变现状，兄弟民族要起来革命，也能继续革命，这是没有疑问的。诞生要发动他们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起来和其他民族一起进行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则必须有一个符合历史要求，符合兄弟民族并且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民族自治的口号，必须恢复他们高度的民族自尊感，才有可能有效地、最快地、最大限度地做到这一点。没有充分尊重民族独立自主的权力，即不可能有高度的互相谅解和信任，就不可能有高度合作和团结战斗，没有谅解和信任，没有互助和团结，民族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国家的解放更不可能。我想，我们可以由此作出结论：

（一）在兄弟民族中须有首先实现真正的民族自治，就不可能最大限度地发动他们起来为国家的解放和统一而奋斗。兄弟民族参加全国解放斗争的过程要分二步来走，第一是民族自治，第二是全国的解放和统一。

（二）由于目前革命斗争形势已经把各民族的民族自治斗争和全民族的解放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已经成为后者的一部分，各兄弟民族的要求已经成为全国人民要求解放的一部分内容。他们的阶级的斗争，主要是内容上，而不是从时间上来区别的了。

(三) 兄弟民族要彻底解放，就必须在获得民族自治，获得国家解放和统一下，继续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共产主义。

兄弟民族占全国人口多数，他们最贫困、受压迫最深，他们必将成为工人阶级领导可靠的同盟军。他们是住在远离城市而又占全国面积大部分的深山里，他们的地区是我们的游击战、持久战的重要战略基地。革命形势要求我们为民族自治而奋斗，在兄弟民族地区建立起自治的政权，使之成为革命的根据地，充分动员他们起来为全国的解放共同奋斗。

这口号是否正确，就要看它是否代表兄弟民族的最大利益，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兄弟民族的各阶层人民，是否能最有效地取得大多数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进步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

有关边区伊班民族解放同盟的工作指示

(1969年3月28日)

正当印马反动政权对边区步步加紧进行反革命“围剿”之际，组织上根据当前整个革命工作的实际及其具体的可能性，毅然地宣布成立边区伊班民族解放同盟。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边区革命斗争的胜利！

边区伊班民族解放同盟的成立，说明了边区民运工作的新发展，意味着边区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是边区斗争和国内斗争更加密切配合的新标志，是北加人民武装斗争和印尼人民革命斗争进一步聚集结合的，新的里程碑。

我们一致认为，成立边区伊班民族解放同盟的决策是英明正确的，是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是极为重要的。我们深信在组织这一决策的光照耀下，在全体革命同志的艰苦奋斗下，今后整个边区势必将会出现一片更加朝气蓬勃的、更加生动的革命新局面，我们在边区的工作也必将取得更多更大的革命成绩。

本领导机关在此坚定要求有关的全体干部战士，立即行动起来，热烈地响应组织上的伟大号召，积极地、创造性地为完成有关组织边区伊班民族解放同盟的光荣任务而艰苦地工作，英勇地战斗！

为了帮助同志们更好地学习有关问题，确保能更有效地进行工作，本领导机关特此发表有关指示，我们责成全体工作人员都能认真讨论，深入研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提高认识，因时因地制宜地做好工作，力求卓有成效地完成好组织上所交给的任务。

一、关于成立边区伊班民族解放同盟的重要性问题

(一) 它是革命组织在边区伊班社会中贯彻执行我国当前革命工作总方针的有效形式，(二) 几年来的奋斗经验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边区搞群众工作必须要有一个能直接代表边区伊班民族利益的革命组织，有了这样的组织才有可能更好地动员、组织、教育和领导边区广大民族群众进行自觉的革命斗争，从而把我们在边区的各项政治任务，特别是民运工作，进一步迅速把推动起来。

当前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已迫切要求我们在边区能有一个伊班民族自己的革命组织，在这个组织的正确领导下，使边区革命群众更紧密的团结起来，坚强地向印马反动政权展开斗争，争取早日实现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革命胜利！

二、关于成立边区伊班民族解放同盟的可能性问题

(一) 边区广大的伊班民族群众历来都是受到压迫和剥削，特别是在印马反动政权的统治下，他们更是灾难深重。目前他们的阶级觉悟，政治觉悟，正在逐渐提高，敌我矛盾正在日益加深，他们要求自由民主，要求自治独立，他们反法西斯统治的革命情绪和斗争情绪正在不断增长和高涨。(二) 几年来在边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目前我们已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准备了一定的干部条件。(三) 边区伊班民族解放同盟是边区伊班群众自己的革命组织，它是彻底代表伊班民族的利益，它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提出符合伊班群众要求的斗争口号，它能全心全意为伊班人民服务，因此，它具有强大的革命吸引力，是一定会获得边区广大人民群众欢迎支持和拥护。

(四) 它有英明正确的革命领导，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它是代表边区新生的力量。因此，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它一定会在艰苦曲折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并最终取得胜利。(五) 在工作中可能存在的落后性、困难和某些不利的因素，诸：1，克服群众当中普遍存在的落后性，把一般群众教育和改造成为一个具有政治觉悟，有思想觉悟的先进分子或进步分子，这无疑是一件极其艰苦的工作。2，在敌人使用高压政策下，群众一时可能会产生恐惧和害怕，甚至在盟内可能会出现某些动摇和变节分子，因而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一定的阻碍

(一) 它是革命组织在边区伊班社会中贯彻执行我国当前革命工作总方针的有效形式，(二) 几年来的奋斗经验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边区搞群众工作必须要有一个能直接代表边区伊班民族利益的革命组织，有了这样的组织才有可能更好地动员、组织、教育和领导边区广大民族群众进行自觉的革命斗争，从而把我们在边区的各项政治任务，特别是民运工作，进一步迅速把推动起来。

当前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已迫切要求我们在边区能有一个伊班民族自己的革命组织，在这个组织的正确领导下，使边区革命群众更紧密的团结起来，坚强地向印马反动政权展开斗争，争取早日实现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革命胜利！

二、关于成立边区伊班民族解放同盟的可能性问题

(一) 边区广大的伊班民族群众历来都是受到压迫和剥削，特别是在印马反动政权的统治下，他们更是灾难深重。目前他们的阶级觉悟，政治觉悟，正在逐渐提高，敌我矛盾正在日益加深，他们要求自由民主，要求自治独立，他们反法西斯统治的革命情绪和斗争情绪正在不断增长和高涨。(二) 几年来在边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目前我们已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准备了一定的干部条件。(三) 边区伊班民族解放同盟是边区伊班群众自己的革命组织，它是彻底代表伊班民族的利益，它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提出符合伊班群众要求的斗争口号，它能全心全意为伊班人民服务，因此，它具有强大的革命吸引力，是一定会获得边区广大人民群众欢迎支持和拥护。


(四) 它有英明正确的革命领导，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它是代表边区新生的力量。因此，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它一定会在艰苦曲折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并最后取得胜利。(五) 在工作中可能存在的落后性、困难和某些不利的因素，诸：1，克服群众当中普遍存在的落后性，把一般群众教育和改造成为一个具有政治觉悟，有思想觉悟的先进分子或进步分子，这无疑是件极其艰苦的工作。2，在敌人使用高压政策下，群众一时可能会产生恐惧和害怕，甚至在盟内可能会出现某些动摇和变节分子，因而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一定的阻碍

和破坏。3，在印马反动派继续加强对边区的军事“围剿”的过程中，相信也一定会增加我们在活动上的困难等等，（六）但是有利条件是重要的，而且它继续正在出现和增加，不利因素是次要的，而且它将会逐步转化和减少，我们一定要发挥主观努力，充分利用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坚决把工作任务完成好。

三、关于发展边区伊班民族解放同盟应注意的问题

（一）要全面深入调查研究，切实掌握有关工作地区和工作对象的实际情况，特别是那些具备要发展的对象，我们一定要对他们有客观的了解和认识，决不可以只看表面现象，只凭“想当然”的主观估计，或只简单听别人的介绍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大量地、详细地占有实际材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唯一有效的方法。（二）必须注意质量，切莫华而不实，只求数量和广泛，不求质量和提高的工作作风，应该严加反对。处在目前这种情况，我们更须要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地工作。（三）认真做好保密工作，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在群众中要防止严密的暴露，在吸收时要提防奸细分子的渗透。（四）在组织工作上，目前应采用边发展边巩固——边巩固边发展的原则，这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的方法。发展不加巩固就没有基础，巩固不再发展就不能壮大，发展和巩固是有机的联系。只有两者紧密地相结合，才能确保组织工作稳健地向前发展。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在进行发展工作或是巩固工作，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并重视搞好福利是我们必须紧抓的第一条原则。（五）吸收盟员的方法可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采用个别吸或集体吸，直接吸或间接吸等形式，吸收工作应该是耐心从启发教育提高认识者，在自愿自觉的基础上进行。（六）应该认真加紧培养伊班干部，在工作中充分动用他们，并尽快形成他们自己的领导机关。在某些问题上，我们既要避免包办代替，也要避免自由放任。（七）要正确对待彼此间的关系，就某种情况来说，边区伊班民族解放同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革命团体，它与北盟、砂农等革命组织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兄弟的关系。以前加入北盟、砂农的边区人民，当他们参加了边区伊班民族解放同盟后，除非有特殊需要，否则一律宣布取消

止他们旧有的组织关系，以便能健全边区人民群众的组织，统一边区群众工作的领导。（八）关于入盟基金和月捐问题，应按照各地各座长屋群众经济的实际情况合理加于处理。我们应该规定每个成员都得各尽所能，有钱出钱，有物出物，认真履行缴捐义务，充实盟的财政，以资必要的开消。（九）为了发展边区伊班民族解放同盟的实际需要，我们应特别加强政治思想攻势。在宣传内容方面大要有：1，关于当前的革命形势问题。2，关于人民生活痛苦的根源。3，关于伊班民族解放的道路。4，关于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5，揭露印马反动派及其走狗的野蛮罪行。6，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敌人必败，我们必胜。7，关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问题。8，关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9，关于破私立公，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10，关于北加革命部队的性质、宗旨及其几年来的光辉事迹。11，关于印尼人民和北加人民应该相互支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问题。12，关于伊班民族的战斗史。13，关于保密问题的教育。14，盟的成员一定要努力同他们学习简要及其他有关文件。15，其他问题如：时事，战斗消息，重大事件等，及时地进行必要的宣传。



xx 领导机关

十几年来伊班民族工作发展

(1977年9月4日)

◆ 探索

一、砂拉越与北加革命的发展

北加是北加人民的，北加的解放，主要必须依靠北加人民的团结战斗来实现。而动员组织群众参加武装斗争，是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心任务。

砂拉越有华、伊、巫三大民族，其中华、伊两族约占人口的65%，尤其伊班族不但人口最多，而且占地广阔和具有很大的战略意义。所以这两族的团结战斗，砂拉越和北加的解放就有了基本的保证。因此，在砂拉越在华族革命工作开展的基础上，同时开展伊班民族工作，就成为关系革命成败的迫切任务。

我们的组织和党，根据砂拉越华、伊、巫三大民族的人口占的战略地位，革命性和民族关系，决定首先和着重开展伊班民族工作，又由于拉让江流域在砂拉越所占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伊班族人口最多，而成为伊班民族工作的重心。

二、1958—1963年的民族工作发展

1958年，我们的组织开始正式提出搞民族工作，首先在第一省号召同志们参加民族工作，同志们起初虽不够热烈响应，但经反复的动员才较为热烈的响应。组织上还建立民族工作的专门负责机构，派出同志们到各处调查民族社会情况，研究和制定民族工作政策，训练民族干部。到了1958年底，第一批的民族干部从第一省派到第三省，1961年再派到第二、四省去开展工作。第一批民族干部一般都派到较深入民族区开展工作，也有少数在混合民族区开展工作，他们多数以割胶和少数以做生意掩护开展工作。这时的民族干部思想和理论水平相对低，多数语言不通，又远离领导，群众又落后，工作干部一

般的思想斗争相对剧烈（消极与积极，坚持与离开工作的斗争，成为主要的思想斗争内容）。1959年，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宣告成立，在这之后，我们利用政党开展合法的民族工作，这对我们广泛的了解民族社会和广泛宣传民族群众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在拉让江流域各主要的河流，我们都派人民联合党的民族宣传员反复去宣传，各主要的河流大都有个别秘密工作组进行活动。1962年，汶莱武装起义后，公开和秘密的民族工作还是继续，甚至得到加强。1963年之后，一批民族干部在加昂上游的巴勒河被捕，民族干部力量受到一次较大的削弱，同时内部分化淘汰又日益严重。到了1964年，许多地区的民族工作陷于停顿，只有少数地区的工作继续坚持，民族工作从高潮开始转为低潮。

在这个时期民族工作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基本是正确的，但它错误的一面，主要的错误是：（一）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混合民族区，而是放在深入民族区；（二）公开民族工作和秘密民族工作结合得不够好，不够重视利用公开形式开展民族工作，不够重视利用公开形式掩护和为秘密工作创设条件；（三）非法保干政策执行不好，造成大批干部被捕等。

这个时期民族工作者的敢冲敢闯，是很值得以后民族工作者学习的，这个时期，民族工作的主要成绩是：（一）初步了解了伊班族社会；（二）制定和掌握了初步的民族工作的政策和策略；（三）提高了伊班族的觉悟和促进华伊团结；（四）培养了一定量的民族干部等。

三、1964—1967年的民族工作发展

这是革命的低潮时期，也是民族工作的低潮时期。在这个时期，公开民族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秘密民族工作也大为削弱。拉让江的民族工作只剩下少数混合区民族区还坚持着，而深入民族区的多数已失去，第二和第四省的民族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到1966年前后，第二省又开始搞民族工作，第三省也有一小组试验武装搞民族工

作。与此相反，在印尼边区的民族工作还随着武装斗争的坚持和发展而有着更好的发展。

四、1968—1973年的民族工作发展

这是处于国内武装斗争高潮时期，也同时出现民族工作的新高潮。第一、二、三、四省有进行一定的民族工作（主要是武装宣传群众），其中第三省的民族工作进行得最广泛和最深入，很大部分的长屋都武装宣传过，也打下了一定的工作基础。

我们武装部队所到之处，多数伊班群众都能支持和相当热情对待我们，对我们持敌对态度的是极少数，少数先进伊班群众能给我们一定的物质支持，能够为我们了解敌情和购买物资；有少部分群众被拷打和坐牢，有的甚至为革命牺牲；还有成千成万的群众被迫关进“新村”，但他们中的许多还是是非分明，不埋怨，不责怪我们；更有少数伊班先进分子还参加了部队（大约有20多位，其中第三省占多数，占了10多位）。在这个时期，伊班族对武装斗争的态度，多是同情，并给一定的实际支持，但一般上还是持观望态度。民族区所面对的实际困难，就是民族群众的觉悟问题和粮食问题，能够提高群众的觉悟问题，也较可能解决粮食问题，也较可能改变当前民族群众对武装斗争的基本态度。

这个时期的民族工作和武装斗争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没有武装斗争，就没有民族工作。民族工作的基本政策，就是武装动员群众。其具体的主要政策和策略是：（一）初以深入民族区为重点，后以混合区民族工作为重点，逐步的深入；（二）边搞边打；（三）以流动突击宣传为主，以搞点为次；（四）以政治宣传为主，并结合医药、文娱和生产劳动团结群众。以上的政策和策略经反复证明基本是正确的。事实也反复证明：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根本谈不上民族工作。

我们在这个时期的民族工作政策是更加实际有效和更完整，

但也犯过一定的错误，主要是不够重视混合区民族工作，混合区民族工作也曾违反过逐步深入的原则，使工作遭到了不必要的损失。

我们的党和军队为了这个时期边区和国内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区的武装斗争，付出了最多的人力物力的牺牲代价，为数约一两百位同志为民族工作和民族区的武装斗争牺牲，为数约一两百枝枪损失。在民族工作阵地上，数以万计的经济用在民族工作上，我们的同志的确也为了民族工作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为了民族工作受苦受难，这是我们革命者应感到光荣和自豪的。

在这个时期的民族工作，我们付出了相对大的代价，但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也相对大，其主要成绩是：（一）更广泛、更深入的了解了伊班社会，更实际、更完整的制定了民族工作的政策和策略；（二）更广泛、更深入的影响了伊班群众，更有效的提高了伊班族的觉悟，使众多的伊班群众了解我党我军的性质，并树立了一定的威信；（三）有力的推动了武装斗争的发展并为武装斗争的长期坚持提供了条件；（四）有力的打击了敌人的民族离间政策和促进民族团结；（五）促进了华族工作阵地的巩固发展；（六）打下了有一定的民族工作基础，等等。此外，更为今后民族工作和武装斗争的更广泛开展和华伊的更大联合创设了条件。

五、1974年到现在的民族工作发展

到了1972年底，在印尼边区的部队已完全转进国内，印尼边区的民族工作也随之中断。1974年，除了第三省能继续坚持民族工作之外，其余地区的民族工作都停顿，民族工作也和武装斗争同时遭到一次严重的挫折。

在这次民族工作低潮中，第三省的民族工作也遭到一次较大的削弱，但各主要民族工作地区都还有同志继续坚持活动，我们对民族群众还能够继续保持一定的联系，还能够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民族工作。

1974年，民族区活动受到比较大的节制。1975年，又开始逐步放手的活动，1977年，又重新得到加强，更可贵的是伊班族，在当前的武装斗争低潮中，还有新的觉醒。我们坚信在这次低潮中，民族工作一定能够坚持和得到新的发展。

六、小结

砂拉越对北加革命的发展能够起最决定的作用，而砂拉越的华、伊团结，特别是拉让江的华、伊团结，对砂拉越的革命发展也是能够起最决定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华族革命发展的基础上，集中可能集中的力量大搞伊班民族工作，是很必要、很正确的。在今天进一步开展伊班民族工作，更是革命斗争和武装斗争巩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我们对这方面工作不但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尽所能给予加强。

在过去伊班民族工作是随着整个革命斗争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武装斗争之前，它是随着争取自治独立运动、反马运动和华族革命工作的开展的。在武装斗争之后，它是随着武装斗争和华族革命工作的开展而开展的。所以今后的伊班民族工作还是较可能随着武装斗争和华族工作的开展而开展的。因此，我们还是必须努力通过搞好武装斗争和华族工作，以推动民族工作的开展。

伊班民族工作是有它必然的发展趋向的，以边区为民族工作基地的，必须从边区逐步深入国内，以国内华区为基地的必须从华区发展到混合民族区，再从混合民族区发展到深入民族区。

今天我们是已把革命工作的重点放在民族区，在今后伊班民族工作将有可能逐步取代华族革命工作，对一切革命工作的主要推动作用。但我们还必须继续重视华族工作，还必须在巩固发展华族工作的基础上，努力动员可能动员的最大力量，不断的坚持和加强搞好民族工作，这是当前华伊工作的正确关系。

今后我们要使伊班民族工作为武装斗争作出更大的贡献，有两个重要的任务（即提高伊班族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生产力）必须解决。解决了这两个任务，民族区就成为武装斗争的好地方，要解决这两个任务，没有通过武装斗争，没有通过建立武装斗争基地和根据地，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今后要搞好民族工作，除了必须有以上的认识和做法之外，还必须突出杀敌夺武；还实行流动宣传与重点搞，政治宣传与医药、文娱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还必须动员华族群众积极主动搞好华伊关系，以及利用有利形势等办法。在今天，我们要特别通过搞好武装斗争和通过基地的战略任务去推动民族工作。

在今天，只要我们充分认识民族工作的发展规律，认真的吸取过去的工作经验，提出更正确更完整政策，我们是一定能够把民族工作更好地搞起来。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民族工作是能够逐步的得到发展的。但要有大的发展，除了政策正确之外，就必须有更好的国内斗争形势，特别是伊班社会出现新的矛盾和出现新的斗争要求，并且同时涌现出大量的华、伊民族工作干部。在没有具备这些条件之前，我们必须耐心和热情的坚持奋斗，把积极的工作和耐心的等待正确地结合起来，自觉的避免工作上的过“左”过右的错误。

伊班民族工作的确是长期艰苦的，但又是伟大光荣的工作。我们每个工作者一定要立下最大的革命决心和最大的民族工作决心，愿意为民族工作承担最大的个人牺牲，不怕长期曲折和有打持久战的勇气，并坚持不断的学习、工作和改造，才能为民族工作作出最大的贡献。

伊班民族工作的展望

(1980年)

◆ 探史

1834年至1841年，砂拉越人民的反封建起义，严重的威胁汶莱苏丹在砂拉越的统治。英殖民主义者詹姆士利用了这场战争而取得对砂拉越的统治权。1841年，詹姆士宣布成为砂拉越的第一代拉者。不久，他就带兵进攻伊班族。在白色拉者统治的101年中，有93年与伊班族经常发生交战。

在白色拉者统治时期，伊班族为什么那么强烈和持续的反抗呢？其主要原因是：（一）19世纪40年代，砂拉越人民正处于反帝反封建的高潮，人民斗争空前昂扬，而白色拉者侵占砂拉越把伊班族视作最大的敌人加予烧杀掳掠，不断残酷的镇压，这自然会引来伊班族的强烈反抗。（二）伊班族的原始经济有利于战争中的自力更生。（三）伊班族居住于内陆山地森林区，有利于武装反抗。（四）伊班族具有斗争和战争的传统。所以当他们不论在海上或陆上遭到残酷镇压时，必定会群起反抗的。由于以上各种因素，白色拉者和伊班族之间的长期战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可是1934年至今，伊班族为什么还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呢？主要的原因是：（一）不论是英殖民主或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他们都是以华族为剥削、压迫和打击的主要对象，而且对伊班族更实行了怀柔和离间政策，特别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实行改良主义政策；（二）由于过去反抗斗争屡遭失败而形成消极观望态度；（三）伊班族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不够高，不易打破各种思想的束缚。由于有上述的因素，在过去40多年里，伊班族就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反抗斗争。

今后在什么情况下，伊班族又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呢？如果能够具备以下的条件，即：（一）伊班族遭到反动派更大的剥削、压迫和打击时；（二）当伊班族有更高的斗争觉悟时；（三）

当伊班族能够更好的看到斗争的新形势和胜利的前途（例如敌人更虚弱，人民力量更强大，国际支援更有力）时，伊班族必定会重新奋起斗争。

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要大力发动伊班族显然缺乏必须的条件，但逐步发动伊班族的条件是具备的。这些条件是：（一）伊班族是不满现状和要求改变现状的；（二）伊班族较多同情、或支持革命和武装斗争，少数还可能积极支持和参加武装斗争；（三）我们已打下一定的伊班民族工作基础（一定的伊班民族工作干部和一定的群众基础）；（四）有党和军队的领导和推动；（五）我们已更有办法开展民族工作。有了以上的条件，我们是能够逐步开展好伊班民族工作的。

我们今后应该怎样加速伊班民族工作的开展？主要的办法是：（一）要通过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形式去宣传、教育和组织群众，以武装斗争形式为主，以非武装斗争为辅。（二）在非武装形式方面，主要是利用公开政党宣传、组织群众，使各种伊班广播、书刊办得更有利于伊班族的觉醒，使伊班学校办得更好；发动伊班族争取更多的发展津贴和生活津贴；发动伊班族为保卫森林资源而斗争，等等。（三）在武装形式方面，要不断加强基地建设，把它作为培养伊班本民族干部的好场所；要着重流动宣传、医药卫生工作、指导生产和文娱活动等相结合；非武装方面也要推动群众进行各种合法斗争。只要我们能够充分的利用各种工作形式和保持工作下去，逐步取得新的工作成绩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伊班民族工作还存在不少困难，这主要是伊班社会的阶级矛盾不够尖锐和普遍存在对斗争的观望态度。要解决这方面困难，不但需要时间，也须要我们做极大的努力才能解决。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有利的方面，即：（一）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和民族独立解放力量，尤其是中国和东南亚革命力量必将会给我们越来越大的帮助；（二）不易摆脱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旦不可遏止的爆发了，现在还很贫困的伊班社会是很可能爆发斗争的；（三）苏越霸权

主义一旦入侵北加，伊班族是非常可能更大规模卷入斗争的；（四）马来沙文主义的不断推行，必将加强华伊的联合斗争；（五）伊班族的可耕地越来越少和贫瘠；（六）北加可供掠夺的资源已不多，有可能迫使敌人改变剥削形式；（七）疯狂的砍伐森林也会引起部分的伊班族的斗争；（八）有日益有力的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领导和推动。有了上述这些有利的条件，就有使我们坚持工作下去和逐步取得新的成绩的可能，而且还有更大突破困难的可能。总之，我们的民族工作是长期、曲折的，但也是有光明前途的。

同志们，让我们更满怀信心和激情，为艰巨光荣的伊班民族工作而奋斗，再奋斗吧！

我们已为伊班民族工作作了长期艰苦的斗争，也为它付出了代价，但它也作出了贡献，我们的血汗没有白流。我们的伊班族工作也曾出现过停滞倒退，但它也是在不断的曲折中前进，我们的伊班民族也是一个伟大、有希望的民族，相信总有一天我们的伊班民族会更广泛的行动起来，参加武装斗争的行列。

对伊班民族斗争的探讨

(1981年8月19日)

重新搞好伊班民族工作是当前发展革命力量任务中具特殊意义的一环。这里就伊班民族的觉醒问题，试探讨点滴供大家参考。

(一) 过去伊班民族会奋起斗争的原因

(1) 最主要原因是，当时伊班民族是英殖民主义者剥削、压迫的主要对象。当时砂拉越的华人除石隆门矿工区稍多外，只有散居在几个小市集做买卖的极少一些人；直到本世纪初，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步多起来，并逐步扩居到离市集不太远的农村。因此，华人在那相当时期内并不成为英殖民主义者剥削压迫的主要对象。而我们知道伊班民族本来是刀耕火种的，还处极贫困的自然经济的，向来未曾受过什么法令过分束缚的比较爱自由的半原始的民族。因此在当突然来了什么外来白人的统治，又被强迫这样做，又要纳那样多的税，当然极为不满。他们不满他们世代生活的土地被宣布为拉者的土地，不满强迫缴税，不满破坏他们的原有生活方式，又加上伊班民族本来就有反抗性和战斗性的，所以在这个民族成为主要剥削压迫的情况下，也就成为主要的反抗力量了。

(2) 英殖民主义者在统治之初，对伊班族主要采取高压政策，经济上也进行对伊班人所不能应付的剥削。如强迫伊班人向堡垒炮台官员缴付门牌税，没有钱就强迫以稻米来当款，不交出就派兵去打（比如 1886 年 Kedang 的伊班人没交门税，竟派兵去打之）；如伊班人过关卡也要付关税；如 1856 年 6 月在如楼向做小买卖的伊班人强迫抽税，激起反抗；又如 1930-1931 年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砂拉越，土产大跌价，百斤树胶只值 4 元，而拉者却训令伊班人每个家庭每年须缴一元税收，激起伊班人极大不满，终于演成恩大拜河 Asun 率众反抗七年之久。英殖民主义者从 1841 年统治开始后，就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手段，过后，拉者在砂拉越各河流域土著酋长会议上宣布不可与不和政府合作的伊班人来往，否则将以同等罪名处之。会议严禁

盐、铁等必需品流入反抗地区的伊班人手中；1876-1882年拉者又先后宣布 Katibas、Baleh 为禁区，不准伊班人移居，违者受罚；拉者强迫伊班人做通行证，伊班人若迁移他处而无取证者在第二省罚款 14 元，在拉让江罚款 5 元；拉者还强迫伊班人在离开本区时，须以贵重物品为抵押（置古瓮、铜属品等贵重物品于政府办事处）。若久不回来，则被没收；1926年后，拉让江流域伊班人还被限令必须居于不超过十户家庭的长屋，以便控制；1931年7月，拉者在拉让江中游进行强迫收枪，迫使 Kendawang 群众反对。历代白色拉者还在对付伊班人反抗的军事行动中采取了极为残忍的暴行。如 1856 年查理士·布律克就曾狠毒地说：“进攻如梭区伊班人的目的是焚烧和毁坏”。他还说：“妇女也应受难，因为她们是这些男人们敢于起来反抗的鼓舞者和怂恿者”。他认为仅仅杀了男人的生命还不是根绝反抗的全部办法，还要烧村落、稻芭。他说：“烧毁村落，就使他们失掉赖以生存的物质，使他们深感恐惧”。就在这次 6 月 18 日到 20 日的进攻如梭中，就至少焚了二十五座长屋。据统计，在布律克家族 101 年的统治中，至少杀死二千多个伊班人，焚长屋至少六百多座，其他稻芭，财物破坏无数。纵观上述史实，英殖民主义者如此无耻残暴地剥削、压迫和屠杀，怎不迫使伊班族做长期拼死的反抗！无怪乎刽子手查理士在 1860 年哀叹：“我们有很多敌人在 SIKARANG, SIRIBAS, KRAIN, SARIKEI, KANOWIT”。1903 年到 1906 年是继仁达长期战斗后，由 Bantin 领导的更为激烈反抗的“动乱年”，当时英殖民主义者已无法控制局面，在《砂拉越宪报》中刊登伊班人消息还要经审查。

(3) 伊班族当时还比较有斗志，有自信心，还认为自己有可能打败侵略者，有许多伊班人由于不甘受屈辱，就是战死或饿死在深山也甘愿。

(二) 当时伊班民族斗争失败的原因

长达近百年的伊班民族抗英斗争先后都失败了，归结起来有下列数点原因：

1. 当时还未有先进的阶级、先进的思想和先进的革命组织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斗争；

2. 力量对比悬殊，尤其处于长期单一民族为主的斗争中；

3. 敌人高压政策和分化政策长期施行。在分化政策方面比如：
(a) 以伊制伊。查理士·布律克曾说道：“只有达雅人才能杀达雅人”，他熟悉伊班人的习俗，他的主要策略是以伊班人打伊班人，从伊班人内部着手瓦解，隔离他们的反抗力量，封赠有影响力伊班酋长，利用投降的酋长带兵打本民族人。一世拉者詹姆士布律克曾为诱引伊班人充当炮灰，规定：凡参加出征的伊班人和马来人可免缴赋税。利用此法，一次出征竟可凑集 5 万人。到三世拉者时，参加征讨者照样可免税，且可获得烟草。他们还怂恿士兵乘胜放火时，可掠夺一切东西，如古瓮、铜属品、猪、鸡、草席、鱼网等诱使他们效力。
(b) 禁止伊班人和马来人混居，散播离间民族关系的谣言。

(三) 后来为什么不能奋起斗争？

(1) 华族已逐步取代伊班民族而成为英殖民主义者剥削、压迫的主要对象。从二十世纪起，华族人口逐步在砂各地城乡增多，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增加更快。更由于华族善于在工商、农业方面经营，经济发展很快，使逐渐取代伊班人成为被剥削的主要对象。而华族乡土观念和民族自尊心强，又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背景，因此就自然逐渐也成为被怀疑和被压迫的主要对象。这样，随着剥削和压迫主要对象的转移，伊班族与当时反动统治的矛盾也就逐步下降。

(2)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从华族群众中的剥削增多，使得英殖民当局更有条件搞改良主义，以小恩小惠收买伊班人。再加上长期欺骗性宣传，如把伊班人和马来人同样称做“土著”，把华人叫做“非土著”，说要“照顾土著发展”等。

(3) 整百年的斗争和后来的失败，挫伤了民族斗志，使他们感

到不易打倒敌人。这样又在敌人的假意安抚政策下，逐步使伊班民族相对安于现状。

(4) 许多国家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民族在被征服后如没有较大社会震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会稍为沉睡一个时期的。

(四) 反大马高潮时为何伊班族能相当积极参与？

在六十年代的反大马浪潮中，广大伊班民族不能容忍砂拉越被轻易再度出卖给马来人占统治地位的马来亚，而沦为次等殖民地，广大伊班族不但在非武装斗争方面相当踊跃参加，在反马武装斗争方面也有一部分先进分子参加，除了先后在第一、二、三省参加我军的以外，早在 1962 年汶莱事件中，也有一些伊班族工人勇敢地参加了“12.8”起义。一些伊班战士还在这场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很好地说明了，深受剥削、压迫的伊班族是一个具有光荣的抗外侵略、热爱自由和敢于斗争的民族；这也很好地说明了，当社会发生比较大的不合理变化时，是有可能激起许多民族，即使相对还落后的民族的觉醒和斗争。

伊班族在当时还可能由于对伪大马计划的恐惧，尤其对向来比较多欺压他们的马来族的将成为直接统治者的恐惧；而且当时反马斗争有五邦联合力量，又有国际声援，各族都动员起来了，他们比较能看到力量，并对胜利怀有希望。因此，他们也积极参加到这股潮流中来。这也向我们表示，当革命形势到来时，当光明比较显露时，伊班族是能够参加到大革命的行列中来的。

(五) 这十几年来又为何不能积极参与反马？

(1) 反马浪潮的转低。在敌人高压政策下，汶莱人民武装起义失败了，由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也由于国内外诸方面原因而长期处于逆境中奋战，伊班族在看不到革命很快就会胜利的情况下，加上本民族百年反抗未能取胜的经历，因此一时采取相对消极、观望的态度。

(2) 伊班民族社会还未形成较先进的阶级，先进的思想还只为极少数优秀分子所接受，因此在如同近十多年来的这样艰苦的斗争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容易直接参与的，在社会尚未有较大变动之前，这种状况不易有大的改变。

(3) 改良主义分化政策的影响。由于多方面原因，使伪马当局这些年来在改良主义的小恩小惠的收买政策和欺骗性宣传方面做得比较多一些。如用假议会民主把一些他们信得过的伊班人拉去充当有名无权的议员，甚至入阁当部长搞各种小型乡村发展计划，搞津贴，搞医疗服务，通过伊班语电台长期宣传等等，这对觉悟不够的大部分伊班族兄弟是有相当的欺骗、蒙蔽作用。而且由于华族日益更成为伪马剥削、压迫的对象，也使反动当局更加重视争取伊班族，以孤立华族社会中的反抗斗争。再者，我党武装斗争的战略重地是民族区，这也更迫使敌人更加重视和我党争夺对伊班族的影响力，因而也更多搞改良主义。

(4) 我党未能及时提出更适当的动员伊班族的形式和内容，也影响对伊班族的发动工作。

(六) 今后会使伊班民族重新奋起斗争的因素

1. 从整个来说，伊班族是深受剥削、压迫的民族。伊班族的生活水平普遍低落，他们是砂拉越三大民族之一，然而他们的语言却不被列为官方语言，连起码的本民族文化教育都没有，他们的社会地位普遍低，因此，他们又是最受歧视的一个民族。伊班族的这种社会经济、政治决定他们必然潜伏着巨大的反抗性。而从历史上看，这个民族的确是有其光荣反抗外国侵略传统的民族，他们曾在布律克家族统治的 101 年中就足足反抗了 93 年。因此，只要革命时期到来或社会发生较大危机，伊班族是完全有可能重新大规模奋起斗争的。不过从眼前情况看，这个广泛动员的条件是还不具备，但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益深重，在苏美争霸加剧，世界战云翻滚，尤其苏越霸权主义对东南亚各国日益咄咄逼人的形势下，在世界革命条件日益更加成熟的

情况下，这个民族的逐步被更好一些地动员起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2) 伪马反动统治和广大伊班群众的矛盾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在激化之中。18年来，尽管伪马当局搞了不少小恩小惠和进行许多欺骗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对相当部分伊班族会有某些暂时的蒙蔽作用，也收买养了某些伊班族败类为代理人，但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恶性循环和无可避免地不断恶化，和伪马当局自己种种不合理经济政策，行政措施和税收政策下，土产价格泻跌，舶来品飞涨，税务多如牛毛，什么油荒、米荒、糖荒相继不断，再来贵油、贵米、贵糖、贵衣……百货腾贵，这一切对本来就十分贫困的广大伊班民族群众的生活更是百上加斤，更加难熬。在这种情况下，从马来封建官僚买办集团越滚越大的经济蛋糕中挑出点点滴滴的小恩小惠；根本无济于民困，18年的大马生活日益更使广大伊班民族看清它的反动反人民的新殖民主义实质。特别是近年来，马来沙文主义愈加变本加厉推行，不但使华族，而且也使伊班族不满和厌恶。这些年来，伊班族中的某些高级知识分子就主动进行了公开的反马斗争，某些地方的伊班群众还进行了森林经济斗争，这些都说明在伊班族中是正在孕育着新的觉醒。

(3) 主观的努力，在过去 20 多年民族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在当前的社会条件，尤其是伊班族社会的条件下，我们是有必要和可能采取更加切合实际有效的动员形式和提出符合伊班民族心理和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口号的。如我们可提出争取伊班民族自治，争取伊班民族母语教育，争取伊班语成为官方语言，争取合理的经济权益的口号。对某些伊班人已自动展开的森林经济斗争可设法予以引导，并通过展开这一类斗争来进一步教育动员群众。我们也可发动伊班群众以集团申请、请愿等形式来要求伪政府给予更多发展生产和生活津贴，如反动当局妥协，我们即争取了群众利益，也提高了革命组织的威望；如反动当局拒不答应，也便于我们藉此进一步揭露其反人民面目，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觉悟。我们还可动员被赶进“新村”的群众争取自由返回原住地的权利等等。在这一切工作中，我们可积极发挥伊班兄弟党的动员、组织和领导作用。我们在做好基地工作和老区巩

固工作的同时，更重视多流动宣传扩大影响于新区。实践也证明，这是切合我军目前情况和有效的。总之，在今后的新形势下，是有更多发挥我们主观努力的条件的。

（七）伊班民族工作是有光明前途的

事实告诉我们，勤劳、朴素的伊班族和其他北加兄弟民族一样是热爱自由、敢于斗争的，有光荣反抗传统的民族。现在虽然暂时不能广泛行动起来，但在他们中间确实是正在蕴存着对剥削、压迫、欺骗他们的伪马政权的日益不满的怒火。在国内外形势正孕育着日益更加成熟的世界革命条件的今天，是完全有可能在我们主观努力下逐步更好发动起来的。我们动员伊班民族的工作是长期、艰难而曲折的，但有光明前途的。



关于伊班民族工作的若干问题

(1981年10月1日)

◎ 求实

一、怎样改变伊班族对武装斗争的消极观望态度

当前伊班族对武装斗争的消极观望态度，主要是他们对武装斗争的信心不足所造成的，如果一旦斗争形势有了大的转变，伊班族是可能广泛和积极响应武装斗争的。

在什么形势下有可能使伊班族改变对武装斗争的消极观望态度呢？初步认为，须要具备如下的形势：（一）新的国际革命高潮的冲激或邻近国家的有力斗争支拥（精神与物质的）。（二）反动派不得不对伊班族采取高压政策（这是更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有了这样的斗争形势，伊班族必定会重新奋起斗争的。

但是这种有利的斗争形势的最后形成，不但须要国内外革命人民的共同努力，而且还需要借助于时间，才可能最后形成。在今天我们的继续坚持武装斗争和伊班民族工作（主要是宣传组织工作），以及充分发挥华族在斗争上的先锋模范作用（也就是能够执行正确的伊班民族工作政策），对于创造有利的斗争形势，对于改变伊班族对武装斗争的消极观望态度，是能够起大作用的。

二、基地与伊班民族工作关系

没有基地，武装斗争不能巩固发展；同样地，没有基地，伊班民族工作也不能巩固发展。在武装斗争初期，伊班民族工作没有森林区基地为依托，没有通过它壮大武装力量和培养伊班民族干部，伊班民族工作是不能广泛开展的。伊班民族工作得到广泛开展之后，没有及时在伊班群众区建立基地，伊班民族工作的巩固发展也一定会遭到很大的破坏。因此，基地是伊班民族工作不断巩固发展的重要保证。另一方面，基地没有伊班民族工作的开展，没有伊班族的参加，基地

也不能巩固和发展。因此，基地与伊班民族工作是对立统一的。

三、当前伊班民族工作的最基本工作形式

当前最好的伊班民族工作形式是武装突击宣传群众，它主要是由敌强我弱，我们武装力量与伊班民族干部队伍的弱小和伊班民族工作基础薄弱所决定的。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采用突击宣传的形式，就是能发挥我方弱小的威力而最好避免弱点被利用，就能最好发挥群众的积极因素而最好避免消极因素被利用，也能最好的打击敌人和最大限度限制敌人优势的发挥。因此，突击流动宣传，就成为我们当前开展伊班民族工作的最基本形式。

四、怎样减少在伊班民族工作中的流血牺牲

我们的伊班民族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我们也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这主要是我们缺乏伊班民族工作经验和正确的伊班民族工作政策策略以及敌人的镇压和利诱政策，加上群众的认识和觉悟低所造成的。在过去的伊班民族工作中，也即初期的伊班民族工作，由于缺乏经验和缺乏形成正确政策策略的物质条件（正确政策的形成，须要长期正反和“左”右错误的比较之后才能逐步形成），所以造成较多的牺牲损失是自然的。即使这样，在过去我们如果能够更讲究策略和政策，还是能够减少损失的。如果说过去还可能减少牺牲和损失，今后就更有办法减少牺牲损失。要减少伊班民族工作的牺牲损失，最基本的办法要避免政策上的“左”右错误，具体的办法主要是：（一）民族工作形式要多样化，合法与非法，非武装斗争和武装斗争的形式要灵活结合。（二）实行两种战略思想，即一种以边区为基地逐步深入，一种以华区为基地逐步深入民族区，力避冒进的错误。那种缺乏基地又冒进的思想是我们过去牺牲损失的主要根源。（三）突击流动宣传和重点争取要结合，但应以突击流动宣传为主。（四）目前在粮食上不能大靠伊班族，要多靠基地的自力更生和华族的供给；要靠伊班族解决粮食问题，方法就要特别讲究。（五）伊班民族干部要善于识别群众，头脑要复杂灵活，警惕性要高，要重视提高军事能力。

(六)要及时适当的开展杀敌夺武，以镇压反动势力和鼓舞革命群众。的确，在今天的状况下，我们是比过去任何时后更有办法减少伊班民族工作的牺牲损失。

同志们，为征服新的革命难关和创造新的革命形势，让我们再一次下更大的决心，为伊班民族工作而奋斗吧！



关于加强开展伊班民族工作的办法

(1982年2月4日)

在今后我们必须以边区为基地开展深入地区的伊班民族工作，以华区为基地开展混合区（邻近地区）的伊班民族工作，而工作重点必须放在深入伊班民族区。

我们必须突出仁达党，以他作为直接宣传、动员、组织和领导的民族形式。

以突击的流动宣传为主，以重点争取为辅，但两者必须灵活的加予结合。

主动、积极的领导和推动伊班族开展森林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以维护、争取他们的经济权益和提高他们的斗争觉悟。

逐步试验推行合作化形式，通过一定的经济信贷和资助，促进群众之间和军民之间的经济合作，更好的发展经济和改善生活，以促进军民的团结合作。

推动公开、合法政党去开展工作，也是很有效的重要办法，应给予充分的注意。

此外，医药、卫生、文娱和物质与金钱奖励也必须继续推行。

—引自《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

我们必须将民族工作进行到底

(1983年5月)

◎ 探史

我们要争取北加的独立解放，就必须搞好国内外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国内尤其须要搞好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我们的革命斗争刚开始不久，我们的革命组织就很重视民族工作和积极努力开展民族工作，并把它当作一项艰巨光荣的任务。重视民族工作，是我们革命的好传统，我们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

我们已进行了 20 多年的伊班民族工作，已付出了种种代价，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为民族工作已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而且为了北加的独立解放和民族团结，我们还须准备为它付出更大得多的代价。经过了 20 多年的工作之后，我们对民族群众的革命性和落后性都有更好的认识，对民族工作的长期性、曲折性也有更具体的体会，对它的光明的前途，也有更好的透视。革命的历史证明：民族工作是随着革命斗争和武装斗争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只要北加人民要独立解放，华族也能不断的起先锋模范作用，民族团结的巨大难关，最终必定是要被攻破的。

自从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北加以来，马来族、达雅族、华族和加达山族都先后起来反抗过殖民统治。可是都由于民族的不够团结而成为斗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现在由我党所领导和推动的武装斗争，即使没有路线问题的干扰，也不能例外的由于民族团结问题，而迟早会遭致严重的挫折。今天还在坚持的武装斗争和基地斗争，如果不能得到民族群众，特别是山地民族群众的及时的、有力的支援，再遭受暂时的挫折和失败是不难出现的。因此，我们仍然必须把民族工作看作关系革命成败和紧急的任务，而且不论会遇到什么困难和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不能灰心失意，都还须千方百计、尽心尽力地将民族工作进行到底。

不论过去或是现在，我们的民族工作都是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进

班族与敌人的矛盾不够尖锐，政治觉悟不够高，也还没有更好肃清过去斗争失败所遗留下的悲观消极情绪。（二）华、伊两大民族之间还存在不少的隔阂（在语言和思想感情上）。（三）我们的武装力量和民族工作干部力量还很弱小。（四）敌人拥有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军警和特务力量，还能有力的限制和破坏我们开展民族工作。（五）敌人疯狂推行民族沙主义政策，破坏民族团结。（六）敌人实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改良计划，以缓和民族社会的矛盾。（七）敌人有效的控制各种宣传教育工具，如广播电台、学校和书刊报纸等等。由于有了这些不利的条件，使到我们的民族工作面对不小的困难，所以没有长期不断的奋斗，是不可能取得突破性的发展的。有利条件主要是：一、总的来讲，各民族与敌人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二、民族社会很贫困，有利于我们宣传动员。三、有一部分各民族群众还会同情和支持我们的革命斗争和武装斗争。四、各民族对我党我军和华族有了更多的了解，消除了一定的恐惧心。五、民族社会中的反动力量还有薄弱一面，又加上广阔的山区和森林地区，这又能使我们有活动的自由。六、我们已打下了一定民族工作基础（群众关系、工作经验和民族工作政策等），并建立了边区武装斗争基地，可作为开展民族工作的堡垒。七、有党和军队的领导与推动民族工作等。由于有了这些有利的条件，就给了我们革命力量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也使我们坚信，只要我们不断的努力工作下去，我们是能够逐步取得新的成绩的。

我们已更全面的考察了整个民族工作的形势，现在就不难发现，民族工作所存在的困难是不小的。所以，我们必须胸怀北加的独立解放事业和北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大目标，并以服务人民，特别是以服务最落后最贫穷的人民为终生目的，我们才可能将民族工作进行到底。

100 多年以来，北加各族人民都不甘心于殖民统治，前仆后继的反抗，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会吸收过去失败的斗争经验，大力的加强民族团结，最后共同赢得北加的独立解放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同志们，让我们为了北加的独立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为了北加的民族团结而重新加强民族工作和将民族工作进行到底吧！

要重视民族工作的开展

(1984年2月)

自转折以来，尤以基地建设以来，民族工作受到了好大削弱。在基地，生产任务异常繁重，使我们不得不集中更多人力来解决；也由于坚持长期的低潮斗争，考验较大，为了保存和巩固内部的需要，也不得不多些人早日走上基地。因此，不说当年高潮时已开辟的民族工作，就是基地周围和有较好基础的民族工作，也无法照顾。即使久久流动一次，也多是了解些情况和搞点物资就走，在宣传上没有系统性。这是民族工作中的低潮，是我们必须重视解决的带全局性的问题。

民族工作是我国革命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它关系到我国革命成败的关键性环节。历史上多次由单一民族进行的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斗争失败的有：华工事件，伊班族的仁达、阿顺反英斗争，汶莱的人民党武装起义，等等。在今天由北共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如果不能发动各族群众参加，没有重视作好民族工作，就是有了先进理论和思想的武装，要想取得胜利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基地多是建立在民族区，基地能否长期坚持与发展和民族工作开展如何关系极大。那时为了早日突破建基地的困难而短时间削弱民族工作，这对我们的危险性一时不大，若久而久之不加改变，没把工作重点逐步放在民族工作上，就将使基地孤立，不能长期坚持和发展，基地的意义也就不那么大了。看来，我们就必需在基地的困难得到一定的解决时，及时的重视开展群众工作，必须重视联系基地周围的民族群众。

党自开展民族工作以来已经近 20 多年了，20 多年来我们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累积了一些经验。但是这些成绩和经验还不够大，也不能很好的巩固起来。主要的原因是：（一）受“左”和右的错误干扰。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党把一批刚从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派到遥远的民族区，长期和组织难于联系，他们缺乏生活能力，不大懂民族语言，没有和伊班族生活过，以长期秘密的地下形式去发动组织他们，结果大多数干部本身，都无法坚持，堕落或被捕。武装斗争初

期，我们又脱离了实际可能，再次把同志派到深入的民族区，结果除中游地区坚持较久之外，多数地方也难于坚持，并付出了好大代价。在工作中也缺乏依据自己的条件，操之过急，结果当敌人镇压时，我们不敢也无法吸收民族群众参军，使好多阵地被摧毁。（二）敌人的镇压和实行某些改良主义政策。（三）伊班族本身的觉悟还低，对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不足。（四）我们还不能提出更适合民族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口号。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今天我们一定要十分重视开展民族工作，在工作中我们要注意做好以下几点：（一）在思想上和政策上要注意防止“左”右倾的错误，要依自己的条件和客观形势，依据伊班族本身的特点制定政策。（二）一定要搞好基地工作。（三）尽量利用公开合法的斗争，以利更广泛更有力的发动群众。（四）加强仁达党的组织和更好发挥它的作用。（五）不断及时的提出适合广大伊班群众的斗争口号。（六）我们要有系统的学习伊班群众民族的历史，重视研究伊班族的社会、风俗习惯以及进行阶级分析。（七）加强伊班语文的学习，深入群众生活，提高宣传能力，民族干部要尽量争取收听伊班语的广播，以便掌握社会动态。

在反抗外来统治的斗争中，伊班族和马来族都有光荣的历史篇章，尤以伊班族斗争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斗争形式最高，给敌人的打击最大。今天广大的伊班族群众依然处于相当困苦的生活和落后的状态中，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深受压迫和剥削，尽管反动派实行更加圆滑的改良主义政策，也不能根本调和他们要改革现状的要求。转折以来，先进的伊班族领袖坚定的和华族一道走在武装斗争的最先头，部分觉悟的知识分子在公开政党中进行反马的斗争。我们坚信，只要有正确的民族政策，大家坚持不断努力工作，抓好和配合时机，民族工作是能取得新的成绩。虽然今天我们大搞还缺乏条件。我们就应从现在起，积极重视对民族语文的学习，认真的多了解和研究伊班族社会状况和历史，了解他们的生活和习俗等等，为今后大力开展民族工作作好思想和实际的准备。

拉让江中游的斗争

(1987年7月12日)

□ 求实

中游位于加拿逸河的左岸和加地拔斯河(Katibas)上的右岸，其中有杯河(S. Poi)和牛麻河(S. Ngemah)的一片地区称为中游地区。沿着这几条河逆流而上直到河尾，便是砂印边界。再越过边界便是印尼的马罗河尾，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在此成立，是边区基地红旗飘扬过的地方。边界两边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绵延起伏的群山峻岭，是战略要地和开展武装斗争的好地方。

中游工作的发展过程

中游除在拉让江边和如楼小镇有华人经商外，其余都是伊班族农民聚居的地方。19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以华族为主的武装部队前赴后继地在这块纯是伊班族的原始森林地区进行的斗争，主要的就是开展民族工作。中游伊班族工作是我们开展较早而坚持最久的一块阵地。我们研究它的发展过程，对我们认识民族工作是有帮助的。其工作发展过程基本上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60—1968年中）

在砂盟的第二个革命总方针指引下，一批民族干部奔赴民族区，以半非法和半合法、公开和秘密的结合，在中游一些地区活动。在卡地拔斯河的 S. Musah 和 S. Chemanong，以及 Ulu Dap 一带活动。这一带的群众倾向爱国和进步，较能与华族合作。1962年有二位同志在 Ulu Katibas 的 S. Chemanong 一带边跟伊班人割树胶，边发动群众。这里的群众给革命同志以热情支持和帮助。后来，这三个工作点，是最早期深入的工作点，为后来开展中游工作打下基础。1962年汶莱起义之后，敌人的反扑，在这里的干部有的被捕，有的在伊班族的协助下越界参军，有的留在 Ulu Dap 一带活动。

在这个时期活动主要依靠船只，限于河上和长屋周围一带活动，并且人数也不多，多数是男同志。最主要的贡献是设立三个初步的民族区工作点。

第二个时期(1968中-1976年底)

1968年中，中游0先进支部和武工队在印尼边区总部基地宣告成立，标志着中游民族工作进入一个新时期。当武工队开进中游时，我们以第一个时期的三个工作点为基础，向周围进行游击活动，先后创设了S. Nging、S. Bat、S. Span、S. Kajah、S. Vka和Ulu Machan等工作点。1970年左右，以上8个新工作点基本上是成功地建起来。在新创立的工作点中，S. Kajah和Ulu Machan两个点对推动中游工作最为重要。群众工作做得比较深入，基础较稳固，还有两个群众参加武工队，是长期可靠的据点。

1971年底，北加共产党中游特别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中游民族工作的一次高峰的新时期。为执行党的边打边搞政策，总结群众工作和战斗的关系，后提出深耕细作和流动宣传的结合。在这个时后，巩固原有的一些阵地外，则集中力量进行流动宣传，主要重点放在Ngemah河尾和Poi河尾的一些长屋，扩大政治影响；另一方面，在6个地区进行重点组织工作长屋委员会。在这期间中游武工队队员中有10名是伊班族。在重点建设的地区、部队和群众一起进行合作性的生产，主要种稻和种木薯。1972年是中游地区伊班族工作的最高峰，四条大河的群众大部分都有宣传过一次。有的没有去的长屋，他们还等候了几个晚上，准备我们可能去他们那边。

这个时期(1973年前)，在军事方面，我们打破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在党的“边打边搞”政策指引下，还集中力量主动开展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战斗：1970年，在S. Ngemah河下游伏击民防队，几乎歼灭整小队敌人，力挫他们嚣张气焰，鼓舞了群众和促进工作的开展；1972年，一个加强小队(约20人)的兵力和几乎全配现代化枪支在S. Katibas河中伏击来围剿的马来兵团，重创其营指挥

部，伪营长还差点丧命。此后来围剿的正规军多驻守在长屋附近；同年，我们又组织力量在 Ulu S. Kanowit 河伏击当地的一股曾多次杀害我们同志的民防队（全是伊班族），打死打伤多个，有力打击了他们的活动力。

在创点初期，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和对情况不熟悉，在接触群众时往往容易被陷害。我们很难识别那些被敌人利用的特务坏蛋，而这些坏蛋又善于用“热情”和花言巧语来骗取同志对他们的信任，这些欺骗我们外来者的故事一时又无法求证。因此，当同志还来不及转移时，这些坏蛋就带兵攻打住点，多次造成同志牺牲。1971年，我们终于成功地处决一个罪状确凿的坏蛋(Pertalong，当地伊班族)。接着我们以 Pertalong 之死为例，在中游地区大力宣传党的处特政策，有力教育群众，震慑其他坏蛋，减少了同志的牺牲。

1973年初，第三省省委决定成立第三省战斗队（即王仰仁战斗队）中游武工队调走 10 多位指战员。从这时起，中游伊班族工作是减弱了。后来，1973年的错误，中游工作保留一小队的力量，进行流动宣传和联系某些重点群众工作。

这个时期的主要活动形式是武工队，在大片森林和群众区，进行宣传和重点建设工作，为推动民族工作做出重要贡献。

第三个时期（1976 - 1986年）

1977年党中央第二分局在此（中游）召开“9.19”会议，会后决定重建边区武装斗争基地。为实现党提出基地的战略任务，在中游地区成立支援突击队，大力支持边区的基地建设工作，成为边区基地的前哨。

在四周都是伊班族为主和大片原始森林覆盖的中游地区。为什么以华族为主部队能够在此坚持 19 年（从 1968 年中游武工队成立算起到 1987 年撰此稿为止）民族工作和游击斗争呢？

以下分别讲一下中游斗争长期坚持的重要因素：

(一) 革命组织的领导和武装部队奋斗下，逐步地打开局面。

(a)1960年，在盟的领导下，一批伊班民族工作者受委派到卡地拔斯河的中游和上游地区工作。经过同志们的努力奋斗下，在卡地拔斯河设立二个工作点，为后来即1968年的武工队活动奠定基础。在这同时达河(S. Dap)和加拿逸河的一些地区亦有地下工作者的活动，也创设二个工作点。

(b)1968年中游革命组织的支部和武工队的成立，在全体武工队指战员的奋斗下，在其他单位的有力配合下逐步地打开局面。可以肯定的讲，离开革命组织的指导和武装部队的努力奋斗，中游工作（包括早期地下工作者的奋斗）是不可能坚持下去。

中游武工队能长期坚持斗争是与 OMT 武工队、DR 武工队及边区的有力支援和配合分不开的。首先，MR 武工队弱小和中游民族区的特点，是无法自己解决经费，衣服装备、药品和器材、兵员和武器、情报书籍和刊物。这些保证我们能在民族区生活和战斗的最重要物质，长期都是由 OMT 和 DR 华区提供。从华区送来的国内外讯息提供我们制定斗争策略方面的帮助，刊物和书籍鼓舞了同志们的斗志……等等。同时，开展中游工作初期，党又不断从边区基地调来领导、老兵和军用枪支，增加我们的活动力和战斗力，增强群众的信心。我们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支援和配合，中游虽然有有利的地理条件和一定的群众基础，要坚持这么久的斗争是不可能的。

(二) 统一战线工作的胜利开展，提高伊班族的政治觉悟。在盟组织提出第二个革命总方针，即“突破公开工作一环，带动全国形势的发展”指引下，有一批干部参加公开合法的斗争，积极开展反帝反殖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通过人民联合党盟的外围组织的合法地位，在城市、乡村和伊班区进行广泛的工作。在组织的积极影响下，华、巫、伊的工农群众被唤醒起来，而且还影响了上层份子，形成广泛的

革命统一战线。在砂拉越的政治运动中，中游深入伊班区的群众亦受到教育，参加人民联合党，进行反对外来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为后来中游深入伊班区工作的开展创设群众基础。没有统一战线形成和反马形势的高潮，坚持中游是不可能的。

（三）战略要地，革命力量的集中和同志们的积极奋斗，是中游工作得以开展和坚持的重要因素。

在 1962 年，北加各邦各族人民反马斗争的高潮中，利用马印对抗的有利形势，第三省的革命力量要越界到印尼接受军事训练，就要通过卡地拔斯河尾越界到印尼的马罗河，是最近的一条路线。所以，第三省的革命领导早就注意到中游的工作。

在 1963 年，江先仿、吴宜云和余清勇同志在伊班人的配合下，成功地越过边界，到印尼的坤甸山口洋与第一、二省的革命组织会合。另一方面，当印尼局势发生逆转时，在印尼的革命组织带领同志上边区建立人民武装部队，并积极准备打通与第三省国内的联络。在第三省国内领导和边区领导的积极推动下，终于在 1967 年底打通关系。于 1968 年下半年先后有二批同志，从第三省国内顺利地通过中游到达印尼边区基地，实现会师。在以后的几年内，中游成为边区与国内物质供给与交通联络的重要渠道。

1977 年“9.19”会议决定，在重建边区武装基地的政策指引下，为实现基地的战略任务，坚持中游工作成为基地的前哨。

（四）有利的地理条件，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以及我们的工作秘密顺利的进行。中游地区有广阔的原始森林（各条大河尾连成一片与印尼边界接壤）和大片的树林的山区，地势险要，离敌人统治中心较远。交通极为不发达，主要靠水路。这是我们进行游击斗争的很好场所。在这期间，我们组织的巩固，整个工作和同志们的斗志都是向上，这就保证我们的部队能够秘密活动一段时间，工作已扎下根。当敌人进攻时，我们利用森林进行游击斗争。另一方面，在 1968 年

左右敌人内部的矛盾尚未很好解决，无暇抽出较大力量来集中对付我们武装部队。

(五) 华伊关系密切，尤其是华族对伊班族的影响。中游地区主要是伊班族居住的地区，而在各条大支流河口都有华族在那里做生意。长期来，他们友好往来，有的还通婚。这样形成的华伊关系是很好的。在华族中一部分受革命的影响，他们对伊班族较亲近。在贸易上，伊班族还欠华族的账，有些还在华族店过夜，这样就加深华伊之间的互相了解，互相帮助。这一点，对我们开展中游斗争是有利的。

(六) 有利的国际形势配合下，反殖反帝，反“大马”形势对坚持开展中游斗争有利。60年代，国际上的反殖反帝的浪潮依然是高潮的，特别是马印对抗和社会主义国家公开对北加斗争的支持。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中游地区的伊班族社会也受到牵动，参加反马的各种斗争。

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武装部队活动的19年，我们的革命组织和军队是坚持中游工作的重要的因素，再加上有利的群众基础和地理条件，我们就能够经受敌人的进攻，坚持战斗在中游伊班区这块阵地。

中游斗争的影响

19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武装部队在一块纯是伊班族的原始森林地区坚持战斗，部队活动面对各种困难都是大的。然而，我们党是坚决革命的，许多指战员不惜牺牲个人的代价，前赴后继，勇敢地在这民族区坚持战斗下去，为华、伊联合和长期坚持深入区的伊班族工作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 对伊班社会进行一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在北加，特别是砂拉越山地民族是革命的决定力量。山地民族又是一个较落后的民族。我们的部队在这块土地进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使到伊班族了解革命道理，对后进民族的影响是深远的。经过多年的传播，伊班群众对党军是有些了解，提高伊班族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这种的影响不仅限于中游地区，也会影响周围的地区，特别是与这些地区群众有血缘关系的，为后来其他地区的民族工作创设条件。

（二）对党掌握民族工作政策提供积极的依据。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特别民族工作问题。这是北加社会的特殊情况。起初，我们对民族工作的认识是：它是革命的决定力量，但对具体政策还不够完善，通过中游深入工作，我们对民族工作的规律认识多一些，对完善党的民族工作政策是有积极作用的。今天，我们基本上掌握一套民族工作的政策、方针，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坚持战斗深入民族区。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党不断总结经验，较正确地掌握民族工作规律，工作也较顺利的开展和坚持。可以讲，没有深入到民族工作中去，我们就不能有对民族工作的深刻理解，就不可能开展好这一环的重要工作。

（三）对华伊两大民族的联合起着积极的作用。十多二十年来，以华族为主的民族干部，在伊班区进行革命真理的传播，使到一些地区的伊班族对我们斗争的目的、工作任务有所了解。通过福利工作、医疗工作、文娱等工作，加深对我们党军的了解。他们就能帮助我们解决困难，也能与外边的华族搞好关系。有时我们也叫他们传递书信给华族；另一方面在部队内部有一部分伊班成员，党军正确地处理华伊同志之间的关系，在革命斗争中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团结。从总的来讲，两大民族有着共同的命运与利益，即同受到英马的压迫和剥削，有摆脱帝国主义控制和争取独立的共同愿望。所以，我们能够亲如兄弟般地战斗在一起。

（四）培养一批民族工作的干部，在中游民族区，起初，我们的干部对民族工作的认识是不足，对伊班族社会政治、经济、宗教、风俗习惯等的了解是有限的。我们的民族工作是处在开始阶段。我们吃了不少苦头，经过多年来的工作和总结。我们的干部水平是提高了

一步，能够适应于深入民族区的战斗环境，不仅有华族的伊班族干部，而且还有伊班族干部。这批干部能够在民族中解决许多复杂的问题，如战斗与群众工作、粮食、保存等，同时还支援其他单位的民族工作，这就保证后期党的民族工作政策得以顺利进行。

（五）伊班族经受一次敌人镇压的考验，我们党领导的以武工队形式开展民族工作，头 9 年工作还比较顺利，几个地区的工作都先后开展起来。到 1971 年时，由于开展杀敌夺武，大队宣传等和内部出现叛徒以及敌人更加重镇压、收买，成立民防队驻点；中游的民族工作又无法提到更高的斗争形式。在强敌镇压下，开展民族工作面对的困难是大大增多了。1972 年，在中游的 Ngemah 河和 Poi 河先后建立集中营，几十座长屋的群众被迫迁到“新村”去，敌人的镇压给群众带来巨大的痛苦，蒙受财产的损失。在敌人的镇压面前，有一部分群众表现的很顽强，他们决心与祖宗传下来的家园共存亡，敌人无法把他们迫进“新村”。即使有一部分被迫进“新村”，但，他们对敌人更加仇恨，更加渴望过着自由的生活，有部分群众消极害怕，有的被收买后反对我军，敌人的镇压给民族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中游斗争的经验

二十多年来，特别是 19 年来，在中游进行革命斗争和武装斗争，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许多失败和成功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这里谈几点看法：

（一）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共产党和人民军性质的宣传，并为伊班群众所掌握，就会发出强大的威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真理最能为贫苦大众所接受。我们党和军的性质和任务易被伊班族所理解。因为伊班族是受压迫、剥削最深的—一个民族，他们是最贫穷的，而这个民族是个朴素、勤劳、勇敢的、是有民族自尊心，最不喜欢有人在他们头上指手划脚。这样的一个民族，

只要他们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真理，他们就会醒悟起来。实践也是证明这一点，一旦他们觉悟了，他们就会为自由和独立而战斗，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在伊班族中宣传革命真理。

(二) 要坚持行之有效的伊班族工作方针、政策，并要不断地总结，力求有发展。我们开展中游工作初期为什么会付出较大的代价呢？原因是，我们对工作的认识不足（即方针、政策不够完善）。后来，我们不断总结，经验累积多些，摸索一套适合民族活动的方针、政策，如解决伊班族工作与基地（根据地）的关系。在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中的策略问题。如何保存和解决粮食问题等；在群众工作中要坚持政治宣传和福利工作相结合的办法，在旧区要深根细作、昼伏夜动的办法；在一些地区进行必要的流动突击，为提防坏蛋的陷害，采取即突即离的办法；在森林中开展伏击战、麻雀战、地雷战，避敌锋芒，寻找敌人的空隙进行突击宣传工作；做好营地的具体保安措施等；解决部队在深入活动时的内部政治、军事、生活、药品、弹药等方法。以上这些都是以血汗代价换来的经验，都是很宝贵的。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把握当前的特殊情况去创造新的斗争方法和政策。

(三) 要重视伊班族知识分子、政党的工作，采取的形式，由低级向高级，斗争形式要多样结合。伊班族的解放要靠伊班族自身觉醒，而华族只能是教育和启发作用，要重视培养伊班族的先进份子，特别要注意伊班知识分子和政党的工作，通过伊班族教育本民族。在60年代初，伊班起来反马斗争，其中有伊班族的先进份子和人联党的作用是个重要因素。在武装斗争时期 Ubong 和 Ribut 对伊班社会的影响也是大的。后来，人联党上层背叛工农后，国民党在伊班社会起的作用也是重要的。从历史来看，革命斗争没有知识分子的觉悟和利用政党形式的推动是不行的。我们中游民族工作之所以还不能推向新的高峰，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缺乏伊班族的知识分子和政党的有力配合；另一方面，伊班族的斗争必须是要由低级向高级，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有的还必须通过宗教的合法条件进行宣传，以破除伊班族的迷信思想，使他们接受较新思想，需要一个长期发展过程。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形式不可能单一，要多样结合。采用多种形式的结

合，用武工队形式还不够广泛有利地动员群众。只有自觉地利用各种形式的配合，才能更好地发动群众。这一点，我们体会尤其深刻。

（四）要伊班族与华族民族的联合斗争，革命斗争才能有新的突破。我们坚持中游工作中，深感华伊关系好的地区，伊班族就较倾向革命和反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里的群众就较易与我军合作，支持和帮助我军解决困难。我们若不是有部分伊班族的热情支持，我们以华族为主的部队是不可能坚持长期深入区的斗争。从砂拉越的革命斗争来看，华伊联合具有伟大意义。要注意教育华、伊群众求大同存小异，为共同的事业奋斗。在中游斗争中，我们也深有体会，华伊关系不好的地区，这些地区的伊班族受反动派的影响较深刻，往往在这些地区，我军到那里活动就较易出问题，造成损失。所以，在新时期中，要更加注意华、伊的联合关系。要突破“分而治之”的政策，要主动自觉地教育华族与伊班族有来往的群众，主动和伊班族搞好关系。如木山的工头、经理等，要耐心地热情地对待伊班族工人；要坚决支持、同情伊班族争取自身利益的合法斗争，如森林斗争。另一方面也要教育伊班族要向沙巴的加达山族学习，主动联合其他民族，而且只有这一点才有可能为自身和民族争得利益。总之，通过各种努力促进华伊的联合，使到革命有新的突破。

（五）19年来，中游的斗争除了主要体现开展民族工作外，还体现在敌我双方在军事方面的较量。中游武工队还是一支属弱小的武装力量，是以小组形式分散在中游地区。人少容易解决粮食，也容易找好住点和隐蔽。加上应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所以每次敌人用大兵团来围剿都无法找到我们，反而从他们使用直升机运输和无法避免的活动痕迹，可以判断他们兵力的部署和动向，让我们作好主动应对，大网捕小鱼无济于事。因此敌人更重视引用50年代对付马共的经验，以地方民防团，一支不正规的本地民族为主的武装，以反游击的形式对付我们。他们惯于森林活动又与当地群众有一定的亲戚关系，小股经常活动在我们周围。敌人这种更实际有效的部署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威胁，也多次造成同志牺牲。因此，必须认真对伊班坏蛋进行镇压，才能煞住反动气焰，我们对待较落后的民族的政策要宽一些，但对那些与人民为敌，而且又欠下血债的坏蛋要执行镇压的政

策，若我们对这些坏蛋不进行镇压，革命工作就会受他们的破坏，甚至造成流血牺牲。实践证明，我们对他们进行打击，革命斗争才能发展，群众也才会大胆参加和支持革命斗争。

（六）民族工作的开展要与基地建设结合起来，我们开展中游的民族工作会相对顺利的立下脚跟，与边区基地的斗争是息息相关。没有边区的基地斗争，中游工作是不可能那么快而又顺利的搞起来。边区基地的斗争促进周围民族工作的开展，这里就不仅在中游，而且在基地周围的地区。反过来，民族工作的开展，也会促进边区基地的发展和巩固。若民族工作不能及时有效地开展起来，边区的斗争就会陷于孤立，就会造成失败。这一点，我们是有深刻的体会。

（七）回顾 19 年来的工作，我们感到政治工作还做得比较不足，影响对党的政策的执行。由于中游群众的特点和交通不便，粮食长期处于紧张情况，使我们不能不花很大精力去搞粮和藏粮，造成中游武工队长期处于小组分散状态。虽然重要领导（政委等）都在中游，但都缺少进行集中整训。一直没有组织专门干部（如安西，吴昊等长期搞民族工作干部）针对多年的民族工作一起学习、探讨和及时总结，不利大家对政策的理解和执行。例如，对党在 1971 年提出关于“巩固原有阵地外，集中力量进行流动宣传”的指示的理解不够深刻，又对新情况掌握不够好，结果流动宣传一阵后很长时间停了下来，错失一些新区的开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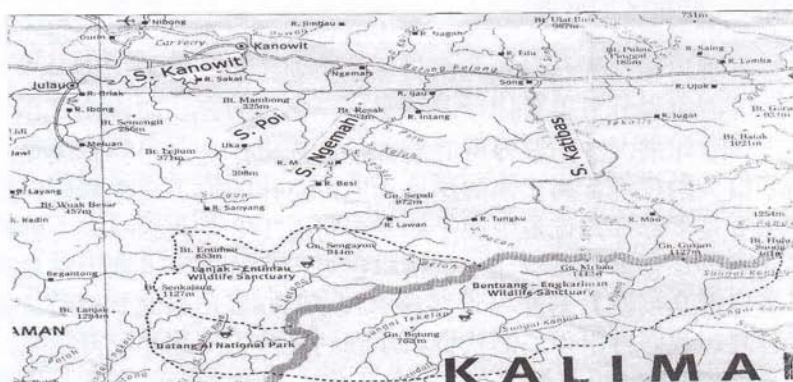
小结

19 年来，在中游开展武装宣传群众工作是取得明显成绩，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为了唤醒这块土地，总计牺牲了三十多位同志，其中 1/3 是干部（几位是中级干部），将近 1/2 是久经战火考验的边区老同志。还有多位在战斗中负伤和在艰苦岁月里患上难于治愈的病痛；多位群众被敌人杀害，50 多座长屋（100 多户家庭）被迫进集中营。总之，我们付出很多的代价，才胜利坚持了阵地和取得经验。然而，民族工作是一项长期艰苦曲折的工作，19 年的奋斗在北加民族工作长征中还只是一个开始和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所取的经验还很

肤浅，特别是对今后民族工作被敌人大力镇压和破坏时，如何继续斗争，还缺乏认识以及还无法提出把工作提到更高的斗争形式的政策和策略……。因此，我们这个总结，是想把我们曾经尝试过的一切提供给未来的民族工作者和至今还仅仅凭着图书馆的历史资料理解民族工作的理论家参考，告诉他们，我们是怎样走过和有怎样的感觉。从总的来讲，民族工作是关系砂拉越革命的成败问题。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是关键，我们要使民族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党的政策就必须要求是正确的，而且在新条件下有新的发展。若我们党的政策错误，民族工作就受挫折。

附：中游牺牲同志的名单

铁军（丘亚陶）	吴昊（吴宜云）	白鸽（蔡明和）
李安（李贵春）	必公（江先发）	战平（江国章）
斗争（张登昌）	明思（刘海金）	工青（余泰古）
耶谷（蔡国英）	汉青（刘汉青）	朝东（黄世真）
巴洛（许广金）	向东（孙剑平）	尖兵（黄理行）
伟雄（黄福庭）	为民（白益忠）	怀鸽（陈干共）
友如（黄尔兴）	新华（温振南）	坚韧（许保乐）
思晶（吴珍香）	鲁青（李道进）	江雄（郑通方）
阳军（黄和泰）	练红（孙银枝）	向阳（姚银花）
杨子荣（陈山川）	周天来（张荣富）	施学之（丘少群）
官益利（蔡少祥）	黄亚林（黄国仕）	志武（颜弟）
奴利（李风妻，伊班族）	李风（Imbat Ak Akam，伊班族）	温允今



中游图示

当局对付民族工作的策略

江宏

自革命斗争出现以来，统治集团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革命斗争的镇压。同样的，自我们开展民族工作以来，当局也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民族工作的镇压。三十多年来，归纳起来，有关当局对民族工作的镇压，主要采取以下七种措施与策略：

（一）分而治之

英帝与统治集团对民族之间都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在各族之间进行挑拨离间，制造彼此之间互相猜忌、不信任，甚至互相不满与怨恨，造成各民族不合作、不团结。尤其明显的是，他们在伊班等土著当中散布对华人不满的谬论，说什么“华人坏”、“华人是剥削者”，也散布什么“华人是共产党”、“共产党杀人放火”、“恐怖分子”……。与此同时，他们实行种族主义与民族不平等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扼制华族，而对马来人等土著实行优待政策，也产生各民族之间存在着隔阂与不满的情绪。

革命内部的团结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这是战胜敌人、夺取胜利的基本事件，离开了这些基本条件，只能是缘木求鱼，一事无成。

（二）在公开上进行压制，对秘密工作者进行逮捕

在公开政党成立之前，於 1958 年革命组织也早已派几批干部到砂拉越各省份的民族区与混合区去秘密开展民族工作。用小组的秘密形式开展工作，由于长期脱离组织的领导，加上主观条件不足与困难，几年来工作成效不大。后来有的民族工作者自行离队，有的遭到敌人的逮捕，通过这一形式开展民族工作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在 1959 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成立后，革命组织曾在公开上利用该党的名义和党员的身份在长屋和甘榜，大力发动、组织与宣传土著

群众，吸收其先进分子加入北盟或农会的组织，取得了不小之成绩。但，在“12.8”事件后，当局对左派公开政党进行了持续的大镇压，疯狂逮捕公开干部，封闭党的支、分部，封闭党报与有关进步刊物，在公开上进行压制，导致民族工作的严重破坏。

（三）派遣军队和组织地方的武装来对付武装的民族工作活动

自我们以武装形式开展民族工作以来，当局就派遣军队驻扎、巡逻在民族区与混合区，以防止和阻挠我们民族工作的顺利进行。有时他们进山搜索、跟踪可疑的痕迹，袭击我们同志的住点。有时他们在有的地点设下埋伏，袭击前来的同志。有时更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除外，当局还组织自卫团、民防队等地方民众武装，发枪给他们，以配合正规部队来对付我们开展民族工作。他们利用本地地方武装对地形、民情的熟悉，有时装成猎手三五成群的进山侦察、搜索，若有发现痕迹等可疑的现象，就进行跟踪，加大侦察与搜索的力度，一但发现目标就进行袭击，或及时向当局通风报讯，配合正规部队对我军及民运工作者采取军事行动。实际上，地方武装比起正规部队对我们的威胁与打击则更大。

就以拉让江中游民族工作阵地为例，在 Poi 河中段 NG Sebangkat 当局有长期驻扎的兵营，军队人数约整百人，配有 M16 与迫击炮等优良的武器装备。“6.20”我军营地被打事件，就是由他们组织发动袭击的。另，在 SG. Katibas 河的 Meluan 地区也有组织一队地方武装。在 Sg. Dap 的 Lias 长屋也有几个民防队成员，屋长就是民防队队长。在 OMT 单位，民族工作比较活跃的 Oya 河与 Mukah 河，Sekuan 长屋一带就组织有 20 多个民防队队员，他们经常上 Oya 河尾来活动。Selangau 区驻有兵营，巡逻队也经常上 Mukah 河尾活动。

（四）收买和利用暗害分子来进行破坏

当局惯用威迫利诱的手段收买长屋无知与品质恶劣的居民，注意探听与掌握我军的活动情报，以配合其军队的打击行动。若当地收买不到暗害分子，当局就会从别处安插来，卧底在长屋或某地，成了敌人可靠的耳目，长期监视我军的活动。

从长期的民族工作实践证明，当局动用军队直接向我们进攻所造成的威胁与损失没有那么大，倒是民防队和长屋居民中的暗害分子对我们威胁更大，招致损失更大。

（五）对革命的土著群众进行恐吓与镇压

跟华族一样，长屋居民也受到当局的恐吓：不可同情支持革命武装斗争，否则，将受到严厉对付。实际上，斗争较尖锐的地区，也有一部分革命的伊班群众被捕，有的被盘问拷打，有的被关进牢房，更有不幸的遭到残酷的杀害。被镇压的伊班群众，多数变成害怕和消极对待革命，有的变坏，变成被利用来反革命的工具，只有极少数坚强。

（六）建立新村，把同情支持革命的伊班群众逼进新村

为了隔绝我军与伊班群众的联系，使我军陷于孤立无援的困难境地，当局从 1972 年起，先后在拉让江的 OMT (Oya、Mukah 和 Tatau) 和中游两个单位，建立四个伊班新村，把 74 座长屋，1000 多家，7000 多人硬逼迁进里面住。在 OMT 单位，乌也路 28 哩的史瓜奥 (Ulu Sekuan) 新村，在达斗河与乌也路约 340 家 2400 人被迫进新村。在加拿逸卡巴 (Kabah) 河的几座长屋，计划迁进新村，但遭到坚决地反对与抵制。在拉让江中游牛麻河的南光 (Ngungan) 和查苟 (Jagau) 建两个新村，几千名伊班群众强行被迁进。

（七）在乡村搞些基本措施建设，实施一些经济发展计划，以争取民心。

通过探讨，统治集团意识到，单靠军事行动和镇压政策是不能

起着治本的作用，也不能完全压服民心。意识到争取与收买民心的重要性，於是，在 70 年代初，他们开始把以军事手段为主的斗争策略，改为以政治上争取民心为主的斗争策略。尤其是“拉士贡”保安区成立之后，他们更重视与有计划地在华伊地区推行“民事行动”计划。

为了对付我们在伊班区搞民族工作，1972 年 2 月 4 日，当局曾在拉让江开展个什么“砂叻”行动，意在以加拿逸为跳板，在拉让江混合区与民族区推行其“民事行动”计划。在这项行动计划之下，以军警人员、医院助理人员、行政官、福利官等人组成的民事行动组，用直升机载去长屋小住几天，进行调查，看病治病，以解决长屋居民的困难与问题。

这里值得一提，当年我们搞民族工作，注意采取宣传工作、福利工作和文娱工作的形式进行。在福利方面，我们尤其注意在医药方面服务群众。由于贫困多病的土著少有看病服药，我们卫生员简单的针灸与普通的便药都多能奇迹般起治疗作用，深受群众的欢迎与爱戴。当局从我军的服务实践中得到启发，有样学样，也搞个什么“飞行医生”，有时也在一些长屋搞医药服务。

综观上述，统治当局对付我们搞民族工作的措施与策略，主要有这些。由于我们未能有力地、有效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必然在民族工作前进的路上设下种种羁绊与阻力，就难以完成民族工作的历史使命。

我们不能把伊班民族有力的发动起来，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矛盾与社会制度问题还不是达到了不彻底的改朝换代就不能解决，社会就不能发展的地步。同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还不是达到了不起来革命就不能生存的地步。加上，我党我军还不能强而有力地领导这场革命斗争，尤其是我之革命武装力量在对比上还是极其悬殊，难以有效地克服客观上的诸多困难，难以战胜敌人的进攻，不能有效地争取与捍卫广大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决定了我们不能动员广大各族人民群众起来斗争，去夺取政权和实现斗争目标。

1988 年 8 月

边区伊班民族解放同盟章程

总纲

边区伊班民族解放同盟为边区伊班民族中的先进分子以及具有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者所组成，本盟也吸收其他民族中愿意全心全意为我们伊班民族的解放事业献身的先进分子参加，我们的宗旨和目标如下：

第一、团结与组织全体边区人民为谋求伊班民族的自治权、平等权力和民族解放而奋斗；

第二、积极以毛泽东思想教育盟员和群众，使边区人民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本盟将联合其他革命团体，为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印尼反动派，为实现印度尼西亚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尽我们一份力量；

第三、鉴于边区人民与北加里曼丹人民的密切关系，本盟将尽力支援北加里曼丹人民的革命斗争；

第四、积极动员人民群众，为提高边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普及教育而努力；

第五、我们将采取合法、公开、和平以及非法、秘密、武装相结合的斗争方式来打倒共同的敌人，达致我们的革命目标。

第一章 盟员

第一条、凡承认本盟纲领和盟章，参加盟的工作，服从盟的决议，保守盟的秘密，缴交盟费，品德良好的成年人均得成为本盟盟员。

第二条、凡新盟员入盟须由盟员一人介绍，经上级机关批准，才得成为正式盟员。

第三条、凡盟员均有下列义务：

- (一) 努力学习盟的文件政策和决议，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认识和思想水平；
- (二) 严格遵守盟的纪律，捍卫盟的利益和声誉，并和一切损害盟的利益和声誉的现象进行斗争；
- (三) 缴交盟费；
- (四) 参加盟的实际工作，宣传、贯彻盟的决议和主张；

第四条、凡盟员均有下列权利：

- (一) 盟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二) 在盟的会议上或刊物上参加关于盟的政策实施的讨论；
- (三) 向盟的任何领导机关直至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和申诉；
- (四) 在盟的会议上批评盟的任何工作人员；

第五条、凡盟员没有正式理由不履行盟员的义务者，如：不服从决议，严重违反纪律，损害盟的利益和破坏盟的声誉或有其他严重不执行为者，应受盟的纪律制裁，经盟的批评和规劝后仍执迷不悟者，上级机关有权停止或开除其盟籍。

第六条、盟员要求退盟者须向上级申请，经上级机关批准后方得退盟。

第二章 组织

第一条、本盟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其具体内容是：

- (一) 盟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制产生；
- (二) 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部分服从中央。

第二条、本盟最高权力机关为边区盟员代表大会，由边区盟员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属下按照实际情况成立河流或地区委员会；按照实际情况长屋得设立若干小组。

第三条、中央委员会依工作需要得设立其他作机关，分别办理各项工作。

第四条、中央委员会设正主席一人，副主席不超过四人，秘书长一人，助理秘书不超过五人，正财政一人，助理财政一人，查账一人，委员不超过五人，各级委员会得依实际需要予以增减。

第三章 职权

第一条、边区盟员代表大会的职权如下：

(一) 听取、讨论和批准中央委员会及中央其他机关的报告；

(二) 决定和修改盟的纲领与章程；

(三) 决定盟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四) 选举中央委员会

第二条、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如下：

(一) 代表本盟与其他团体联系；

(二) 建立盟的各种领导机关，分配盟的人力和物力；

(三) 执行边区盟员代表大会的决议。

第三条、中央委员会属下之各级委员会根据上级机关的决议决定所属范围内的各种工作问题。

第四章 纪律

第一条、盟的政策及各种问题，在未经决定以前，每个盟员在盟的会议上可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一经决议后，及须服从，并须无条件地执行。

第二条、遵守盟的纲领、章程及严密制度。

第三条、无条件执行盟的决议，坚决履行盟员的义务。

第五章 经费

第一条、经费来源

(一) 盟员入盟基金和月捐

(二) 盟员的自动捐和特别捐

(三) 盟外的捐助

第二条、经费用途

(一) 中央委员会或各级盟员负责人代表盟处理有关盟务时的用费；

(二) 为实现盟的目标所付出的一切开支。

第三条、各地盟员应缴之盟费数额，由各地盟委规定实行之。

第六章 附则

第一条、由於盟当前处于地下活动。因此，關於会议和选举的制度暂不执行。

第二条、中央委员会有权阐释盟章。学好民族语言，总结好民族工作经验，掌握好领导上对民族工作的策略指示，为彻底贯彻我们的中心任务——民族工作而奋斗！

北加里曼丹伊班兄弟党（仁达党）建党宣言总纲

（一九七九年）

北加里曼丹伊班兄弟党是在北加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伊班群众自己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政党。

北加里曼丹伊班兄弟党的任务是在于团结、组织和教育广大的伊班群众，坚决领导人民进行反对压迫和剥削的革命斗争，开展反对马来沙文主义的斗争，坚决打倒“马来西亚”，为建立一个各民族、各阶层的民主联合政府，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繁荣的北加里曼丹人民民主共和国而斗争。

北加里曼丹伊班兄弟党有义务领导人民改善群众生活，掌握先进的农耕地，努力提高与发展伊班民族文化，搞好长屋的医疗卫生工作，减少人民的疾病与痛苦，以及改善交通等。

北加里曼丹伊班兄弟党认为，革命要取得胜利，没有联合各民族的革命力量是不可能的，在现阶段，党认为尤其是要联合先进民族的革命力量，革命才能更快的走向发展。

党注意到敌人的反动本质是不会改变的，“议会民主”是敌人用来长期欺骗人民的東西，它不可作为我们斗争的主要形式，但我们必须重视使用它为我们的斗争服务。武装斗争是我们主要的斗争形式，党将坚决领导人民“上山”，走仁达那种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北加里曼丹伊班兄弟党，坚决继承仁达的遗志，联合各民族的革命力量，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为彻底实现北加的独立解放而奋斗。

回顧民族工作歷史





早期的民族工作

—怀远

砂拉越是多元民族之邦，伊班族、比达友族、马来族、马兰诺族、加央族、肯雅族、普南族，等等民族，不仅占人口的大多数，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民族人口中的95%以上是农民，他们居住在最广大具战略意义的地区。因此，砂拉越革命的主要问题是民族问题，是民族农民问题。由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所以任何单一民族要解决砂拉越的革命问题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才能发挥最大的斗争力量，才能根本上解决砂拉越的革命问题，砂拉越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

砂拉越解放同盟的成员是清一色的华族，然而我们的革命目标是解放砂拉越的各民族，是为广大劳动群众服务，是不分种族的。我们以实际行动，最忠实而坚定的为这一崇高的宗旨而奋斗。

盟向来就非常重视开展民族工作，并把它看作关系革命兴衰存亡的首要问题，这是正确的。早在1958年，盟中央就成立了以中央委员文铭权为首的包括黄纪作、叶存厚和雷皓莹四人组成的，中央民族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民族工作。当年黄纪作、雷皓莹等几个人，还走了几天到第一省印尼边界一带，沿途对达雅民族状况进行了一般调查与了解。后来盟还制定了“以地下工作为主，以民族工作为中心……”的革命工作总方针。

由于历史原因，加上英殖民主义者长期实行“分而治之”的阴险政策的结果，使得各土著民族不但经济和文化极端落后，而且使得各民族之间产生隔膜，甚至导致民族之间关系呈现紧张的局面，因而使得民族问题显得格外复杂，民族工作道路格外艰巨和曲折。然而为了实现盟的崇高理想，盟依然勇敢的面对现实，迎接挑战。

为了开展民族工作，盟采用秘密和公开两种形式，首先采用秘

密的工作形式，而且从深入的民族地区开始。这样做除了为将来武装斗争创设条件外，也同时为一旦革命遭到镇压时的退路做准备。

1959年，盟开始秘密挑选和训练民族工作干部，训练内容包括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民族语言以及生活技能（包括学习割树胶、理发、修手表和普通医疗）。

1959年，民族工作中央委员会进行改组，以郭伟忠为领导、成员有雷皓莹，刘紫金和张本仁。由郭伟忠领导的第二届中央民族工作委员会派其领导成员之一的刘紫金去领导第四省的秘密民族工作。之后有十多位同志接受了这项任务，其中张伟森、张子游和蔡慧珠等去开展巴南河支流丁渣一带工作，庄金明、沈耀辉、张雪梅等在巴南河另一支流杜多河一带工作。经过几年工作后，随着民族工作干部被捕，第四省秘密民族工作就停顿下来。

1959年，盟还秘密的派出民族工作干部开展第一省的秘密民族工作。1961年后，又有20几位民族干部，到古晋县的安拔梯头和巴达旺，西连县的打必禄和打马庚，下沙隆县的实文然以及石隆门和伦乐县等地区长屋去开展那里的达雅族工作。

1959年，第一批民族工作干部成员包括邱亚陶、曾纪明、彭家训、吴三光、张伍就、蔡秀芳、蔡三扬和陈春林。在邱亚陶的领导下，从第一省来到第三省，与第三省的民族干部结合，到桑地区的乌鲁卡地巴斯、如楼、民丹莪、泗里街、乌也及沐胶等地，也有派往混合区去开展伊班民族工作。1961年，又有一批民族干部被派去加帛等地开展秘密民族工作。1963年后，许多民族干部在加帛、桑、泗里街以及如楼等相继被捕，使民族干部力量遭到一次较大的削弱，同时内部也出现分化。从1964年至1967年拉让江地区的秘密民族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的状态，只有极少数地区有继续坚持工作。至到1968年，武装斗争开始向上发展时期，民族工作也逐渐开始向上发展。

1961年也有约20位民族干部被秘密的派到第二省的乌鲁英吉

利里、乌鲁巴丹艾、乌鲁丰洛等地区开展伊班民族工作。

1962年，盟派庚长和张燕辉到第五省林梦河上游，以姆禄族为主的瓜拉卜劳乡地区开展秘密民族工作。

当年的秘密民族干部对伊班族、比达友族或加央族大都只有理论上的一些认识，绝大部分民族干部的民族语言初时不会听，也不会讲。然而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却毅然离开那从未离开过的家乡，到那完全陌生的深山老林，不少同志由于水土不服而生病，还有个别同志病逝长屋。

为了不暴露身份和政治目的，到长屋去的民族干部多以到长屋找职业为借口，而多数同志是从事割树胶，有少数以做生意为掩饰。有的住在群众树胶芭的茅屋。平时除了格树胶，就尽量多跟群众一起学语言，帮群众做些家务或者义务劳动等，以便跟群众打好关系，争取在群众中树立好的形象。后来有的同志还给土著群众做义子，个别同志还娶土著女子为妻。

为了和土著群众打成一片，同志们跟群众生活一起时要表现得越土著化越好，用手抓饭吃不必说，就连土著用腐烂的鱼或肉类制成又黑又臭的一种叫“肉骨”的，也要硬着头皮吃。有个别同志始终不适应那种生活环境，而反复生病，不得不安排撤回华区工作。

虽然在秘密为主工作方面的时间不长，而且大部分地区不能进行有力的政治宣传和教育，然而也提高了部分民族群众的政治认识及搞好民族团结，还培养少数土著本身的干部，也加深了我们对民族问题的了解，为公开政党工作的发展，以及后来武装斗争的开展创设了有利的条件。

为了配合民族工作，第一省还先后出版《拉让江战斗报》和《民族呼声》，第三省也出版伊班文的《农民报》，以及一些伊班文的宣传册子和传单，对民族干部和民族群众进行宣传和教育。

在组织工作方面，非武装时期我们利用地下农会吸收伊班农民

入会，在长屋建立长屋委员会，或者采取个别联系方式。在武装斗争时期，我们曾经组织伊班兄弟党（仁达党）。

在公开民族工作方面，盟积极而充分的配合公开政党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大力开展民族工作。通过人联党不但对民族群众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还把民族群众组织起来，并发动他们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斗争。公开民族工作高峰时，不但人联党中央有土著参予领导工作，各地方党的支部也多由土著参予领导工作。平时不但发动几百名土著群众参与政治集会，也多次动员过上千土著群众参予大规模的政治集会。

尤其是通过公开式民族工作的开展，不但掀起了砂拉越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各民族团结共同斗争的反帝反殖运动高潮，而且许多土著民族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得到了一次飞跃性的提高，呈现出各民族团结共同斗争的令人鼓舞的美好局面。公开民族工作的大力开展，所取的明显成绩，也为后来的革命武装斗争夯实了一定的可靠的群众基础。

纵观世界历史和现实，举凡多元民族的国家，尤其是几个民族人口均衡的国度，呈现出的民族问题都格外复杂，特别难解决；尤其是殖民地国家，由于殖民主义者非常善于应用“分而治之”的毒辣手段，执行阴险的民族分裂政策，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之间仇恨和冲突。

正因为上述原因，在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开展民族工作时，尤其是武装斗争时期，我们在开展民族工作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牺牲了数以百计的优秀干部和战士。我们的民族工作最终与我们的革命武装斗争同样遭到挫折，这充分体现了民族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值得欣慰的是，在大批堪称是砂拉越人民优秀儿女的民族干部的不惜流血流汗，历尽千辛万苦前赴后继的奋斗下，我们的民族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尽管我们的斗争未成功，民族工作未达到目的，但我们民族工作者的光辉形象，却留在北加人民的心坎里，特别是留在伊班族的心坎里。

稿于一九九五年

当年开展第一、二省边界民族工作的回顾

—杨传兴



(一) 小引

民族问题没有解决，土著人民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是北加革命不能取得胜利的一项重要因素。但不应该就此否定过去事业的性质和成就。

“人间正道是沧桑”，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的正义事业和斗争，尤其是不能一蹴而成的。一般上都是要经过反复的失败、甚至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逐渐呈现出胜利的象征，也是事物发展的一般客观规律。

作为革命事业和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工作也一样要经过上述过程。

这些用无数鲜血换来的失败的经验值得人们加以重视珍惜和进行探讨、总结经验，取得教训。

既然有着上述作用和意义，这里就暂且让我回顾当年开展第一、二省的民族工作。

(二) 殖民地统治所造成的民族问题

英殖民主义的反动统治，不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激起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百多年的英殖民主义的反动统治，造成了我国各族人民，尤其是乡区和内陆的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生产力、文化政治等方面，不

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和发展。相反，却是在掠夺我国的资源财富，和始终都进行着高压和欺骗的反动统治，苟延残喘其殖民地统治的寿命，达到维护其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权益。

英国人为了上述目的的需要，也进行了一些简单和粗糙城市与乡区基本设施的建设和改良。

所以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所看到的，除了城市英国人统治中心，军警及其行政机关和汉族人民用自己血汗所凝成的基本设施建设外，也有几条极为简单粗糙的石头公路，从各省省府伸展到乡区内陆，甚至到印尼边区。

此外即使在一些非常偏远落后的土著乡区和长屋，都可以看到由英国人所建立和开办的教会学校和教堂，在进行着所谓“开化”落后民族的奴化教育的工作。

由于上述的殖民统治造成了我国各族人民，尤其是土著人民在政治文化、经济生活等方面的极端落后，愚昧无知，几乎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深山荒野、穷乡僻壤，和半原始的状态中。

（三）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重要性

“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农民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左右，土著民族几乎都是属于上述阶级的群众。因此，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边区各民族农民则是革命的决定力量。”（引自：《1965年的建党宣言》）

从上述国情和实际情况出发，革命不但和农民阶级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而且更明显地突出和这个阶级中的土著民族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砂盟始终把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摆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公开政党成立后，甚至提到革命的议事日程上来，加以积极处理。

民族问题和工作，确实属于农民问题和农民工作。早在公开政党成立之前的 1957 年，砂盟不但积极着手开展农运工作，而且也提出向民族区进军，和开展工作的实际行动。不过，由于当时主客观困难和种种原因，只能派出少许干部到民族地区，作短暂的居留和熟悉地理民情的的工作。因此，工作成效不大。

公开政党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是通过公开政党的活动形式，到民族地区去，号召他们参加公开政党。

（四）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基本认识

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农民运动是革命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民族问题和唤起他们的觉醒，是农民工作最为主要的一环。

这里讲的是民族，主要是指华族以外的其他土著民族。这些土著民族，包括马来族、比达由族、伊班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

其中巫达（海陆）是三大民族，人口相当接近。不过，当时陆海达雅民族合起来，人口会稍微多一点。

华族主要是居住在城镇和城镇附近的乡村地区；马来族主要是居住在各大河流沿岸和城市周围的乡村地区；陆海达雅族主要是居住在深山僻野，穷乡僻壤，尤其是各大河流的山区地带。以上大概是我国三大民族分布的基本情形。

华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具有革命和斗争传统。首先接受先进思想的古老民族。马来民族政治觉悟程度较次于华族。很早之前，马来亚就有一批先进份子，是参与马来亚共产党和公开左翼政党的缔造和组织者。1962 年汶莱武装起义，也是由汶莱马来人的地下组织所策划领导的。三大民族中虽然达雅族最为落后，不过在历史上，也有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反外斗争。

殖民主义为了维持对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反动统治，除了进行暴力统治和高压政策外，也在各民族中实行了挑拨离间，造谣中伤，制造仇恨和进行分而治之的分裂民族统治。

在历史上英国人所煽动和挑起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有石隆门华工的反外斗争，后期演变成大规模的民族屠杀。日本投降英国人回来初期，也曾趁着人民对日本汉奸的不满情绪，企图在华人社会挑起其他民族，尤其马来民族的不满情绪。1961年和62年，为了配合镇压革命运动，英国人也曾经在某些地区，发动过达雅族砍胡椒头、迫迁，企图掀起排华的民族矛盾冲突事件。还好由于华族人民的政治觉悟的提高，和各族人民长期都和平友善地生活在一起，英国人当时的阴谋诡计始终都没有得逞。

不过，由于土著民族的落后无知和殖民主义者长期的愚昧奴化教育政策，无疑的必然会导致土著民族的觉醒和民族工作的开展增添了种种的客观困难。

只要摊开地图，我们不难看到北加里曼丹。砂拉越的东南方和印尼交界都是一望无际的高山峻岭，深山僻野，山峦水绕，土著民族聚居的地方。北面临南中国海，河流交错的平原地带则是华巫民族寻找生活，获得温饱和生息的土壤。

土著民族在婆罗洲岛上，尤其砂印边界的土著民族是最落后的民族之一，他们甚至一生都不曾到过城市，见过世面，几乎长期与世隔绝，只有少数居住在与边区小镇较接近的长屋甘榜，才有到过好像第一省的安拔梯头、打必禄、望割，第二省的鲁勃安都，第三省的桑、加帛，第四省的巴南上游和姆禄，甚至接近砂印边界的山区进行物物交换。他们的物物交换是极为简单的，一般上他们所拥有的是树胶、树积（狗巫油）、蛇皮、穿山甲壳，有时也有猪、牛、羊、鸡等家禽，到上述地区的小店，换取他们所需要的铁、盐、毒鱼白药和火石等用品外，其他日常用品，尤其是那些奢侈品就谈不上了。

他们生活不但简单而且落后，那里没有正规学校，他们几乎都

是文盲，不管男女都没有穿衣服，只是把树皮或树叶织成围巾，围在身体的主要部分，就是来到上述地区的小店，也是没穿衣服。他们男女不分，全身赤裸一起到河中洗澡和戏水。十几岁的少女没有穿上衣，是平常的。只要和她们相处一个时期，关系比较熟悉后，在大庭广众面前，可以倒卧在你怀中。

他们除了一年一度的稻谷生产，果子收成和养少许家禽外，就没有其他方面的生产和收成了。平时主要是靠打猎捕鱼，采集野果等维持生活。

由于他们没有卫生知识，所以卫生工作很差。妇女生产做月，根本不懂得对身体的调理和补养。他们主要是靠生火取暖维持身体温度。住家和周围环境从来没有打扫，清除污秽。家庭用品、饭锅等用具，几乎从来没有进行卫生清洗。

生产力和思想落后，对自然界现象和自然界所产生的各种情况所引起的问题，无法理解和加以克服，致使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迷信思想。因此对一些天灾人祸，不但无能力克服，只有听天由命。因此所产生的各种禁忌，不但影响到人民的正常生活，而且也影响到生产的进行和生产力的提高。由于土著民族的贫困落后，生活在远离城市的穷乡僻壤，交通不便，外界讯息难以传入，尤其是正确进步的讯息不容易传播给他们。由于人数众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向来都是革命和反革命所进行争夺的对象。

由此民族工作不得不是一项长期、艰苦、曲折的工作。

（五）调派干部

民族工作是砂盟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就必然和革命的成败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有了上述开展民族工作的目的和政策之后，干部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真正在砂盟领导下比较有规模的调派干部奔赴民族区工作地区，还是1961年尾，1962年初的事情。

也就从那个时候起，砂盟中央才从第一省农运部先后调派了小杨（原名杨贤华，已牺牲）、方生（原名赖石辉，已牺牲）、山民、钟娘锦、刘震雄（原名庄美祥，已牺牲）、施敏、黄英（原名彭梦合，已牺牲）、莫明思（原名朱谨旺，已牺牲）、贝泽、耕夫、抗生、钟坤柱、李景请（已牺牲）、邓 xx、刘 xx、王明、丁乙、田友、坚民等；学运部有敏华、胡勇（陈玉球，病逝）；工运部有陈自强、田云端、黄勇；公开党部有弗克，公开政党代表小 D（原名杨柱中，已牺牲）。

上述部门所调配来的干部，除了个别人派往第二省，大部分留在第一省民族区。

（六）立足点和工作起点

留在第一省的民族工作干部和成员，主要是被派往古晋县的巴达旺和安拔梯头，西连县的打必禄和打马庚，下砂隆县的实文然，石隆门县和伦乐县等地区。

这次砂盟派遣干部开展民族工作，已经不是像前一次那样，只是在那里进行短暂的工作和居留，而是决心长期留下来开展工作了。

由于这样到上述地区开展民族工作的时候，必须通过一定关系寻找立足，便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了。

一般上除了通过公开政党的关系外，还要在当地有一份固定职业作为掩护，才能长期立足和生活。所以当时他们到上述地区，不是租借土地种胡椒，就是去打工，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上述地区还不是纯粹属于民族地区，其中有不少在那里从事小生意和进行农耕的华人。这些华人，多数已经和当地的土著民族，有着通婚关系。他们不但通晓当地的民族语言，而且在风俗习惯方面，几乎都和他们一样了。

这些和当地土著民族通婚的华族群众，他们的前辈，同样是从

中国来的。大部分都曾经受过中国革命的影响和熏陶，尤其是早期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甚至更早之前的革命运动。由此，他们都具有中华民族的优良革命和斗争的传统。

民族干部在上述地区立足，和作为工作起点，不但解决了基本生活问题，也自然提供了不少方便於工作上的条件。

（七）对开展民族工作的领导

从上述部门调来的干部，都先后奔赴工作岗位了。这个时候领导机关的建立，对他们的领导，便是往后成败的主要因素了。

1962年，田友联系坚民，然后通过后者，联系各地的民族干部。同年中，第一省民族工作核心的领导小组宣告成立。组长宇太（1966年离队），成员包括丁乙、田友、黄勇、坚民和公开政党代表的小D同志。

1962年“6.22”和“7.23”的逮捕事件发生后，为了适应当时局势的剧变，砂盟所领导下的工作，逐步由公开转入秘密，由城市转向农村，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退却，和积极保存革命力量。除了对民族的加强领导外，也进行以下的重组和调整。

在第一省省委的直接领导和具体指示下，1962年尾63年初，第一省南部边区民族工作委员会宣告成立。

第一省南部边区民族工作，主要是指从石隆门县开始到第二省的砂印边区。

委员会书记坚民，宣传敏华，财政黄勇，监察弗克，成员包括胡勇和施敏。

委员会负责的地区如下，敏华、施敏联系xxx三人组成一个小组，负责上砂隆河、打马庚、打必禄以下公路地区的民族工作；黄勇联系七午、贝泽、钟娘组成一个小组，开辟打必禄和砂印边区民族工

作。胡勇联系小杨、方生，三民负责安拔梯头和砂印边区的民族工作，坚民联系黄英、庄美祥、弗克和耕夫负责四哩邦河巴达旺公路一带的民族工作。

不久，敏华、施敏和他们领导下的成员都被捕，工作也遭到了破坏。

1963年到印尼后，为了更好地执行第三项革命总方针和“大力开展民族工作和积极准备武装的条件”的具体指示，除了继续开展第一省南部边区的民族工作外，也要积极把工作推向全省去。因此扩大和健全化民族工作的领导机关，便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了。

1964年初，一个以丁乙、坚民为正副书记，成员包括水浒（原名郑端绵，不久被调往民族工作部门负责宣传出版工作，直到牺牲为止）、抗生、刘震雄、田志锋、弗克、黄勇等人所组成的第一省民族工作委员会宣告诞生。

委员会所负责的实际工作，除了原来第一省南部边区民族工作外，也真正扩大到全省的所有地区，不过重点是放在砂印边区。

此外，坚民也开始兼第二省砂印边区的民族工作。

接着第二省砂印边区民族工作的开展，被派往那里的干部有谢亚声（原名蔡义清）、祝春（原名郑维忠，已牺牲）、李智、赖福强、李武飞、高金兰（女性，已牺牲）、沈蒂玛（女性，陈爱娘，已牺牲）、赵大山（原名吴德荣，已牺牲）、黄珍娜等。

上述被派往第二省边区的民族工作干部，其中谢亚声、高金兰、祝春、赵大山、赖福强等人被派往英吉利里、鲁勃安都的砂印边区；沈蒂玛、黄珍娜、李智、李武飞等人，被派往横江、板督一带的砂印边区。

砂盟除了发动和调派专门的干部开展民族工作外，也积极通过

被派往参加北加国民军的第一、二、三、四连的干部成员，除了在军事上和有关方面配合外，在他们所到之处，也负责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工作。通过他们的活动，至少促进了边区军民的良好关系。

部队成立后，除了领导机关和后勤部，几乎整个部队都是民运队。

（八）执行砂盟的决议

1962年汶莱人民党武装起义前后，砂盟先后组织和成立了秘密的砂拉越农民协会，和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以及提出第三项革命方针等一系列措施和工作。

汶莱武装起义后，我们执行砂盟所提出的“以地下工作为主，以民族工作为中心，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准备和适当开展武装斗争”的第三项革命方针。这时候，土著社会的主要组织工作，除了继续通过公开政党的组织形式去发动群众外，更重要的为适应当时形势的要求，必须把秘密农民协会和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的组织形式，作为土著社会的组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更广泛、更深入团结农民阶级，和其他阶级组成，包括各民族的反帝反殖广泛的统一战线。

正因为有了上述组织形式的提出，才有可能比较有效的组织和发动群众进入武装斗争的历史阶段。

另一方面，由于群众已初步被发动起来，砂盟所领导的所有工作，才有可能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退却，积极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九）砂盟在民族工作部门的宣传和出版工作

砂盟在处理民族问题与开展民族工作的时候，也是始终非常重视宣传教育和出版工作。宣传教育和出版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大部分的口头宣传也是从文字出版而来的。

除了砂盟早期所出版的《民族独立》、《学习报》、《工农报》，外围组织的机关报，以及公开报纸不提外，到印尼后，第一省委驻印尼地下小组，和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所出版的就有专供给民族干部阅读的《拉让江战斗报》和用伊班文编写和出版的《民族呼声报》(Suara Bangsa)。还有第二省北加民族解放同盟机关刊物—《解放呼声报》和许多有着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专辑的小册子。

认识和经验都是来源于实践，从1962年到1965年，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砂盟领导民族工作的实践，基本上取得了以下的初步认识和经验。

根据上述初步的认识和经验，民进同志曾经以 MC 为笔名，发表了《北加革命和民族问题》为题，於《拉让江战斗报》创刊号的社论。

社论基本上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简述以下的问题：

1. 北加的民族问题和革命，实际上是属于农民问题和农民革命。
2. 由于土著民族的落后，和殖民主义者的长期统治和奴役，致使土著民族的工作成为一项长期、艰苦和曲折的工作。
3. 民族压迫，归根到底是阶级压迫，必然有反抗，加上革命组织的正确领导，土著民族的最后觉醒，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4. 革命是群众本身的事情，因此其他民族的干部，尤其是华族干部，在开展土著民族工作过程中，必须从根本上把培养土著民族本身的干部为主要任务，建立他们本身的领导机关，树立他们的领袖，才能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看成是一项关系革命成效的根本战略问题。

坚民同志以坚敏为笔名，在第二期的《拉让江战斗报》发表了《民族工作和土著民族干部的培养问题》为题的专论。

专论除了同意 MC 同志关于开展民族工作，和解决民族问题

的基本观点外，也进一步地提出了关于培养土著民族本身的干部重要战略意义和作用。

以上刊物和专辑小册子的出版，虽然缺点不少，却对民族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

（十）民族工作的成就和干部的献身

砂盟领导下的民族工作，经历了公开和非法（包括和平宪制斗争和武装斗争）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首先要肯定这项工作所取得了以下的成就。

1. 进行和经受了一场广泛的反帝反殖和初步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运动。

2. 第一次由砂盟领导下，把婆罗州岛上最落后的第一省砂印边区、双空(SongKung)和第二省的砂印边区的部分土著民族发动起来。

由于上述地区的土著民族工作的开展，为砂盟 1962 年所领导进行战略退却，准备武装斗争，大批人员向印尼提供了客观的方便条件。

其中，后来成为砂拉越人民游击队负责人的叶存厚、杨柱中等人就是从老路 14 哩出发，经过左手港一带，由小杨同志所安排的交通线，抵达安拔梯头。然后由当地的民族干部安排越界到印尼的巴来嘎兰岸(Balai Kerangan)，再由当时民族工作负责人胡勇同志接送，最后经过上侯(Sanggau)安全抵达印尼的坤甸和山口洋。

第二批由天空同志（原名沈稚威）所带领的最大批（一百多人）的一队，从晋连路 24 哩木瓜山出发。由黄英同志所负责的交通线，经过最少 20 多座长屋和地区，到达打必禄。由黄勇他们安排越界，到达双达(Sondah)。由七午、黄安老伯（黄祥明的叔父）他们负责，取道巴来嘎兰岸，经过上侯安全抵达坤甸和山口洋。

第三批是从伦乐直接到印尼的尼姑村，由于实际有关的负责人直接安排联络，也安然抵达山口洋。

最后一批是火炬所带领的 86 人，由于发生意外事件，带路人被捕，缺乏经验，部署不周，又被达雅人出卖，结果不能和打必禄民族工作者取得联系，除了少数突围外，结果有 69 人被捕。

此外，还有很多零星和小股，由于他们有和边区民族工作干部和负责人取得联系，所以他们都安然越过边界到达目的地。

第二省，由于边区民族工作稍有开展，所以李洪彬（原名范子香，已牺牲），谢亚声（原名蔡义清）他们才能大批过界，不过由于印尼那一边工作没有开展，到了印尼境内的新当(Sintang)县地方，就受到那里军方的阻难，甚至扣留，经过相当时间的力争，这批人才能继续成行，抵达目的地。

汶莱武装起义后，大多数公开阵线的干部和同志都转入秘密和华族农村。不过，也有少数转向土著民族地区和甘榜。其中黄英、弗克、耕夫等人，除了潜伏在民族地区，得到土著群众的保护外，也开展了不少工作，和吸收了不少的农会会员。

当他们得知有大批华族群众要路过他们的甘榜，取道到印尼时，这些土著群众除了主动热情为他们送食物送点心和送行外，甚至有个别的积极分子还要求参军。

3. 从 1962 年到 1963 年，仅仅是一年的时间，就把立足点和工作起点的华达混合区的群众，几乎大部分的发动起来。这些群众不但为过界撤向印尼起了向导的作用，而且也为后来军事活动，提供了多方面的方便。

4. 由于边区土著民族工作的开展，不但为上述工作进行和完成，提供种种方便条件，也为后来部队建立、生存、坚持反围剿斗争，提供了基本的条件。

第二省巴当艾部分地区民族工作真正通过部队武工队形式去开展，还是1967年后的事情。

当武工队开入上述地区，不但受到他们的热情欢迎，而且往后还主动负起分担武工队的粮食和保安的工作。

不到两年的时间，武工队活动过的甘榜有四十多座中的二十座，其中有四座，整座都被吸收为北盟盟员。在艰难困苦的反围剿的岁月中，敌人进行无期戒严、宵禁，和全面的封锁，而且凡是被认为可疑的人物都被逮捕，投入监狱，只有屋长才被请去西马“观光”。

在上述高压行动面前，他们并没有屈服，仍然为武工队送情报、买粮食，甚至有人在厨房和武工队人员接触谈问题，前面客厅则由一些女盟员去应付和“奉陪”敌军，他们的机智勇敢令人钦佩。

长屋中尤其是一些女盟员，甚至和武工队一起进行反围剿的斗争，直到武工队撤回印尼边区，她们仍然坚强不屈。第一省边区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地区的个别屋长，甚至遭受敌军的严刑拷打，至死不屈服。

汶莱武装起义后，砂盟所领导下的革命，能够顺利地进行和完成战略退却，撤向印尼，保存革命力量，以及建立部队，坚持斗争，和边区民族工作的开展，取得一定的成就是分不开的。

5. 民族工作除了肯定上述成就外，民族干部队伍也经受了一场锻炼。在上述长期、艰苦、曲折的工作中，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出色、忠于民族工作事业的干部，他们包括水许、谢亚声（蔡义清）、祝春（郑维忠）、小杨（杨贤华）、胡勇（陈玉球）、黄英（彭梦合）、沈蒂玛（陈爱娘，女）、高金兰（女）、刘震雄（庄美祥）、赵大山（吴荣德）等。

这批干部始终是忠于革命和民族工作外，具体表现认真学习民族语言，初到民族地区时，有的连半句伊班话都不会讲，在一个极短

的时间后，基本上都学会能讲、能写、应用自如的民族工作者，尤其是水浒同志在翻译华伊沟通民族文化的工作上，作出杰出的贡献。

他们真正深入到民族区，同群众打成一片，同劳动、同生产、同吃、同娱乐。尤其在劳动生产、开芭砍大树等工作中，祝春同志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

土著民族社会的物质生活极端艰苦，卫生也很差。他们经常把已经高度腐烂发臭的肉类，做成肉酱如骨（Jukut）当做佳肴美味，敬奉上宾，这些食物上述民族干部也照吃。这样的物质生活对原来的城市富裕家庭出身的人，能说不是勇敢考验和艰苦的改造过程吗？

因此，民族工作有上述成就，和上述大批干部的决心与献身是分不开的。

（十一）挫折和失败

在肯定民族工作成就的同时，挫折和失败也应该加以承认和探讨的。

挫折不等于失败。但，多次的挫折，可能会导致失败，不管是挫折或者失败，首先和以下主观原因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1. 尤其认识了土著民族工作的重要性之后，但因为组织不健全，专门的领导机关虽有设立，但始终不能发挥较有效的作用。
2. 由于没有专门有力的领导机关，因此对土著民族问题和工作就无法着重研究，提出更有效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
3. 民族工作部门的直接负责人和干部缺乏应有的理论水平与工作能力。
4. 叛徒的破坏也起着一定的影响。

除了上述的主观因素外，也有以下几方面的客观原因：

1. 土著民族的落后性不是短时间可以改变的。一个民族的觉醒，是一个民族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奋斗过程。

2. 长期受着英殖民主义者的反动统治和奴化，导致土著民族工作开展，面临重重困难，要觉醒起来需要更长的时间。

3. 土著民族始终都成为革命和反革命互相争夺的对象。在这场矛盾的争夺战中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不但还未达到势均力敌的程度；相反的，革命的力量还处于相对较弱小的方面，在统治阶级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手的镇压下，土著民族是暂时被压服了。

4. “斯里阿曼”事件的发生导致民族工作失败的最直接原因。

上述的主、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始终是根本和主要的；客观因素只能起着影响的条件作用是次要的。

（十二）正确看待民族工作的失败

因为革命的全面失败，因为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和血腥统治，土著民族工作也和其他民族的工作一样，再也不能继续开展和发动了。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承认民族工作是失败了。

确实这也和其他民族问题和工作看成只是伊班民族，其实也包括马来民族在内。在反对外来统治的长期斗争中，马来民族曾经出现过不少民族英雄、革命先烈和领袖。他们的斗争对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做出重要的贡献。今天以马来民族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为先导的社会运动，必将对今后社会起着重要影响和作用。

（十三）结语

写完这篇拙稿，难免会有深深喘一口气的轻松感觉。不过在回顾这一部门工作的经历时，心情却又更加沉重的感觉。

虽然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但今天拿起笔来进行整理这份历史资料时，仍然有着严重的“理论用时方恨少，实践之后才知难”的深刻体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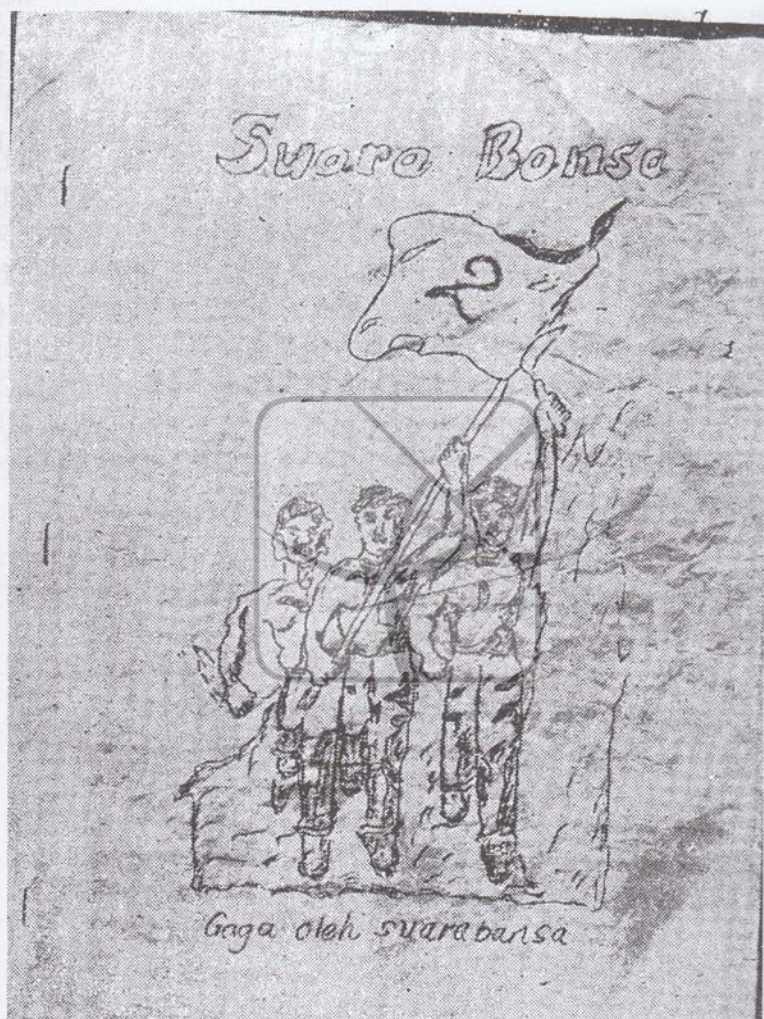
三、四十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有着上述情形，三、四十年前的那个时候，不是可想而知吗？

老实说，没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学识和工作能力，只凭着满腔热情和一股干劲是无济于事的。

以上所略述的只是第一、二省土著民族工作开展的局部情况。以粗浅学识和理论水平所挤出来的东西，缺点、错误和不足，实在所难免的。

笔者大胆执笔完成这篇拙稿，仅仅盼能取得抛砖引玉之效。





Suara Bansa 《民族呼声报》第二期封面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的民族工作

—张亚华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要在民族地区立足，要坚持武装斗争，要壮大和发展部队，就一定要开展民族工作，就一定要同民族搞好关系，就一定要得到他们的同情、支持和帮助，否则我们的部队就根本无法在边区民族地区立足。因此，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和第一支队到边区活动和建立基地时，就立刻开展民族工作。

但是，在当时，开展边区民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是什么？它与国内开展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方法和形式有什么不同？例如：究竟是要发动边区（指印方）的民族直接参与北加的革命？还是，只争取他们同情、支持和帮助北加革命呢？……等这一系列问题，还是没有完全弄清和解决，这就直接影响到民族工作开展的效果。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原本搞民族工作的同志调去第三支队后，就由第一支队内重新挑选出几位同志，由何士曼亲自负责领导他们开展基地附近的甘榜工作。

由于多数同志都不曾搞过民族工作，没有经验，语言不通，对民族的风俗习惯也不了解，真的是困难不少。为了搞好民族工作，首先就要积极学习民族语言，同时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进而了解和熟悉他们的生活，民情和民俗等。

边区的民族甘榜大大小小有数十座，有些甘榜有印军驻守，我们不便去开展活动，仅选开展基地附近的甘榜。如巴都依淡、单容、加翁、廉、巴当亚弈等。这些甘榜分散在边区地带，有长屋，有分散住家，甘榜路程距离半小时、一小时至数小时以上不等。当时我们的工作重点选择巴都依淡，单容两座甘榜；其他的甘榜根据情况和实际需要不定时的去作宣传工作，同他们保持联络和搞好关系。

边区民族大多数过着非常贫困简单的自然生活，全靠刀耕火种，风调雨顺的年就是丰收年，年粮足够有余。碰到天灾人祸时，一

年的日子难于渡过，要靠种木薯、玉米、南瓜等杂粮以渡难关。食油奇缺，连基本上每天要吃的食盐有时也断绝；加上他们不懂卫生或不注重卫生，体质弱，疾病多，又不懂得医药治疗，迷信神鬼，用鲁坤治病，求平安，造成他们生活更加贫困。甘榜是一个远离城镇，偏远落后的山间地区，交通极其不便，走的是只能容一人行走的山间小路，行的只能撑小船的小河流；是印尼政府还没有发展和管制松懈的贫穷边区，他们所生产的主要是自食的稻米和杂粮，几乎没有经济作物的生产，可供交换和买卖；使用的是巴冷刀和斧头等简陋的生产工具。

面对着如此的边区民族兄弟，应如何开展工作呢？当时的作法是：向他们宣传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性质、组织纪律，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等等。争取他们的同情、支持和帮助我们的部队。除了做宣传教育工作之外，我们还严格要求搞民族工作的同志遵守和执行部队的组织纪律，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要倾听群众的意见，要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要了解和注重他们的风俗习惯。

在具体的工作上，遇上他们农忙季节时，同志们就帮助他们砍芭，种稻和收割；有伤疼和急病时，我们派医务人员去帮助医伤治病，还免费送药品。有时，他们也会到部队基地找医务人员，我们教育他们要注重卫生清洁；有山猪、鹿等野兽破坏他们的农作物时，我们帮助狩猎，猎获野兽，与他们共同分享，不占为己有。由于部队战士的一举一动都表现是关心他们的利益，维护他们的利益，毫无侵害他们的利益，部队战士与他们同劳动，同甘共苦；同他们深切交谈往来，有困难时互相关心和帮助，完全没有旧军阀主义的作风，因此，深得他们的尊敬和爱戴。

民族兄弟经过宣传教育，以及亲眼目睹我们部队是一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部队，所以我们的部队到周围附近的甘榜去开展工作活动，他们都会支持和欢迎，并希望能经常到他们的甘榜去；在工作重点的巴都依淡和单容甘榜，部队安排数位同志长住在民族兄弟的家里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有的同志还认了达雅为干父干母，其关系更为密切，这些工作同志，每一、二星期都定期回部队商量和研究工作的进展。在工作中，同志们不但要搞好同民族兄弟的关系，还要争取教育甘榜头。同他搞好关系，有了甘榜头的同情和支持，在甘榜内展开工

作就容易和顺利多了。由于我们部队同民族兄弟的关系密切和良好。每逢年节时，他们都会请部队战士到他们的家过年（丰收年）；平时的民族兄弟经常会送些米、树糖、烟丝、菜类等给搞民族工作的同志和医务人员；部队所建立基地的地方，种木薯、番薯、稻等的芭场是民族兄弟借给的；部队所砍伐的原始森林，准备种山稻的芭场也是甘榜头同意的，由熟悉地形的民族兄弟找给部队的，砍伐树的斧头等工具是他们借给战士们使用等等。总之，部队当时能在边区顺利立足，开展工作，劳动生产，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是非常重要的，否则，面对重重的困难是难以克服的。

第一支队在当时没有用组织的形式把他们有效的组织起来，这是很大的缺点。原因是：一、缺乏经验；二、领导上没有明确的搞边区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三、缺乏民族工作、民族问题的理论指导。

在这里，还应提到的是巴都依淡等甘榜有不少的年青人想参加我们的部队，当时考虑到我们的部队没有带民族队员的经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顾虑这些想参加部队的民族青年能过部队有组织纪律和艰苦奋斗的严格生活吗？因此不敢大胆放手吸收他们，仅仅吸收三位试验，等以后慢些时间，依情况才另做决定。后来这三位民族战士在部队中的表现还好。

在马印联合“围剿”初期，部队还能同甘榜的民族群众保持联络，他们还会秘密的支持和帮助部队做些工作，如提供印尼兵的活动情况，帮助购买一些粮食或送给部队一些粮食等。后来由于印尼兵长期驻守在甘榜中，特别是巴都依淡，单容甘榜，并残暴的镇压、迫害、逮捕、审问、毒打同我们部队有密切来往的民族兄弟。因民族群众受不了印尼兵的迫害，有些分化变质而出卖自己的队员。对方还限制民族群众到森林边缘的稻芭等。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继续到甘榜去活动和联络是不妥的；另一方面也很难联络他们，同时危险性很大。故此，部队要解决粮食的难题，另打通到单容利八的交通线。

后因印尼兵袭击我部队，部队的战士被单容副甘榜头杀害，我们撤离甘榜到更远的边区森林地带去，这样我们就逐渐地放弃甘榜的民族工作。

回忆第二支队民族工作点滴

忆林

东部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第二支队，是在 1965 年 12 月 12 日成立。它的据点（营地）是建立在干督河支流的森林地区叫做“马兰交”。

第二支队营地离干督河村镇大概要整天的步行路程，村镇有极少数华族商人在做小生意，镇附近有警察和印尼兵驻扎，也有好几座伊班长屋。第二支队在成立前后好久一段时间，都好常在该村镇出入来往。初期，我军还常派一些较精干的同志到干督河村镇搞群众工作，搞粮食，也和印尼军搞统战工作，搞一些我军需要的军备，粮食、子弹等。

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第二支队的组织系统是以总部和指挥部领导各属下展开工作。由总部直接领导下的有一大队人员，这批同志是精干，任务特别艰巨，因为他们是在国内前方靠近国内边区地带，进行武装教育、组织动员群众工作。

支队的各小队都分配在不同的地区与范围内开展民族工作。初期在营地生活时，这些小队是以小组出去跟群众搞福利与搞粮食，及宣传工作等，工作了三、五天又回到大营地。

部队刚成立那年，同志们较多时间花在营地搞生产，如种菜、番薯、木薯、瓜类等，部分同志到长屋除了宣传教育群众外，也是注重搞粮食。因为米粮是我军生存的重要条件，储备军粮和搞群众工作，是我军当时的重要任务。

1966 年底，整个局势已转变，印尼政府已和马来西亚政府从对抗走向媾和。印军也陆续到边界驻扎，到森林和长屋巡逻，准备围剿我军。从此之后，二支领导人就逐步把大营地的同志分散，以游击队的形式，分散到各个地区搞民族工作。

以下简述第一小队搞民族工作的点滴。指挥部杨平（杨传兴）指导员，分配两座长屋给第一小队搞，一座叫“哥郎密”，另一座叫“吉当”，这两座长屋较接近鲁勃安都地区，从长屋到鲁勃安都大约步行四、五个钟头而已，这两座长屋的伊班群众很常背一些土产到鲁勃安都去卖，然后又在当地购买一些需要的日用品回来。

“哥郎密”这座长屋，大概有 30 户。这座的伊班群众生活会比“吉当”的一座长屋较好一些，长屋也比较新，他们也比较勤劳，每个住家都有种稻，每年收成都不错。也许他们生活较好些，所以他们比较积极热情和开朗。“哥郎密”这座长屋，大部分的群众都很积极支持我们。群众之中有少数不管事，明哲保身。屋长较严肃，但他只管好他属下长屋的群众，其他事他就不很热衷。但有好几家和我们小队关系特别好，尤其是 Apai 一家和苏帮西母女一家。我们小队的同志，每到“哥郎密”长屋 Apai 一家一定要留我们在他们家吃饭，要不然就是到苏帮母女家吃。

这两家是“哥郎密”长屋的积极分子，也是我军的保干群众，长屋发生什么问题，或到鲁勃安都边境购物时有看见或听到什么，她们都会先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有时也叫她们了解敌情及购物等。

我们小队住在长屋附近的森林，白天有时帮群众砍芭、种稻。稻熟了去帮他们采稻，中午在“郎高”一起吃饭，晚上到长屋帮群众针灸治病，伊班语文较会的同志就逐家去拜访与宣传群众。有部队同志向他们学习语言，及叫他们教导我们伊班族的传统舞蹈，如狩猎舞、丰收舞、英雄剑舞、老鹰抓小鸡等。

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形式和伊班群众生活在一起，和他们打好关系，从而团结教育和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促使他们更了解我军的宗旨，使他们感受到我军是为人民与爱人民的人民军（Paraku）。

自 1966 年底，分散开展民族工作以来，各小队也开始自力更生了，我们的伊班群众都积极支持和协助我们，给整大片森林让我们去开辟种稻、种木薯与菜类等。经过小队同志们的努力艰苦奋斗，终于开辟了整片森林，烧芭后种下稻和菜类。辛勤劳动几个月后，终于

有成果，收成稻米，能辅助小队的米粮。

伊班群众自己的稻芭收割完后，也让我们去种木薯，他们先前种的木薯及稻芭所有种的东西，如黄瓜，玉米、伊班菜等，都叫我们可以自由去采来吃。除此之外，他们也会卖一些米给我们，还会帮我们到鲁勃安都附近买一些我们需要的物品等。

我们负责下的第二座长屋“吉当”距离“哥郎窑”长屋大约要走两个钟的路程。“吉当”长屋的群众在经济上比较不好，年老的群众较多，长屋也很陈旧，一上到长屋走廊感觉有点阴暗。该座长屋的群众生活虽然比较穷苦，然而他们还是会支持与帮助我军，如帮助了解敌情，买粮食及卖一些杂粮给我们。

我们这一小队每个月都会到吉当长屋两三次，除了处理粮食和宣传之外，也注意福利工作。白天我们帮他们种稻、采稻等农活，晚上帮他们针灸、按摩，也配一些药物给他们。我们的战士都很真诚关心与帮助他们，他们异口同声表示感谢我们 Paraku，他们都会给一些木薯、金瓜、黄瓜、恩沙比等来答谢我们。

我们二支的武装部队，能在印尼边界的民族甘榜立足与生活。这主要是靠我们各小队的每一个干部战士能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贯彻执行人民军的群众路线。再加上我们都有真诚、热爱群众的一颗心和他们相处，也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能和群众打成一片。

1967年7、8月间队伍进行调整，有的同志调到二支与三支中间地区搞联络和交通工作。我和其他岗位小队同志被分配到第二省边境较靠近内地区搞民族工作。这个小队是由蔡秀明同志（杨云台）担任队长。我们这小队要搞的地区 Semalai 长屋，再过去不远还有三座长屋：RH Palok、RH Ilai 以及 RH Mulubuk。这三座长屋不属于我们搞的范围，是第一支队同志们搞的。

而由蔡秀明队长带领我们搞的 Semalai 长屋，也是一支队未成立之前，是 B.P 武工队（就是横江板督武工队）已开展了的民族甘榜，已有一定的基础，所以我们去搞就容易的多了。一般群众都很热

情支持与协助我们，我们队里的米粮都是靠他们帮助买和运送，然后我们才到长屋附近去运回点。

在这区搞民族工作，我感到很开心，同志们相处得也很好，大家都能互相关怀与照顾。我们这队只有我和贝小妹是女同志，其他都是男同志。队中有一个叫起来的同志是从二省来参军的，年纪比我小些，他的文化水平很低，但他的伊班语讲得很流利。他很风趣，也喜欢吃榴连虫，曾闹一些笑话。

可惜，我在 Semalai 地区搞民族工作，只不过半年的时间，我又要离开同志们和该区的伊班群众。

1968年3月初，蔡政委（蔡瑞庆）从第一支队带领几位同志，经过我们这个地区，我就和他们同行，一起撤回第三支队去。

以上我所写的民族工作点滴，是在1965年底—1968年初，是我在第二支各地区搞民族工作的点滴回忆。在那个时期搞民族工作的确比较顺利，也没有遭受到较大的挫折。因为那时驻扎在边界的印军较倾左，对我军的态度还好，我军还能和他们搞统战，跟他们的关系不错，我们还搞到好大批“士登枪”（Sten）子弹和粮食。

在这种较平静的形势下，第二支属下各单位的民族工作都搞出一定的成绩。凡是我们去开展过的地区，大体上的伊班群众都会欢迎我们，并支持与协助我们，这是因为敌我斗争还不是很尖锐，群众还没有受到外来势力的镇压和威胁；另一点他们也看到我们（Paraku）的成员都很有组织纪律性，不像印军那样胡做乱为，相比之下，群众认为我们是好人。再看到我军的战士每到他们的长屋，都积极热情的帮助他们，尤其是关心他们的病痛，并尽力帮他们诊疗治病，给药他们吃，减轻他们的病痛。

但从1968年中开始，印军就逐步加强在边境的军事行动，经常到长屋巡视与探听我军的行踪，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威迫伊班群众供出我军活动的情报，尤其是恐吓他们不可支持人民武装部队，知情者一定要赶快来投报，否则就要受到对付等。同时，印军也常到森林

搜索与追剿我们。

之后我军在民族甘榜搞工作，就面对了许多困难：遭到敌军的埋伏袭击、同志被坏群众出卖而被杀害等。同志们上到长屋，群众就感到害怕不安。如1969年，330战斗队是在都劳河上游开辟新区工作，初期群众都很热情地支持他们。后来领导计划要在那些地区打伏击战，他们打了好几场战，也缴获好些枪支。在这同时却引来敌兵大肆向我军围剿，破坏与恐吓群众，放火烧他们的长屋，使他们无家可归，被迫暂时走进森林。住了几天后，因为没有粮食吃，他们无法生活下去，只好跑出去向敌军屈服投降，在敌军强迫与镇压下，好些群众就和敌军同谋进山追剿我军。过后，敌军下令叫伊班群众把所有在长屋附近种的木薯砍光，目的是要切断人民军队的粮食来源。从此，3.30战斗队的民族工作组就很困难在那些地区搞工作了。

在敌我斗争日益尖锐化的当儿，在敌军的迫害下，群众害怕恐惧，不敢支持我们。虽然我们部队的同志是有组织、有训练、有教育、有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在不断的尖锐斗争的考验下，也有部分同志（包括支队负责人）也和群众一样，动摇革命立场，走出去向敌军投降。这些叛徒被敌军利用来对付我军，一些人被组成敌军的突击队，倒回来追缴我们的同志，也和敌军一起去镇压曾支持帮助过他们的伊班群众，因为这些叛徒很清楚知道那一座长屋的那一些群众，是积极支持我军的。然后敌军就强压长屋的群众组织民防队，加入他们（敌军）一起去森林追剿我军。如果一些群众不听从、不肯加入民防队，就抓他们到河里浸水，再不然就用生命威胁他们，在敌军种种威迫利诱下大部分群众只好屈服顺从。然而群众又在敌军队伍看见有他们积极支持过的 Paraku 成员也穿着和敌军同样的制服，来镇压他们，一起进森林追杀我们的同志，事实上也造成一部分同志牺牲。在此种情况，伊班群众更加害怕。

总之，随着敌人对我军和群众的不断围剿和残酷镇压，敌我斗争的日益尖锐化，也导致部分同志对武装斗争失去信心，也造成伊班群众不支持武装革命斗争，加上领导的问题，造成第二省的人民武装部队在1973年全部瓦解的局面。

写于2006年7月28日

为唤醒民族兄弟，不惜流血牺牲

为了团结、受苦受难的民族兄弟，有多少的祖国好儿女，放下个人一切，奔赴贫困落后的民族区。在帮助、教育伊班等民族的过程，又有多少的优秀民族工作者被坏人陷害，付出宝贵的生命。

在此，着重简介一部分在拉让江民族区活动时被陷害而牺牲的同志。

造成这些事故的客观原因：敌人的残酷镇压群众和收买诱骗、群众的觉悟、坏人的出卖、活动搞粮的暴露、民情不熟。主观因素：轻敌麻痹、过于相信群众、没有严格实行必要的安全措施及缺乏斗争经验。这些事件的发生并不完全说明对方的厉害，而也有我们本身的弱点和一些群众的落后，而被敌人所用。

(1) 蔡铁军（邱亚陶）宣委，于1969年1月8日凌晨壮烈牺牲在牛麻河支流—Ng.Kayungo。

在出事前，蔡宣委是准备1月5日和那一流的一组同志联络。当时那组同志依靠的群众，有个当警察的弟弟得知同志活动的情况，就和他哥哥密谋陷害同志。起初当地的负责同志拒绝接见那个警察，后来由于警惕性不强，到联络时间就独自一个人拿了一把巴冷刀，叫那个伊班群众划船。当船划到大河时，那坏蛋两兄弟就把同志抓了交给敌人。敌人从坏蛋口中得知有一组同志要来联络，就派兵前往同志们约定的渡河点的山头进行埋伏。由于蔡宣委他们慢来，结果敌人扑个空。但狡猾的敌人又退回小支流河边埋伏。

1月7日，蔡宣委等人到了约定地点，发现了敌人埋伏的痕迹，可是由于轻敌，认为敌人不会那么卖力，深夜不会继续埋伏。于是决定深夜渡河，沿着路去找同志。当他们经过一间“郎高”时，发现屋里有灯并有人讲话，同志们以为是伊班群众捉鱼，就小心摸进。并摸到一半

时，他们的涉水声被敌人听到（当时月光又很亮），就遭到敌人袭击。由于地势不利，同志们没有还击就分几路散了。当时蔡宣委腿部受了伤，走不了，就隐藏在附近。

第二天清晨敌人来打扫战场，当敌人靠近欲逮捕他时，他宁死不屈以猛烈的火力向敌人扫射，当场打死打伤五个敌人（其中一个军官），最后英勇的牺牲。

(2)张荣富（周天来）队长，1969年2月5日牺牲在 Sg. Musah。

事前他们发动去搞粮的群众被捕，两三天后被放回。为了证实他是否彻底背叛和了解其他情况，同志就约其孩子来碰面。在约见的前两天，群众曾表示敌情紧，只能最后一次帮助，并强调同志不要出来和要小心。有位群众还写信给天来，叫他和卫生员最好不要出去联络。这些情况领导和同志都感到要特别警惕。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决定提前半天去等群众，并特别强调提高警惕。

当天中午约十二点半，那青年来赴约。同志们都感到他的表现有点反常，但天来还是去见他。他匆忙的把天来诱骗到平时的约定地点，结果使天来队长中敌人埋伏而牺牲。

(3)永发、李木容（学海）。1969年5月，在牛麻河 Sg. Tamang 叫群众买粮遭出卖。当他们去拿粮时，遭到埋伏在“郎高”旁边的敌人射击而牺牲。

(4)1969年8月，莫静兰（小叶）在反围剿中跟沈耀彬他们拆散后，她突围到 RH Asun 一带，却不幸遇上一个伊班坏蛋。她向他讨饭吃，坏蛋乘她不防之际，用短刀向她猛刺狠戳，直至活活被刺死为止。

(5)纪平（蔡布家）队长，1969年8月12日牺牲于乌泽河尾。

当天他们碰到一名伊班群众，从其口中了解到有两股敌兵扎在其长屋附近。见到该名群众表现得热情，又积极提供情报就轻易相信

他，还交给他一百元帮助购粮。看到夜深了，打算第二天天还没亮就走，所以在他木薯园“郎高”过夜。那坏蛋连夜去报兵，凌晨5点，正当李红煮木薯时，“郎高”就被包围遭投手榴弹。李红和阿猛同时受伤，为掩护战友，纪平队长和敌人进行七小时的战斗，后英勇牺牲。

(6)有如、必公（江先发，诗巫沙连人）。1969年9月，他们在 Song 地区 Sg. Sipan 的住营地被伊班坏蛋闯到。当时坏蛋假装很热情，并欺骗同志说外面有敌情。第二天他帮助送东西来，叫同志不好出。他离开后，当晚就带兵到山顶，当晚同志们发觉可疑迹象，但没引起注意和戒备，第二天凌晨敌人就进攻，造成有如、必公两位同志牺牲。

(7)明思（刘海金），耶谷（蔡国英）1969年10月23日，由于宿营地被伊班坏蛋发觉，在 Ulu Sg. Katibas 遭民防队攻击而牺牲。

(8)在 1969 年 11 月 Emtabai 地区，三位一组的民族宣传组，因群众的热情产生麻痹，和群众一起打猎，打到猎后同志们又帮助弄到深夜二点左右才睡。当同志睡时，坏蛋就带兵突击同志的住点，造成钱秀光、黄厚桃、刘世火和武民四位同志牺牲。

(9)活虎（江先铨）、志锋（王聪顺）。1969年12月8日晚上，为数5人的民族工作组到乌驿路 Tamin 河尾一间小店。由于当天下午他们给伊班坏蛋暗中发觉，而5个同志又都上小店，结果半夜给敌军包围而不知。经过激烈驳火，活虎和志锋在突围过程中牺牲，而另三位则遭逮捕。

(10)坚持（杨如昌）越坚。1970年同志们到 Ulu Sg. Mujok 河流的新区搞粮，在约定时间到时群众并没有来约定地点，同志们觉有异就撤回放背包的地方。可是敌人则从他们背后闯来，发现背包就进行埋伏，当同志们倒回时就因此中伏。

(11)1970年在 Emtabai，陈恒福（东风）等四个同志因群众的积

极热情便帮助他们理发，枪支、吊带没有放在身边，结果给坏蛋抢去，在无防备中三位同志遭杀害。

(12)1970年在 Emtabai 6位同志组成的民族宣传组在活动时被坏蛋跟踪，傍晚六点多同志们扎营，两位同志冲凉，三位同志（李新合、刘扬振和朱孟蜜）在准备炊事时被敌兵突击而牺牲。

(13)郑金声於 1970年1月25日牺牲在 OMT Ng. Jih。那天晚上同志正赶路（跑群众小路）过程中，听到前面有脚步声，他们便进草丛隐蔽，发觉有两个民防队员，用手电筒乱照乱喊，郑金声给照到，他们问一声“Siapa”语音刚落，可恶之徒就开枪，郑金声因而中弹，在同志还枪后，坏蛋逃之夭夭。

(14)新华队长（温锦南）於 1971年1月4日牺牲于中游的 Sg.Katibas。

有位妇女（过去相当支持革命）当民防队的儿子被我军打死，她心有不甘。当新华队长叫她买粮时，她暗中出卖。新华对她没有警惕，事先没有做好必要的安全措施，结果在接粮时新华被引到稻芭，那妇女一跑敌人就开枪。

1971年1月7日，有同志发现冲凉的地方已有人用刀砍的记号，但没有及时转移。第二天傍晚坏蛋就带 Muluan 的民防队来进攻，造成伟雄牺牲。

(15)坚韧（许保乐）、江雄（郑通方）。由于活动暴露，给伊班坏蛋出卖，1971年1月10日在 Ng. Machan 的一个宿营地被敌人进攻，同志们安全转移。当时坚韧、江雄同志在河上联络群众，他们有听到驳火声，同时看到一股敌兵从附近过河。有关同志则认为不是他们暴露，不成问题。后来他们就与这股敌人驳火，坚韧在主动打掩护中英勇牺牲。后来，江雄等同志担心营地同志的安全，於当天晚上摸回营地过程中，在近距离受到敌人扫射而献身。

(16)1972年1月7日，伟雄（黄福厅，是第二省 Sg.Lachau 横江人）和军兰牺牲于中游 Sg. Lijan 支流 Sg.Sukup。

(17)亚林、巴乐（许广金）。1972年初，他们四位同志去 Muluan 的一条支流开展工作，他们碰到群众后叫一个妇女帮忙买粮（特意试她）。当天我们就撤到河尾，后来亚林和巴乐去接粮，当那妇女来时，他们叫她把粮背过河，她不要，反而叫他们过去。由于两位同志已经埋伏一天，都没有发现什么，於是就决定过去拿。当他们过河后，埋伏在“郎高”的敌人就开枪射击。

(18)白鸽（蔡明和）副武工队长、战平（江国章）于1973年3月1日牺牲。事前，同志们活动频繁，加上缴收了一个民防队的史登枪后，去向可能暴露，他们住的是已暴露的旧点，又在执行任务时给伊班坏蛋发觉。当天同志也发现在营地对面有条路跑得很大。当时同志们决定第二天接粮时进一步了解和处理。

3月1日那天，大多数同志都出去，营地剩下白鸽和战平同志，宿营地就被民防队包围，白鸽副武工队长在不利地形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一个多小时，打死打伤五个敌人后才壮烈牺牲。

(19)1973年4月9日，一队同志在新区第四省县的一个临时营地遇到两名伊班人，将之扣留过夜。当夜时分，其中一名逃掉，由此说明是坏蛋，而同志们却到第二天才转移。在渡河时与敌船遭遇，由于缺乏经验，许多同志往水里跳，造成刘殿锐、吴春娇、刘廷源、吴培华、刘世广和张自卿六位同志的牺牲。

(20)老吴队长、李凤副队长、鲁里、斗争，由于活动一定的暴露和拔木薯的痕迹被民防队跟踪到营地对面。当晚同志们在准备拥军的文娱节目，造成声响给民防队听到。第二天凌晨，同志们没有站岗，当同志们正要吃早餐时，敌人就从背后突然袭击，造成四位同志在1973年6月20日在 Poi 河支流 Bilat 的牺牲。

(21)坚红（潘启鉴，加拿逸联合国人）于1976年11月10日牺

(21)坚红（潘启鉴，加拿逸联合国人）于1976年11月10日牺牲于乌也路22哩深入混合区。

事前半个月的搞粮，已造成一定的暴露，引来敌兵，可是他们估计与此事无关。11月9日，由于有位女同志跌伤，他们在离丹奇路(Tenggi)三哩处（跑群众路）的下午一时扎营。第二天十二点十五分左右，敌人从同志的来路摸来偷袭。当时他们没有站岗，正在看日记的坚红同志就因此牺牲，而坐在吊床上的李华健则双股中枪。

(22)学愚（余志发）和武群(Burang Ak Gambai)牺牲于1976年11月26日於OMT地区的Bunau支流—Sg. Sakrang。

当时，他们的营地被一队敌兵突袭（敌人分成三组并占有利地形），造成当时正在站岗的武群和生病的学愚牺牲。其余同志对敌人进行勇敢、镇定的射击和喊口号，使起初疯狂的敌人只剩下零星的枪声和一些喊叫声，同志们赢得了安全撤退的时间。

(23)革武（孙剑平）、东风（李道进）、思晶（吴珍香），于1977年3月1日在加拿逸河支流S.Mador牺牲。

由于一段时间的搞粮造成了一定暴露，已经引来过敌人暗兵的侦察。对此同志们没有提高到应有的警惕，事隔不久又进行大胆的搞粮活动（由于有位女同志跌伤不能转移），被伊班暗特出卖。在当天沿河（群众路）接粮回程中中敌埋伏。

(24)志武（颜弟）1973年10月30日在 S.Lijan 支流 S.Kelimit 牺牲。

同志们执行任务时碰到一对和我们关系很久的屋长夫妇，当时他们表现很害怕。同志向他们了解敌情时，他说没有，而他的妻子却说有，同志对此反常现象没有提高应有警惕，当天还在稻芭边敌人的旧营地过夜。那屋长（此人本来就是贪心的两头蛇）后来就去告密，当天傍晚6点多志武同志在冲凉时发现敌人，她立刻先发制人，打死打伤各一名民防队，由于地形不利撤退到半山而英勇牺牲。





民族工作回憶



我的民族工作经历

曾忠口述
凯锋整理

砂拉越解放同盟很早就重视开展民族工作，早在 1959 年之前，盟中央就成立一个以郭伟忠为首的民族工作小组，负责领导与推动砂拉越各省份的民族工作。虽然 1957 年底，洪楚廷由第一省派来第三省（指拉让江区域，当时还未划分第三、第六和第七省）负责领导第三省的工作，但这里的民族工作前期还是由中央直接领导，最初是由张本仁直接领导的。

1959 年中，我是其中一个由第一省派来第三省，先到诗巫，我到甘榜南甲（Kp. Nankap）找洪楚廷联络。他安排我到民那丹新港门联络黄祥忠（黄当该地小学校长），由他协助配合，开展新港门和马罗后山一带民族工作。跟我一起前来的两个组员是海口区三密的张伍以及他的爱人蔡秀芳。

盟中央虽然有强调搞民族工作的重要性，但本身也没有实践经验，因而对我们也没有给予具体的指示，只吩咐要多了解情况，跟伊班群众搞好关系，作一些宣传教育工作待机而动。来到新港门不久，在一位熟悉伊班长屋的当地华族带领下，伍就与我三人有意识地去马罗后山一带拜访伊班群众。在附近周围一带，每也有去走走、看看。我们感到要在长屋住，并开展民族工作会有不少困难。於是，我们跟祥忠商量后，决定在新港门租一块地，在那里种胡椒。我们工作重点还是搞这一带的华族群众工作，工作也有一些成效，后来也有一部分青年和中年积极分子转入地下或参军去。

半年后，我回第一省联络，张本仁找我了解情况。

老实说，当时能实际，较有力的领导我们的还是邱亚陶，在第一省时，我跟陈玉球同组本来就是他领导。当时负责泗里街、民那丹、达（SG. DAP）和如楼等一带的民族工作。他也有来过我们在新港门

的住点。张本仁是鞭长莫及的，1960年后因涉嫌宗派主义活动，他的工作改由赖锦玉所取代。

我们在新港门想搞民族工作的搞不成，反而遭到坏蛋伊班的注意及破坏。我们在胡椒园旁边的小茅舍却被坏蛋烧毁，幸亏大家当时都不在茅舍内。

在新港门活动约 10 个月后，我接受组织上分配的新任务，而离开此地，奔赴新的岗位。

1960 年中，组织上派我上拉让江河尾，了解不拉加（Belaga）的政治、经济、民族与地理等方面情况。

在未前往之前，洪楚廷指派我先去找许保祥，因为他的父亲是加帛做生意，熟悉上面的各方面情况，也可以安排船只方便我上不拉加。

我乘了一艘货船抵达不拉加，找上一个厦门商人，说是他孩子的朋友，是上来游玩的。他欣然地给我住宿和吃的，我一呆就是 10 多天，他分文不收。在这里，我结识了个别跑船的人，了解了民族等一些情况。

回到诗巫后，我去找洪楚廷，他叫我回第一省找张本仁，研究一下如何开展上游的民族工作。

根据自己的活动感受和实地调查，我以为可以通过做生意和跑船形式来搞民族工作。

之后，我跟随邱亚陶来到泗里街河尾阿松（RH. Assun）长屋，跟古晋来的陈春林、陈建明以及本地民族干部龚贤能和刘友光结合在一起一小段时间。刘友光他们通过开店做点小生意，跟伊班人来往，以便团结教育他们。

后来，我跟陈春林他们转到靠近第二省 SG Krian 的

Tubujan 一带。我们住的“郎高”很靠近长屋，上午割胶，下午和晚上有时上长屋，有时去打猎，有时跟长屋的人到其他长屋走走、看看。我们没有在政治上进行宣传，一时还不会暴露我们的身份。

约半年后，我又转到不拉加上一带活动。

1961年，洪楚廷买了一架30马力的挂尾车给我们和蔡三扬俩上加帛。到了加帛买一艘船，装上挂尾车，跟一位跑船的群众一起上不拉加。这个群众载有30个左右的印尼加央人。他们是在各市镇工作的，现集合在一起回去的。回印尼的路线有三条：可从SG Baleh河尾回；可从SG Gaat河尾翻过马罗河河尾；也可从巴贡河尾回。这次他们是选择最后一条路线回。我们借此机会跟随他们，了解水路，了解地理地形及了解民族等情况。

从加帛上不拉加一般要行驶7天，有时根据水位的高低而决定了时间的长短。上巴拉固(Pelagus Rapids)急水湍难，岸边行走一小时的路程，在水里遇到浅滩，人要下水，甚至有的货物要搬下，大家合力把船推上，这样四上四下，才能渡过这一地段。在这急水险滩里行驶，如果不是水路熟悉，随时有可能撞上淹没在水里的岩石，导致船沉，人被急流冲走，溺毙在水里或头撞上岩石人亡。

我们的一艘挂尾车义务帮那个跑船群众载一部分加央人。从不拉加上到巴贡河尾的Long Bulan也要行驶2天。中途，也要下船几次，方才能顺利通过。

巴贡以上主要是加央人，肯雅人和柏南人聚居的地方，居民纯朴，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过着与世无争的清贫逍遥生活。宣教士有时也会乘小型飞机Long Jawi进行宗教活动，但一时还影响不大。

后来，我们在不拉加下一点的巫力(Merit)一带住将近2个月，为了解决生活基本开销，我们得割一些树胶。在这里，我们主要依靠一位娶伊班妇女的客家人，帮忙我们所需要的帮助。

去诗巫联络后，我跟蔡三扬又到 Sg. Baleh 的 S. Kian 住二、三个月，并在那里割胶。

过后，我们又转上 Sg. Gaat 河口上第三座的长屋，这座有几十户人家，一点基础都没有。我们从长屋划小舟约一小时的地方下，上午割胶其余的时间到处去走走。在树枳 (Enkabang) 成熟季节，屋长分配一条河的树枳给我们去捡，我们共捡了 10 多担，一担可卖 30 多元，可跟伊班人分半。

郑勇生来时，我就归他负责，他买一架 25 马力的挂尾车给我，要我行驶加帛一不拉加之间，偶尔也上 Baleh 河尾。加帛的总承包商负责载兵载电油时，我从他那里接来一部分的生意，有时载古加兵和英军。据组织上指示，我们前往印尼参军的同志会打回来，我们国内同志要积极给予配合，首先我们本身要熟悉水路，能掌握兵点，和了解拉让江上游的民族等情况。

我频繁的在上游上上下下，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加帛政治部有传出风声要抓我。於是我就撒下加拿逸比带坡 (Pedai) 找王连贵。经过研究，组织上决定把我调去乌也路和诗巫郊区一带做洪楚廷的警卫工作，从而结束了我那在民族区颠簸不定的生活。

在民族区活动几年，看到土著民族生活普遍贫困，许多疾病缠身，有病没法医，未老先衰，死亡率趋向年青化。对他们的困难处境与不幸遭遇，我只能深表同情，不能给予有效帮忙感到悲哀与无奈。

我以为，当年土著民族认识很低，觉悟很差，即使我们跟他们感情很好，关系融洽，他们还会被居心叵测者的诱惑欺骗。我们通过少数人秘密的形式搞民族工作，成效不大。若我们能通过大队的武装流动宣传跟有基础与重点建设的地区用小组深根细作的形式相结合搞，成效会较大。

参与第二省与中游民族工作回忆

—老温

盟组织重视民族工作，1957年开始调些身体好，思想品质好，尤其是有技术与民族语言能力的同志，到民族区去开展工作。组织上也成立了专门负责民族工作的小组，出版关于民族工作的刊物。



1958年开始，我也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积极准备去开展民族工作。我学习组织有关民族政策，学习外国开展民族工作（如中国开展藏族工作）的经验，也学习生活技能（如向黄兴汉学修手表、修收音机）理发、民族语言等等。

当时我们秘密地开展民族工作，必须遵循 16 个字诀：“避开敌人，深入群众，积蓄力量，待机而动”。我们这些外来的革命青年，就是所谓“白皮红心”，以公开职业与公开政党为掩护，跟土著群众在一起，进行长期耐心的宣传教育。

1961年，我响应组织的号召，向第二省的民族区进军。我没有向朋友及家人告别，深夜我从吉晋码头下船，经过一天一夜，抵达成邦江和在那里等候的郑春喜会合，然后再步行一天上到丰洛一带的 Batu Lintang。郑春喜与我负责丰洛一带的民族工作。[注：S. Undop（丰洛河）是鲁巴河在成邦江以上右支流，丰洛是一区总称，包括 Batu Lintang，巴姑（Baku），三麦（Sumark），总共几十座长屋和三十多户华族]当时其他地区的工作分配：英吉利里对面是海洋（郑万灵）同志负责；鲁勃安都是郑小风同志负责；马鹿是鲁洪（刘德庆）同志负责；马纳是刘队长（李日晴）负责，龙芽是郭楚然负责。

从学校到农村，从舒适的环境到艰苦复杂的环境，要深入到偏远落后的土著群众中去，组织上几个月才有一次的联系，组织上出版的刊物许久才能收到，自个面对的一切和遇到的问题，全靠自己来解决。特别是从一开始，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从生活、工作到安全等

方面，都得自己去摸索、学习和动脑筋、想办法解决。在生活上组织没给经济，而我们又不能暴露，根本无法从家人和外界取得支援，一段时间的生活全由春喜家人承担。新的工作岗位，的确是个不小的考验与锻炼。

丰洛的华族群众大部分都和伊班族在婚姻上或经济上有密切的关系。为了方便工作，我们也积极去联系华族群众，特别是年青群众。向他们宣传世界各地的反帝反殖；反对殖民主义教育制度；鼓励他们积极参加人联党的活动等等。李日晴、郑春权、徐锦木与李汉文等都是我们经常联系的积极分子。

这里的华族群众与印尼边界的伊班群众也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几乎都把农产品（如胡椒、树胶、米、生猪）卖到这里换回日常用品，每逢节日有斗鸡时，这里的群众都去印尼边界参与。为了更深入开展工作的需要，我随斗鸡队伍越过边界到印尼长屋，争取熟悉地理和那儿群众。这方面的努力更在 1962 年汶莱起义后为第二省同志越界参军起了积极作用。

在 Batu Lintang 活动一段时间后，政府对我们加紧注意。我决定把春喜留在 Batu Lintang，而我转入更深入丰洛河尾 Baku 一带。这里距离英吉利里较近，并和马鹿的范子香保持联络。当时我住在一个有华伊血统的群众家，距长屋不到一百米远。这家的妇女是达雅人，丈夫是华人，在这里做点小生意。一次，她丈夫在背东西回的途中，遭到不好的达雅人谋财害命。他们有几个小孩子，那时最大的才 12 岁，最小的才两岁左右。由于失去了家庭支柱，全靠 12 岁的大儿子傅金贵（部队名明光），挑起了家庭重担，砍芭种稻，造小农舍（郎高）有时还去附近长屋做小生意。他们生活很贫苦，弟妹们无法上学，平时以木薯和竹笋为主粮，小妹有时到河里捉小螃蟹，采野菇当菜。而我因处深入地区又不敢暴露，修理钟表及收音机的零件无法取到，没有经济来源，也无法资助他们，和他们一样过着一段难于忘怀的生活。

这里有三座长屋，居民贫困，文化水平极低，又少和外界接触，不懂得清洁卫生，由于缺碘，好多都患大颈泡。为了能跟群众打成一片，取得他们的信任，就要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尊重他们的风俗习

惯，就要入乡随俗。我要求自己，他们做什么，我就跟他们做什么，捉水鸡、捉鱼、打猎跟着他们去。他们把小蝙蝠打了，没拔毛破肚，就烧得焦黑的，看起来会呕心反胃，但为了使他们看到我不嫌弃，没有跟他们保持距离，我还得硬着头皮半吃半吞下去。再说，达雅人捕捉小动物的陷阱，按风俗他们第一天是不去检查的。等两天过后去收时，有的动物已腐烂了，他们并没有丢掉，放些盐做成肉酱类，伊班称之为“Jukut”，过后取出来放进竹筒烧，又苦又涩又臭，看了令人皱眉头，但还得跟他们一起吃。看到我吃，他们就高兴。只有尊重他们，才能被他们所接受。

白天我到他们稻田和胡椒园，帮助他们劳动，晚上到长屋宣传。然而少女们以为是去 Ngangyap（谈情说爱的意思），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在后屋或蚊帐里等。有时，在河里冲凉，一大群情窦初开的少女光着身子围过来，向我泼水调情。对年轻的小伙子来讲，这确实是个考验。那时组织上也不会去检查我这事，我要怎么做都可以。然而我头脑清醒，有道德观念，有革命纪律约束，没有陷入儿女私情的漩涡中去。

“12.8”事件后，革命形势起了新的变化，政府有关方面更加紧注意我们，民族工作呈现更多的困难。在新的形势下，革命组织提出积极准备武装斗争，当时由范子香召集在第二省活动的主要干部，都集中到英吉利里的马鹿开了一个会议，与会人数十几人，由当地积极分子范国强（部队名吴铁）负责站岗。会议进行不久，政治部主任王文发带领一队人员来围捕，国强敲响鞭炮作暗号而被捉去。我们的会议便结束，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地方。

回来后情况更加紧张，雇佣军（古加兵）经常巡逻和包围长屋。为了保存自己，我不能再住金贵的家，除了一把手电外，什么东西都没带就躲到与英吉利里交界海拔 3000 尺高的一个群众“兰高”（小茅屋）。在“兰高”除了有一点盐外，其他都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每天得去采奶汁果树的叶和竹笋，塞进竹筒烧了吃。晚上睡的“枕头”黑得发亮，睡觉用的被是“加隆”（Tekalong）树皮去掉粗皮后，再捶打制成的。有一个晚上刮大风、下大雨，又把盖屋顶的树叶刮走，本已寒冷的夜晚，再淋得全身湿透，实在冷得全身直打哆嗦。第二天再一片片把

树叶盖回。整星期的时间内，就这样吃一点野菜，每个时刻都在忍饥挨饿中渡过，我饿得酸软无力，眼睛变黄，张眼都吃力。

1963年初，我已很难继续在这里躲，决定先转过印尼边界。由于许多地段经常有兵，所以由我工作地区的一个群众带路。由于长时间跟他相处，通过不断的宣传教育，我赢得了他的信任，他把我当做他自己人一样。当遇上敌人包围追捕时，他同情我、帮助我。他主动地跟我讲：“Tukan（对我的称号），我走在前面，你跟在后面。若遇上人，我会大声讲话，你就躲闪一边。”就这样沿着边界的大森林开路去印尼。到了印尼那一边长屋，他就跟印尼那边群众讲：“我把这个人交给你，你要好好照顾他噢！”正因为有这些群众的帮助，所以几次都成功避过敌人的追捕。

还须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第二支队成立后在这里活动，有一次明光与蒂玛同志在那一带群众的稻芭跟敌兵驳火，蒂玛同志受伤，躲进“如基”（有一种又硬又易脆裂的长茎蕨）丛里。马来西亚兵还驻在长屋，屋长获悉她受了伤，却大胆地向印尼兵要消毒药水和纱布，说他自己儿子的手割伤了要用。这位可敬的屋长，约有50多岁，有一对长长的耳朵，上身赤裸，下体用Sirat（缠腰布）围着。他拿着煮好的饭和药给蒂玛，最后还把她背到同志们地方去。

在印尼长屋住不久，从英吉利里转来范国强和叶贤钦（鲁恩），紧接着范子香、丘振芳（赖福）、蔡义清、志伟（成邦江来）、春华、郑春喜以及我们在丰洛联系的李汉文、李佑晴（部队名刘亚胜）、徐锦木、Dalu（伊班族）等也相继到达。到此在丰洛开展两年多的民族工作就告一段落，我们以更激荡的心情踏上武装斗争的征途。

两年多的民族工作并不算长，然而给我许多感触。我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思想中存在着许多幻想、幼稚、软弱与温情，经过实践使我变得较务实与坚强，独立与粗俗；在比较艰难困苦与组织不能及时监督和引导的偏僻落后地区生活，是检验一个革命者的忠诚可靠的最好地方。在现实中考验下，大部分同志失败了。面对困难，我曾出现过许多思想斗争，想家、想往日在校的同学、想过去较安逸的物质

生活和安全方面的斗争，等等。可是那时我想要更多的是我来的目的，组织的教导与革命组织的纪律，不时勉励自己前进。在短暂初期的民族工作过程中，我没有作出多大的成绩，却给我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从中我学到伊班语言，了解他们的生活和风俗；也学到生存和生活本领...这些在往后的军事活动，特别是六年后（1968年），再以武工队的形式开展拉让江中游武工队工作（主要还是民族工作）是很有帮助的。

根据1962年“12.8”汶莱武装起义前的两年和1968年后，在拉让江中游武工队前后10多年搞民族工作的亲身体验，我有以下的点滴体会：

一、革命斗争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只有他们自己起来了，坚决为争取与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团结斗争，才能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在北加，特别要广泛动员与依靠占人口最多的、占据战略要地的达雅族，离开了他们的广泛参与坚决斗争，要坚持长期的斗争是不可能，也不可能能有最后的胜利。

二、要想得到土著群众的尊重与信任，首先就要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要以我们的诚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来赢得他们的尊重与信任。我们要入乡随俗，深入到他们中间，才能跟他们打成一片，这样我们讲话，他们才愿意听，也才能听得进，需要他们动时，才能动起来。

三、以少数人秘密的形式搞民族工作难度很大，也更容易损失。要把秘密与公开以及武装形式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特别是武装的形式，更具有威力与号召力，敌对者也较难对付我们。通过广泛的武装突击宣传后，从中找出典型，然后进行长期耐心的深耕细作。

四、当年搞民族工作还比较简单与急躁。试想，把一个青年人一下子放进偏僻落后的土著区，两手空空，没有任何帮助，全靠自立、自理。如果没有一定的思想素质与工作能力，很快被淘汰掉是不奇怪的。当时，我是凭着一股热情、怀着理想、和对组织的信任，并对为之

奋斗事业的忠诚，我才坚持下来的。

如果是以华区为基地，利用和依靠先进的华族，利用华族与土著的良好关系，逐步开展混合区民族工作，进而再逐步深入民族区。总之，如能循序渐进，按部就班，要进可进，要退可退，会更有回旋的余地，更为妥当。

五、预防，避免和处理好群众被镇压、收买，也是一个要解决的大课题。当年在马罗河搞民族工作，老吴、小燕、安西、李山等同志搞的长屋群众都不错，但随着敌我斗争日益尖锐，群众被镇压、被收买，群众的革命态度就会起变化。特别是有些地区的革命内部出现叛徒，出卖群众，致使群众被捕，有些还被吊着拷打，以致在威迫利诱的情况下密报我军活动，陷害我同志。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当群众被迫害时，有些地方的整座长屋群众避到山里，要求跟着我们一起，但由于我们主观能力有限，容纳不了他们，不能有效地保护他们，结果让他们返家。他们在家里经受不了敌人的压力，结果被迫和敌兵一起对付我们。

我们的主要群众工作，说到底就是民族工作。我感觉到民族工作开展起来不很难，但要巩固好就难了。在拉让江中游时，敏战、丹莉、南章、亚福、亚厚，后来珍娜、德兴等与我一起开辟牛麻（S. Ngumah）的支流加牙河（S. Kajah）约整十座的长屋。初时，群众感到害怕，但我们以实际行动与表现，通过突破个别“兰高”带动长屋，群众很快就消除了恐惧，向我们靠拢，被我们动员起来。我们更进一步，通过搞福利、医药服务、文娱演出和不断宣传教育，公开的把整座长屋群众集中起来开会，群众就被鼓动起来了。拉让江中游的卡地巴斯河、Poi 河、牛麻河和加拿逸河等几条大河的绝大多数群众都搞起来。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例如 Impah 和 Sinal（富春太太），Arok（Dap 长屋）还投入我们部队的行列。但当敌人的镇压超过他们的觉悟水平和所能接受的程度，我们又不能争取与捍卫他们的利益时，加上当时的阶级矛盾不够激烈和政府的改良主义政策的欺骗性，群众就会被分化淘汰，有的甚至反而站到敌人阵营方面反对我们。

向巴厘河流域进军

—回忆民族工作片段

刘义忠口述
凯锋采访、整理



在汶莱“12.8”事件之前，我是在孙xx的领导下在诗巫职工会与人联党中进行工作。汶莱人民揭竿而起之后，英殖民者就乘机到处进行大逮捕、大扫荡。为了避敌锋芒，更好地保存革命力量，我就从市区退到市郊的木杰阿十。

开展诗巫县的混合区民族工作

一小段时间后，革命组织提出大力开展民族工作。我接受了一项革命任务，即调查拉让江左岸从沙连（Sg Salim）到集（Sg. Jih）、右岸则从阿山河（Sg Assan）到鲁国坡（Lukok）的混合区伊班人的政治、经济、人口等方面情况。在各个坡的同志配合下，我深入到各长屋去走一走、看一看，以便进一步摸清情况，对这一带混合区伊班社会有个初步的了解。

经过一个多月实地调查之后，组织上决定派一批同志深入到诗巫县范围的混合区开展民族工作。拉让江左右两岸的几条大河基本上都有派人去开展伊班工作，其中左岸的沙连河有周民权等负责，美烟河由黄明生等负责，集河则由我、徐忠良和李明坤负责。

集河有两座长屋，河尾一座离江边约走路1小时多，有13户住家，好多伊班人有参加左派的人联党活动。我们在有一位娶伊班妇女、住在长屋的华人介绍下，来到长屋的附近，建一间约三人住的小“朗高”（茅舍），就开始割起树胶来。

除了下雨天，每天清早我们都下芭割树胶，迟要到中午过后才会绞好胶片。下午有时休息，有时也有去长屋（大多数长屋人外出）和稻芭“郎高”走走。晚上我们就上长屋跟伊班群众聊天拉家常。我们很

快就跟长屋居民进行政治上宣传，我们跟他们说，我国是个美丽、可爱、富饶的国家，但却遭到英殖民当局的残酷剥削与蛮横的压迫，我们各族人民要团结起来，为争取自身自治独立而斗争，建立一个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新社会。这些伊班群众对政治感到兴趣，也会同意并接受我们的政治观点。

在这里才工作约 2 个月，组织上又决定把我们调到更远的深入民族区去。

向巴厘河流域进军

1963 年 3 月某日，我们分两批搭摩多船上到加帛市镇。王连贵、许保祥和朱 xx 接待了我们，我们在 xx 学校后面的联络站过了一夜。翌日，我们就乘 15 马力的挂尾车上，准备上到拉让江的河尾—Batang Baleh。

保祥驾着船跟连贵护送我们上。船大人多马力小，又是逆流而上，船行驶得很慢。行驶了约一小时，上游的洪流滚滚而下，船只不能上。我们只好靠岸，找那里的伊班人。我们跟他们讲，我们是来旅游观光的，我们要向他们租船。这样改由一位有经验的伊班人驶一艘 25 马力的挂尾车，9 点左右载我们继续上。王、许俩则倒回加帛。

清澈的河水变成浑浊的黄河水，我们迎着涌流而下的水缓缓前进。眺望两岸，除了砍过种稻的 Tamuda（仔青芭）之外，全是郁郁葱葱、参天古树，各种虫声鸟鸣不绝于耳，偶而也传来少有听到的猴子欢乐的叫声。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抱着把青春献给祖国豪情壮志，眼前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可爱，仿佛都在高兴地迎接着我们这批热血青年的到来。

下午 4 点左右我们到达巴厘河的第一站，这是 Mujong 河口对面上一些的 S. Kamari 上一些。这是郑勇生的点，蔡三扬与黄志平事先半年已到那里工作了。

我们从河边的长屋向后芭走了一小时多，在树胶芭一间伊班人“郎高”停下，这是勇生等住的点。在这里，我们 12 人开了一次几天的会议，主题是讨论如何开展工作，为今后所进行的武装斗争铺平道路。

会后决定分为四组开展这 Batang Baleh 一带的工作：第一站 Kamari 河就由勇生带领黄祥云（还有一位未到）开展这一站周围长屋的工作；第二站由黄志平带林玉江和江志航展开 Sg. Merirai 河口上一些对面的一条河一带的民族工作；第三站的组长是蔡三扬，成员是杨成栋和黄明生负责 Sg. Merirai 一带民族工作；第四站是由叶宗洪、江莲辉（女，Sg. Pak 人）和我三个组成，由我当组长。

开展 Gaat 河的民族工作

Gaat 河是巴厘河一条支流，这条河有 6 座长屋。河口右边有一幢华丽的别墅，是敦蒙公朱加（Temenggong Jugah）住的，还养有牛只。Gaat 河的下游三座较复杂，也是朱加的势力，我们暂时不去动他们。我们的落脚站选在第四座，着重搞上游 3 座长屋的民族工作。第四座有 17 户人家，第五座有 13 户人家，最河尾一间有 30 多户人家。

有幸获得下一条河的一个屋长介绍说第四座屋长的树胶要租给别人割，这样我们就顺利地住进了离长屋划小舟约半小时的小“郎高”，在新的环境里我开始了新生活。

每天清晨约 7 点朦朦亮（深山里面感觉天慢亮），我们就背上小胶篓，带着胶刀，上芭割胶。收好胶汁也要到 10 点多，要到 1 点多才能绞胶片。3 个人一天可割 11—12 片，跟胶主可以分半。

这里深入民族区的群众生活比混合区的群众生活好。他们传统上是采用迁移耕种法，由于人口稀少，有广大的原始森林，砍下大树，烧成厚厚的一层火灰，这是很好的肥料，稻谷长得好，一英亩可割 10 多包的谷，每年的收成都吃不完。虽然果子不多，但猎多鱼儿多，经济

生活不算难过。

这里伊班人还是沿袭古老的风俗传统，譬如上午听到某种鸟叫就不去做工了。虽然有印度籍牧师流动来布道，对深根蒂固的土著传统影响，一时还不能有效触及。在我们重点搞的这一座长屋还可以看到当年砍的人头骨，挂在篮子里，但已没有猎人头的风俗了。

这里的居民有 90%多是文盲，只有朱加家族的人才有机会去读书。听说，Baleh 这么大的地方只有 Behau 这一带有一间小学，受教育的也没有多少个学童。

我们白天割胶，晚上上长屋跟他们聊天，谈农民的生活如此种种，借此启发引导他们在政治觉悟的提高。白天下雨不能割胶，我们就参与他们进行义务劳动，帮他们拔草、割稻、背谷，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有疾病，也尽可能为他们针灸、按摩，给药他们。他们很少服药，药物对他们是很见效的。另河尾两座的长屋，每逢佳节喜日我们也跟本长屋的人一起去，首先去了解熟悉他们。

我们同志生活也不错，我们割的生胶，一担可卖 60 元。米可向长屋的人买，伊班人也会送些猎物（长屋的人打到猎，每户都会分到一些，我们也分到一份）、菜类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去稻芭采些“恩沙比”、南瓜叶等之类做菜。相隔不久都会有做生意的华人驶船上来收土产，我们也会向他们买些食物、日用品之类。同时，我们有买鱼网线，算工钱叫伊班人去编织成鱼网，只要晚上把鱼网拦截在河里，清晨收网时总可到捉到 3—4 只每只约半公斤的 Semah（白令）鱼。若人跳进河里追赶，吓得鱼儿乱游乱闯，还可以使网卡住更多的鱼儿。

在融入伊班社会，以期跟群众打成一片的同时，我们也获得不少生活的情趣。

有一次，河尾 3 座长屋的人联合起来去到最河尾一座长屋上一点用几担的鱼藤来毒鱼。每个人带一把鱼藤到目的地用木棍或石头来敲

烂之，然后放进河水里搓洗。藤汁跟随河水由上而下，所到之处，大大小小的鱼群浮出水面翻滚挣扎，一艘艘舢板上的人们也紧张地用梭镖与鱼叉刺顺流而下的鱼群。我们三个也幸运地刺到一只约 40kg 的“恩伯捞”鱼，捉到最多的是吃屎鱼，每只约半公斤。我们捉的鱼约占舢板的一半载量，我们把大部分的鱼都送给伊班群众。那只“恩伯捞”切了炸了足以装满两大长珍，够我们吃几个星期。

有一次，为了迎接 Gawai（达雅节）的即将到来，我跟三位伊班人一起去狩猎。傍晚时分到了稻芭边，爬上高处，准备狩来吃稻米的猪群。果不虛此之行，一批山猪群送上门来了，三把手电筒同时照出，三把猎枪也几乎同时开火，三只山猪应声倒地。我们转移到另外一处狩，没等多久，两只鹿出现，被我们手电筒一照还地好奇地站着对手电筒看，一下子被我们全打倒。五只猎物就地杀子烧烤，就够我们疲惫。烧烤的肉平均分成四份，我的份让给他们，只拿他们不要的内脏。背回去煮咖喱，吃得大家大快朵颐。

伊班人民另一种狩猎法，就是白天带犬带梭镖去围追山猪，可以不用猎枪。嗅觉灵敏的猎犬找到山猪，就穷追不舍，几只狗围着它又吠又咬，搞得山猪团团转，进不得退不了，精疲力竭地半蹲半站地。这时猎人就可以及时赶到，轻而易举地用梭镖刺死它。有一次，我也寻到一个大好机会，由于没有经验又不熟练，投掷不中，反而受激怒的山猪攻击，还好我脚快手快抓住树枝避过这一反攻。

没有出去找群众之时，我们在“郎高”里多半是看书，学《群众报》和《农民报》等，我们也学伊班语言。江莲辉的父亲在广东芭做小生意，跟伊班人接触多，伊语较会，她就成为我们两个学伊语的老师。我们的负责人勇生 2—3 个月也来找我们一次，跟我们一起学习、讨论问题。有时是我下到勇生的住点作汇报和研究些问题。

新的环境的确是个考验，它要求不仅要使自己思想适应新环境，也要使自己体质适应之。由于水土不服，我们三个都先后病倒了。我病得最重，还得要勇生带下去进了加帛医院。在朱同志的安排下，经

生活不算难过。

这里伊班人还是沿袭古老的风俗传统，譬如上午听到某种鸟叫就不去做工了。虽然有印度籍牧师流动来布道，对深根蒂固的土著传统影响，一时还不能有效触及。在我们重点搞的这一座长屋还可以看到当年砍的人头骨，挂在篮子里，但已没有猎人头的风俗了。

这里的居民有 90% 多是文盲，只有朱加家族的人才有机会去读书。听说，Baleh 这么大的地方只有 Behau 这一带有一间小学，受教育的也没有多少个学童。

我们白天割胶，晚上上长屋跟他们聊天，谈农民的生活如此种种，借此启发引导他们在政治觉悟的提高。白天下雨不能割胶，我们就参与他们进行义务劳动，帮他们拔草、割稻、背谷，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有疾病，也尽可能为他们针灸、按摩，给药他们。他们很少服药，药物对他们是很见效的。另河尾两座的长屋，每逢佳节喜日我们也跟本长屋的人一起去，首先去了解熟悉他们。

我们同志生活也不错，我们割的生胶，一担可卖 60 元。米可向长屋的人买，伊班人也会送些猎肉（长屋的人打到猎，每户都会分到一些，我们也分到一份）、菜类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去稻芭采些“恩沙比”、南瓜叶等之类做菜。相隔不久都会有做生意的华人驶船上来收土产，我们也会向他们买些食物、日用品之类。同时，我们有买鱼网线，算工钱叫伊班人去编织成鱼网，只要晚上把鱼网拦截在河里，清晨收网时总可到捉到 3—4 只每只约半公斤的 Semah（白令）鱼。若人跳进河里追赶，吓得鱼儿乱游乱闯，还可以使网卡住更多的鱼儿。

在融入伊班社会，以期跟群众打成一片的同时，我们也获得不少生活的情趣。

有一次，河尾 3 座长屋的人联合起来去到最河尾一座长屋上一点用几担的鱼藤来毒鱼。每个人带一把鱼藤到目的地用木棍或石头来敲

烂之，然后放进河水里搓洗。藤汁跟随河水由上而下，所到之处，大大小小的鱼群浮出水面翻滚挣扎，一艘艘舢板上的人们也紧张地用梭镖与鱼叉刺顺流而下的鱼群。我们三个也幸运地刺到一只约 40kg 的“恩伯捞”鱼，捉到最多的是吃屎鱼，每只约半公斤。我们捉的鱼约占舢板的一半载量，我们把大部分的鱼都送给伊班群众。那只“恩伯捞”切了炸了足以装满两大长珍，够我们吃几个星期。

有一次，为了迎接 Gawai（达雅节）的即将到来，我跟三位伊班人一起去狩猎。傍晚时分到了稻芭边，爬上高处，准备狩来吃稻米的猪群。果不虛此之行，一批山猪群送上门来了，三把手电筒同时照出，三把猎枪也几乎同时开火，三只山猪应声倒地。我们转移到另外一处狩，没等多久，两只鹿出现，被我们手电筒一照还地好奇地站着对手电筒看，一下子被我们全打倒。五只猎物就地杀子烧烤，就够我们疲惫。烧烤的肉平均分成四份，我的份让给他们，只拿他们不要的内脏。背回去煮咖喱，吃得大家大快朵颐。

伊班人民另一种狩猎法，就是白天带犬带梭镖去围追山猪，可以不用猎枪。嗅觉灵敏的猎犬找到山猪，就穷追不舍，几只狗围着它又吠又咬，搞得山猪团团转，进不得退不了，精疲力竭地半蹲半站地。这时猎人就可以及时赶到，轻而易举地用梭镖刺死它。有一次，我也寻到一个大好机会，由于没有经验又不熟练，投掷不中，反而受激怒的山猪攻击，还好我脚快手快抓住树枝避过这一反攻。

没有出去找群众之时，我们在“郎高”里多半是看书，学《群众报》和《农民报》等，我们也学伊班语言。江莲辉的父亲在广东芭做小生意，跟伊班人接触多，伊语较会，她就成为我们两个学伊语的老师。我们的负责人勇生 2—3 个月也来找我们一次，跟我们一起学习、讨论问题。有时是我下到勇生的住点作汇报和研究些问题。

新的环境的确是个考验，它要求不仅要使自己思想适应新环境，也要使自己体质适应之。由于水土不服，我们三个都先后病倒了。我病得最重，还得要勇生带下去进了加帛医院。在朱同志的安排下，经

过7天的治疗，大病渐渐痊愈，才出了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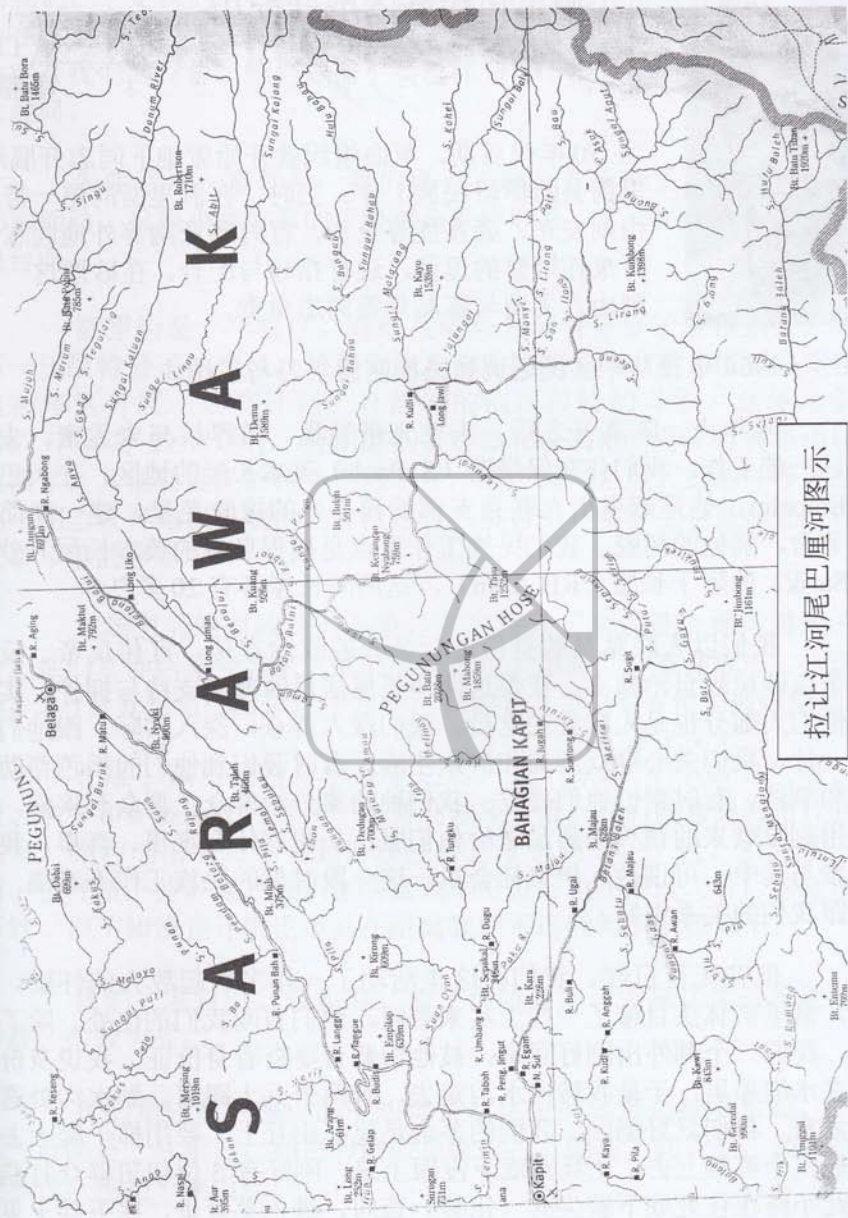
出院后，三扬、志平、勇生、我及某位同志在林x仕家后山住了一个月，勇生带领我们进行思想整顿。

巴厘河民族工作遭到破坏

这是“马来西亚”成立的前夕，局势比较紧张，特别是印尼想通过军事进攻，以制造声势，引起国内外人们的注视。据悉，不久前印尼志愿军和北加国民军在加拿逸以上的卡地巴斯(Katibas)一带打了战，局势更加紧张。我们主观估计马来西亚才成立一个月不可能就大捉人，9月14日我们5个同志全部回到巴厘河工作地区。

9月17日，我回到Sg Gaat的住点，两个晚上我们讨论研究问题没有出来，不知外边情况的变化。原来政府当局有派人来调查，并欺骗群众假造借口说什么外边局势很乱，若有外地华人在此，要劝他们回去……。就这样，我们的情况被馅露漏风了，我们还蒙在鼓里。第二天凌晨4点，我们被“郎高”外喊声惊醒，起身一看才知被荷枪实弹的约8个兵包围—我们被捕了。同一天，黄志平一组、成栋与明生也被捕，三扬由于去勇生点才成了漏网之鱼。由于兵船经过第一站，大水泛滥不能进后芭，伊班群众事先通风报讯，勇生那里8位同志及时做了转移，使第二天进兵抓不到人。

我们被关押到加帛2天，羈押在诗巫一星期，后关进古晋6哩拘留营。我坚持狱中斗争，直到1977年12月才结束那14年多的铁窗生活。



拉让江尾巴厘河图示

泗里街民族区战斗经历

斌 口述
锋 整理



在50年代后期，革命组织就开始派地下同志开展泗里街县的伊班民族工作。当时，在泗里街河尾一带是由刘友光、龚友能等负责，有时邱亚陶等外地同志也有来作短暂的逗留，进行指导与配合。在砂厘这一向则由卢文明与陈品华等同志负责。

1964年我从华区民运调到民族区组学习与工作。

同年卢、陈离开之后，朱兰光带领我、黄厚桃与朱孟蜜，去开展这一带工作。我们住在保皇港（S. Paoh）英本长屋的地区，在英巴林（Empalin，他是泗里街人联党支部的秘书）的橡胶芭里，建一间简单的茅舍，割他的树胶。我们民族工作重点是搞保皇港的英本长屋和砂厘（Sarik）的阿丁长屋（RH Adin），这两间长屋各有20多户。

我们以人联党员的身份进行公开的政治宣传，宣传反帝、反殖和争取砂拉越自治独立，获得这两座长屋居民的普遍支持与拥护，实际上他们大部分也是人联党的党员。我们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跟他们打成一片。我们关心群众利益和群众生活。有时我们到他们的稻芭帮助拔草和割稻；有时帮忙他们理发；我们种的菜分给群众；群众有疾病，我们用割胶赚来的钱买些药品送给他们服；长屋有什么丧事、喜事，我们都参与其中，可谓融入伊班社会里。这一段时期的民族工作不难搞，群众跟我们的关系很好。

但花无百日红。我们在这里活动了一年多引起敌人的怀疑。某日，泗里街林头目带了一些士兵来查问，他们直闯我们的住处。除了孟蜜，我们三个都外出刚好回来，被他们截查要查看身份证。我说身份证放在水沟那里，于是我转向水沟走去，有两个兵士跟着。到水沟处遇上了孟蜜，我们只好倒回，我们的茅舍是建在山丘上，要用梯子爬上去。我们四个都爬上去，士兵在底下没跟上来，刚好有5位伊班群众打猎经过此小路在住处底下被尖兵（化装）查问。进入茅舍里，底下兵士见不

到我们，于是我们乘机从后山疾行溜走。向英巴林借来打猎的一把猎枪放在席下也没有带走，我们养的鸡、猪等更管不了。我们这一走，几乎肯定了我们的身份。他们逮捕了英巴林与保干群众，有几位群众也被调去盘问。

发生了这一事件后，我们再也不敢公开活动了，我们只能转入秘密活动，只跟少数可靠的伊班群众保持联系，工作的困难就明显的浮出台面。

泗里街是一个红区，有些反动势力与特务分子也很猖狂，为了压一压敌特分子的威风，长革命同志与人民的志气，革命组织决定在泗里街华区开展一场有计划、有部署的镇压敌特的斗争。这场斗争在1967年4月29日进行，金山路的黄钟如和玻璃港的蒋元良被革命同志处决了，其他要处决的特务正巧不在，成了漏网之鱼。这场斗争之后，地下同志就开始以自制水龙管枪进行武装自卫，实际上也是掀起拉让江武装斗争的序幕。

这场空前的对敌特的斗争，对敌特分子来讲是个撼地掀天的斗争，他们立即纠集与调来大批的军警进行“围剿”，宣布戒严，大派传单，5月份分别通缉两批地下分子，我们8人当中有6位是被通缉的。

开展了镇压敌特分子斗争之后，我们原本4个加上兰强、兰美、木容和赛娇，我们8个一起转到砂厘一带。我们被通缉的相片到处散发，我们的出现难免引起群众注目。才来到2、3天，兰光并不避嫌、公开碰一些群众。我们也注意到军用直升机在附近飞着，感觉情况不妙，但不知道直升机正运兵在距离我们不远的阿丁学校降下。

我们大家探讨、议论着，为了预防万一，大家认为改换住点、转移一些较为妥当。

我们是住在两座山的中间地带，这中间地带是种着水稻。“朗高”前面是一片稻芭，稻芭的前面是座山，“朗高”的后面，经过一小段稻芭，也是一座山。

当天上午，我们收拾行李开始转移。6位同志都走到后面山去，有的正走在山边上，我跟兰光作了最后检查后在“朗高”边正起步走时，却骤然听到枪声。子弹正从我们对面山打来的，稻芭光秃秃的没有好隐蔽。兰光跟我匍匐起跃向芭边冲去。我们俩被拆散了，也没跟上其他同志。

看来有坏蛋去告密，当敌兵来围捕我们时，在还未部署包围好，看到我们跑了，才匆忙就远距离扫射。

撤离火线后，我不敢乱闯，一来地形不太熟，二怕附近有兵，先找个地方潜伏起来。我两手空空，没有什么吃的，也没有什么用的，饿了只能喝点水。我可以听到附近有兵说话与活动的声音。晚上只能坐在树根上靠着树打盹，蚊子的侵袭，特别下半夜，冷得龟缩一团，根本不能入睡。有时天公不作美下着雨，淋得全身湿漉漉的直打颤。就这样煎熬了3天2夜。第三天下午，听不到兵的声音，周围也显得寂静。我决定摸出去，找砂厘通往毛洛冬（Meruton）的大路，我只会走这条路。我摸到兵走的路，跟着这条路到砂厘—毛洛冬大路。我真幸运，一路顺利，原来砂厘的兵当天全部撤到码头，而在毛洛冬路那一向的三处兵点也都在当天下午三点撤离了。三天来没有一粒饭之类进肚子，我感到疲惫不堪，走几步，都得停下歇一歇。当晚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总算给我走到了毛洛冬的华区。

其他6位同志都安全地撤到金山路。

而兰光，凭着他言语通、地形熟，撤出后他就去找伊班群众。这个群众表面上很热情，说周围都有兵活动巡逻，就叫同志躲上小茅屋里，不可下来，他要出去看看，了解情况。谁知这个伊班人利欲薰心，去找坡内有个坏蛋分子，通了风。这样，兰光就像在瓮里被捉了的鳖。

回到华区后，我们对工作进行了探讨与总结。大家认为，如果没有对敌特分子进行镇压，我们就很难在民族区立足，也很难开展工作。因此，我们决定在民族区开展镇压敌特的斗争。

我们先到砂厘地区，在群众中去调查那里发生的一些事件，找出出卖兰光的那位主谋。於是我们就找到他的住处去。深夜时我们上他的家，原本想把他引向屋外秘密解决，但他死也不肯下来。事前，某同志说，他有功夫，只要用水龙管枪用力捅他心脏就可以一了百了，不必花费子弹。行动时，他果真在床前捅他一枪，但并不能致命捅中他，坏蛋反滚到床底下摸出事先准备好的一把又长又锋利的“巴冷刀”，向同志们一刀挥斩过来，某同志用枪一挡，水管龙枪被砍中几分深。情况危急不能再迟疑，我们当机立断，只好开枪，两把枪同时开火，才把他打倒。瘫倒下来的刀锋刮伤了孟蜜的虎口，血流如注。

打了砂厘的坏蛋伊班后，我们又接着去找保皇港另一个伊班坏蛋。这个坏蛋，平时注意侦察追踪我们的活动秘密，一有情报就向当局报告，我们找上他，也让他向阎罗王报到。

除了砂厘、保皇港之特后，随着友光被捕接着我们也活动到巴洋河和 Ulu Sarikei 一带。

1969 年，下游武工队在泗里街宣告成立，黄理生当 DR 武工队宣委，沈耀彬当武工队队长，付队长是朱传容。民族工作队第一队由我与兰强带领，开展泗里街河右边一带的民族工作。民族工作队第二队则由卢春星与武民带领，开展义郎（Nyelon）、如楼（Julau）、巴干（Pakan）这一带的民族工作。

朱传容乘电单车在椰甲一带跌倒出事后，付武工队队长则由王世良（武辉）代替。

下游武工队成立后，就以整装的形式大力开展混合区和民族区的民族工作，活动的频繁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与恐慌，加上叛徒的出卖，敌方早就策划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1969 年 8 月 8 日，当局宣布在泗里街开展“双网”行动，出动几千名兵力进行海、陆、空大扫荡。活动在 Ulu Wuak 的沈耀彬由于长期习惯边区的部队生活，来到国内后缺乏应有的机警与防范，住点较公

开化而引起了暴露。“双网”行动宣布后，首当其冲的是 Ulu Wuak 这个住点。当天，敌兵从小河进来，发现我们布的岗哨，并开枪射击，在岗哨的陈金兰与刘忠东不幸中弹牺牲。敌兵人多势大，直迫住点，一位来自诗巫的知识分子也不幸被击中。当时点内人数较少（有一组外出联系武辉未回），挡不住敌兵来势汹汹的进攻。同志们从后山已侦察过的一条山路撤退。才爬上山头在下山时沈耀彬的脚本来就有点毛病，此时不小心又跌伤了。我们停下，小叶还帮他推擦，但还不太会走。才撤不上半公里又跟敌兵接火。我方占据不利地形，战斗力又弱，敌兵人多又居高临下，火力强，显得咄咄迫人，并逐步围下来。沈耀彬不能走，他说不要因为他而影响大家，他叫我们撤不要管他。我们放心不了他，只退下一点。看到沈武工队队长扔出了他的一颗手榴弹后，就没有动静了，估计在那时他被雨点般的子弹打到。

沈耀彬的爱人一小叶（莫静兰）被打散了。据说，她突围到 RH Asun 一带，遇到一个坏蛋活活被刺死。

我们三个撤到实曼归（Sebankoi）一带，再转到金山路，幸好驻兵也刚撤走。

1969 年底，据说黄纪作会到第二省某处，我们要过去设法跟他联络，顺便在经过的途中兼搞民族工作。在卢刹坡时我们在一个广东华族娶第二省伊班妇女的家里遇到他的内弟。我们跟他说，有去第二省时去找他。果真去第二省时碰见了，但感觉他很傲慢，甚至言行表现藐视我们。我们问他能不能帮忙购粮，他说很简单、很容易。他说，听说外面有兵，但很远，也只是在大路走走。只要我们留在“朗高”里，就没问题，而且很安全。在民族区工作几年，我学会听其言、观其行，我感觉对他不踏实。他临走之前，我交代他，购粮回来时若我们不在“朗高”，就会上“朗高”边的山上，上去找我们时要打联络暗号。

当天傍晚，他购粮回来，没有打暗号，就把粮食背上山找到我们。我跟忠民队长讲，防人之心不可无，还是退一点为好。当晚我们立即把粮食收拾好，从这一头的垄转到另一头的垄去宿营。凌晨 5 点多，有些同志就下到山边取水炊事。看到了炊事的柴火，印证了人民军还未

离开。顿时响起了枪声。所幸枪弹打的方向是对准接粮的那个扎营处。我们稍微转变扎营处，就避过这一劫数。

沈耀彬牺牲后王世良就接替武工队长的职位，卢春星提拔为副武工队长。接着下游战斗队宣告成立，王世良当上战斗队队长，叶富盘（活用）当上副队长，并积极部署开展杀敌夺武的战斗。

1970年2月25日，我们搞民族工作的同志也参加了这场战斗。战斗队成立后的第一次埋伏战终于在巫叻（Bulat）路一哩处打响。我们通过贴标语、挂红旗来引兵。果然傍晚将近7点，一辆小车在前（政治部头目在里面，当时我不知晓）一辆连古舍兵车在后，在正付战斗队队长指挥下，三组战斗员对准后面一辆打，成功地打上了，而且打死2个，打伤一个，还缴获一支史达林手提冲锋枪和100多粒子弹。

在下游民族区，除了“双网”行动遭受较大损失之外，另外，还有两次我们遭受较大的牺牲。

一次是卢春星带了4个同志去第二省想联络黄纪作。到了 Sg. Wuak 与第二省的交界，那天提早扎营。同志们去稻芭挖了木薯就在芭边山丘扎下。4点多稻芭主人也来稻芭发现木薯刚被人挖掉，回到长屋就把这一事讲开了。长屋里的民防队获得这情况，就即刻来到稻芭一带侦察。同志们的活动，扎营、砍树和炊食的声音被侦察到。当晚刘扬振、朱孟蜜和李彩合三位先下河冲凉，上住点时，卢春星与另一男同志才下河冲凉。正在这时，住点同志遭到民防队的袭击，三位同志都遭到不幸。

另一次，钱秀光、黄厚桃、刘世火和武民（江先汉弟）4个（卢春星与黄同志回华区开会）在 Wuak 的支流 Unpik 的 RH Ugas 一带活动。他们靠长屋的一位华人的帮助，他们也种稻割树胶。Ugas 的屋长是个坏蛋，假心假意，表现“积极”。有一天伊班群众打到一只很老的山猪，分一半给同志们。他们只有小锅，搞到下半夜2点才休息。原来林头目授计给当地坏蛋，扮装积极，伺机下手。坏蛋与当局联络、部署，从诗巫派下排长，结合当地边防队10多个。凌晨5点多，敌人直

闯同志们睡觉地方，在近距离向 4 张吊床熟睡的 4 同志的头部开枪，过后又砍下首级去邀功请赏。

还有一次，在乌鲁泗里街，我们也遇上一次被陷害事件，只是我们有防范措施，避免了流血牺牲，情况是这样的。那天，我们了解无敌情，到了一个木薯园的“朗高”，遇上一个伊班群众。我问他一些情况，他说的话不符合事实，表面又表现很热情，说这里很平安，很秘密，没有人会知道，可以住这里，要采菜可以到稻芭里尽管采……。为了检验他，故意叫他去购粮，并交代他，回来时去“朗高”或是上山找我们。他一走，我们也转移了。第二天遇上一个群众，他惊讶地说我们没事发生？原来，那个伊班群众是被处决的特务之岳父，当天他的“朗高”被兵包围。他还被兵打得半死，指责他提供假情报。

用武工队形式搞民族工作后，我们在混合民族区、深入民族区进行广泛的流动宣传。

有一次，我们 8 个人第一次突击宣传 Pakan 的一座 50 间的长屋。长屋的两头分别由 4 位同志站岗，这一头望不到另一头。为了更好的控制局面，避免可能的意外事故发生，我只能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虚张声势一番。说长屋外面已被包围，埋有地雷，不可出去，必须集中在一起。借此，我向长屋群众做了一番政治宣传。

由于在民族区开展除奸的斗争，加上不断的广泛流动宣传，局面有所改观。个别次我们在巴洋河（Bayong）从下游起一路沿河逐座宣传到河尾，路经的长屋有 7、8 座，有时一个晚上突击宣传两座长屋。当然每座长屋都有我们的“情报员”，有什么情况，他们会设法通知外面。

在第三省战斗队成立期间，Ubong 也有跟温贤定他们从中游来下游。我们带 Ubong 在下游民族区转了一圈。从毛洛冬出发，先到砂厘，再南下保皇港，再向东南巴洋河和 Ulu Sarikei 走一趟。一行 20 多人，浩浩荡荡，我们很受民族群众的欢迎，特别是 Ubong 的出现使伊班群众受到不小激励与鼓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洛冬、砂厘一带的伊班群众都很好，有许多拥护我军的感人事迹。他们无私的物质支援我同志，黑夜帮忙带路，长途跋涉去联络，冒着危险去了解情况，……总之，无怨无悔地去做许多事情。其中我们有一个点，在半山腰有设了个了望台，有个有点问题的同志，有时爬上了望台大喊大叫，都没有发生不幸事件。我们长期能在这一带保存下来，足以说明这一事实。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泗里街我们除了团结教育一批伊班积极分子之外，我们还吸取了两个伊班青年参加我们的民族工作队。

“斯里阿曼”行动之前，我被调到下游领导机关去工作。下游民族区成立沈耀彬民族工作队，由刘明耀、何可兰和 xxx 带领，负责泗里街河下一向的民族区工作。另外，武辉民族工作队则由刘华荣和赖学建（李山）带领，负责义郎河尾至部分加拿逸（Kanowit）河尾的一带的民族工作。黄国华则带一组搞第二省边界一带民族工作和部分第二省华区工作。

“斯里阿曼”行动出现后，下游的民族工作遭到很大的削弱。下游多年来的民族工作，我们是付出了不少的努力与代价，也有取得一些成绩，也有些可资借鉴与总结的经验教训。

在马罗河开展民族工作

李山口述

江泓整理



我是晋连路 7 哩人，1963 年尾跟 30 多人一起越界到印尼西加去参军。最初在山口洋，有 2、3 个月时间一边进行军事训练，一边学政治和华文伊语。后来我又转到坤甸，在那里将近一年时间，我们 4、5 个同志组成一个小组，在老吴的指导下研究民族工作政策和专学伊班语，准备奔赴边界开展民族工作。

1964 年，组织上分配老吴、友如（真名王尔兴，石隆门金隆人）、李安（真名李贵春，晋连路 7 哩老港下人）和我 4 个一项神圣的任务，即上马罗河开展民族工作。我们 4 个乘着一艘“波波”船从坤甸出发，一边向卡布尔斯河上游进发，船主一边做着生意去。行驶了半个月才达到马罗河的范围。安西（余清勇）早就在接洽处等后我们的到来，原来他比我们更早上马罗河下段搞民族工作。

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就建“朗高”，准备安家落户搞工作，为今后建军、建武装根据地奠下基础。这一带是属于印尼的马罗人，他们比伊班人较有文化，有些受过小学教育。我们随乡入俗，跟他们一样的生活在一起，劳动一起，并不断的在政治上进行宣传。在我们的努力下，一般马罗人表现同情支持革命。

在马罗河下段工作 2、3 年后，我们又向河尾转移。我们 4 个负责河尾的四座长屋，一人负责一座，我则负责最后一座的 RH 敦蒙公。这座长屋有 18 个门户，约近百人，我一个人住进长屋，跟他们同吃同睡，偶而也跟他们一起去捕鱼打猎。我认为，只有深入生活，跟他们打成一片，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才能做好工作。

老吴是诗巫侨南坡人，他很早就离开家乡，深入到民族区工作。他热爱土著民族，热爱民族工作，加上他聪明好学，他很快将掌握了民族语言，他不但能流利地进行伊班语普通交谈，而且能翻译，能进行生动的、富有鼓动性的政治宣传。在他活动的地区，都深受那里民族的爱戴与尊敬。几年来，我们在他的带领与指导下，民族工作工作取得不小的成绩，它为我军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粮食与情报等方面的方便，特别是当我军走上自力更生之际，更显得重要。

在马罗河这一段期间，我们也有几次去南边一带搞工作。我们其中一次是 8 个去，要走四天才会到那一带。我们到此地主要是搞工作，也附带设法联络印尼共，听说他们有武装活动出现。这里的土著民族还很落后，我们没有找到印尼共，有一次我们四位同志还惨遭土著的杀头厄运。

1965 年 10 月 26 日，我参加了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的建军，热烈庆贺北加人民子弟兵的成立。我继续在加拉央周围一带工作。至到 1969 年初，我才转回国内。

回到国内，我参加下游武工队第一军分区武辉民族工作队，我担任副队长（刘华荣任队长）。我们活动的范围是义朗河尾、鲁刹基塞一带、巴干和如楼等地。三年多来，我们拜访和宣传了约 30 间长屋。直到 1973 年“斯里阿曼”行动，我才离开民族区，离开部队，返回家园。

多年来的民族工作，我深深地感受到：

一、一定要学会民族语言。语言是人们主要表达的形式，是人與人之间沟通所必需的。要想搞民族工作，首先就要学会民族语言，才能彼此沟通思想、感情，我军才能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要想搞民族工作，又不要学民族语言，这是假搞而不是真搞。

二、民族工作者要注意自行的品行和道德修养，要自觉改造自己。

深入民族区土著质朴、忠厚、老实、善良，这也要求民族工作者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真诚对待他们。有一次，方旋同志答应土著兄弟，说要以旧衣服跟他们换木薯。木薯早就拿走了，但衣服迟迟未拿来，土著民族就感到受骗。初时我还不理解原由，遇到他们时不受理睬，妇女则把门关起来。我感到蹊跷，就去问甘榜头，他说，你们做法岂不是像印尼军人那样，随便拿群众的东西不还钱，讲好的承诺不兑现。我解释了老半天，后来回去拿了衣服倒回给了他们。当晚我们 10 个同志就跟民族兄弟一起举行联欢会，我们一起又跳又唱，他们敲锣又打鼓，洋溢了深厚的军民情谊气息。

要搞民族工作必须要有革命的决心，还要能吃苦耐劳，要经得起硬的困难压力和软的利诱等的考验。当年在深入长屋通常是一个人，缺乏组织监督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帮忙，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去解决，自己要怎么做都可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革命者就特别需要自觉的革命，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自觉学习，在斗争中自我提升。反之，就不能坚持民族工作，甚至葬送自己的革命前途。

当年正值青春年华，在长屋里有许多亭亭玉立、情窦初开的少女围绕在我的身旁，表示爱慕自己。只要自己不自觉，不检点自己的行为，就会陷入儿女私情的漩涡。那么又怎样不得罪她们，又能让她们了解自己，我跟她们讲，我也喜欢她们，只是现在不能要，往后才可能要。不是现在不要，而是条件与环境不允许。她们问要多久才能要，我说要等 10—30 年都不敢讲。如果是她们不能等这么久，只好打退堂鼓。这样我仍然可以跟她们保持继续友好来往。

三、要深入了解土著民族的风俗习惯，入乡随俗，深入群众，跟他们保持打成一片。

我们要搞好民族工作，就要深入群众，了解和尊重他们的风俗

习惯，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在他们未自觉移风易俗，进行改革，不能在言论与行动上触犯他们，不能把自己视作高于他们一等。我们要遵守长屋的风俗习惯与规定，他们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他们做什么，我们也跟他们一样做，像一家人一样。这样他们就不把我们当外人，把我们当成真正的朋友，有话愿意跟我们讲，也愿意支持与帮助我们。

四、要学会保护自己，提防被坏蛋陷害

我们少数人，势单力薄，深入到未曾到过的、贫困落后的民族区，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要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初时，我们穿便衣，但随身带有2颗手榴弹。后来军队成立了，我们就开始用武装形式去搞民族工作。武装的军人在民众中有一定的威严，但还须提防警惕，还须提防不可避免地在群众中可能出现一些坏分子的陷害，特别是在敌人威迫利诱的压力之下。



当年开展民族工作的公开民族工作干部与伊班兄弟合影

逊空的达雅人

曾玉兰（杨思珍）口述
扬帆整理



1965年上半年，我跟一部分同志上华莪。“9.30”事件后更多住在坤甸、山口洋一带的砂拉越青年先后也上了华莪。在那里进行了二个月多的军训，接着就分批上逊空地区去建立武装斗争基地。

来到逊空地区，我得首先了解达雅族。

逊空的达雅人是信奉阿拉土苍的，虔从甘榜头与 Dukun（巫师）即其风俗习惯。由于他们有时在自然界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只能任由上苍与命运的摆布。甘榜里有发生什么事就去找甘榜头，甘榜头的话就成了甘榜人的最高指示。甘榜里有什么生死、疾病、结婚等事都请 Dukun 来。巫师头上戴上一个皮圈，插几条山鸡羽毛在上面，腰间系上一个精致的小竹罐，有时。手里握着一把刀，边跳边舞，口中念念有词，似乎大功告成。每年开辟新芭种稻有一个隆重的仪式。甘榜头、巫师和男的甘榜居民（没有女的，他们是男尊女卑的），一路喃喃有语的走着去，到了芭地就搞个大同小异的仪式，然后在芭边插一根上端像漏斗形的竹子，把老叶、槟榔、鸡蛋，放在漏斗形竹里，祭拜上天，希望能带来好运。7 天内不可让人踏过这里，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这块芭就可以用，否则就要换新的。

有一次我差点闯了祸。那是我负责的 Selubu 甘榜的一个群众，他死了孩子，请 Dukun 来做仪式。我没有注意，见有蕨和“巴古”我就去采，却被这个群众看到，他说我越过这个做仪式的界线，要我对可能导致产生的灾祸负责任，我否认这个指责，他气冲冲地去找甘榜头和亚林评理。亚林讲不能跟他硬，我们找阿吉大甘榜头去和他理论。最后彼此谈条件，我方赔他两件 Yanbu（围裙）和一个瓮（它们可以用来酿酒），就算了却这个纷争。

听说，逊空达雅人有“尾巴”，初时我感到困惑不解，后来才理喻明了。原来，达雅人一般没有衣服穿，有些人剥下一种树皮，量身裁剪成树皮穿在身上，树皮在屁股后面打个结。要坐下时，必须把结推上，久而久之，这个树皮结就翘起来，外来人不敢接近这些土著，远远看去屁股后面就像长了“尾巴”。

这里的达雅人有时过着群体的生活，种稻时十几个人一起来，很热闹，男的在前握着一根木打洞，后面妇女不用弯腰可以准确地把谷种丢进洞里。除草的工作是自个去处理。她们在稻芭也种上木薯与玉蜀黍，其他农作物如果长得好，就会影响稻谷的生长。他们一年种一次山稻，不种水稻，也不劈另外地方种杂粮，因而一般都不够吃。逊空地方不肥沃，靠采集、捕鱼和狩猎也难以多大改善生活。我负责的那个甘榜头，他的米不但够吃，还绰绰有余。一般甘榜一家平均只能养活2个孩子，最多也不过3个。他却能养活5个子女，老婆可以不出外干活，在家里还有奶汁给孩子吃。他的女儿牙齿磨得尖尖的，大概显示其身份非凡。那么，为什么他会比较好过呢？这跟他有头脑，跟外界有接触较有见识有关，更主要他自己有优先权选较肥沃的地自己来耕作。可以说，只要他们不改变迷信和旧风俗习惯，不改变传统的刀耕火种种植法，不提高生产力，就难以提高经济生活水平。

由于他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几乎跟外界隔绝。所以许多生活必需品必须就地取材，自力更生，自供自给。他们的糖靠自己种的甘蔗。他们抽的烟是自己种的。他们没有火柴，更没有打火机。他们起火是靠一种树毛，用两粒石头磨擦，产生火花使树毛生烟，再慢慢吹，才引出火来。平常的灶头用一种木做火头，煮完饭后用火灰盖住，以便保持热度，留着下餐起火之用。他们的灶架是用竹做的，架内堆上泥土，做为生火炊事之用，他们烧的是竹片在炊食的地方做个架子，木、竹子排放上面熏干了备用。

他们建的“朗高”（小茅舍），不用一根铁钉，全靠竹、藤做原料。梁柱用的是竹子，屋顶也是用劈成的竹片盖的。他们用二片竹片里面并列相接向上盖着，再用一片竹片用里面相对向下两片相接盖下，

每片按照这样盖着，屋顶就不会漏水。地板和墙壁也是用竹铺的。床铺的做法是，先把又厚又大（有的直径半尺或更大）的竹子砍下，砍成一节一节的，再把节破一边，然后慢慢敲软，摊平，简直像木板一样。篱笆也是这样做法，看上去美观而整齐。只有楼梯才是木做的。砍一棵直径半尺以上的木桐，用刀砍成一层层梯子，一头插在泥土里，另一头靠在门口。上梯子的扶手也是用竹子做的。据说，砍竹时勿要在有月亮的晚上，否则会有蛀虫会蛀坏竹子。

逊空地区的达雅族不懂得医药卫生。他们住的高脚屋，楼下竟充满楼上抛下的东西，包括人的粪便，猪是靠吃大便长大的。由于没有碘和缺乏营养，有 85% 的逊空达雅人长泡颈（甲状腺肿），有的三、四岁的孩童颈项就长了泡颈，我看到一位达雅人颈项两边长着泡颈，上面的脸苍白的，跟下面的泡颈一样大，看过去仿佛长有 2 个脸，相信过后下面那个“脸”要大过上面的脸。

他们种的菜下雨天不采，等晴天才采。采了也没有洗，放进鼎里，加上米和大量的水，煮熟了用槟榔的蕾胎包着。一般煮一次吃一天，几个人就包几包。有一次，我看到他们捉到一只鸡，毛没有拔也没洗，就放在灶里烧，未烧熟就破肚，拉出内脏，放进火烧，待肠爆裂，就砍了分给旁边待吃的孩子，连肠内粪便也吃下。

逊空达雅族的人口繁殖力弱，有不少婴孩夭折，一家大概只养两个子女。他们有病就找巫师来医。巫师一边舞刀一边跳，口中念念有词，再用鸡血、老叶汁或槟榔汁撒在病人身上就了事。试想，这样怎能治好病？

有一次，我在甘榜附近听到婴孩哭，久久哭个不停，于是我向着哭声方向去探了究竟。我看到一个面黄肌瘦的，只有三个月大的婴儿，由 7、8 岁的姐姐携带着，她们的父母到邻近的农田里去砍草了。我看了说婴孩饿了，问有带来什么东西吃的，小女孩指了指挂在身上的方形小吊篮，我解下看。不看犹可，一看使我愣住了。里面放着一点已起泡发馊、带血色的烂饭。原来达雅人有嚼食槟榔、老叶（放有石灰）

的习惯，因而牙齿嘴巴是红色的。清早母亲用自己的咀巴细嚼一些饭留给婴孩吃的。这样苦涩又带酸辣的坏饭怎么能吃的？几天后这个婴孩就夭折了。

达雅人的狩猎除了自制枪、喷筒之外，有的在整座山装上待猎的机关、陷阱，从大的鹿到小的山猫之类都可以捕捉到。

有一次，他们杀了一头鹿，特邀我和亚林去吃。他们没有把鹿胃里的粪洗掉，这样就把胃连粪一起煮了吃，而且还把它当成上等菜肴，让我们这些“贵宾”来尝一尝。

第二次，一个甘榜群众高兴地叫我晚上去他家吃猴子肉。我看到他背的 Damuk（背篓）有虫在爬着，周围飞舞着苍蝇，远远都嗅到那难嗅的臭味。我心里皱着眉头，但表面上还得装出兴奋的样子，说：“好，好！”原来这只猴子已死掉了 6 天，只能捞到皮跟毛，看不到肉，水是黑色的，像脏沟里的水一样。这个主人特别爱护我，只请我一个吃，因为我医好他太太的病。他盛情地盛半碗给我吃，还说：“好吃的，吃啦，吃啦！”我说：“好，好”，我不得不吃一口，一下子感到舌头痹了变硬了，嘴巴与牙齿被粘住似的，我不得不装着好吃的样子，不断地咬着，我用喉咙顶住，不让它吞下，也吞不下。等他与妻子稍不注意，就赶快吐出竹缝下面，接着忙擦着嘴巴又咬个不停，再偷偷地吐掉，直到吐完为止，但嘴巴还是应酬着说好吃好吃。回到营地，我赶紧洗手（用手来捞），一直洗，一天洗几次，用仅有的一块肥皂来洗，指甲也剪掉。4、5 天后还是有臭味。

另外一次，一个甘榜群众叫我去吃已存放一年多的山猪肉，由于没有盐，早已腐烂发臭，瓮里已捞不到肉，只有毛和皮，水也是黑色的。他用竹碗盛着给我。所谓“竹碗”，是选两节短的竹子，锯下两头，上面锯个口，下面削平，能站在桌上，可以用来装水或菜等。我当然吃不下，只好旧技重演。老实讲，在那样的环境里生活，由于革命需要、生存需要或潜移默化作用，我们要学会适应那样的环境与生活。在那一年多搞达雅族工作的影响下，我学会了抽烟。同时，只有肉腐烂不

太久，还有肉，还是勉强可以吃得下。榴连存着一年变馊酸生虫，我们还会吃，若虫爬上手就扔掉，若已吃到口里，照旧吞下。

在逊空的甘榜里，达雅人用一根大园木栽入土里，约两层屋高，在木顶端建一个伞形的小房间，又叫“青年屋”，因为只有青年男人可以上或住在上面。原来，青年达雅人砍了人头，就把头颅吊挂在上面。同时，另有一根空洞的圆木竖立靠在“青年屋”的门口，在上端园木口绑上一层兽皮之类。当砍到人头时，“英雄”就踏上梯子上此屋，敲起这兽皮鼓来。这种鼓声会悠扬传至很远，我们听起来毛孔竖然。这是他们热烈庆祝砍到人头，还喂人头吃饭，表示敬奉上天。

逊空甘榜的达雅族是猎人头、喝人血的民族。外来人有来无回，即使各甘榜之间也时有发生冲突与互相戮杀。他们把猎人头、喝人血当作威风的行为与英雄的表现。他们把猎取的人头挂在甘榜，甘榜的人头挂得越多就越就威风、越英雄。我们是唯一的外来人敢进入他们的甘榜，我们手中有枪，他们不得不敬畏三分，不敢对我们轻举妄动。尽管如此，我们同志还有几位的头被他们砍掉。特别是敌兵来围剿，驻在甘榜时，他们有的变成了敌人的帮凶，来砍我们同志的头。

在印尼兵还未围剿逊空时，有一个同志掉了队，迷了路，遇上了甘榜的几个人，他们把我们那位同志骗到“郎高”去，然后砍掉头，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后来被我军查到，捉到3个谋害者，经过审判，枪毙主谋者，另外2个从者警告了放回。我们同志把被害的同志首级背回营地。

第二次，两位同志去会晤两位达雅人，廖福生同志（马当人）跟他们谈话，水和同志在旁戒备。他们有备而来，见我们冷不提防，后面那个达雅人迅速抽刀跨前一步，一刀砍下福生的头。水和同志还未完全反应过来时，左手也被对方快手砍了两刀。

还有一次，三位男同志会见达雅人，对方说有事要相告。还未到达该地点，中途被事先约好的印兵埋伏，海外人阿忠被打死，另一位

逃脱，石隆门达雅人(Senam)被活捉，他不屈服，不投降，拒绝带路，头也被达雅人砍下，并喝他的血。

印共也曾派 2 男 1 女来逊空找联络，两位同志被达雅人砍头，女同志却被他软禁起来，要她做他的老婆。女同志为要发出求救讯号，她把不能再修的手表叫这个达雅人拿出去修。他找到三支的民运工作者，引起我们怀疑，问他手表那里来的，他死不承认，却说捡到的。后来通过向他进行巧妙带威胁口吻查问他，后来才托出内情，救出了这位女同志。

在逊空地区我主要是搞民族工作。民运工作的总负责人是朱增仁(亚林)，他带领二个中队(约 60 多人)负责 9 个甘榜几百人的达雅族工作。我们是在总部的外围搞土著民族工作，并兼负些对外联络和搞些生产。我跟另一女和三男组成一组负责第一个甘榜 Selubu 的民运工作。这个甘榜有约 30 户近百人。从丹蒙的中间站上逊空的山脚第一个甘榜，就是我负责的 Selubu 甘榜。

怎样搞达雅族的民运工作呢？我认为，重要的是要随乡入俗，首先跟他们搞好感情。我通过医病，进行医疗服务，救死扶伤，来团结教育他们。

在逊空，天花病死了不少人。天花症病患者全身水泡似的，肿胀连在一起，不能睡，躺下皮就会脱掉，他们把病人拿去熏火就死掉了。我们主要用逊空地带土生土长很多“集鱼胆”草，跟他们洗、敷又内服，结果医好天花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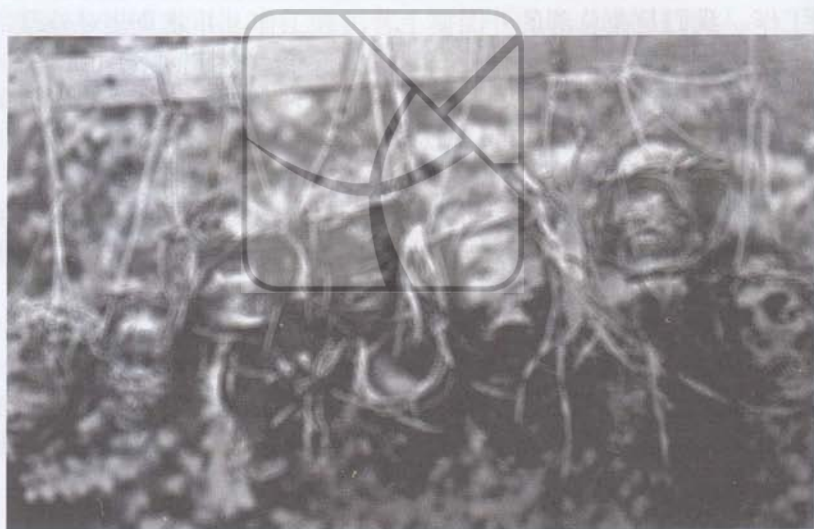
“集鱼胆”草有多种治病的功效，主治解毒、发冷发烧、消肿、疼痛等等，我们把“集鱼胆”草拔了洗干净，晒干，磨成粉状再渗和进木薯浆、搅和均匀，用史登枪子弹壳压出一粒粒子弹壳圆状的“集鱼胆”丸，熏干了方便保存与携带。

有一位达雅青年眼睛被蜘蛛网粘住，眼睛打不开，21 天看不到

太阳，眼泪流不止，非常痛苦，我用墨汁滴入眼内，再用棉花抹，却抹不掉，原来蜘蛛网已吃进眼膜。我找到网头，我用力一拉，他整个人跳起来，拉出眼下半边的蜘蛛网，粘住眼膜的就流出血，血流下腮。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高兴地能让他重见天日。

一个群众背部长一粒大疮，有 5 粒头，疼得要命。我用 8 号线夹住疮，用力一挤，浓血都溅到我的身体。过后消肿消痛，很快痊愈了。

逊空的达雅族工作我们才搞一年多，取得一些成绩，但敌人一来，镇压与收买，后来反过来，站在敌人一边，配合敌人追捕，杀害我们同志。



人头骨悬挂在长屋里，展现猎人头者的荣耀

稿于 2004 年 1 月

缅怀在印尼边区的民族工作

小李

珍娜最近突然到访，使我心中欣喜万分，因我们已 30 多年不曾会面，彼此全无信息和联络，欣慰大家都安好。心中也感慨万千，大家都是 60 几岁的人了。

提起往事，尤其对当年在印尼边区的伊班民族工作，始终难以忘怀。在珍娜的鼓励下，在回忆中，她也提供许多资料。回想我们当年一起搞民族工作的 7 位战友：我、珍娜、陈燕、丹莉、丁山、将来和新泉。我们当时是远离领导，有一年多的时间失去组织的联络下，依靠大家的团结、关怀，互相协助，在崇高的理念下，“敢”字当头，去开创民族工作。

经过深思，我要把这历史长河中的片断回忆写下来，不让它沉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也让后人知悉这段历史过程，了解前人曾经这样奋斗过，并曾付出宝贵的青春岁月，甚至付出年青的生命！

我这篇文章，也算是对已牺牲的四位战友：丹莉（袁锦香）、丁山（郑汉辉）、将来（刘德方）和新泉温俊南的纪念吧！我们永远怀念你们！

（一）可敬的赖伯一家

1964 年 2 月初，我和陈世杰接受组织委派到印尼西加边界的印境勿里当河流域双勾月地区去搞民族群众工作，同时也准备在那地区开辟一条通往砂印边界，能直通国内地区的路线，以备将来回祖国的路线。当时组织上只交待我们到勿里当河上流实勿岸地方找姓赖一家人，可能他们会帮助我们，以后一切工作生活就全靠我们独立自主了。

我和世杰俩人在坤甸找到一艘刚要去勿里当流域一带做生意的商船。我们和船主谈妥，我们表示要到双勾月实勿岸地方找一位姓赖一家，希望他帮帮忙。他答允后还偷偷笑，原来船主也姓赖，和赖伯还有

亲戚关系。船主很热情又客气，最后连船费也免了。

第二天早上，船向卡江上流行驶了一整天后，抵达中途站，在实加罗市镇过夜，船家也在这里做他们的生意。隔天船再朝勿里当河口驶去，下午五点多抵达勿里当河口，船只又停下来过夜。

勿里当河口有座小市镇，华人有十多家在此经商，四周住着许多印尼民族。这里有小型的政府行政机关、警察局和医院。我们又再休息一夜，隔天又经过三小时多的航程，近中午时，船主就和我们说，你们要找的姓赖那家已经到了。我们向前一看，可吓了一跳，原来赖伯的房子是建在河面上的。这种水上人家在印尼卡江一带是随处可见的，毫不稀奇，可是在我们砂拉越就太少见了！

赖伯家人看到有陌生人到访，全家都跑出来，惊奇看着我们两人。因在这么偏僻地方是很少人客到访。经我们自我介绍后，屋主客气地把我们迎进屋里。我此时化名亚芳，世杰改名小杰。

赖老伯夫妇都已经 60 多岁的老年人，不过身体还健壮。赖伯的大儿子叫阿金，40 多岁，有儿媳妇和两位孙子。小儿子叫阿华 20 多岁，最小女儿玉华，也 20 左右。他们都住在一起。其实赖老伯还有两位儿子，一位已成家立业在坤甸，另一位也成家并在双勾月下游地区做生意。

赖老伯很健谈，他透露他们在十多二十年前，从山口洋三发地方避难到此地定居，到底避什么难，他就支吾不肯说了。他还跟我们透露，在几个月前，我们有三位同志从这条来路，抵达他们家，而且还住宿了三晚后才下坤甸去。我们听后才猜测和体会组织上为何重视我们这个地区的工作。就这样，我们暂时留在赖老伯家里居住下来。一方面可以跟他们全家人搞好关系，再来也可以从他们那里了解双勾月地区的民族分布情况。

日子匆匆过了一个月时间，世杰先回去山口洋向组织反映情况，并征求意见。这时只留下我一人。我就跟赖伯家人去稻芭做工或去找野菜之类。

赖家靠做一点小生意，还靠种稻维生。赖老伯还经常带一些药品到长屋卖，或换取一些米粮回来。这正合我心，我就帮赖伯划船，背药箱，到长屋去或做点生意。这使我有更多机会和那里的达雅民族接触，他们的语言和我国伊班语差不多，因我通晓伊班语。不久，我就和这一带的达雅群众混得很熟了。

时间过得真快，我在赖家已经居住了半年，我还认赖老伯为义父，称他老人家为阿昌，意即父亲，赖伯母为阿姨。

1964年年尾，珍娜、陈燕、丹莉、丁山，将来和新泉同志陆续到来，骤间，赖家可热闹了，但赖家也容纳不了我们这么多人。还好赖家在河边还有一间放杂物的木屋，我们把它收拾清洁，就住进这临时的居所。

当然，我们体谅赖家的负担。我、珍娜、陈燕经常跟赖伯到长屋去，珍娜和陈燕有学过一些医药知识和针灸，她们为达雅群众针灸看病，群众无限感激，经常会送米粮给她们。其他几位同志也没有闲着，他们帮赖家到稻田工作，有时间也会去找山菜。

我们居住的这条河流，堪称鱼湖，就如这里人所说：“等锅水煮熟才去钓鱼还不迟”，这话虽夸张，但这河里的鱼确实非常多。我们的钓鱼高手珍娜和丁山，有时他们划条小船出去钓一两小时，就可钓到一两桶鱼回来。这里的水上人家，每户都在屋子下面的河水中装个笼子，把吃不完的鱼养在河水中。要吃鱼时，就去笼中捕捉活蹦活跳的鱼儿。野菜也容易找，不过米粮就很缺乏，经常闹米荒，有钱也买不到。记得有一段时期，我们三餐都是米渗木薯或玉蜀黍当饭吃，这真是难为赖伯一家也跟我们一起受苦，但他们从来不曾有半句怨言。

不知不觉我们在赖伯家居住了几个月时间，大家都觉得，长此下去总不是好办法。几经讨论，我们认为应生活到民族中去，还应自立更生。我们决定搬到长屋去居住，何况这一带达雅群众和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赖伯一家也很赞成我们的决定。不过，将来还得同志留下来做赖伯去长屋做生意的助手；丹莉同志身体不好，也留下来负责当地的群众工作。

（二）民族工作的苦乐

1965年初，我们5位搬到兰沙长屋居住。兰沙长屋共有20多户人家，因为他们要重建造新长屋，旧长屋已全部拆平，因此每户人家都各自建造自己独立简单木屋（郎高）作为临时居所。这座长屋也是我们较有群众基础的，同时我在这里也早就认了一位干爹，此人名叫令奎。他是60几岁和他儿子媳妇及两位孙子同住，我们住进他的家。他们一家人很欢迎我们，也非常客气，因觉得非常难得的是我们华人会住进他们的家，那是他们的荣幸。

“郎高”虽小，但它有连建一间客厅，现在刚好成了我们临时住所。我义父也是靠种田及做些手工艺品换取米粮。不过他可算是多才多艺，他会编织各种藤篮和草席之类，还会打刀，同时也会制造火药及火药枪，真使人佩服，他的产品有的供出售，也有的拿来换米粮。后来我们和这里的达雅群众一起去打猎，也是用他制造的火枪，但是经常会走火，反把山猪吓跑。

为了生活和减轻群众负担，我们商量后，决定割树胶。我和新泉替我义父割胶，珍娜和丁山替另外一家叫兰那的割，而陈燕则帮忙收胶汁。这真是难为了我们这些不曾拿过割胶刀的年青人。早上五点多，天还未亮，寒风刺骨，我们戴了头油灯，提了胶刀，就往胶园跑。早上九点多钟就去收胶汁，最后压制成胶片，下午才松了一口气。我们所割的树胶片，二成还给主人作为伙食费，因我们在他们家住、吃、喝等。另一成我们作为购买药品和日常用品。

我们的刻苦勤奋和友善的态度给这一带达雅群众很好的印象。他们表示很钦佩我们，一闲空就自动来找我们谈天，把我们当自己人看待。有什么好吃的就会送来或叫我们到他们家去吃。

珍娜和陈燕经常替达雅病人推拿和针灸。有一次，从另一座长屋扛来了一位看起来很严重的病人，经他们两人细心医治后，不久病人痊愈了。他们非常感激她们救命之恩。这样一来，珍娜和陈燕两人就大名远播了，从此到来看病之人络绎不绝。

在我们这组当中，只有我一人会懂得讲达雅语言，其他几位可一句都不懂，我就成为他们不可分离的沟通者。不过，他们几位都肯努力苦学，经过一段时日苦练，他们都会讲一些简单日常用语，不必只摇头和点头，我也轻松了许多。

时间匆匆过了近半年，我们帮达雅群众种稻、拔草、割稻，割好的稻谷，还帮忙用“拉笼”（一种藤制背篓）从稻芭背回甘榜去。两位女同志也和我们男同志一样，不怕苦，接受挑战，使达雅群众颇为佩服。

我们在这里生活虽然清苦，但也有欢愉之时。例如我们几位男同志参加他们集体狩猎，还有毒鱼和采蜂蜜，他们都算我们每人一份。他们的新年庆典，我们也去帮忙杀猪杀鸡，女同志则帮煮饭菜，做糕点。然后我们一齐聚餐庆祝，我们也到每一家去拜年，大家都欢欢乐乐，其乐无穷。

在政治工作方面，珍娜负责盟组长，一有机会我们就召集达雅群众坐下来漫谈。我们向他们解释我们来到这里并不是来避难，我们是要摆脱殖民地统治，要争取国家的独立。经过我们多次宣传，他们已开始明白，都很支持我们。

我们还特别去联络较有文化知识的青年，宣传我们的政治理想，我们有培养三位青年可做为我们的地方工作干部。他们积极联络村民，搞好团结。我们也教导村民在种稻，割稻及一些较繁重的工作时，大家能发挥互相帮助的精神，他们都很乐意接受，并做得很好。

兰沙长屋是我们的主要据点。当时我们所负责的工作范围，共有5座长屋。如牙来长屋共有30多户人家，芒吉长屋有10几户人家，另两座长屋是单容和把兰惹。珍娜、我和陈燕三人经常都有去那些长屋搞宣传和动员工作，也有在那里居住几天，并参加他们的日常工作和活动。所以我和长屋居民感情都很好，很得他们的支持。

珍娜和陈燕有一段时间是居住在芒吉长屋，那里有一户人家，只有一对老夫妇无儿女。她们后来就认老人家为义父母，除了帮做家

务，还去种稻。这对老夫妇可能年老又无子女，真把她们当自己女儿亲疼爱和保护。她们俩人走到那里就跟到那里，怕被别人欺负。珍娜说，她非常怀念这两位老人家。后来因我们接到领导指示，匆匆撤离这民族区，回去参加我们当时刚成立的武装部队，即东部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她们竟然没有时间倒回头向这对老夫妇告别，后来也没有机会倒回这地区工作。珍娜说，当时的不告而别，想起来有点遗憾终生。

兰沙的达雅群众，为了报答我们无报酬及不辞劳苦地长时间的帮助他们，他们竟送我们一块9英亩的土地，并通过集体劳动，帮我们种稻和拔草，就和他们同族一样。这也带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与欣慰。

（三）印尼军队的追捕

印尼“9.30”政变后，局势显得很紧张，各处风声鹤唳，我们这遥远的边区也感受到紧张的气息。我们大家都提高了警惕。因我们这一带活动，早已受到军警的注意。只是他们找不到我们非法的作为，现在他们利用局势的突变，得到上司的指示，准备来追捕我们。

果然不久，我们得到可靠的消息，印军要来追捕，这是我们早有预料之事，大家并不慌张。

我们集体讨论后，决定和这些印军周旋到底，来玩一场捉迷藏游戏。主要是群众关系好，每座长屋都有人为我们提供信息和带路，我们对地理环境也比较熟悉。

我们也马上通知在赖老伯家的丹莉和将来，要他们撤到兰沙长屋来会合，以便大家能够互相照顾。

就在某天中午时分，整10名印军全付武装，找到我们的兰沙长屋。这对长屋居民来说，这是几十年来首次遇有这么多军人到来。居民都惊奇地走出来看看，由于我们预先有宣传过，长屋居民并不感到害怕，也没有人上前去跟这些军人交谈。

这些军人首先去找屋长，屋长说我们居无定所，来去无踪，有时会来住一夜就离开了，又说我们只是来这里找米粮而已，其实我们也没有做什么事，目前也不知我们在何处。军人无法可施，只得在长屋外面广场上扎营过夜。隔天军人看到居民对他们不理不睬，也识趣地离开到另一座长屋去。

我们几位同志在当地土著积极分子带领下，专走山芭小路，在各长屋之间迂回。其实，我们住点距离军营并不远。

连续四天，印军都无法得悉我们的行踪，只得撤回去。印军走后，局势也平静下来，我们几位同志倒回各自住的长屋向他们道谢。长屋居民都非常高兴和我们握手，妇女还激动地流泪。

当晚许多家都杀鸡，煮一些好菜请我们去吃。我们邀请他们把饭菜都拿到我们的住所来。我们请来了屋长，几位地方土著干部和其他居民，共有几十位，来个欢乐的聚餐。餐后，再来个聚会。我们感谢当地居民的帮助，希望今后大家更紧密团结。我们也称赞地方干部的勇敢，我们聊至深夜才散会。

夜是那么黑暗又沉寂，四周只听到昆虫的鸣叫声，大地也沉睡了！经过几天的颠沛流离，大家都很累倦，沉沉进入梦乡。

（四）没有打通回国内的交通路

组织指示要开辟一条越过边界回到国内的交通路线，现在我们的民族工作已经有一定基础和成绩，我们早就从民族群众这里了解清楚，这里本来就有一条可通到国内的板督小镇，和那里的商家换取粮食和日用品回来，直到马印对抗为止。

我们找来了一位普通印尼华人来做我们的响导，他叫阿坤，40岁出头。他和这里的达雅姑娘结婚，已有四位孩子。据他说，他以往常有往返做生意，他又说，这条路并不难走，因常有人来来往往，有明显的路模。我们和他谈妥了条件，只给他几千盾当家庭费用，他也爽快

答应帮助我们。

我们经过几天的筹划后，我、丁山、新泉和印尼籍的阿坤 4 人，在某天清晨七时多就出发。我们都无比兴奋，第二项任务终于开始踏出了第一步。

第一天所跑的路线很好走，这是一条甘榜路，路途中经常遇到一些土著路过。我们一直走到傍晚时分，才抵达一座长屋，这里开始比较荒凉，四周都为山林所围绕，这已经到了勿里当很上游地带。这地区的达雅土族看起来较野蛮，没有接受文化，不过对我们这些外来人还算客气。当我们要出发前，一些达雅群众就叮咛我们，到了这地区最好不要乱吃他们的东西，以防他们在食物中下毒。我们真的只吃自己带的干粮、竹筒饭和咸鱼等。在长屋住宿一晚时，大家都很警惕，差不多半睡半醒中渡过一夜。隔天一大早，我们赶快上路，也不敢跟他们透露要到那里去，以防他们会在半路埋伏。

第二天走了两个小时多的路途，前面的路也越来越难走，因这一带大森林已被砍伐，变成老稻芭，有的已变成子青芭，老路模已经不存在，这是我们意想不到之事。现在只好凭阿坤的记忆来辨认方向，并且边走边做记号，进度非常慢又辛苦。直到傍晚还没看到长屋和“郎高”。在我们意识到可能迷路时，太阳也渐渐西沉了。因事先没做防备，只得露宿河边的大树林里。此时我们才注意到阿坤的神色有点害怕和紧张。他交代我们，在深山密林里过夜，大家最好不要乱讲话和吃饭时不要臭味的东西，如咸鱼、马拉煎等，以免惊动山神野鬼之类东西。我们当然听从他的话。同时吩咐我们拿多一些干柴，堆成一大堆，以备点火之用。这时只看阿坤用刀子在地上划一个大圆圈，把大家都围在中心，嘴里还念念有词，我们听不懂他念什么，可能是驱魔除妖的咒语吧！念完后他就点起火来，叫我们每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围着柴火，不准乱讲话。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不敢也睡不着觉。半夜里只听到四周都有野兽走动和吼叫的声音，伴随着各种虫鸣。大家都心惊胆战地渡过漫长的一夜。挨到天亮，大家才吁了一口气，赶快收拾行当就上路。

第三天行程更是难了，因为已迷失了路，现只依靠大方向，慢

慢向前走。可能这几天睡眠不够，又疲劳过度，到了中午，我就感觉全身发热，头疼得要命，走起路来，双脚乏力，举步艰难。我们边走边休息，希望快点能找到一间“郎高”来休息。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不久我们在一处旧稻芭，发现有间破“郎高”，总算晚上有个住宿地了。此时我发高烧更厉害，一躺下去，就昏昏沉沉地睡过去，晚上也尽说梦话，他们三人轮流看顾我。天亮时，病情更严重，小便也带血，人也昏昏迷迷，看来已经不能再继续走下去了。他们三人商量后，认为救人更要紧，决定打回头先归家。他们动手做一个担架，轮流扛着我沿着稻芭路往回走。不过，幸运之神还是眷恋着我们。中午时分，我们遇到两位找山藤的达雅群众。他们很乐意答应我们的请求，把我们带回去他们的长屋。

阿坤马上去见这长屋的屋长，说明了原因，这年老的屋长很慈祥，他安顿我们在长屋住宿，并表示一定会帮我们到底。他说他们这一带长屋居民有一条规矩，凡是有外人病重不能走动或受刀枪伤不能移动者，长屋居民都应帮忙把此人送到下一座长屋，一座传一座，直到此病人或伤者回到自己的长屋为止。我就是在这种接力赛般地经过三天时间，把我送回自己住的兰沙长屋。此时我还是神志迷糊，不知自己到了何处，只听到有人在哭泣。

在珍娜和陈燕同志的细心照顾和医治下，经两星期的修养，我终于慢慢痊愈了。

这次开交通路线失败的原因，大家都认为不能怪怨任何人。唉！大概天意如此吧。我当时真感到很内疚，若不是为了我，此次任务可能已经顺利完成。过后大家还是互相鼓励，等待下一次时机再出发，直到成功为止。可惜我们在1966年初匆匆撤离这工作地区后，再也没有倒回去过，这一切只给我们留下永远的回忆。

（五）再见吧！双勾月的乡亲们！

1966年3月天，稻穗还未成熟。一个清爽的早晨，大家正值休息日，没做工。当我们正起劲闲聊时，丹莉和将来突然到访，同时还带

来两位同志，保林和华林，大家吃了一惊，预感有什么大事发生。丹莉向大家问好后，就交给我们一封组织上的来信，我们看完信后都兴奋地跳起来，原来组织上要我们撤离这里，回去参加自己刚成立的武装部队，即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这天大喜讯来得太突然，真使我们一时都手忙脚乱。

第二天就得离开这里，大家心里七上八落，一方面又忙着收拾要带走的物件。我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先通知这里的屋长及义父，要求他们在当晚能召集全体长屋居民，以便我们向他们解释我们即将离开之事。

当晚七时许，屋长家客厅已集合了几十位男女老少的达雅群众。我们几位同志也准时赴会。我首先发言，我向会众解释隔天我们将要暂时离开这里的原因。这使他们大吃一惊，都七嘴八舌地要我们留下来，我们表示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倒回来，希望他们自己多保重。接着我们经过讨论结果，决定我们的稻芭过后所收割的谷子，将存放在屋长处。如果谁家缺粮，可用这些谷子先借予他，不过谷子须在一年内还清。同时借 10 干筒（木制的圆桶，叫干筒‘Kantong’）须还 11 干筒，这样我们的存粮才不会减少。大家都同意此处理方法。这一晚大家都闲谈得很晚，依依惜别，互道珍重。真是相逢容易别时难。

第二天一大清早，我们已准备动身，一踏出大门，就看到一大群人，男女老少约有整百人吧，都集聚在长屋前的草场上。在人群前面还堆积着一大堆东西，定睛一看，有米粮果子、鸡只等，都是要送给我们的。当我们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道声保重时，就有几位妇女拥抱着我们的女同志，开始哭泣。这些女生也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突然多数妇女都大声哭起来。这时我们女同志也开声大哭，这离别的悲情场面也使我们几位男子硬汉和他们同声哭泣起来。

在保林和华林的不断催促下，时间确实不早了，必须启程离开。此时有 6 位达雅兄弟用背篓背着要赠送给我们的物品，陪我们走两小时多的山路，从兰沙长屋到勿里马的保林船只停泊的地方。我们都迈着沉重的脚步，离开这难忘的穷乡僻野，还有这里亲切的兄弟姐妹。

在这勿里当河边的一个小乡镇,有 10 多家华人,多数经商做小生意。其中有家年老夫妇和儿子经营的小商店,几乎是我们的联络站。这年青小伙子叫阿豪,原是我们的联络交通员,和我们感情非常好。我们往往一到他们住处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在那里休息、吃和住,我们生活的日用品、药品、米粮都由他们供应,不过我们用树胶片和他们交换。

俩老听说我们即将离开,拉着我们的手,一直哭泣。三位女同志也开始哭了,我们全部都很伤感,为了组织的召唤,要迎接新的任务,只得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保林和华林所驾驶的是一艘 40 马力的舷外摩多,船有 20 尺长,四尺阔,速度很快,直向勿里当下游乘风破浪而去,目的地是最后一站的赖老伯家。

将近中午,我们已远远可望见赖伯家,因他们早已料到我们当天会到来,他们都在外面等着我们。我们一上岸赖伯就要求我们在此过夜。我们好言婉拒,但答应一齐吃午饭。这一餐菜色很丰富,我们也真饿了,吃得津津有味。饭后,因时间紧迫,分离在即,我们邀请两位老人家坐在我们前面,然后我们都跪在他们面前,向他们全家叩三个响头,感谢他们这几年来对我们的照顾和帮助,此恩此德,永世难忘。此时我们都再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又放声大哭,赖伯一家也跟我们哭作一团。想起我们这几位远离祖国,远离家园亲人来到这异国的穷苦边陲小镇,为了理想而在此做宣传动员民族的工作,当年我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花样年华的年青姑娘和小伙子,心地善良,感情丰富,连男儿汉也控制不了离别悲情,大家同声一哭,这也不算脆弱而是真情的流露。

当大家都上了船,保林开动了摩多船,迎着夕阳,直向勿里当河口乘风破浪而去。我们都回过头,看着送行者,码头、屋子、树林这一切都慢慢模糊远去。我们都挥着手,不断地喊着,再见!

再见吧!邻国的双勾月的各族兄弟姐妹!祝你们世世代代都能平安和谐共处,富国强民,身体健康。我们永远难忘的双勾月!

稿于 2006 年 2 月

我在民族区的日子

珍娜口述
方明整理

我是在 1963 年 8 月 31 日，离开我出生的砂劳越第一省的海口区，即现今的砂隆再雅（当时称怒诺）的椰林老家，启程越边界去印尼，至到 1974 年 1 月 18 日，从第三省的加拿逸乌鲁船溪马占，通过 Sri Aman 和淡行动，走出森林。先后十多年的日子里，我有六年多即三分之二的时光是在民族区工作。我曾在接近二省、三省的印境和砂圻边界，以及拉浪江中游地区进行民族工作，那里几乎都是属于伊班族族群。

响应号召，到印尼接受训练去

1963 年 8 月 25 日，我响应革命组织的号召，离开了家，不告而别。我先到达三密，并和三密几位战友一起坐船到马当地区，逗留有一星期左右，我就认识到的有来自海口区的六位，其中有耀雄、尼亚、保林、丽芬……。马当地区来了 20 多人。8 月 31 日晚，我们坐长挂尾船出发，我们都坐在船里，上面被卡章（Kajang，有一种用亚答叶编织的蓬）盖罩着。基于严密，大家互不开声过问。到三马丹海岸时，因海浪太大，又折回三马丹的一条小支流里面，找个地方，休息了一个白天。9 月 1 日晚上，再从那里出发，驶出大海，过了印尼那一边的海滩，半晚到达了打马柔；大家肚子饿了，不知是谁拾到一大锅的海龟蛋，有人烧火煮熟了，每人分得几粒充饥。天亮了，我们继续走，烈日当空，又渴又热又疲倦，加上刚离开家，要到一个遥远又陌生的地方，心情也不平静。走了好长的路后，终于到了一个小甘榜叫尼姑的，我们终被安排坐船到班戛，以后再颠簸辗转到山口洋。

在山口洋的学习和上课

到了山口洋，当晚我就被送到张氏公会。在那里，我首次见到秀琴。其他一齐来的战友立即被分派到张氏公会，潮州公会和琼州公会或群众住家。随后我又被载到凉塘的公司山（墓山）的木屋。那是间木板屋，里面有两间大房间。当时，林严华和其他领导干部住一间大房

间。我们 30 多人挤进另一间大房间。男男女女像沙丁鱼似的挤在一起，排挤着睡觉，坐起来就地学习。晚上轮流站岗，站岗者叫醒下一位去站岗后，就只能就地睡下在那空位上。我们只能直直躺着睡，连翻身的余地也没有。

我居住的地方，白天都不可以走出屋外显身露面，不可以让周围群众看见，还好屋后靠近墓山，较偏僻，白天还方便上厕所。每天只能等到天暗了，轮流到一个水井处冲凉，那是群众挖来取水浇菜的。

当时伙食很差，多数早晚两盘稀粥，配上一汤匙腐乳加水又加盐，有时有得到公会分来的青菜，也是煮成半水。平时当然谈不上茶水点心，当时我们几乎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青人，每天都感到饥肠辘辘。

大约有两三个月时间，我们在这小屋集中精神学习理论，也研究学习为什么要搞武装斗争，为什么要搞民族工作等。主讲者主要是老谢，讲解者还有传兴、玉兰、文对、佩雄和瑞新等。

参加民族工作

我在凉塘集中学习理论和医药针灸知识的三个月后，就被调派到坤甸，在一华裔群众家住了一个多月，再转到朱如祝(Juluju)。在那里，我遇见金贞，赖百佳和他太太，碧珠，保国等。我印象较深刻的是，在那里经常吃芋头粥，有时芋头坏了也照吃。不久，组织上就派我去搞民族工作了。

我负责的民族工作，可按不同时期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身份化白，生活在印尼土著群众中，了解他们的民情风俗习惯，学讲他们的语言，熟悉地理环境，通过医药卫生福利和劳动生产，促进我们彼此间的友好关系。时间是在 1964 年年尾至 1966 年 4 月间，有近一年半的时间。地点是印尼卡江(Kapuas River)上游的勿里当河的另一小支流 Sg. Yap, 又称双沟月地区。最靠近砂印边界的国内地区是横江板督一带。

第二阶段：全付军事武装，宣传联络接近第二省边界的属于印尼圻内的伊班族群众工作。我记得的长屋有哥罗笔（Golongbit）。这时我们是属于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领导下。这段时间是在1966年5、6月间至1968年4月间，有近两年的时间。

第三阶段：1970年初至1974年初。近四年的时间是在砂劳越第三省的拉浪江中游地区。活动地区是牛麻河尾和卡地拔（Sungai Katibas）河尾。当时，我们是全付武装，并提高警惕地经历着被围剿镇压的艰难环境中开展工作的。

第一阶段：“敢”字当头，摸索着去做

1964年年尾，我接受领导李辉的分派，和丹莉、陈燕、丁山、将来、新泉，从印尼西加的坤甸出发，坐船沿着加里曼丹岛最长的卡江，向上游越的边界地区进发。在实加罗小市镇短暂逗留后，船继续驶进勿里河口的小市镇，那里有十多家印尼华裔在此做小生意。这里有印尼政府乡村的小型行政机关，周围散居着印尼土著民族。我们再坐三小时多的船程，到达双勾月地区。住进当地华族群众赖伯的水上的家，即屋子是建在河边水上。比我们早到半年多的战友小李已在那里迎接我们。

当时我们都穿着便服，带着简单的行装。不过领导上也分配给我们六粒手榴弹，当时我们都未接受军训，不会使用，也不知其危险性，我们把它放进背包里，背上背下。

当时我们的组织领导系统也是怪怪的。我的上级领导是李辉，我是盟组长，我组成员丹莉和新泉。另一组组长是小李，其组员是丁山，陈燕和将来。小李的上级是谁我不清楚。我们这两组共7个人，在没有组织具体指导和联络下，我们两组结合起来进行当地的民族工作这一年多的时间。

那时，只有小李一人会讲伊班话，其余六人连起码的日常用语一句都不会。

我们住进善良、勤劳、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赖伯的一间放杂货的小木屋，靠近河边。赖伯一家生活条件也不很好，最初我们住吃等都由赖伯负担。我和陈燕三几天就去挖木薯，赖伯母每天把剥好的木薯砍成很小很小的丁粒，等米饭快熟时，就把木薯细块参进饭里搅拌，再焖熟它，我们每天都那样子吃，还不时去采野菜来煮。

不过，我们住屋的那条河非常多鱼。我们每天早上起身后，就分工合作，有的洗衣、有的钓鱼、有的捉鱼、杀鱼、煎鱼。浮游在河面上，五六寸长的各种小鱼成群结队。我们一抛鱼饵就上钓得兴高采烈，不亦乐乎。不过，这些小鱼有许多骨刺，我们得把它切花切块，再拿来煎炸，每餐我们都有一大盘鱼吃。更有趣的是赖伯母一边煮菜，一边在厨房地板的一个缺口的洞里，放鱼饵下到屋下的河里，竟然钓上一条“加罗鱼”，她三几下子就快手快脚地杀好鱼，煎炸好后，我们马上就开饭了。

我们在山口洋时，个个饿得瘦瘦的。在这里除了木薯饭任你吃，还有那么多鱼吃，我们很快个个都吃胖了，我整个脸部都胖嘟嘟起来呢！

我很常和丁山划小舟去钓鱼，每次都可钓到一两桶鱼回来呢！群众很常把小鱼和一种不知名的野菜做为煮鱼配料，一起放进锅里煮得烂烂，连小鱼骨头都可吞吃下，但鱼肉竟不会散掉。我们吃得津津有味，整大锅都吃得清光。

我们的住屋很小，是建在临近河边的斜坡上，走出房间门口几步就是河边。我们在铺有几块木板的河边钓鱼、杀鱼、洗衣、吃饭、聊天。我们都用手抓饭吃，吃好了盘碗就顺手在河水中清洗后收藏起来。在这穷乡僻野，我们和大自然为伍、一心一意只为接近和团结这些土著群众，希望他们能成为我们有力的支柱，希望将这里开辟成我们的大后方。

组织上派我们去进行边界的民族工作，并设法打通一条回砂劳越进国内的交通线。我们没有得到领导上任何具体指导，就“敢”字当

头，奔赴这偏远的异国的民族区，在这交通不便，远离城镇的地区里扎下根来。

这条支流沿岸附近有十多座长屋，分散的稻芭都有小“兰高”（小茅屋），它们穿插在相当阔宽的子青芭，丛林和原始森林边沿。土著群众们都过着刀耕火种，向大自然要粮的生活，他们没有缺乏土地的问题，只是生产力低。他们几乎都是文盲，那里没有道路、学校。我们也看不到货币，他们之间或和华族小商人之间都是物物交换。印尼华裔小商人从小市镇购买了油、盐、日常用品、五金药品等，背到长屋向伊班族群众换米粮、树胶或其他土产等。因群众没有受到科学文化的熏陶，几乎与世隔绝，在宗教信仰上很迷信鬼神，我们必须绝对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有时表现急躁，心胸狭窄，对仇恨的人会下毒药。听说毒药是取自鱼藤或一种毒树的汁，他们也是用这种毒汁来毒鱼。这里伊班族群，可从华族小商人处购买衣服布匹，他们有穿衣御寒防晒，不过老妇人通常赤着上身，下面围条沙龙而已。

这些伊班族群，把我们看成从砂劳越来的政治难民。他们最初是好奇的，因我们是拥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华族青年男女。我们尊重他们，协助他们砍芭种稻等一切农活，又帮他们针灸，按摩医病。我们的态度诚恳，彬彬有礼，有表现吃苦耐劳，精神面貌又是热情、朝气蓬勃。我们在卫生医疗服务和其他劳动福利上对他们的帮助，他们非常感激，有的还视我们为救命恩人似的，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友好的。

和赖伯一起上长屋

赖伯一家都很善良、正直和有正义感的，对我们这批青年男女无限关怀，也无私的支援。想一想，要喂饱我们这七位胃口奇佳的年青人，就是不简单的负担，但他们没有怪怨，反而跟随我们一起吃木薯饭。我们虽入世未深，但也能体谅赖伯生活的艰辛，大家都想出点力分担这生活担子。

赖伯三星期左右总要背上一些药品上长屋去对换米粮，他背的都是普通药品，如三脚标止痛片、十灵丹等之类。丹莉很不会走山路，

身体也欠佳，经常留在家里。通常是小李、我、将来、丁山、新泉、陈燕轮流跟随赖伯上长屋。

我们划一艘长舟到河边群众家渡头上岸，再走好长一段路才会到达长屋。赖伯在前面头引路，丁山长得高大，所以经常帮赖伯背药箱，这药箱是用两个长珍接起来的，新泉和将来也轮流背。我和陈燕得到特别优待，只在后面跟随着。

那一带土著群众有足够的米粮，有些勤劳的群众一年的收成三年吃不完呢！群众的住屋用半间当谷仓，暖烘烘的谷仓上面铺上草席，我们就睡在上面。我们每次上长屋都有整十天，可以跑整十座长屋，一座过一座地做生意。我记得一瓶十灵丹可对换四罐米，他们用米谷来对换糖、盐、药品、咖啡粉等。我和陈燕一到达长屋，就义务为长屋居民针灸，他们很欢迎高兴，每次也会回报我们几罐米。当群众知道当晚我们会到来时，有的还会杀鸡，煮好等我们，若有猎到山猪，还会烧烤好等我们去吃呢！所以这一阶段的民族区工作，我们不会饿肚子，反而还吃得不错呢！

我们沿着河岸走，每座长屋的居民都会帮我们收集到的米粮背到我们最初上岸的那座长屋处，方便到时我们集中后用船运载回去。从河尾到河口，我们每次收集可能有两大麻袋吧！

每晚我们留宿一座长屋。我和陈燕一到达长屋，几乎没有半点空闲，居民已在排队等我们的针灸。我们忙着针头、针腰、针脚。其实我们也只曾学几个月的针灸，对穴位也还探摸不很准，但我们不断摸索，很酸麻就意味着接近穴位，再参考穴位画图。针灸后，每个人再给两粒止痛片。隔天问他们，他们几乎都说不痛了，好了。当时我们还不会听他们的语言，只能笑嘻嘻地比手划脚。

等待赖伯补充足够药品和其他货品后，我们再度出发去长屋，一路上我们帮他背药箱和米粮，否则他也要请土著帮他背。而我们也在这条件下，上长屋去接触伊班族群，学习伊班语，了解他们的风俗民情，熟悉那里的地理环境，地形和山路，并且也都认识了那十多座长屋的居民。

更深入群众，上长屋和群众住在一起

在赖伯家住了好几个月，我们集体讨论的结果，决定更深入到民族群众中去；另一方面，我们都没有钱，日常必需品也还得买，我们也想搞点经济收入，也要准备存粮。我们必须自力更生，谋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其实，我们有时间就为群众种稻，种木薯、瓜菜，和割稻等，男生也跟去打猎，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由于将来必须帮赖伯工作，丹莉身体不好，留下负责当地工作，其余我们五人则搬到长屋去住。我们决定去割树胶，小李和新泉去割小李认的义父的树胶，我和丁山割另一家，陈燕负责收集胶汁。

我是在海口市椰园长大的，椰园里一切粗细生活我都能干得，但我和其他战友一样，不曾摸过胶刀。我们又是“敢”字当头，开始一刀一刀学割胶。学收集胶汁，渗进胶醋，制成胶片。天未亮就得起身离开暖和的被窝。我割的胶园就在伊班墓上旁边，丁山还特意讲鬼故事来考验我，还绘声绘影地说刚下葬不久的那个伊班小孩的鬼魂凌晨还拉过他的脚，害我怕得要命。但我们是革命青年，要破除迷信，要磨练意志，还有那远大的理想，我们仍互相鼓励，割树胶去！

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我和陈燕又搬进一个寡妇的小屋里住。她没有孩子，非常疼惜我们，我们走到那里，她都跟随着，如影相随，怕我们被人欺负。我们的到来，好像天下掉下来给她的女儿一样。

我们跟这寡妇去种稻，采稻，除草等做农田工作。傍晚时，我和陈燕先赶回家，一回到家就拿谷来舂米，筛好后，储存起来。这老妈妈一回到家就去煮饭，再去河里捕捞小鱼、小虾、烧煮“班苏”给我们配饭。“班苏”是把小鱼虾放进竹筒里，加进水，盐和野菜或木薯叶，以后把竹筒放在火堆旁上烧煮至熟为止。

听说那地区的伊班群众也很怪，几乎多数随身带着毒药，尤其是过达雅年期间，去拜年时，随时会下毒药给有私人怨恨者食用。老妈妈交代我们不可以吃摆在长屋客厅里的食物，她会带我们进去长屋里面

房间里吃饭，说这来得安全，因谁下毒很快就会暴露，而在客厅里吃了食物中毒，难于追究谁是受害者。所以，没有老妈妈叫我们吃，我们都不敢吃，没有她带领，我们也不敢随便走动。

在双勾月为群众医病的日子

在这段时间，我们才较有充分的时间学伊班话。在晚间，我们从日常用语学起。因之前，我们上长屋针灸时，居民排着队到来，我们一个接一个的针灸，根本没有时间去听和学讲。

附近长屋一旦有人生病，都会赶来找我们去帮助。有一次有个小孩子病急了，我们赶了四个钟头的山路，到达时，发觉那小孩子已经去世了。

这双勾月地区的伊班族群每年砍芭种山稻，木薯，同时种上瓜类如黄瓜、茄子、白胡、芋头、莽头、金瓜、毛瓜、野芥菜和野苋菜。种稻时，是整座长屋轮流为每一家稻芭耕种，那家芭主有时要杀猪煮好饭菜招待协助者。

对于针灸和卫生护理，我们只能医小毛病，如发烧、头痛、泻肚子。群众较严重的刀伤，跌伤或妇女难产，我们也无能为力。甘榜长屋有他们的接生婆，而我们因语言沟通的困难，无法深入了解，知道也不多。

我们去河边洗刷冲凉时，同时也顺手帮群众提取食水回来。河水非常清洁，我们可以看透在河床上的岩石和细沙。那里没有铁桶，只有用老了的白胡，其外壳已坚硬，挖空其瓜肉种子。在顶端两边钻两个洞，然后绑上用藤编织的圈子就可以用了。一个白胡可装上三、四公斤的水。我们当时年青，身段灵活，可以双手各提一壶，飞步踏上独木梯子。这梯子是一根树桐，分砍几个缺口当阶梯的。厨房地土，排着整排这样的水壶。

当年我们这“土医生”怎样医治“毛丹”呢？（毛丹其实是一种病毒，全身发高烧，并会出红疹，医治太慢，会有生命危险）。我们

首先宰杀一只黑毛鸡，把鸡毛浸在烧水里，用鸡毛从头至脚全身抹擦，以后还要用去壳的熟鸡蛋全身滚推。若发现皮肤上出现红点，我们用粗盐去压按，以后再用“佬叶”捶烂，用布包起来全身至上下的推擦。最后，我们再用“四方草”，其茎呈四方形，会开突刺小花的，取其汁加入洗米水，让病人喝下，据说是清凉去毒。我们也很兴奋，病人终于退烧慢慢痊愈了。

遇到有小孩子一直泻肚子，我们就去采青青的番石榴，捶烂煲水后给小孩喝，竟然也有效。我们也学会了运用青草药为群众治病。

在这远离文明社会的偏僻地带，我们上长屋时，内心也有点怕怕的。当你看到在楼梯口吊着越多的人头骨，就说明这家主人杀人多，是英雄。清早出发工作时，听到不祥的鸟啼叫声，他们一定回头，今天不上工了。他们有些有猎枪和子弹，他们也用标枪、装箭和设陷阱。他们建的小茅屋几乎都没有铁钉，而是用藤来绑。他们的锄头，锅等五金品是和华族小商人交换的，但也有人会自己打巴冷刀。

这里记得有一件趣事。我们跟随赖伯去长屋卖药，针灸时，睡在长屋内的客厅，我和陈燕睡在一张蚊帐内。半夜，陈燕突然惊醒，发觉有人伸手进来摸她的脚，她害怕的大声惊叫，吓走了那位土著男生。按当时伊班人习俗，那男生若伸手进蚊帐触摸女生，女的没有抗拒，就表示接受那男生进来和她一起睡觉。事件发生后，赖伯就去找那屋长论理，究竟是那一位去作弄他的女儿。赖伯在那一带长屋中享有一定威望，那屋长表示很不安地，不断向我们表示歉意，这也是唯一的一次被骚扰吧！

惊闻 930 事件回坤甸联络回部队

我们逗留在这双勾月地区进行民族工作的一年多日子里，组织上没有派人来联系指导，我们也没有打通从印尼边界进砂劳越国内的交通线。我们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组织刊物，不了解外界的讯息。1965年9月30日，印尼事件后好久，我们才从华族群众处传来很不明朗的消息，也传来令人震惊的印尼政府不只取消了对抗大马，而且可能反转

过来围剿我们的消息。

印军几十年来不曾到这一带巡逻，后来竟也派一队士兵来巡逻和了解我们的活动情况。印军撤退后不久，集体讨论后，大家委派我一人去坤甸找组织领导。我到了坤甸，找到公会，发觉领导人都不见了。遇见了保国，他竟说，我们的人员都已撤进边界了，尤其是双空一带，你还回来做什么？我不得已，只好单身只影地又搭船又走山路地倒回双勾月地区和同志们相聚。

1966年3、4月间，组织上终于派保林和华林，驾着挂尾船来接我们归队。这时，我们才知道砂劳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已经成立，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和第二支队都已成立了。我们将回归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的大营地。

我们匆匆忙忙收拾好离开双勾月民族地区。群众知道我们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再倒回来而流泪难过，群众痛哭难分难舍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而最令我耿耿于怀的是，我们没有机会向老妈妈说明原委地告别。当年，我和陈燕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两姐妹，后来又似在空气中蒸发掉了，不知道她老人家想得开吗？她晚年生活又是怎样渡过呢？

可能这民族区距离边界较远，也可能我们民族工作干部太少了，我们最终放掉这一阵地，不曾回去过。

关于我在印尼双勾月民族区工作的情节，我的老友小李在他的《缅怀在印尼边区的民族工作》一文中有生动的记述，大家可以参阅。

第二阶段：武装军人的身份，宣传动员伊班群众

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于1965年12月12日成立。主持成立的有蔡瑞新副政委、世杰支队长、李鸿彬支队长等。

1966年4月底，在我们回到第二支队前，支队营地已建好各营房，做好许多准备。我们一行人回到支队营地后几天就开始接受军事训练和政训。

我们的军事训练是由维忠负责。我们小队的正队长是维忠，副队长是大虎，我担任盟组长。军训内容是整队形，操练，使用武器、爬行、爬单杆、夜行军、搞突击，包括全付武装训练，记忆中是好严格的训练，时间大约有十几天吧！

人民军第二支队算是较正规的游击队，备有两支中型机关枪，男队员是拿步枪或来福枪，女队员是拿 Sten 枪，都配有子弹。

军政训不久后，我们就离开第二支队营地，开去接近第二省的印尼边界进行民族工作，活动范围是近砂劳越边界的横江、板督一带。

边区民族工作兼搞粮备战

当时我们和印尼的军事统战工作还未真正决裂，我们还有许多同志还在印尼军领导的连队里。我们还能从统战部同志那里搞来一些米，罐头、盐和烟。我们民族工作者必须到群众区或长屋背回这些物质，尤其是盐，我们通常要负重行军一整天回到二支队，更要设立藏粮藏盐的秘密地点。

我们往返民族区，主要为备军粮而做出许多苦力工作。比如背盐，每一块四四方方，硬梆梆的有半公斤重。背二、三十公斤的盐比背二、三十公斤的米难背多了。盐很沉重，我们都感到很辛苦。藏粮点的同志每晚都要烧火来熏架上的盐块，因盐块一潮湿，就会化水溶解。

“930”事件后，印尼右派军人还在捕杀印共人员，还未腾出军力来对付我们，此时在民族区公开活动，我们是全付武装的，穿军装，背军包吊带，我拿 sten 枪，还配有手榴弹。我们上长屋宣传时，是公然表明身份，我们是反对大马政权，我们要国家的真正自治独立。他们当时也表态说支持我们，不满被外来马来人统治。

当时领导干部有蔡瑞新，杨平（杨传兴），陈世杰。这一次总算有人直接领导我们了。

维忠、大虎、大山都会讲伊班话，我也已能讲简单的会话了。我们还是通过福利工作，如协助砍芭种稻，还有义务的针灸治病，来促进和民众的友好关系。同时，也不断宣传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总有一天我们要打回国内，争取国家的独立。

在宣传上，我们受语言的限制，但若我们能讲得深刻一点，我想他们也听不懂和理解体会不到。他们感觉不到什么是剥削和压迫，只要他们肯吃苦勤劳，高山森林任他们砍伐去种植，他们没有土地问题。他们几乎都是文盲，与世隔绝，过着半原始的生活。在没有遭受利诱，或镇压下，他们和我们保持很友好的关系，对我们是很热情的。

1967年底至1968年初，印军开始在边界地区围剿我们。我们人民军第二支队的大营地生活和自己的生产稻芭难于坚守。我们只能化整为零，分成多支小队分散活动。后来蔡秀明、老黄生等又分派到我这里来，经过重组，蔡秀明担任我队队长，我仍是盟组长。这小队只有我一个女的。

敌情吃紧时，我们避免大白天上长屋、稻芭公开活动，多在森林地带活动。当时印军的军事活动并不多，我们在森林里活动还有相对自由的主动权。群众基本上还是同情支持我们，我们有时还可以和他们一起砍芭种稻。

1968年年头，队员又增加罗卜，高金兰（蔡秀明的爱人）。这时马印联合围剿情况日益紧张，我和罗管严、韩必亚、月伦（都已牺牲）负责护送国内和印圻的第二支同志到马罗河畔的北加人民军总部和第三支的营地接受政军训，我们往返第二支和第三支好几次。这些路途并不远，大概两三天行程而已，所以不必一路上设藏粮点。

我们在人民军第二支队和第三支队的中间地带设立一个交通联络站，除了背和储蓄粮食，也兼搞民族工作。并专门护送二支队和二省来的部分同志到人民军第三支队接受整训。

这交通工作看似简单，但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务保沿途同志们的人身安全，行军路途也是辛苦的。通常凌晨四点左右就得开步走，需涉走一段冰冷的山溪水路，再绕过一座长屋，到达一座很高的山脚下，以后要争取时间马不停蹄地一步一步攀登这座又高又陡的山。走到中午才到达山顶，稍微休息才开始下山。当天还需继续攀登到另一座高山的半山腰处，才能停下来扎营过夜。隔天我们继续行军一整天，到达预定地点，我们把护送的人员交托给第三支队的交通员接邻过去，我们终于完成任务了。接下来我们三几人的交通组人员开始回头返回二支。

这一带群众种有许多果树，我们就会采些果子到半山腰处过夜。没有敌情时刻，我们心情轻松，视野开阔，远眺那重重叠叠的雄山峻岭，四面山头，轻雾萦绕，四周景色如此多娇，我们心情真愉快。在山顶上扎营后，我们甚至可以望到印尼那边 Lanjak 的鱼湖，群众在湖面上的渔船里照射出来的灯光一闪一闪的，真像流萤，闪闪烁烁，这样更美丽的晚景，现在还留在我的脑海里。记得那时刻，广源就会拿出他的口琴轻轻的吹。广源和我同龄，都是异乡奔驰人，大家似乎都坠入忆乡曲中，这时后最会想念自己的亲人和家乡。

接近群众区的子青芭，蚊子特别多，入夜后，我们赶紧要挂起自己的小蚊帐，我们躲在蚊帐里，这蚊帐也是当被盖了。这蚊帐其实是一条长沙龙，我们 L 形缝死了，在一头的顶端绑上绳子，提高挂起来，使不会覆盖在我们的脸上，一面使空气流通些，一面不会使蚊子隔着布咬叮到。

1968年3、4月间，我们护送林辉等过去第三支队时，正是榴莲盛产季节。我们还背了很多榴莲给他们吃呢！

此时期，我们第二支队只留下一小组人员。我们接到指示，要我们去打麻雀战，以转移敌兵视线和牵制力量。

在第三支队

我在人民军第三支队的军事营地，马罗河畔的日子，顺此一提。

我在第二支队打了骚扰战后，竟病倒了，一直咳嗽不止，当时敌情又紧张，因此领导决定把我转移到马罗河畔的人民军总部第三支队营地，希望我能在较安定环境下疗养身体，当时卫生员竟诊断我可能是患上肺劳病。慎重起见，叫我吃和睡都要隔离。

我的病情好转后，也参与抢收工作。在营地也做编草席，磨米谷等工作。当时人民军第二支队正副支队长和队员 40 多人也正在三支接受军政训练。我们接着投入建营房，准备军粮，狩猎等工作。当时我们曾捕捉整千公斤大鱼，被煎出的鱼油竟然有几个大乌油桶呢。记得当年稻谷也丰收，我们也种了许多南瓜（金瓜），我曾数过一棵竟然结了二十多粒大金瓜。我们拿金瓜来做金瓜糕，蒸整晚，像年糕一样耐存。我们又花相当多时间排练文娱节目，准备迎接国内第三省同志们的到来。

第三省由老洪带领的 40 多位新同志到达不久，我和新同志们参加种山稻和木薯。但是在 10 月 1 日，我们营地和附近稻芭面对印军的空军轰炸。10 月 4 日，印尼陆军教导团（红帽兵）进攻我们较下游的旧营地（11.1 营地）营地。这次，印军是来势凶凶，不断向马罗河上游挺进。

鉴于形势变化，领导上决定，第二支队队员分散进国内，人民军总部主任田石明也率领一批武配备较好的去第二省边区。洪副主任和铁军等也率领一批老同志和新同志回三省搞地方武装和民族工作去了。第三支队当时还留下近百人吧！

留在第三支的同志后来又再分几批进第三省和第二省国内去了。我在 1970 年初（前后逗留在马罗河三支一年半左右）也被派回第三省国内。

第三阶段：第三省国内的民族工作

在我进第三省时，敌我斗争已日益尖锐，在马印联合围剿下，边界的砂印民族在敌军血腥镇压和利诱下，部分土著群众动摇，出卖我

们，同志们面临严重的考验。1970年初，已有好些同志被民防队袭击流血牺牲。

西部在印尼边界双空和巴拔山活动的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已经全军覆没，叶、杨也在1969年3月25日英勇牺牲。

在第三支的一年多日子里，我所熟悉的战友，在第二支和进第三省国内，在民族区竟然牺牲了那么多战友。他们有贯长虹、苏哈里、海洋、李小峰、赵大山、敢斗、鲁江、周天来、黄永发，纪平、耶谷、丁友如、明思、必公、铁军、新民、小叶、工青、罗平等。

在中游武工队

在第三省中游地区搞民族工作，我们已提高警惕，我们中游武工队全都以全副武装形式进行宣传工作。我最初活动地区是卡地拔河尾和Kaya河。Kaya河口有座长屋，我们经常夜晚划船上长屋去。我主要负责针灸，我一个人可从傍晚6点一直针到半夜十二点。这长屋居民对我们很支持和热情。之前，老吴、南章等已在那里宣传活动三几年了。

我身上几乎每次都带整千零吉，叫群众为我们购买粮食、米、油、盐、药品，有时也买几罐沙丁鱼。长屋居民是去加拿逸购买粮食，我针灸至半夜，群众还会为我们准备食物充饥。以后，我们和他们结了帐。把粮食放进向群众借来的长舟里，我们几位，有小青、生强、亚福、南章等，把船划到河尾。靠岸后，我们把船里的粮食物质背到一段距离的一个住点里。隔天我们还得花一天一夜的时间把粮食藏起来。那艘船以后群众自己会去取回。

后来我又被调派到牛麻河口那一带（以前我们第三省同志上边区时经过的地方）工作。这时，我的伊班话较流利了。当时一起工作的有另一位小李（李家恩）、邱平、振东、红武、小雄、勇战等许多年青力壮的新兵，他们都很吃苦，肯背重，振东和勇战常帮助我背重。我上长屋主要工作还是针灸。我们有时召集长屋的积极青年7、8人到芭里召开座谈会，我们宣传我们是什么军队，为什么反大马等。

牛麻伏击战

1970年8月27日中游武工队在加拿逸牛麻河伏击敌人巡逻兵船。据当局报导，打死他们兵士12名，打伤3名。我们缴获轻机关枪弹盒三条，子弹75发，冲锋枪子弹盒10条，子弹350发，猎枪1把，其子弹25发，打坏敌兵挂尾车40马力的一架。

敌兵反过来镇压很厉害。军方不断用迫击炮轰炸长屋附近森林，沿着河岸山垅两旁和山垅尾狂炸。大树都被炸断倒下。我们后来去巡视，炸开的洞，我们可以在里面游泳呢，若真的被炸到，那可真的是粉身粹骨，尸体也找不到。但是他就是炸不到我们。我们驻扎在相当距离的住点。听到的声音还是非常震动，像是地动山摇。长屋群众都表示非常害怕，大喊“mati咯”。

长屋内只要有少数几个坏蛋，就会很大威胁我们的生命。好的群众会把敌情和坏的群众转告我们。但有的群众也会有意或无意地把我们行动的情况透露出去给民防队知道。敌情紧，敌兵来时，好的群众只敢把挖好的木薯放在稻芭边，通知我们快快躲避。

中游的民族区的群众完全不能给我们经济的支援。我们距离华区很远，物资来源难，米粮都要限制吃。初到民族区可以和群众一起劳动，我们进行医疗服务时，他们也会回报米粮。后期我们不能公开在民族区活动。只能在森林里生活，我们辛苦地背来的粮食藏好，经常会给山猪破坏掉，还有的被有经验的敌兵民防队发现而破坏。我们后来在藏粮点用上一种大叶裸植物，它容易生长，也能阻挡山猪的破坏。

在民族区生活几乎都是吃坏米，每半年左右我们去藏粮点检查，很常是发现铁桶破洞漏进水，虽然有塑胶布包藏，因经验不足米很常发霉，我们只能背回来吃坏米，再藏进新米。这是我们长期不断要做的例常事务工作。

接着我们也面对敌兵的镇压，伊班群众不大敢支持，有个别人

反而为了得到金钱而出卖我们战友。

我在第三省活动所看到的民族和第二省边区还有很大不同。第二省边区的长屋居民由于交通不便，青年男女很多还在长屋。第三省的长屋青年男女好多都出外工作，也有受小学文化教育。

回顾

我认为最初我们在印尼境内进行民族工作是没有错的，我们必须在那里能生存下来，有个立足点，以后才能创造条件打回国内来。在反围剿斗争中，需要周旋后退，也有个大后方。但由于他们处在半原始半封建社会、文化和政治意识也很低落。没有利诱、镇压，他们会支持我们的。少数参加民防队，认为有工钱拿就好了，我以为和他们的民族性有关。在第三省中游，地区极少数年青人有受小学教育，边界一带几乎都是文盲，没有政治主见，左右摇摆不定，他们多从本身利益出发。我们帮助他们，他们听我们的，政府宣传别的，他们也会听取他们的。后期我在中游活动，出钱交代他们代购粮食，取粮时，我们一定要预先在来路的前头埋伏，侦察他们是否同时带兵来打我们，因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先例，血的教训使我们每次不得不有高度警戒。

为什么我们在民族区艰苦生活，在生产劳动，医疗卫生等方面帮助他们。初期他们对我们无限热情友好，但在敌兵镇压、金钱利诱下，少数坏蛋、民防队就出卖我们，甚至带兵打我们呢？使我们难于立足，希望朋友们能进一步探索研究。

我期望伊班族同胞能在科技全球化时代，接受提高科学文化教育，开阔视野，提升政治意识。要求民族平等，反对种族主义，为增进各民族的友好关系，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升各民族的生活素质，清除贫穷，以实现一个更公平、自由、民主和繁荣的社会，让我们各民族的子孙后代，也都一起为之并肩奋斗！

2006年7月7日

OMT 民族工作的片段

李红口述
江泓整理



1969年6月，OYA河武工队成立，我们就准备北上进入民族区开展工作。当时我们一组人有纪平（队长），林猛（林庆端辅导员）、白鸽、青松及我。

我们是以华区为基地开展混合区民族区工作，以致逐步开展深入民族区工作。

在未启程进混合区之前，我跟白鸽在伊班人带路下，在比带后段路走一趟。我们在黑夜的晚上走伊班群众的山路。平常从比带江边走到拉让江垄直到 Bunau 河尾，快的人只要走 2—3 个小时，我们却走了三个晚上。从城市刚下乡来的小姐同志走得像蜗牛一样慢，特别是青松“小姐”，不习惯走乡村的羊肠小径，更不习惯摸黑走路，走起路来跌跌撞撞，还要纪平（蔡布家，第一省海口区人）队长牵着一步步走。

到了 Bunau 河靠近第一座长屋驻扎下来。不久后，尚武（莫荣光）、家妮（梁莲花）、护士（叶天星）也陆续从华区进来。几天后，白鸽与尚武（莫荣光）被安排去长屋了解情况。他们去后超过规定时间没有归队，纪平和我武装去探消息才知道他们被捕了。

得到上级指示，收拾起悲伤的心，我们一行三男三女向深入民族区进发。花了约三个星期的时间，我们终于到达乌也河。活动了几次，那天我们三个男同志来到 OYA 河尾第二座长屋下游一带，在一个稻芭“朗高”停下。傍晚近 6 时，稻芭主人来打猎遇上了我们。这个伊班人离此步行约一小时的乌也河边住做点小买卖的，他是第一次会见我们北加人民军的。他表现很热情，他叫我们不要走，可在这“朗高”住下，可以自己随意去拔木薯。约 10 点，纪平、林猛和我三个跟他到小店处，他煮饭给我们吃。他的妻子月经不来肚子痛，我帮她针灸治病。

跟他们宣传后，感觉他很热情，又说愿意提供各种需要的帮忙。於是纪平队长就叫他下 Sekuau 华人小店帮助去购粮。他叫我们不要走，第二天下午 2—3 点就会回到。

倒回稻芭“朗高”已有清晨 2 点多了，林猛与纪平因疲劳很快就进入梦乡，我却转侧不眠。4 点多我就起身炊食，5 点要煮好早餐，正打算叫同志们起身，突然感觉有东西从外边抛来，只听到“嘭”一声，我就不省人事了。顷刻间我苏醒过来，我喊到“敌人来袭击了！”接着我就滚到“朗高”后面。林猛随着喊声移向我这边来，他惊讶不解地问“什么事？什么事？……”我发觉自己前额和右颈被手榴弹片炸伤，感觉麻痛，头大大的，脸部正流着血。林猛胸部和下腹部也受伤，血流到脚下，他说脚不大会走。子弹还在不断地射向“朗高”，我喊“纪平！纪平！”但没有反应。乘着天黑，我拖着林猛移向后面。

不远处是一条的小河。下了河，走一段，爬上山，又翻下另一条河。这条河是我们走过的，我认了出来。再爬上对面山，就是我们的住点。

回到点里，叶天星等三位女同志紧张地帮我们清洗和包扎。事先由于认为女同志难以背重，医药包全交给男同志背，结果被敌袭击了都没能带走。在此节骨眼要用到的药品却没有，真令人焦急。卫生员只能用盐水来洗涤和消毒，用眼药膏涂伤口。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帮我们缝合伤口。

在我们撤回之后，枪声还在不断的传来。但已转向另一个方向了，显然纪平为了掩护同志们，有意地把敌人引向另一方向去。我们听到纪平的 sten 枪一发一发的打，诚然为了不浪费子弹，枪声不止，直到下午 2 点，大地才恢复平静。我们意识到纪平队长已英勇地牺牲了。

遭到敌兵袭击后，敌兵还到周围附近去巡逻和搜索，我们从住点看到他们站在山沟口张望，我们的住点险些被他们割到，幸好只从路口前面经过，我们才得以安全保存下来。

经过整个月的疗养，我们逐渐地痊愈了。我痊愈得较快，还跟天星走一个多小时的粮点去背粮，以解决粮食的短缺。

我们俩基本上痊愈，可以走了，我们就转回华区去。

进民族区时有老同志带，有人割路当尖兵，自己没有注意去学用地图指南针和学会割路，甚至纪平提醒我们要注意地形和学开路时也毫不在意。现在，倒回时就辛苦了。我硬着头皮当起尖兵来，还好叶天星是丹章公集乡村人，她虽然是个护士，但却像个男子汉，得到她的配合与帮助，我们这一组人才能摸索前进。我们要同志们先停下来休息，天星跟我先慢慢去侦察，找到旧路才回头带同志们走。混合民族区的山丘地带分叉多暗堑看不清，有时要找好久才找到。还好进来时半路上对新环境具有新鲜好奇心，当看到一座山头很大，却只有一棵大树鹤立鸡群，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开来，有的同志开玩笑叫这棵树为“风头树”，看到一座山石头很大，形状像母鸡，取名为“母鸡山”。这样倒回路时有助于我认出地形与路线。我们仅用 13 天的时间就割回到比带坡，比进民族区所需要的时间还快了 5 天。

次年 0 河战斗队成立，三明当队长，阿清（江爱华）当副队长，郭锋（郭炳河）当辅导员，我们决定又进民族区开展斗争和工作。

我在前面开路，下午一点左右准确地把队伍带到那个陷害纪平同志的伊班人的茅屋。我们上坏蛋的屋里，发现人不在，我们先把他的猎枪没收了。我们到上一些找别的群众了解，群众都说他有报兵陷害同志，同时知悉那个坏蛋是去喝什么喜酒，傍晚会回。我们在他们的家周围守着，等到 6 点，发现一个妇女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个男子扛架挂尾车。我们迎上去，那个妇女显然感到害怕，并倒退跟丈夫讲“有共产党”。她丈夫说：“不怕，是自己的兄弟”，他并叫其妻子去杀鸡。我们讲：“不吃了，上一次给你骗了！”他矢口不认，说是误会。阿清反驳他说：“我们同志在你的‘朗高’为什么兵会懂？！而且在你报兵之下，造成一个同志牺牲，其他同志受伤！这是证据确凿，无可狡辩的！”这个坏蛋支语搪塞。害人偿命，我们只能被迫处决了他。

处决了伊班坏蛋后，我们 13 人的战斗队伍开到大河下游一些去埋伏，等后敌船上来，开展一场杀敌夺武的战斗。埋伏了 7 天，毫无敌兵的踪影，只好撤离。原来对方有了防备之心，他们用直升机降下学校一带，载了就飞走，不敢从水路上。

伏击战打不成，我们就把队伍开到沐胶(Mukah)河尾去搞民族工作。我们通过宣传、看病和搞福利形式团结教育伊班群众，这一带群众普遍同情支持革命。

有一次，我们在长屋宣传完后，该谈的话也谈了，我跟三明两人兴致勃勃地跳起舞来，意想不到吸引大批群众来围观，有的群众敲锣打鼓，我们跳了狩猎舞，又跳农作物，再来个邀请舞，把大家搞得热烘烘、乐陶陶的。

后来，每到一座长屋，除了宣传、医病，也少不了文娱演出。边区来的房月梅等来民族区后，在她的指导下，文娱搞得更有声有色。

“斯里阿曼”行动之前，在沐胶河尾 2 年活动期间，都没有发生不幸的事件，6、7 座长屋的群众都跟我们友好相处在一起。伊班群众用挂尾车载我们武装同志在大河上上下下。如果实兰沟有兵上来巡逻时，我们就转到 Iran 河去。

Iran 整条河 7、8 座长屋的居民也不错，我们经常去长屋宣传，在此一带活动 2 年也没有发生密报和陷害我同志的事件。有一部分群众参加人联党和国民党的活动，比较有政治意识，也比较支持我们的争取祖国独立的斗争。我们从沐胶河尾到 Iran 河尾，每到一地就积极搞粮，并囤粮以防敌之围剿和不测之困难。

我们在 Iran 活动，消息就很快传到下游去。大概我们在 Iran 河尾活动的第二次，我们突然在中段 Wie 河有一对经营小生意的华族夫妇来接见我们。原来他们听到我们来，就特意驾挂尾车上来（快 2、3 个小时，慢要 6 个小时）主动载我们 10 多位同志下到他们的家。在途

中下大雨，又遇上急流险滩，为了避免船可能翻覆，他俩夫妇不顾危险，跳下水去扶持。到了他们家，又杀鸡又杀猪热情招待我们，又主动帮助我们到 Song 去购粮。他们表现积极热情，我们深为感动，我们都亲昵地叫他为 Ah Guat（热情之意）。

那是我们第一次活动到 Song 河，我们 10 多位人员到 Song 河在拉让江出口进来第二座长屋搞粮。粮到手后我们就向伊班群众借船。上午 8 点多，沿河经过长屋、“朗高”，也有遇到伊班人，到河尾最后一座时已是下午 2 点多了。其实，事后我们才了解到，从 Song 河口到河尾最后一座长屋，沿河有一条小路，只要行走三个半小时就可以到，比船只行程时间更短。我们的行踪与活动早已被敌方掌握。其中潜伏着的危险我们仍蒙在鼓里。

在此长屋歇脚后，我们整理粮食、冲凉、吃饭，又在长屋进行例常的活动。到深夜 11 点半我们才告别群众，准备回到树芭里宿营休息。每个同志手里都亮着手电筒从长屋下来。才走到楼梯下，骤然一阵枪声划破了谧静的夜空，密密麻麻的子弹从对面江扫射过来。同志们很快灭掉火，在黑暗中找隐蔽物。这样我们一小队人员被撤散成三组：炳河带一组、月梅带一组新同志，小群跟我撤在一组。

撤离了火线，我们匆匆地过河，在黑暗中我拿着指南针向着 Iran 方向割去。走到凌晨约三点，忽然发现山坡前面隐约有人群聚着，我以为是失散的同志，正要继续走近，忽然被对方一喊，发现不对劲，紧接着枪声就响了。我们赶紧伏地滚下，下了河边沿着河边疾行，直到天亮。我对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问题出在那里。后来才知道，我过河时指南针湿了变成失灵，故走了几个钟头又倒回原来地方，遇上了敌兵。

擦干了指南针，白天我们继续向着集合点——Iran 河尾割去。下午当局在天空大散传单，胡说什么打到几个共产恐怖分子，……呼吁赶快出来投降……。当晚敌人从桑兵营不断打来迫击炮，又打照明弹，把气氛搞得紧张兮兮的，这是他们搞的惯例心理战。

正常只需要行走一天的路程，我们先后共走了三天，直到第三个晚上大家才全部集合在一起。显然这次我们遭受突击，也吃了不少苦头，还算幸运，没有一个同志牺牲或受伤。

1972年2月，OMT 武工队在乌也路20多、30哩一带开展了一场轰动的斗争一二月行动。

在0河尾我们向群众借了两艘挂尾船，分别由辉武与我二个驾驶，共载有30多个同志，在华联队长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向着实瓜尔（Sekau）方向前进。

实瓜尔一带有几间长屋，Pengulu Iman 住的长屋有50多户人家，其中民防队有24个。我们那次镇压的对象就是 Pengulu Iman，他的言论很反动，说什么共产党最坏，到处杀人放火；又说什么，他全身有山猪牙等做的护身符，是打不死的；胡说什么，共产党的枪“老雅”打他时枪还爆炸……；也唆动敌兵来巡逻；更不能容忍的是，他报兵造成尚武与白鸽的被捕。他统管乌也河、沐胶河和万年烟三条河，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为了更好的保存革命力量，更好的开展工作，抵消恶劣的影响，我们必须镇压敌特分子。

黄昏五点多，我们抵达附近一带，先潜伏起来，我们进一步对行动计划进行讨论和研究。我们等候6点半后，一般伊班人很少出去的时后才开始行动。夜幕低垂，我们移近长屋，部署好后，华联、三明、庄平、华英等7、8个先冲上去。其他同志则在楼下站岗，个个亮着晃动的手电筒，虚张声势一番。对方毫无准备，被我方突击，显得措手不及。我们很快抓到本古鲁·伊曼，要他宣布把所有长屋的枪集中在一起。很快的50多把枪堆在一起，我们只收民防队的20多把枪，其他的则拆散了放在客厅的竹席上，当着长屋居民面前，宣判了伊曼的罪行，然后处决了他。民族宣传员庄平也宣传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我军自卫原则。

当晚我们在学校附近过夜，第二天割向 0 路 30 哩的实打板工部局。

在对敌斗争中，除了军事、政治斗争之外，我们也开展经济斗争。乌也路 30 哩政府工部局有众多各种车辆，我们进行了摧毁，以打击当局的经济。

开展了经济斗争后，我们抽出 10 多个较有战斗力的人员，埋伏在 0 河 30 哩上一点一个急滩转弯处。埋伏 1 星期没有动静。原来当局也有提防我们可能的埋伏，不敢用船上，却用直升机来，结果也是打不上仗。

转眼间，30 多年飞逝而过，当年风风雨雨的民族工作，红红火火的战斗生活，都成为我挥不去的记忆，激励着我，伴随着我走进人生的最后阶段。



稿于 2003 年

上民族区

-学军

1969年初，当时国内反帝反殖力量与边区武装力量顺利会师之后，国内出现一片新的形势。经过长期反帝反殖斗争低潮考验的战友们，这时正以高昂的斗志迎接新的任务。各地区工作逐步恢复，参加斗争的人数也迅速增加，斗争形式正在转变，从非武装形式转入武装斗争形式，从边区斗争转入国内斗争。这时我接到上级通知，要调我去拉让中游民族区参加即刚成立不久的中游武工队工作。

我即将奔赴民族区，心情激动、豪情满怀，我决心要在最艰苦的岗位，为人民事业做出新的贡献。回想1968年，革命组织号召上边区，当时多么响往边区，但由于工作需要，我没有机会去。现在能上边区，求之不得，我感到无比光荣。我知道这是领导和人民对我的信任和重托，为实现崇高的革命理想，我要勇往直前，不怕牺牲地忘我工作。

从接到通知到动身去民族区，前后不过一星期左右。千头万绪，好多事情要处理，这包括办理属下小组调组织关系、告别会、处理刚成立不久的兵工厂工作，回家向家人告别等等。

同志们得知我要上民族区，个个热烈祝贺，人人依依不舍，声声鼓励，场面感人，使我久久无法忘怀，它激励着我在那艰苦的民族区坚持乐观战斗。当时我直接负责有三个小组，分散各区，还有一个直属隐藏小组。

告别会开过，接着是处理复杂的兵工厂工作，兵工厂是设在我们住点约半小时的地方，组长是夺目同志。可是就在我离开华区前夕，夺目同志却突然失踪，他到底去那里？无人知晓。

谈到向家人告别，真不巧，我父亲刚好去古晋探监，看望我二妹。事缘不久前，二妹到古晋去会见我二弟（杨祖国烈士），结果情况突变，二妹被当局逮捕入狱。因而父亲得知消息后，焦急万分，立即赶往古晋，家里只留下小弟，小弟当年才十六岁。

告别之中，最难过的一关是与初恋情人的离别，这一别不知何年何日才能相见。我的爱人是跟我同一隐藏组生活，我们相识不到半年，谈恋爱还不到两个月。那年我已二十八岁了，这么大年纪才第一次遇到自己理想的对象，第一次谈恋爱，我们没有海誓山盟，但却怀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两颗火热的心，心心相印。面对离别时，虽难分难舍，有思想斗争，也很痛苦，但革命理想高于一切，何况先辈有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于是我只好放下儿女私情。

一个星期很快过去，我就要踏上新的征途。但，这时突然接到我小弟被捕的消息。原来政治部得到密报说，我曾回过家，于是就派兵包围我家（这是第三次包围我家），当然政治部人员扑个空，但他们不能无功而返，于是便把我的小弟抓走，在诗巫被关了 28 天后才释放。我这个做大哥的，不能去探望小弟，多么无奈。小弟啊，是大哥“连累”你被捕，很对不起，不知你有被鞭打吗？还有老爸才去古晋探望二妹，回来又要忙着探望小弟，双重打击，老爸受得了吗？家里没有人看管，老爸回来还有家住吗？（小弟被捕后，家也被洗劫一空，老爸回来已无家可归）。老爸真苦命，由于母亲早逝，老爸父兼母职，把五个孩子养大，我和二弟参加反帝反殖斗争，大妹已出嫁，家里只剩下二妹和小弟陪伴老爸。想不到当局一下子把二妹和小弟都抓了，今后老爸怎么过日子？老爸啊，我真对不起你，孩儿不能为您分忧解愁，反而增添您的苦楚。

晚上八点，两位同志送我到码头，临别时大家互相勉励和祝愿。我坐上一条小船向着对面江划去。别了，多年战斗过的拉让江三角洲华区；别了，患难与共的战友；别了，亲爱的家人；别了，亲密的爱人。

小船抵达高乐多，上岸后很快就与上级见了面，大家谈着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多年的战斗友谊。话锋一转，他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夺目同志已为革命牺牲了生命。原来夺目同志那天接到一支从上游转来的新枪，与另一位同志一起研究，不知何故那位同志扣了一下扳机，他们不知道枪膛里装有子弹，而枪口又对准夺目同志，结果九粒弹

沙全部进了夺目的肚子。中弹后，夺目同志表现镇定，他忍着巨痛，他还鼓励那位同志不用怕，设法找医生。在当时条件下不易找到医生，夺目同志用无比坚强的意志力，坚持了十多个小时才断气，就这样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夺目同志的遗体已在高乐多，于是我们一起把夺目的遗体运到墓园安葬。夺目同志是一位好干部，工作认真负责，思想大公无私，为革命作出很多贡献，他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第二天天未亮前，一位同志用挂尾车载我到上游南溪达坡 (Ng. Dap)，两位同志已在江边等我。这时天亮了，我们吃过早餐，准备好行装，正式向民族区挺进。民族区山高路难走，行军吃力，气喘吁吁，经过一整天的翻山越岭，爬山涉水，傍晚时分，终于到达领导机关。洪领导和同志们全副武装站在营地门口迎接我们。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整齐的武装队伍，多么威武，我怀着激动心情，与大家一一握手。

领导机关的营地是设在一个山头上，居高临下，是个理想的营地。大家睡吊床，上面盖一块雨布遮雨，营地中央铺几条木，让大家坐着开会。领导办公的地方，有一张自制桌子，方便审批文件。厨房设在一个角落，煮饭烧水全用木柴，整个营地设备简单，但充满战斗气息，让人耳目一新。

第二天领导发一支士登枪和一副吊带给我，我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战士（这支士登枪一直陪伴我到 1985 年离开队伍为止）。接着领导宣布要我肩负的工作，以及当时有关党的政策、策略和战略方针。洪领导平易近人，他是我高中同学，1962 年领导大组学习，低潮时曾接见过我，我很高兴能在他亲自领导下开展民族区工作。

第三天，领导叫我去附近一个民运工作队体验生活。这个民运工作队除了搞民族工作外，还要负责提供粮食给领导机关和掩护领导机关。交通员把我带到民运队，队长伍乐同志，也是我高中同学，大家相见，喜出望外。从未谋面的伊班族领袖乌榜 (Ubong) 同志也在这个队，彼此热情握手。可惜我还不会讲伊班话，无法交谈。由于我初到民族区，各方面都得从头学起，更要虚心学习。我抓紧难得机会，跟大家去见一次当地群众。所见的这些伊班群众真热情，他们争着送米、送菜。

他们有什么就送什么，以表心意，就像华族群众一样积极支持我们，真使我大开眼界。

经过几天的训练和熟悉民族区生活，领导决定派我们一组五个人去杯河(Sg. Poi)河尾创设新点，并同时到麻正河河尾联络另一组同志。同组的其他四位同志早已习惯民族区生活，而其中一位尤队长是边区老同志，军事经验丰富，还有乌榜同志在伊班群众中德高望重。

出发时，大家都背得很重，只有我的背包最轻，同志们都很照顾和体谅我，使我十分感动。民族区真是不同凡响，高山峻岭，连绵不断，站在山顶，一望无际，风景优美，尽收眼底。每天行军到傍晚，就要准备寻找水源，以便扎营。扎营后，大家分工合作，拿水，找木柴、煮饭、绑吊床。这样的行军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有说有笑，互相鼓励，时间很快过去。

到杯河河尾，我们初步了解了群众情况和周围地形，又继续割向麻正河(Sg. Machan)河尾。这里已有一组同志工作一段时间了，当我们和他们会合后，大家无比高兴。组长伍扎同志是过去相识的中华同学，他乡遇故知，格外亲切。这个组还有两位从城市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伍空(孙剑平)同志和阿胖(李瑞金)同志，他们都适应了民族区的艰苦生活。据反映，这里的伊班群众很不错，积极支持革命绝不逊于华区群众，在这样地方建立相对巩固的据点是有一定的条件的。我们听了很鼓舞，感到民族工作大有前途。

民族区，山峦起伏，林海茫茫，是游击活动的好地方。河里多鱼，美味可口；还有山猪肉，百吃不厌，更有一部分热情的伊班群众可依靠。经过几个月的活动，我已初步适应了民族区的艰苦战斗生活。

在中游民族区战斗了五年，至1974年初“和谈”后，才转到下游华区继续坚持反殖斗争。

02-06-2006

记拉让中游“6·20”事件

—实学



“6.20”事件已经过去九年了，为了缅怀这次意外驳火中牺牲的烈士，对1974年6月20日驳火前后的连续几次事件进行回忆。由于时间太久了，没有备忘录以及本人当时的历史与环境的局限，只能凭记忆进行回顾，差误之处属难免，希望参与这次反“围剿”的同志们能予以纠正和补充。

随着华区开展拥军运动取得积极的效果后，我们民族区1973年也广泛的开展拥军运动。六月初，团结工作队（队长吴昊，辅导员敏战，队员李风、奴里、怀鸽、小青、斗争）与白鸽工作队（队长AC，辅导员斗私，队员小雄、朝东、思晶、许青）临时组成一个宣传队，集合在位于Poi河尾Sg. Bilat的团结工作队营地，积极的培练歌舞。6月20日清晨，正准备进餐时遭政府野战兵袭击。当场造成4位同志牺牲3位同志受轻重伤，这是中游武工队最多数量伤亡的一次。

Poi河尾是中游武工队重点巩固地区之一，这里有反帝反殖的传统。当年亚逊就在Uka河设有据点与英殖民统治对抗。这里的民族是热情纯朴的，是我们争取与立足之地。但是敌对的一方也是极力利诱分化，乃至限制驱赶，因而河尾留下的民众甚少，河中段驻有民防队，长期渗透到河尾，假借拜访、打猎，侦察我方。

团结工作队，除了着重宣传教育群众外，还自己动手与群众一起种了多片木薯园有近万棵，达到粮食方面的半自力更生，既可减轻华区同志的负担，又能密切军民关系。由此时间一长，造成痕迹扩大与麻痹大意，群众中的严密可能在互访中泄露，敌方的窥探，我们没有高度重视。我们的木薯园不仅芭主知道，长屋里有好一些人也知道。六月一日达雅节期间，长屋间的互访也更密切，群众也可能在酒醉后不慎把我军的秘密泄露给他人。更重要的是，自搞拥军运动来，我们加强宣传活动。渗透在民众中的坏份子去告密，敌人肯定在那一带有一股武装力

量。事后，我们了解有民防队上来河尾活动，河中段还有打迫击炮。由于时常有炮轰，我们不以为然。由稻芭到我住点的山顶痕迹也没灭（仅下岭到住点有灭迹），敌方侦察到此一带搜索，十九日还有听到附近有狗吠（事后证明是坏蛋伪装打猎，实质是侦察潜听军情）。当天下午我们还剥树皮做背带，晚上例常练歌舞，这些都可能被附近潜伏的敌兵探听到。

敌兵当晚就在山垄顶住宿，摸清了我们的情况，清晨乘我们吃饭时向我们袭击。第一枪声响，我右眼只觉热血流下，当初还以为同志枪支走火，还顺口骂了一句“他妈的”，紧接着一排子弹扫过来。这时才知道是被敌人袭击了。第一阵火力后，我身旁的队长也受了重伤，斗争（新兵）当场牺牲，接着吴云宜队长（老吴）也中弹牺牲。在这种极不利的情况下，我方又失去了指挥，只好迅速往下坡撤去，接着有二个来不及撤退的李风夫妇又牺牲，朝东同志的小腿被弹片烫伤。队伍拆散成三部分。

一部分同志（二个）很快地就撤到另一站与那里同志联络上，五个同志撤离火线后约半小时，因重伤号已经走不动了，所以就潜伏下来，接着派二个同志去联络点放信求联络。他们等了许久没有联络上，只好回到潜伏点。另一部分三个同志也有重伤员，也在撤离半小时后走不动，也蹲下来。他们留下伤员，二人去集合点联络。由于第一组去放信的同志没有按指定的记号、地点放信，结果后来者找不到。当他们回来时，敌人已在附近四处搜索，又由于地形不熟悉，天黑的缘故不能按原来路线撤回。当他们回来时，敌人已在附近四处搜索，结果没有找到原来一起的重伤员（只在附近粮点寻找，放信，还是找不到失散的战友）他们只好到其他地区去，不久顺利联络上了另一区的同志。

我们一组潜伏的同志，近黄昏时，隐隐约约的听到潜伏点的下方有呻吟和呕吐的声音，经细听，我们估计较可能是自己的同伴。为了辨明这种估计的确实性，我们经过了整夜的潜听后，凌晨派朝东同志摸下去探个究竟。果然不错，是受伤的队长，他的伤势相当严重，处在半昏迷状况，伤口全布满了苍蝇卵。我们当时没有药物，只好用前一天留下

一点盐用冷开水泡成盐水，给伤者洗涤。清洗之后，伤员也较清醒一些。

第二天，同志从集中点回来，没有联络到同志，只好经过旧粮点拿了仅有的一些盘尼西林药片和少许滴露药水。在驳火中，我们损失了所有的背包，个别同志还丢失了枪支吊袋。物质上是极端缺乏，可吃的东西也仅有我吊袋中的两包干粮，约半斤重。记得，还是从华区带上民族区的，有好几年了。一包卫生盐、胶布、吊床、衣裤等必备品全没有了，只能拉一些草铺地上，大地当床，蓝天当被。更为困难的是，两位重伤员都不能行走。山垄上、山脚下都有敌兵巡逻搜索。我们被迫的只能在原地潜伏，同志们只好互相扶持，两包干粮都留给伤员，4位同志只喝着淡淡的盐水充饥。到了第四天傍晚，我们要派二位同志到大粮点去拿粮，可是粮点的进口处有敌兵跑过痕迹，粮点上方的胶布发现有异样，同志们怕被敌人发现或埋上地雷，不敢去取粮（事后证明是被风吹起）他们只好到木薯芭拔点木薯回来。到了第七天，才去较远的粮点拿米回来，第十天伤病员能行走时才转移他地。

从许多方面看，敌人的这次围剿是蓄谋已久的。“6.20”早上七点驳火开始到八点是最激烈。后来一直到下午四点敌人都陆续发冷枪。十点多，还出动了直升机在上空盘旋，招降传单与扩音器同步进行，气氛非常嚣张。从传单看来，他们以为是贝副政委被围住了，因此布兵之密集与广度都是空前的。以 Poi 河尾作为中心，扩展到 Machan 河尾（加拿逸河支流）。随着时间的推移，亦扩展到 Poi 河下游至拉让江边。我们转移过程中，在 Poi 河的两岸发现了不少痕迹。

转移二天后，7月2日，我们委派3位同志出去联络与背粮。出发的时候，同志们半路拉了藤，这可能留下痕迹引起敌人注意。当他们拿了粮食往回走时，发现有敌兵的痕迹，当尖兵的朝东同志通知后面的同志要小心点。可是才跑几步，枪声就响，朝东同志当场中弹牺牲。两个同志由于地形不熟，回不了出发点。他们翻山越岭来到 Machan 河尾，可是那里早有敌情，一时联络不上同志。他们只好继续寻找粮点，但是找到的粮点已搬走了，只剩下空珍和少许盐。几经努力他们终于找

到米粮，也碰上了当地的好群众。群众还为他们递来了两大包饭，真是困难即将过去，坦道即在前头，可是当晚那个新女兵终于支持不住投敌了。

留在点的同志听到枪声和直升机的扩音报导，知道又有同志牺牲，在等候了两天，不见同志归来，也只好转移。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转移到 Machan 一边，那里有较强的领导力；一种主张转移回白鸽工作队活动地区。由于两个同志主张后者，所以，我们只好往江边方向转移。

几天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两个同志去寻找群众了解情况，以备下一步行动。他们傍晚时分才回来，并说路上有敌情，准备第三天再去了解情况。第三天出去后，不见回来。留在点里的同志总是在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是被敌人或坏蛋活捉吗？是伤势恶化晕倒吗？也闪过是否会投敌去？本来敌情不明朗，为何急着要出去？可是很快又觉得自己根据不足，不可以乱怀疑同志，尤其被认为的一个好同志。在焦急的等待两天，点里煮的饭连续两天不知何故到傍晚都馊了。这是何等不祥的预兆，可又想，马列主义者怎能相信什么冥灵感应。但无论如何这不是久留之地。我还留下信件，煮好饭，收拾我的行李，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行李，唯一的一支枪也被他们拿去“了解敌情”了。我挂上我的吊袋包，独自一个人上路。

转移的前一天，我未受伤的一只眼受到枪伤右眼的感染波及，视线变得模糊不清，远近高低距离不调，令我转移特别困难。我靠人民战争中学会的本领与坚强毅力，终于经过二天一夜的努力，在群众的帮助下，联络到了同志。

到了华区后，很快就听到一个群众说：“在加拿逸市有二个出来投诚”。哦！原来是投敌去了，但又怀疑这消息的可靠性，以免冤枉了同志，所以总想进一步调查。可是一时查不出真相，为了预防万一，在离开群众时暗示群众，若有同志来，不要告诉他们我的去向，只能说我已走了，然后把情况秘密告诉我们。

两位投诚者在敌人的安排下，很快又回来那里搞假联络。约四天后群众在后芭里发现有三五个人坐过的痕迹，附近还丢了一个踏扁的饼珍和一个帽舌。再过两天，投敌者把信交给群众，要求转移了的同志到指定时间和地点联络（后证实是敌兵布置，用此联络来活抓或击毙该同志）。由于我们有了警觉，不按他们的方法，而是约他们来到我们指定的地点联络。由于突然的改变，敌兵来不及改变进攻，原本的计划扑空，我们从八点多等到深夜 12 点多，才撤离。但我们行踪却因此暴露，被人跟踪，第二天再约那位曾碰到投诚者的群众来了解情况时，两艘兵船载约二小队兵就在我们前面停着，我们只好转移。

与此同时，对面江的 Bawan 河尾发生驳火，育文与小兰同志牺牲，忠武受伤后也撤到这里，同样有了暴露。两方面的情况加起来，敌方依据此情报集结了约五百士兵在一个不大的范围进行追剿。约一星期之后，据了解敌兵已退，但有家群众说前一晚当兵撤走之后又听见狗吠声，隐约中听到脚步声，很可能敌兵又倒回来。由于这家群众平时表现较怕事，同志们就不大相信。八月初，二位同志准备去一个旧点拿帆布做背包，当同志接近点的时后，发现有敌人进出的痕迹，可是分不清先进去后出，还是先出后进，嘴里还说不知有兵吗？但脚步还是继续前进。突然，前面的同志发现近三、四丈远处有个敌兵正朝着自己射击，一个转身子弹已从腰部贯穿，幸好在同志的协助下撤回点。由于住点离驳火处不远，我们被迫再次转移。

敌人得逞后，连续的利用投诚者四处假联络。九月中在阿拔河，红阳，学坚他们在探明投诚者的联络的真伪时被跟踪群众后尾的敌兵袭击，又牺牲了学勇（李秋儿）同志，学坚也受了伤，还有两个群众受伤，一个牺牲（江土娇）。

我们要唤醒民众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也很不容易。许多民众还安於现状，不少人敢怒不敢言，或同情支持我们，能够参与斗争前线，也只有极少数敌人对我们虎视眈眈，非把我们处于死亡而后快。我们面对强大的压力，我们要生存，要发展需要有多少勇气与毅力。回忆当年，多少烈士为了理想、为了人民幸福的明天，他们敢于牺牲，敢

于创业，敢于斗争的精神是多么的可歌可泣的。那种在枪口下并肩作战、手扶手共同前进的友情是多么崇高的！

同志们，朋友们，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有时平静，有时动荡。用平静年代的心情总难以感受动荡不安年代的斗争。倘若没有昨天的动乱，就不会有今天或往后的安定。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一部社会史。我们要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努力去促进社会更加进步。

稿于 1982 年，2004 年修订



磨不去的记忆

~ 回忆我在麻正(Sg. Machan)河尾的日子

◆山林

在丛林战鼓声中上民族区

在北加里曼丹丛林的战鼓声中，我从诗巫市来到拉让江中游的前哨基地。原本是第三批上边区的我，因边区情势变化，被安排在中途的中游民族区，也就是拉让江中游的一条支流加拿逸河的麻正河(Sg. Machan)尾扎下，参加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中游武工队的工作。

1968年年尾，我在高三会考完才一星期，就依依不舍的离开亲人，离开诗巫，踏上这个完全陌生的征途。几经辗转来到中游的红旗山(Ulu Sg.Dap)，结合边区来的老同志，接受简单的军训。拉让江中游武工队正在筹备成立，1969年1月8日，拉让江中游武工队的主要领导蔡铁军宣委就在桑市附近的牛麻河先行牺牲了。于是我们大部分人员暂时转回华区去整训和准备重上民族区的工作。没多久，我们就带着“铁军一八”（自制枪），步上民族工作岗位。我们的武工队，顾名思义就是，以武装形式去动员民族群众，而一开始就伴随着军事斗争的严峻考验。

麻正河尾这一组，我们最初只有五个人，由交通组有跑山经验的同志送我们到达目的地。就这样，可以说是把我们自己溶入群众中，因为除了枪支和背包是带来的，我们要生存要工作，就要紧密的和群众结合在一起。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简单。我们当中两个会讲伊班语，三个是城市来的知识分子，而我是从 Satu、Dua、Tiga 开始学起，对群众的风俗文化，生活习惯更是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只有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向他们学习。

和群众在一起的日子

我们很顺利的联系上了群众，由于有些群众在之前曾有参加当时的人联党活动，在这个基础上，在屋长的带动下，普遍都热情接待我

们。当然，我们活动还是秘密的，以免遇上外来者，最初我们依靠一些积极的分子，提供我们粮食，同时安排驻扎在他们田芭附近较隐蔽的地方，以便参与群众的生产劳动。我们帮这家劳动三几天，再帮那家劳动三几天，有时我们五个人分成两组，甚至一个人去跟他们劳动。逐步的，只要有条件的长屋我们都去。后来从一座长屋再到另一座长屋，有时在较偏远的地方，我们就在群众的田园郎高与群众同吃、同住。就这样，我们几乎参与群众的劳动生产的全过程，认识了他们的习俗，体验了他们生活作息的酸甜苦辣。

当我们来到民族区时，正值群众准备农耕季节。这里种山稻，还是用刀耕火种的办法。首先得先砍草、藤、小树，然后再砍大树，晒它一两个月，干了，等天晴时才能把树木烧成灰烬，才有肥料，然后播放谷种。过一个多月，就要开始拔一遍草，好让苗长高。等待稻熟，采了后，再搬运回长屋，屯积起来，在需要时拿出来晒干后，再舂或磨谷去壳成米。刀耕火种需要每年换地方，种过的地方要等多年后，才重回旧地再种。因此每年都要做些准备工作，如搭建“郎高”及所需要的材料，有的还需要造船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农耕的间中，也适时种些玉蜀黍、木薯、金瓜、黄瓜、白莆、芋头，及各种菜类与杂粮。农闲时还为农忙时光准备些菜类，腌制鱼、肉和果子，日常也找些野菜，砍 Ubat 芯（类似棕榈科树的树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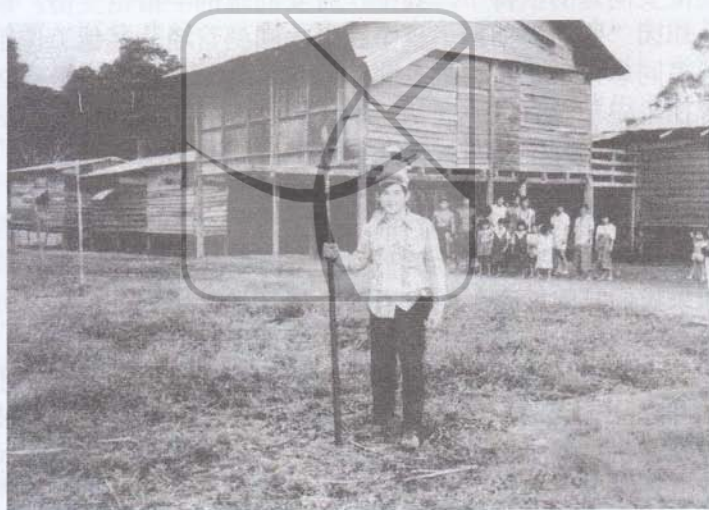
参与群众打猎是一项很开心的活动，一大群人，也可以是一、二十人，男女老少都有。大家带上刀、梭标、猎枪和狗群，浩浩荡荡的往荒山野林里走，狗儿在前面地毯式的搜索，有经验的老猎人倾听着狗儿的吠声就知道猎狗是否已缠上猎物了。如有收获，只要你是代表长屋的一个家庭，即使是小孩，也可以分到一份。当看到一只鼠鹿被逼潜入水中静静的躲着，能不发笑吗？看群众打蝙蝠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晚上七、八点左右，大家举着长长的竹竿，排开站在不会深的河中，向上望，由于蝙蝠一阵阵整群的飞过头顶，大家一起打下，把打落的蝙蝠抓来烧了就吃，也是一种美味的山珍。

劳动是个大考验，我们要赤着脚，在布满棘刺的荒山野岭中，手里挥着刀斧，开荒辟芭。当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上山下

况。砂拉越有广阔的森林，漫长的边界，纵有良好的地利，奈何时不与我。

磨不去的记忆

民族工作多艰难，然而在前进的路上，有长屋善良的 Apai、Indai 真诚的赞赏、呵护着我们，是我毕生难以忘怀的经历。在这里的战斗日日夜夜，有我的青春，有我的成长，有我的伤痛，有我的自豪。那稻浪滚滚，瓜谷飘香和那半山云雾里的“郎高”，那民族区的岁月，……都是我磨不去的记忆。



★ 山林后期活动到东北巴南流域在柏南群众中留影 ★



当年公开政党劳动队在第一省甘榜马来学校帮忙清理工地



1960 年左翼公开政党一人联劳动队为加拿逸明烟长屋伊班同胞筑路



深入甘榜长屋的民族工作。



携儿带女重踏当年民族工作时所走的路



这条民族区的独木桥是我们当年所留下的踪迹



鱼水情姐妹相逢在三十年后的今天

乡，向贫下中农学习的精神在鼓舞着我们。我们有意识的去体验劳动人民的苦难，拿着刀斧的手指，磨出了血泡、手腕，手臂酸痛，脚底被刺刺得起浓水，可谓寸步难行，但大家还是坚持着，在向大自然挑战。群众是非常吃苦的，好在砍芭的劳动一般上是在山脚大家整排一起砍上去，谁砍的速度快，范围砍阔些，弥补了速度慢的人，不至于落在后头。群众很体谅我们，照顾我们，较危险的劳动活不让我们上，二、三人合围的大树，要搭架爬上去砍，我们还真沾不上边。

我们要入乡随俗，群众吃什么，我们也要吃什么，那种渗入“加巴央果”的腌鱼、腌肉，配上伊班山地稻米，在劳动过后，饥肠辘辘，吃起来简直不知饱。但有时也吃群众用陷阱装到的猎物，被箭刺伤逃离死於他处，一星期后才被发现的山猪，已半腐烂且布满苍蝇和生虫的山猪肉，腌制成带有苦味的肉为菜肴。我也尝试过浸在水中的木桐里，有类似蚯蚓的虫，从木桐中一个小洞拉出来生吃。空闲时，我们也学群众在郎高吃从河边捡回来的一种很幼的粉石，当做零食吃，味道淡淡的，只能吃一点而已。当然，榴连飘香的时候，我们就把榴连当饭吃。吃一餐、两餐还可以，第三餐就不能不找米饭吃了。

为群众医病

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忘记要替群众医病，这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之一。群众生活在偏远地区，很难得到什么医疗，大病小病都得忍着苦撑着，我们能替他们医治疾病，他们就最能直接体验到我们是为他们服务的。在“郎高”，在 Dampa（一种接近生产地的短期的小长屋）或是在长屋，每当我们到时，总是围上许多人要求治病，往往是医上大半天，或是晚上到深夜。有时在半路上，遇到就地医治，或是在田芭边，或是在森林里照样针灸治疗。

伊班群众多长期劳累，缺乏营养，又缺乏医药知识，积劳成疾，头痛、腰酸背痛是最常见的。为了生活，得了病还要坚持劳动。有一位妇女只有一只手而已，问她另一只手呢？她说以前那只手被毒蛇咬到，结果伤口腐烂，以至到整个手掌烂到脱掉，可想而知，这过程有多痛苦！一次，长屋有个幼儿病危，我们到时即刻施以急救，然而也回魂

返术。大家眼巴巴的看着他死去，怎不叫人心痛！我们只有尽力而为，尽量减少一些他们的痛苦。一些体质弱的，我们分发些维他命，有时打一些维他命 B、B12 的针也很见效。伤寒止痛片是少不了的，跌打膏药布、风湿膏药布、刀伤药也都经常派上用场。卫生员的小小银针加上艾草也大有作为，扎在病人身上直喊 Akai！Akai！真是又酸又痛或是麻，很是刺激，但可以减轻群众的病痛。总之，人民军的医术不径自走，成了名符其实的“赤脚医生”。

每当卫生员为群众医病时，其他同志往往也不闲着，除了帮忙烧水煮针，招呼病人，我们还带着理发工具，大大小小都来理发。我们还一边宣传我军的宗旨，一边筹集粮食等物质。

老 Apai，老 Indai 像待孩子般痛惜、帮助我们

在和群众相处过程中，有许多美丽的回忆，劳动中 Indai 亲手教我们怎么削藤，编织亚答，编织篮子、草席，Apai 教我们如何把亚答盖上“郎高”。对较年长的我们都尊称他们为父母(Apai, Indai)，而他们也 Anak 长，Anak 短的呼叫着我们。有的 Apai, Indai 很痛惜我们，有什么好吃的，就把我们叫到房间去请我们吃，如山猪肉、榴连，甚至买的饼干。夜晚在郎高或“Dampa”烧烤着香喷喷的玉蜀黍，我们也把农田里木薯制成糕饼，Apai 也捧出刚酿出的糯米酒，边吃边聊天，兴致来的时候，跳上一两支舞。在较后期，由于我们的生活体验，编创了《农作舞》，在流动宣传的文艺演出中，引来了共鸣和欢乐。

初期的时后，我们活动能力很差，靠群众开路、带路、找住点，甚至建“郎高”。一次，我们住在一处子青芭的山顶，周围是厚厚的蒙基草丛，食用背后山边的小溪。一日，傍晚听到山脚下河边传来嘈杂声，后来群众通知说是敌兵在那儿扎营，仔细一听还隐约听到“makan, makan！”原来敌方在用餐。第二天一早，在群众的带领下，我们安全地转移他方了。一次群众带领我们转移过程中，同样赤着脚的我们这些城市佬，像蜗牛似的在后面挪动，好在前后都有护送我们的。休息的时候，前面引路的老屋长有点不耐烦的批评我们说：“我在前面

都去拉肚子三次了，你们都还没到”。他是待孩子般的对待我们，我们都还真的有些敬畏他呢！

不屈的屋长

麻正河尾是拉让江中游武工队的重要据点，进出印尼边区或是联系下游武工队，OMT 武工队多由此出发，它是个粮食补充站，也是中间是休息站，因此不断有许多部队人员来来往往。我们的伊班领袖，Ubong 副总司令也多次到来接触宣传群众，军民相互鼓舞，青少年试着配戴起我们的装备，好不威风，只是还没人真正加入，大概不合时宜吧！

对我们的频繁活动，敌人自然不能不有所行动。可敬的老屋长被捕去坐牢，可他并没有屈服，政治部也无可奈何，约一个多月后又放他回来。长屋中有一位早期曾当过兵的，在我们到来的某一段时间有偷偷去为敌方带路，但毕竟在长屋广大群众的监督下，我们也给予劝告，还不至于太嚣张。群众中也有个别人会多讨些药，在帮我们去购买物质时，有些人会多花些钱，这是落后面。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们还这样地帮助我们

形势不断的演变，从河尾算下去第三座长屋成立了“自卫团”，后来我们的战斗队也去没收过一支自卫团的枪支，还进行一次 Macham 中段的埋伏战，可惜没收获。河尾长屋不时有民防队驻扎在“围剿”期间，就在长屋旁的军营处发射迫击炮，向着河尾和森林。许多个夜晚，听着炮弹从我们宿营地的树梢上，或附近呼啸而过。这时，我们就得起身，隐蔽向大树背后，听着炮弹在附件山头爆炸。曾经有过夜晚每隔一个钟头轰炸一次，扰我清梦，扰我军心。从收音机中也不时听到打死共军的消息，这不正是播给我们听，也播给群众听。还有直升机丢传单的心理战。更什者，在我们驻扎范围，还用战斗机扔过炸弹。在二战过后，砂拉越的土地上，还能听到炸弹声，还真稀罕。我们不能像最初那样跟群众生活在一起了，有些群众也难免会害怕，不敢支持我们。我们也间断性的离开这里到其他地区活动。然而这里仍然像我们的

老家一样，在最困难的时候，被冲散的同志，只要能回到这里，就有办法坚持下去。群众仍然断断续续的支援着我们。米粮难于供应，就供应木薯、玉蜀黍、黄瓜等杂粮。当收获季节来时，我们就设起秘密仓库来储蓄木薯干和成百上千粒的金瓜。在那最困难、黑暗的日子里，老 Apai，老 Indai 他们还在这样地照顾帮助我们啊！

奋斗和牺牲

我们最初来这里的五位同志中，除了林其清、蔡美英和我幸存留下外，江雄在 1973 年和谈前，在麻正河中段，遭埋伏牺牲。Ukong（真名孙剑平）是在 1976 年是在加拿逸河尾 Sg. Matua 牺牲的。我在 1977 年，去 Machan Kanan 长屋背粮，回森林路上遭遇战时，臀部受伤，在三位女同志的扶持下，其中一为女同志的手指也受伤，原本半天的路程，却因“割路”而跑了三个晚上才回到营地。其他工作组前后也牺牲了好多同志，但是在我们的 Ulu Machan 老“根据地”这里那么久和群众的频密往来中却没有发生过牺牲事件，这里仍然有同志坚持活动，直至八十年代初我离开中游时，都还没有完全中断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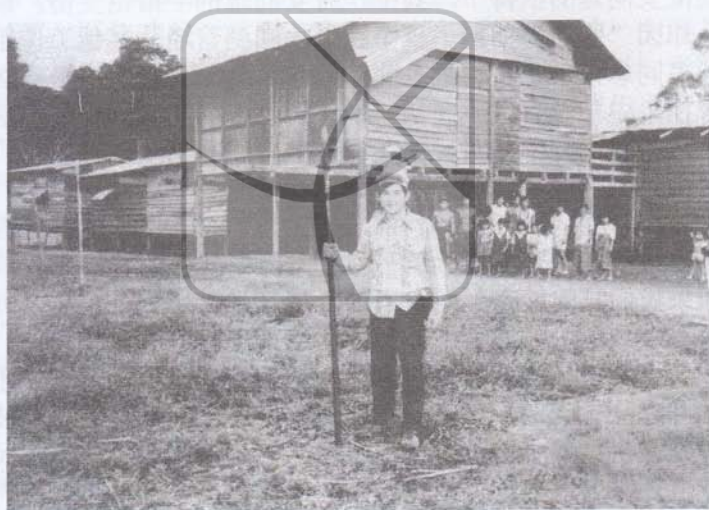
怎么评价伊班族的革命性，回顾一百多年前，他们有着英勇武装反抗白色拉者的光荣斗争传统。在二战时，伊班同胞能配合联军打击日军。如果我们真的能有强而有力的力量，且又是一个正义之师，在我们长期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下，又能争取捍卫他们的根本利益，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觉醒起来，能跟我们并肩战斗的。在我们这场反殖反帝争取独立的斗争中，Asun、Rentap 那种伊班英雄的精神还没有被激发出来，也许是伊班族那种纯朴的感情，原始的生产形态和意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还未普遍到达白热化程度。而我们当年的斗争又没有其他形势配合和支援，不进则退，群众也只能在观望，表面上在同情支持我们，实际上还不能在实际行动中参予革命斗争。

在争取群众方面，除了有政府军在这里的长屋活动，还有“飞行医生”服务。砂拉越可谓得天独厚，七十年代森林逐渐开发，加上石油的开采，整个经济发展加速。原本还不是极其贫困的民众，眼前生活是有所改善，大有异于中国当年军阀割据，民不聊生，非革命不可的状

况。砂拉越有广阔的森林，漫长的边界，纵有良好的地利，奈何时不与我。

磨不去的记忆

民族工作多艰难，然而在前进的路上，有长屋善良的 Apai、Indai 真诚的赞赏、呵护着我们，是我毕生难以忘怀的经历。在这里的战斗日日夜夜，有我的青春，有我的成长，有我的伤痛，有我的自豪。那稻浪滚滚，瓜谷飘香和那半山云雾里的“郎高”，那民族区的岁月，……都是我磨不去的记忆。



★ 山林后期活动到东北巴南流域在柏南群众中留影 ★

回忆在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搞民族工作的片段

叶晓阳

东部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第三支队成立时，我们这一队是娘子军队，我担任小队长的工作，副队长是蔡秋华同志（蔡细妹）。队员有陈如霞、彭小燕、亚厚、黄莉英、莉莉、赛玉和黄小妹等。队里的军政工作主要由我负责，蔡秋华负责全营的卫生工作。除了搞小队工作外，我还常参加其他小组去长屋搞群众工作。

记得我第一次跟白鸽中队长（蔡明和烈士）、小燕、忠明、赛玉等同志到离营地不太远的马罗河支流一座长屋搞民族工作时，我第一次赤脚走森林小路。山路有某些地方长了很多大藤，藤上长了很多刺并垂下地面，每节都有很锋利的三角刺，只要经过就会被它的刺钩到衣服，若使劲一拉，衣服就会被拉破，手脚若被钩到，只得皮破血流。第一次走路就被这些藤刺干扰，使我跟不上队伍。之后要走到长屋附近时又有一片茅草芭，又被锐利的茅草刺到脚底，像针扎到似得又痛又痒。这时白鸽中队长在前面等我，回过头来大声喊：“喂！晓阳，你为什么走这么慢啊？”我真有点汗颜，身为小队长呢！岂能那么怕痛！我就咬紧牙根一步当三步走，半走半跑地向前赶上去。白鸽中队长低下头看了看，微笑地对我忠告说：“晓阳啊！今后可要加油锻炼呀！”他这句话让我直到今天还印在脑海里。

走到伊班长屋旁的小河边，我们就地休息一会儿。同志们就用两个手掌捧取河水来喝，我就顺手把扎在裤脚的胶带解开，想洗个脚，谁知从小腿掉下一条软软像小拇指大的虫，吓我一跳，原来是一只山蛭吸饱了掉下来，好可怕呀！再看我的小腿伤口血流不止，我用拇指按住好一段时间，才慢慢止血。

森林里的山蛭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在山路上枯叶底下，当有人或动物走过时，山蛭就马上弓起身体，乘机搭上你的脚或其他部位，开始吸你的血，这种山蛭一般上咬人时我们不会感到痛，所以等它吸饱

掉下来，你才发觉衣裤有血渗出时，山蛭已经不见了。另一种山蛭的身体是有青色的线条，它常躲在山垅下的小溪涧两侧小树枝的叶上，当有人走过动到树叶时，它就马上会敏捷地爬上你的手臂或身上。不过它一开始咬，马上就感觉到很刺痛，就知道是这种青边的山蛭在咬你了。然而，在大队行军时，有时没有可能停下来捉山蛭，只好忍痛一阵子，就让它去吸血吧！说心里话，我们在森林里行军时，女同志最怕的是山蛭爬进身体里面，尤其是怕它爬进下身。所以，每次行军一休息，我们有时就去找个地方把裤子脱下来检查，偶尔有山蛭掉下来，这时我们心里有多怕，担忧有否个别只偷偷地钻进里面去了，这是我们女同志的秘密，从不曾向男同志透露过。

据说，西部单位有位女同志，不知怎么的，每天流鼻血，又感到有点肿痒，也查不出什么原因，就这样过了约两个月。一天，她和另一个女同志到河边洗脸，洗着洗着，另一个女同志倏然停了望着她的鼻子，惊讶地大叫：“什么东西从鼻子钻出来？！”定神一看，唉呀！是一条山蛭！这个鬼东西也不知何时钻进鼻孔，若它不出来凉快凉快，呼吸新鲜空气，还找不出制造鼻子流血二个月的罪魁祸首！

然而，日子久了，也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断地锻炼和考验中，使自己慢慢地适应斗争环境，人也变的更坚强勇敢了。经过思想斗争，认真想一想，敌人都不怕，生命都可丢，为何要怕一只小小的山蛭呢？

之后，我们上了长屋，这座长屋是我们第一次到访，长屋有十几户人家，他们都很纯朴，几乎都是文盲，但他们有一手好手艺，能自制美丽图案的布料，家庭日用品如草席、背东西的“拉龙”、磨谷的木磨、打各种形状的刀斧、以及打猎的镖枪、喷筒等，还有各种艺术的雕刻，这些都是伊班民族的生活艺术和文化。

我们初次接见他们，他们有点怕，也比较冷漠，经过我们热情地和他们交谈，问长问暖，拉家常谈生活等，然后才向他们表明，我们是北加里曼丹人民军，这次来探访你们，是和你们交个朋友。今后我们在此地活动，要劳烦你们多多支持与帮助。接着我们就问他们有什么病

痛吗？需要我们帮忙针灸吗？这时他们就完全放下戒心，就开始跟我们亲切的交谈起来了

总之，多去几次，不断进行宣传教育，尤其是帮助他们治病，免费配一些简便的药给他们，多少也能帮助减轻他们的病痛，我们有时也帮助他们做一些劳力工作，如砍芭，种稻、采稻等，日子久了，伊班族同胞自然也和我们打成一片了。

我们在此座长屋探访与交流了几个小时，在当天下午五点多就回到“卡拉央”营地了。其他去执行任务的同志们也先后回到营地。同志们来来往往，互相慰问，嘻嘻哈哈谈着，你一句我一句，营地变得热热闹闹的。

真没想到，我第一次被山蛭咬伤的小腿，回到营地第二天，整个小腿的内侧红肿起来，微微刺痛。第三天就一直流出脓血水，开始发炎了。蔡秋华卫生员察看不对劲，就帮我打了一针朋尼西林(Penicillin)，几天过后才慢慢地消退红肿。当时，我有点担心，若每次被山蛭搭上了，都会这样红肿，那还了得？幸好，往后被山蛭咬到，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发炎了。

第二次，我、友如、如霞、小燕、忠明和赛玉等，到马罗河下一座长屋搞工作。这座长屋有二十几户，这里伊班群众的文化水平较低，多数是文盲，生活也较贫穷艰苦，有好些男女没穿上衣，男的都是用树皮围下体，女的穿三苏古的短沙龙(Salong)。有的生过孩子的少妇就不穿上衣，有的少妇乳房挺丰满的。我们帮她们针灸，感到好尴尬，友如同志是男卫生员，人既老实又内向，我们女同志陪着他在场一起针灸，他只好头低低，脸微红地帮她们针灸。

马罗河岸的伊班群众，主要务农为生，靠种稻、打猎以及猎鱼为生。马罗河有很多鱼，尤其是银色的大白鳞(Semak)，味道可口清甜。每年年尾大概是十一、十二月，在某些河段会浮现出密密麻麻，成群结队的小鱼，就如我们祖国的江鱼仔般大。在这个季节，伊班群众就

会划着舢板船到河里撒网，鱼网一撒一拉，通常都是满载而归。伊班人把部分晒干制成江鱼干，有部分用盐腌，这样，有的长屋常年都有鱼可吃。

有一次，我们小队来到这座长屋，他们刚好去撒网回来，捕到了很多小鱼，整二艘舢板都堆满了鱼，鱼儿还活蹦活跳着，这是我有幸第一次看见那么多的小鱼儿！

过后，群众就把这些小鱼洗干净撒一些盐放几片姜，配一些香料（龙刚叶）放进竹筒去，然后拿去炉灶烧熟，配伊班香米饭吃，味道真清甜可口，同志们吃到不知饱哩！

第三次，我和 Joseph、生强、李山、有如、如霞、小燕、黄小妹、赛玉等，到马罗河上游一座 Rumah Pilang 收购树枳(Enkabang)。我们沿着马罗河岸边走，森林岸边生长了好些 Enkabang 树，当时是树枳成熟季节，河岸就掉下许多 Enkabang，我们边走边拾，不知不觉也到 Pilang 长屋了。上到长屋，我们先拜访屋长，告诉他我们的来意，因先前我们的同志曾来过，所以屋长很欢迎我们的到来。和伊班群众交谈了好一阵子，我们就开始向屋长购买树枳，一部分用现金收购，一部分用衣物交换。

树枳可以制造成油，伊班人把它煮炼成油，待它较冷时，就搓成条状，把它晒干，用叶子包起来。要吃时，涂在热腾腾的饭上，及时吃，味道非常香，不用配菜也可吃一大盘饭。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客人去到长屋，主人就会把树枳油拿出来招待客人。当我们北加人民军子弟上到长屋，如果遇到他们有制好的树枳油，他们一定会拿出来招待我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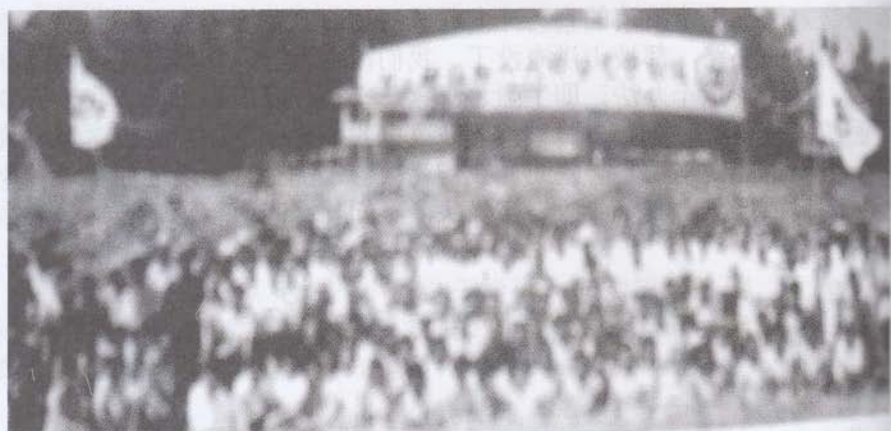
我们向长屋群众收购到的树枳是交给交通员同志，他们到河下游小商店去卖，然后再买一些需要的物品回来。

去长屋收购树枳的工作是我第一次参与，记得那天下午四、五

点，我们离开长屋，再沿着原来的马罗河岸边小路走向营地。那时正下着倾盆大雨，洪水滚滚的直泻冲向马罗河，一刹那间，河水高涨起来，沿河岸边的小路，都被山洪淹没了。我们涉水而行，总感觉走得很慢，过后，我们商量个办法，即生强、小燕、李山、赛玉、小妹和我一起拉着手游向河中心，乘着奔腾滚滚的波浪把我们一个个地冲下去，当时我们一点都不感到害怕，一瞬间，我们就被河水冲到营地附近的岸边。今天回忆起那一刻，真是“敢”字当头，不知什么叫“害怕”！

2006年10月5日





当年公开政党劳动队在第一省甘榜马来学校帮忙清理工地



1960 年左翼公开政党一人联劳动队为加拿逸明烟长屋伊班同胞筑路



深入甘榜长屋的民族工作。



携儿带女重踏当年民族工作时所走的路



这条民族区的独木桥是我们当年所留下的踪迹



鱼水情姐妹相逢在三十年后的今天

伊班人反抗拉者王朝之战

◎ 林添贵

拉者王朝在“大城城陷落”后，对吉兰丹、峇株巴辖、古晋及巨港的统治，已告结束。

拉者王朝在加入土邦联盟这个新的政治格局时，也失去了其霸权，其政治、军事力量，受到削弱。拉者王朝的衰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拉者王朝的统治，已到了穷途末路。拉者王朝的衰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拉者王朝的统治，已到了穷途末路。拉者王朝的衰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拉者王朝的统治，已到了穷途末路。拉者王朝的衰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拉者王朝的统治，已到了穷途末路。

拉者王朝在14世纪

拉者王朝在14世纪

拉者王朝在14世纪

拉者王朝在14世纪

拉者王朝在14世纪

拉者王朝在14世纪

拉者王朝在14世纪

拉者王朝在14世纪

拉者王朝在14世纪

拉者王朝在14世纪

拉者王朝在14世纪



拉者王朝在14世纪

拉者王朝在14世纪

拉者王朝在14世纪

拉者王朝在14世纪

拉者王朝在14世纪

拉者王朝在14世纪

拉者王朝在14世纪

拉者王朝在14世纪

拉者王朝在14世纪

拉者王朝在14世纪

拉者王朝在14世纪

拉者王朝在14世纪，伊班人的英雄史话，由拉者王朝的衰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拉者王朝的统治，已到了穷途末路。拉者王朝的衰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拉者王朝的统治，已到了穷途末路。拉者王朝的衰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拉者王朝的统治，已到了穷途末路。

拉者王朝在14世纪，伊班人的英雄史话，由拉者王朝的衰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拉者王朝的统治，已到了穷途末路。拉者王朝的衰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拉者王朝的统治，已到了穷途末路。



伊班人反抗拉者王朝之战

◆ 蔡宗祥



拉者王朝统治砂拉越逾一世纪，非高枕无忧，实受到各族人民的抗御。

詹姆士布洛克入主砂拉越最主要的目的是强硬执行殖民政策，占取土地、统治人民、夺取财富。伊班人是砂拉越主人，他们热爱土地，土地是他们建屋、种植、渔猎之处。土地是伊班人的生命，伊班人热爱自由，

他们要自由的迁移、耕种、出海，他们不愿自由生活受到外来压制。拉者王朝为巩固和扩张政权，容不得任何形式的挑衅。两者的利益激烈冲突，演变成战事。伊班人为摆脱拉者王朝统治，保卫土地，争取自由的反抗之战是正义的。詹姆士因残杀伊班人而被提控於新加坡法庭，拉者政权染满伊班人反抗的鲜血。

詹姆士於 1841 年 9 月 24 日统治砂拉越，随即处死两位拒绝承认拉者政权的两位达雅人首领。1843 年得到英国海军援助，拉者士兵攻打泗里末河巴地 (Padeh) 的伊班人，延至 1834 年，拉者王朝仍征伐恩打拜河流域伊班人。伊班人反抗拉者王朝之战近一世纪，主要的战役有：（一）1849 年的比丁马鲁战役，约一千名伊班战士血流漂杵，伏尸遍野，（二）林达数次反抗拉者王朝之战。查理士於 1861 年领大军攻占林达大本营砂卓山，放大火狂烧，数哩外可见到大火燃烧，火焰直冲上天。林达时期伊班人反抗拉者王朝力量气势如虹，斗志高昂，揭竿起义，敌忾同仇的伊班人纷纷投奔砂卓山。林达正义凛然的说：我是内陆拉者，林达自始至终，站稳立场，誓死斗争。林达是伊班族英雄，是砂拉越人民的骄傲。

拉者王朝对不愿归顺的伊班人的策略是频频出兵镇压，利用伊班人打伊班人，瓦解伊班人内部团结，建堡垒、立炮台及焦点法。这些策略取得实效，削弱伊班人的势力。伊班人不能和其他族群团结成一阵线，部分伊班战士为利所诱，转而为拉者王朝效劳，分散伊班人的团结，伊班人长期顽强的反抗，终被拉者王朝压服。

伊班人反抗拉者王朝之战，是民族主义的形成。伊班人爱乡土、爱自由，不愿屈服於外侮的斗争，铸熔成宝贵精神，激励后来者。

平凡的人，不平凡的经历

～ 记 OMT 民族区开路先锋三明 ～

❖ 丹心

在那风起云涌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反帝反殖的岁月里，我们这一批热血青年，用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生命投入到热带森林里，过着游击式的危险、艰苦、紧张、刺激的生活。回首当年的日子，实是感到过之不易，过之不一般，过之非凡。一般的战士是这样，少数带头人就更是如此。我所认识的我们当年 OMT（乌也、沐胶、达斗简称 OMT）武工队的三明朋友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不以成败论英雄，成织的得来是经过不少失败，错误的经验累积，总结而得。因此，表面上看来他并没有非常突出的战织，可是为我们 OMT 单位的游击生活，尤其是民族工作他却担任着，先遣、尖兵、开创有利条件的工作。他是有过错误和失败，脚步也蹒跚，但是设身处地为他想，我对他更多的是尊敬和佩服。就他的经历来说，有时真是挫了折了，尤有什者是头破血流了，但是他依然一路走来，忠诚的听从组织的指挥，走在斗争的前线。

他文化不高，没念几年书，但脑子却灵光得很，他很有新点子，新方法，而这些有的是涉及到游击活动和民族工作的策略和技术的。他在我们单位的民族工作上，在开路上，在打仗上，在各种各样的游击生活技能上是起过先锋的作用，对我们的事业做出不小的贡献。

寻找平等、尊重和公道

三明当年之所以会参加革命，是因为他深受贫穷困苦的生活所逼迫。先说他妈吧，生活本来就穷苦，又深受旧礼教思想的迫害。过去的女性难得有好家婆，而她就偏偏遇上恶家婆。她嫁到婆家后，粗活家计一拼扛，却少给吃少给穿。有什么不顺眼的事，就得劈头盖脸挨抽挨打，拳打脚踢，更没有人格尊严的是，家婆动手打，丈夫帮着捉，帮着打。三明小小的心灵里，早就为母亲的不幸，烙下深深的伤痕；接着说

他父亲，他那父亲就懂得冲妻子凶，但在朋友夥伴中，却是老实结巴的一个男子汉。和 xx 邻居的当家人好的很，那人却是个在乡厘中有点名望财势的，但却骗走了三明他爸爸的土地，他爸经这一打击，再加上病痛，没多久就离开人世。再说他自己因家里穷，没人看得起他，一直都生活在被歧视、白眼，和欺凌之下。他是个调皮的孩子，而一般认为调皮的孩子都是错的。在班上，他没犯错，被同学诬赖，老师不分是非黑白，惩罚无辜，他不服，和老师理论，但是没理论好，还得再次挨打。邻居大孩子（大四、五岁）欺侮他，他直斥对方。你比我大多少？你不羞耻，你大欺小。总之，小时的他窝在心中的社会对他的不平等，践踏，和讨不到公道的心事，塞得满满。他在心里呐喊，我要平等，我要尊严，我要公道。

和进步朋友的接触

60 年代，乌驿路 3 哩半，三明的老家乡活跃着进步力量，有进步思想的朋友在他的乡里，组织劳动队，学习小组，集体学习大会，篮球队等等。他说，真有这么好的人，视他为兄弟姐妹，平等相对，和睦相处，不欺不诈，还能学习，还能学唱歌，太好了，他服了这些朋友，并紧紧的团结在这股势力周围。从此之后，那个喜欢打架，生活不严谨的小伙子改变了。他不再打架了，很努力工作，到那都很卖力的干。他说自己没文化，但他身强体壮，有的是一身力气，干起活来的那个样，那个老板看了都满意。

他说，由于常受人欺侮，他反抗性特强，在家里做大哥的会打他，他不认小，和他对打，打不过也要打，也因此，他变的也会打弟弟。在一次，看过进步朋友的一个亲情画面的感召下，他自此和弟弟的关系一反以往。那画面是“有一位做大哥的，生性儒雅温和，爱护弟弟。一天，弟弟因有事不高兴，抡着拳头不停的捶打大哥，可是做大哥的，不还手、不责骂，只轻柔的说，你这样打，不是会把大哥打死了？做弟弟的听了不打了，撒娇耍赖了。”

自此后，三明和弟弟的关系，亲密无间，是兄弟，若同志，似

战友。在那乌云密布的风雨年代，他转入非法地下活动，这时他思念弟弟，写了一封信给他，深刻的检讨了自己过去对弟弟的粗鲁态度，就此两兄弟灵犀相通了。1968年7月的一天，当他要离开故乡上边区参加武装斗争时，弟弟买了一包橘子来送别，话别过，弟弟走了几步，却又反转回来和他握手。是时，他还愣着站在那看弟弟的背影，看到弟弟伸出手来，才急忙把个又粗又大的手伸向弟弟，两个人的粗手那么一握，就已把各自内心的温情都倾向对方的心坎。那一刻，让记忆把时光胶住了，永恒地刻在他脑海里，每每记忆起这一幕往事，就心情荡漾不能平静。

因小时的贫困，受欺压，所以他在寻找平等、尊重和公道，直到接触了革命同志，知道这些革命同志的所图所为，想到穷人也能翻身做主人，他在心里呼喊着：“我找到了，我終於找到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他踏上这条路，心满意足，兢兢业业的走下去，听革命组织的话，领导上指挥到那里，他就工作到那里。

隐藏生活

有段时间，他是在外地找生活，是帮忙一位商人种接种树胶，他全心全意的为商人干活，商人也对他爱护有加。做了段时间后，他接到一位进步朋友的信，希望他回老家，参加他们的农会。好个三明把朋友叫他做的事摆第一，把自己的工作给摆到第二了。虽然也会舍不得老板，因他的老板很喜欢他，把他当儿子看待，而且一再挽留，但他听革命组织的话，毅然打起包袱回老家。

回老家参加农会，负起印刷工作，他意识到自己的被尊重而更加强了自信心。他认真负责的干着默默无闻的工作。本来这工作不适合于他活跃的性格的，但他一直坚持做好，并在这基础上有所创新。本来印刷工作是要两个人配合作，一个拉框架，放稿纸，一个推印刷的滚轮。他把它改成只要一个人就能兼做的印刷工具，这是他初次显露的创意，他还帮忙找住点的工作。他是生长在农村，对当地地形又熟。而对

一个住点必须具备的条件，他也比较有认识，因此上级要找住点时，他就帮上忙了，他说，有的领导上住的点他曾帮忙找过。

他的脑子很活络，总有许多问题想要问，直接的负责人不一定能解决他的问题，还得烦劳越级领导的出面解决，据说越级领导当时还出面解决过他的提问。他不善写，读，学问的得来，往往是通过和人们言谈交流，提问题，索取答案。

本来他的印刷工作是须要很隐蔽的，但是他太活跃了，难免有破绽。他说，本来他不能暴露出他是个进步分子，不可唱进步歌曲，可是他却喜欢唱，还因此而被罚降级，降到和他的下级一组。但是因为自己错，故他认错，接受处分。

总之，那时候的他，身心焕发出来的热情，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对革命工作的投入是无法阻挡的。

上边区参军去

1968年，革命组织号召上边区参军去，三明被点名应召。他太高兴了，因为以他的个性，长期一两个人的潜伏搞印刷，太寂寞，沉闷。他是搞印刷的，当然看过《来自丛林中的战鼓声》想到部队的生活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又想到那是自己部队的“红色根据地”，他的神早就飞到边区了，组织上召唤，正中下怀，他满怀着憧憬，精神抖擞的踏上征程。

他是和我一同上边区的。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十足农民味，热情、健谈，两眼炯炯有神，身架子总是摆的挺直挺直的，非常能适应森林里的生活。一句话，如鱼得水，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吸引着他，他努力的吸收着，学习着一切，他渴望想学本领，他学跑山、学打猎、学有关军事的诸多本领。

他并不像我要付出很大精力来应付长征的挑战，他说他压根儿

就不感到辛苦，而他又是被编排在尖兵队里，他是踌躇满怀的。在这将要奔向人生另一个旅程的前夕，他为自己取名“三明”，立场明、路线明、目标明，三者鼎立，立场稳。这次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名字还大有来头，大有实际意义，他的人生方向，前进路线可是明确的很。我们过去还以为是“三民主义”的三民，他也不纠正，大概因为追求“三民”的意义亦蛮棒的吧。

人生第一战

我们第一批上边区的队伍，到边区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第二批同志到达时，敌军就向我们空袭。从此，我们面对印马夹击的“围剿”局面，大营地在搞生产，还得抢种抢收。领导上应时的做出了部署，主力去一支二支，老洪带部分人回国内，有的后撤在马罗河边，搞战备粮（运粮、囤粮）。更重要的是成立一组活跃在前线的伏击组，由老温带领一小队精选人马到前线去找战机。三明和增忠两位三省国内刚去的同志被选参与，这时的三明更深一层的感受到自己在革命队伍里并没有被忽略，而且是被重用了。

老温行事稳重谨慎，在他带领下，他们这一次的伏击战打的蛮漂亮的，打死 xx 个，缴枪 xx 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是人生第一战，他还不能领会什么是怕死，他说，当时他的枪打了几枪就不行了，他一直要求旁边的战友让他打，只是不得要领。要不，他真想砰，砰，砰多打它几枪。也是这一次，他初尝了枪火下的血腥味，因他缴获来的敌兵军装，那上面有敌兵被打后飞溅到军装的碎肉片。

回国内参加 OMT 的工作（OMT 武工队—OYA, MUKAH, TATAU 三支河流域地带活动的武工队）。

三明到 OMT 时，刚好是 OMT 很缺乏队长级的人才。在他之前有发生几桩事故，先是有纪平队长牺牲之事，后来又有叶天星、陆良贵、周明权等工作时在群众家被捕，以及江先余和王聪顺牺牲。这是他们当时的主要负责工作人员。在这多事又缺乏人才的情况下，三明的到来，

自然就得担负起民族工作或战斗的工作重任了。

他在 OMT 时，先是担负战斗队的队长。国内三省的革命力量自从 1968 年上边区和一二支队会师后，政策重新制订，队伍重新整顿，OMT 组成武工队。当时各武工队皆组有战斗队。枪支上我们自制出一定数量的“铁军一八”，再加上边区老同志带回的少数印尼军用枪支，我们的同志开始学习打战了。那是在学习，在尝试，但是，我们的胃口很大，总想打缴获战。应该说当时，一方面是懵懂、幼稚，另一方面是思想过激。

三明亲自带队出击的第一战是在乌驿路 xx 哩，打兵车，战是打成了，打死了几个敌兵，但是因为他被自己飞出的撞桥撞伤了肩胛骨，以为不能指挥了，因此就指挥队伍撤退。当时，有人有意见，认为他怕死，没有去缴获。他说，本来是能缴获的。这一战，打了几个敌兵，自己撞坏了肩胛骨，另一位同志受轻伤又没缴获，拉平了，不赢不输，但他却得检讨怕死思想。后来求实跟我说，那次他们还好早撤退，不然可危险了，因敌人很快就反击过来，赵德的手，就是那次受伤的。

接着他又打了另一次埋伏战。本来战机是不错的，但是打第一枪的辉武同志，枪支发生故障，子弹卡壳打不响，这一拖延，敌兵的队伍已超过我们的火力范围。所以并没有给敌兵构成什么威胁。这次的敌兵特别凶狠，他们进行了反扑，三明立即指挥撤退。但带头撤的同志，慌张之余撤错方向，竟然向凹的山脚方向撤，那山凹特别深，待到下了山凹又得向山上撤时，敌兵的火力已掩至。三明当时是知道撤错方向，但无法挽救，只好跟者撤。初时，敌兵火力扫来时，他们依一贯的经验马上伏倒。但是在此情况下，已毋须扑倒了，因火力是从对面山打来的，伏倒那不是正挨个正着吗？三明连忙叫同志们快跑，但是很快，老江和阿华，已先后中枪。三明看见阿华受伤，不能跑，便把他背着撤，越过山顶来到一处小山，看见阿华膝盖受伤处直流血，三明帮她在伤口上方用布条扎紧。当时有一定的止血作用，但时间一久，因疼痛阿华要求解下布条，那知一解血就涌出来，再扎回去已不管用，怎么压都不能止血（他没经验，本来是要在先前扎的伤口部位前方扎紧才对），阿华

终于不支昏死过去。

敌兵知道他们是向上撤的，所以很快就搜索到山顶，因阿华会呻吟，敌兵依声搜来，三明只好撤到邻近隐蔽，只一阵子，敌兵就丢手榴弹，三明只得负着沉重的心情离开。

这一仗，牺牲了三位同志（包括潘启美同志）。当然，按说，他本来是不用太过自责的，因为谁也没经验，谁也预料不到会出这样的状况，但无论如何他是主要负责人，他深深的觉得愧疚于牺牲了的同志。

去医院杀特

当时的敌特别猖狂，对我们的威胁大，为了镇压特务的嚣张气焰，我们制定了锄特的政策，三明又是我们单位的首选者。他告诉我：“老实说，这一次的杀特行动，我思想上的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他亲爱的弟弟，在那不久前，刚因锄特不遂而牺牲，他的伤痛还在。或许有人要说，既然兄弟情如此深，不就把它当着为革命，也为兄弟报仇，应该英雄气长才是，只是人性是矛盾的。在我们这种社会基础上，有谁能免得了怕死思想。再说，他打了两战后，应该也打出些活思想来了吧，暴力的行动，本来就潜藏着各种凶险，各种危机，那是往往难于预料的。

尽管如此，他还是接受任务，因为，他还不曾有出现“不接受任务的念头”，相关朋友在医院侦察后，他们开始行动。要杀特，得先干掉维护在旁的士兵，三明他是由其他同志用挂尾车送到医院附近处。单独拿着枪（放在包里）上医院行动。但是这次的行动因特务不在而告吹，不过无论如何，他思想上又经受了一次的磨炼。

去加拿逸医院附近，烧特务的房子

他的锐气挫的不多，还相当旺，他还很为革命着想。加拿逸的

特务太活跃，要干掉他不是很容易，他和领导上商量后决定把特务烧死，他的点子特多。于是就派同志化白去了解特务住处的周遭情况，确切证实是那间房间。他们决定行动的那晚，搬了几桶汽油去，以为会把特务烧死，那知闹了笑话，为什么呢？因为汽油燃烧的快，但是也熄灭的快，一阵爆烧，并没有对房子造成多大损害，人也没烧着。后来总结，不可用汽油，要用土油。这又是一次无知的军事行动，也是他又一次走在头里的失败军事尝试。

二月行动

那是 1972 年的事，我也已回到国内，也同样是在 OMT 单位的民族区工作。所以也亲自参与，但那时的我，刚回国内不久，对于政策问题想的不多。虽然是队的辅导员，思想上也只侧重队员们的思想和学习的工作。他说他当时已从战斗队调到民族区工作，他是民族工作队（向东北开发的一支队伍）的队长，当时他们已朝向沐胶达斗方向前进。而二月行动，他们是回来配合我们的。

所谓二月行动，就是要干掉伊班族特务，南亚史古瓜奥长屋的本古鲁伊曼，另外就是到乌驿路三十几哩的工程局去搞破坏。当时我们是会合了三个工作队的人力行动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行动呢？他告诉我，这行动的建议是他提的，因为当时在中游的武工队连连发生我们同志遭伊班坏蛋出卖，被敌兵伏击，造成很大的伤亡。而我们单位之前发生的民族工作干部被捕牺牲的事件，也是因伊班群众的出卖造成的。因此，他想出一个道理，难道我们也要坐等我们单位的特务出卖我们而造成我们人员的伤亡吗？他和队员们商量这件事，队员们都说“不能”，我们要“主动出击”，我们要走在敌人的前头。因此才有了我们单位的二月行动，锄掉本古鲁伊曼。

不论是杀特或三十几哩的工程局搞破坏，他都是主要的负责人之一，这场行动，人多，活动也不那么凶险，还算成功。不过从那个时后起，我和黎家文在乌驿和沐胶活动时，就没有安宁的日子了，我们经常都遇到有敌兵的活动，不能公开的和群众接触，要很小心的了解情况

后才可以行动，黎家文是个作风很谨慎小心的同志。因此，我们的队伍自始至终只发生一次事故，那就是说“二月行动”的锄特活动引来敌兵的深入民族区去行动，也给我们民族工作队造成许多危险和困难。

二月行动是搞得有点轰动，三支队伍是三十几个人再加上 OMT 武工队长带的几个人，有四十个人左右吧。那之前我和家文的一队已和三明那队会合小整过。行动之前又会合了向军武工队长那小组和老郭那一队人，在下午 3、4 点钟时，用船下到长屋附近上岸，然后整支队伍浩浩荡荡涌向长屋。我们一到长屋，主要人员三民他们马上第一时间上到长屋，限制长屋的人出入，而我们次要的人员在武工队长分配下，站岗，封锁路上和河上的交通。

上长屋先是不动声色，只在宣传我们的宗旨，另一方面就是缴收他们的猎枪，最重要的是在了解那一个是本古鲁伊曼。天很快就暗下来了，本古鲁依曼作贼心虚，他似乎是还想把枪藏起来，他还把“本牙和”（护身符）带上（那是黎家文说的）。然后，我们就集合所有长屋的群众，宣传我们的政策，宣布伊曼的罪状。当要把他押出去枪决时，他却挣脱沿楼梯往楼下跑去，被赵德（他是执刑者）开了一枪，追到楼下时，又补上一枪才解决掉。当时，我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形（绝大多数同志是第一次面对），说不出个中的感受。总觉得有点懵懵然，又好像很清醒，很理智，因为那种场景是需要打起 12 分的精神的，是不能有差错的。只是我原有的智慧似乎跟不上现实工作的需求，多少我还有点紧张、慌乱，不知所措的感觉吧。杀人是残酷的，但想到我们许多同志被群众的出卖而流血牺牲，却也恼恨的很，觉得非干掉不可。还有一点就如三明所说的：许多走在前头的人，都流血牺牲了，但接着不就轮到这批人了吗？干掉本古鲁伊曼之后，武工队长带领我们二线的人员向森林撤退，等待。而他们第一线的人员连夜又向三十几哩的工部局出发，当夜他们夜访工部局，造成一定的破坏。

带领新兵向东北进军

1972 年，我们 OMT 单位在边打边搞政策下发展了一批新兵，肯

定的新兵都集中在华区活动是不行的。於是就把绝大部分的新兵带往民族区，一方面适应游击生活，另一方面进行集训整顿，还有就是也要他们接受军训。当时的民族区也是搞的沸沸扬扬的，我们队也分配来几个新兵，当时的坚强、勇进、学英、向英等我都带过。带他们学习，带他们唱歌、跳舞。当时跟三明他们队去的新兵有武虎、武虎妹（学勇）、勇进、坚强、意坚等。武虎长的魁梧结实，他妹长的修长秀美，勇进老实巴交，坚强活泼可爱，意坚即精灵又沉稳，除坚强和意坚外，都是农村的好青年，坚强和意坚应该是学运来的。这几个的素质都很不错。他们也都是被精挑出来的，因路途是长的，时间是久的，而他们又都是新兵，必须有相适应的条件才可。

他们起程之前，我们的队和他们的队还相处了一段时间，所以接触的多，也熟络得多，对他们我爱护有加。坚正原本是我队里的一员，这一次分手跟三明去，我和她谈了许多，她是位好同志，我喜欢她。好的是虽然发生事故，她还是无恙而回。不断的发展巩固工作，不断的分离聚合，我们终须说再见了，他们十四人的队伍有三明、胜意、银银、辉武、红兵、重林、坚正、五号、毛挥进、武虎、武虎妹（学勇）、勇进、坚强和意坚，向东北出发了。

Kemena 河边发生事故

行行复行行，他们来到 Pulau Binai 上一点的 Kemena 河对岸，计划着过江之事宜，过江之前，他们了解到有敌兵活动。江是要过，只是要在什么时候过，这是个有争执的问题。三明说，他是不主张过，但是其他干部要过，以一对三，他争不过，但也基于团结只好顺着过，他们向群众处搞来一条 Koda 船过河。其实他们是知道有敌情的，只是没估计到敌兵会来的这么快，或说他们是怀着侥幸的心，以为会过的了河的。说穿了他们是冒险前进，当他们驶离岸边一段距离后，还想倒回，因有犹豫，但就在他们倒回时，敌兵的巡逻船开过来，在见到敌船后，Koda 船又转头前进。这时他们已输掉时间，巡逻艇快，Koda 船慢，眼见只有几尺的距离就可达到彼岸，但敌兵已开火了。在一阵枪声响后，辉武开枪还击，三明在没有指挥同志们怎么应对就跳江避开火

力。估计其他没有牺牲的老兵，只要会游泳的都游到岸上，而胜意和五位新兵们却不懂得游泳而丢失了他们年青的生命，这是我们单位牺牲最多的一次驳火事件。除了牺牲，一个跑掉，一个受伤，队伍折半。

为什么会发生这不该发生的事呢？发生这样不幸的事，谁都是不愿意的。但是事情既然发生了，再怎么不幸，怎么痛苦都得面对，都得承担责任。三明确说，事情发生后，同志们都怪他的怕死思想，没指挥就自己先跳水，他说他承认自己的不对，也对牺牲了的同志痛惜不已，他说他自己也恨死了自己，不过事情检讨起来，当时发生事故，也不是他不怕死就能解决好问题的。

我以为事前要解决好问题才是重要的，既然有敌情，怎么敢过河（还是条大河）？应该要估计危险性吧！陆上遭遇战，还比较有经验。但在河上却是第一次，没有应对的经验，在陆地枪声一响，马上回应的举动是隐蔽，在江上要隐蔽只能跳水，他不就习惯性的跳水隐蔽，那知道一跳水，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这是一种习惯势力，就像他打阿华牺牲的那一战，退路是向山上撤，而敌兵是在前面扫射，伏倒有什么用？但他却是很自然的习惯势力。整个来说，朋友们当时想的太不周详了，太急着过河了。而三明本身应说明他花在工作上的精力多，但在战斗上的精力不够。这也是一部分干部的通病。

为什么三明既然反对了，其他干部还硬是要过呢？我认为干部们的思想都很麻痹、草率、盲撞，以为一定不会有事。若考虑到可能会出事，就应商量对策或至少在指挥员个人要想出应对的方法。三明他是相对粗心的，而其他干部应该是警惕性不高吧。三明确说如果他警惕性高，他就应该行使他的权力，因军政权力都主要在他，而干部同志警惕性如果会高，就不会硬闯过江。

当时牺牲的朋友五位是新兵，老兵（辅导员胜意）只有一个，因他不会游泳，其他几位老兵：三明、武辉、2号（银银）红兵、重林、坚正等都游上岸，而且武器多数有拿到。过河之前，他们是知道有敌情了，还是要过河，为什么？三明认为，现在想起来是过左的思想在指导着他们，因为当时正值中国四人帮非常猖獗的时后，有一句话在他

们的前头指挥着他们（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们内部也深受影响，思想偏左，极端。所以，已经到达 Pulau Binai 上一点的 Kemena 河边的他们，没有向河对岸挺进是思想不红，不革命化的思想，甚至当时迂回前进的想法都不可行。本来，要挺进，要革命化可以，但可以迂回，比如可以倒回到什么地方，隐蔽起来，敌兵过后，才选另一地点过河。这思想，现在想起来挺容易的，但当时就是不想，不能想，其实这也是说明我们不能把中国的革命理论和我们的实际情形具体的相结合，有时甚至盲目套用。

我以为他们最大要考量的问题，本来是他们带有过半的新兵，他们应该负责好他们的安全，其他都是次要的。我以为这是最革命化的思想。

他们驳火后，到对岸集合时，还有 6 个人，其他队员们都一直怪他，批评他。当时身负重责的他，面对这一非常事故，整个脑子“懵”了，真空了。但身上的担子并不能卸下。这点他还是清醒的，他对队员们说：这次的责任，主要错是我，等我们安全回队后，我会接受批评和处分，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留下来的人要团结一致，共同去克服一切的困难，要不，连我们的命都留不住。他这一说，队员们也明智了，大家同心协力，克服眼前的困难。当时他们的四周肯定都是兵，他们是第一步登陆新区，困难可想而知。

大约一两星期后，他们还面对另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红兵要离队，在这重折之后，他萌生离队思想。红兵的亲生父亲是在那一带住，他想去找他，在这非常时刻提出这种要求，够难处理的。三明和其他负责人商量，其他人多是要把他处置掉，三明他本身也闪过这种想法，但算他还是冷静的，他说“这一处置，后果怎样”？不小心，也许他还先把我们给干掉。三明还是理性的和他商量，叫他暂缓出去的时间和尽量拖延投报的时间。

这样，他们在那地带躲了一个月的时间（发生驳火事件后，他们潜伏在一个临时点。当晚他们摸到一个群众家，群众给他们煮了一大

锅饭吃，还拿了米粮。因太饿了，午夜2点他们又到另一群众家吃饭和拿米粮。）就这样他们找个地方隐蔽起来，他当时所以选在群众周遭隐蔽是因为他想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是安全。当时他们6个人只有2张胶布，地上睡觉的胶布都没有，只能用麻袋等代替，因敌情紧他们根本不可动用群众购物。

面对这种困境，一时间，他也想不出对策，后来脑子里闪出个念头，他想到：“听说，你三明不是很会走路吗？”这不是正用得着吗？这一来，他灵活起来了，他想敌兵在这一带活动。他们的队伍可以舍近取远，突击到敌兵料想不到的海边去找群众，在敌兵还没觉查到他们的动向时，他们已在海边补充好一切，之后和领导联络上，他就起程归队。他的革命历程，这一事故是他的致命伤，沉甸甸愧疚自责感。从此一直啃蚀着他的心。

本来是一次成功的长征

这次的东北进军，是他累积了两三年的森林活动的经验，比较满意的付之于实践的经历，如若不是发生这驳火事件，则是一次成功的携带新兵开辟新区的运程。因为一，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走山路经验，这包括怎么把地图结合地理形势，对山路的错综复杂性更有认识，减少走错路，省了时间，省了气力，不需要再走旧路，一张地图，一个指南针指到那里，就能走到那里，纵横遨游。

二，他总结出一种适合游击生活的规则和方式，山地里长途背负粮食活动，体力消耗大，人很容易劳累疲乏，往往走了半天后，体力已消耗的差不多，如若再走到四、五点才找点休息，那将意味着得透支精力和体力去扎营。如若歇脚处，容易找到水则好，否则一切跟着忙乱，因扎营后一连串的工作，必须马上展开，找水的找水，看路的看路（明天要走的路），找菜的找菜（打猎、钓鱼），拾柴的拾柴，做饭架的做饭架，炊事的炊事。这其中还包括了自己必须找位置绑吊床、冲凉等，晚上还得集体学习，如果水远，那么冲凉取水就成为苦差事。一天行军后，满身汗水湿透，不习惯穿汗臭衣的朋友，还得洗衣烘干。总

之，活动紧张得很，因为这样的艰苦、疲劳，经常造成他这个队长和尖兵发生摩擦，而战士也会出现许多矛盾不快之事。因为这种种的经验他总结出，必须在3点左右就得准备歇脚，有条件马上扎营，没有条件，也要赶紧找条件扎营，不可再拖。如此一来，生活顺畅得多，生活上不打结，队员之间的精神面貌也好多了。在不是很劳累的情形下，还可哼着歌，聊着天干活，矛盾摩擦的事也少了，找菜时间多了，伙食也改善了，队伍活跃了。再加上晚上的学习或娱乐，这支队伍就成了有活力，有朝气的队伍。其实他们这次的东北行，在这些方面的处理很好，整支队伍是和睦团结的。

三，他们的东北长征历时颇久，大概有8、9个月吧，这么长时间的脱离领导的在深山密林里活动，也得有一套，能使队伍活跃起来的生活方式，这点他也总结出3天休息一天，一星期休息两天，半个月至二十天，休息一星期，学习、工作要保持平衡，搞些整训，精神和体力都得到休息和充电，才有后续力。

这次的东北行，如若不是发生驳火之事，是一次很成功的完成新区的开辟和带动培养新兵工作，只是不幸遭此劫难，一切成功的因素，都被埋藏掉，剩下的是半辈子深深的内疚与自责。就在他跟我倾诉这一段经历时，他掏出了心里话：“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到现在还不能面对死去的烈士们。当时，我苦楚呀！我的背都被这种苦情给折驼了”，说时他滴下了汉子泪。战争就是那么的残酷，生死的到来，由不得我们，谁都不愿发生的还是发生了。

这起事件的发生，我以为和整体的民族工作的政策也有关连，应该说和领导上的错判也有关。因当时，三明他们出发前，我们全体民族工作的队伍在民族区有结合整训，搞了二月行动后，他们又再打了一次埋伏战。后来我们带新兵活动了一段时间，敌方已开始对我们有所行动，而在我们整训后，敌人就对我们开始行动追踪。我记得，那次整训之后，我和阿明（黎家文）的一队住点的周围也出现了大批的敌兵活动，赵德和奋忠就因出去侦察和敌兵遭遇而驳火，奋忠也因此失散，饿了十一天，经历了许多苦难后，在家人的劝说下，出去自首。而当时为

么会驳火呢？奋忠告诉我，不因什么，就因太麻痹大意，他们出去侦察时，是有发现一条踩得很烂的大路，而路上有兵鞋印（也许不是很明显吧）。因为太久没面对敌兵，没有敌情意识，而赵德以为是山猪路，奋忠说是敌兵走的，在两人争执后不久，就遇到敌兵而挨敌兵的枪火，其实他们的枪声距离我们的住点并不远。

而郭锋和晓阳带的一队去桑长屋也遇到了敌兵埋伏在点，他们也是因麻痹大意，出了事故，敌兵已埋伏在点里还不知道，情景也是险恶得很，好得是，当时他们是处于夜间，敌人没有明确对象，要不我相信也会有伤亡的。

我以为当时在培训新兵，开展民族这一工作政策上应该犯有左倾意识的，或对敌情的错判。当时，我的脑子并不十分会想，只是觉得很忧心。我是一个队伍的辅导员，我的思想并不过硬，我的战斗力很差，我甚至要花好多的时间和自己怕苦的思想在作斗争。我总想，一旦发生意外，我该怎么办？我能怎么办？我无从索取答案，只能时时检讨自己的怕苦的思想，要求自己与之斗争，要自己腰撑硬点，但一旦发生危险，我会出什么丑态，连我自己也不知。

我们队伍之所以没有遭受三明般的重大挫折，那是因为，我们的担子轻，我也幸运没遇上那么严重的敌情。

过后，领导上基于损失了 6 位朋友而对他严责，严责也许并没错，但在同时，必须了解，甚至谅解他的处境，他的困难。再说，领导上也没有对他当时的战略布局有所检讨，这也造成有的干部心里不凉。在严责他的失误之后，对他的其他方面的成绩要加以肯定。三明说：“我已把我自己的所有能耐（所有能拿出的本领）都掏出来了，还要我怎么样？”因这过程，他也付出很大的代价，也累积了不少经验为后来人所用。

三明的游击生活理念

三明说：他有个理念，这理念很科学，他认为，民众的生活很

多是取自自然界和森林，比如，家猪是来自山猪，家鸡是来自山鸡，许多藤制品也来自深山野林。所以要在森林里求生存，就要看我们怎么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把森林里的产物为我所用。所以他特注意自己这方面技能的掌握，就说走山路吧，他也不会走呀，他身为战斗队队长或工作队队长的只是依靠阿青和李红当尖兵。但在实践工作中，因自己不会而遇到种种困难，吃了许多苦头，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实地去掌握。过去很多的经验证明，不会跑山造成的损失，就在有一次，他们要去沐胶开发新区，前程当然是很艰辛的，当时，阿清并不想去。他是开发新区的负责人，他必须忠于自己的职责，他必须去，他和阿清说，他决心自己学会走山路，阿清在他的影响下，也决心和他共付艰辛之路，就这样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全心投入于走山路。从最简单的，走一段路之后，休息下来，他就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坐下休息看，走时回头再看，看什么？看许多特征，山顶，下坡，树头，歧路，河流流向等等的特征。走过那条河，那座山，走一段后，马上就回忆，连续走，连续回忆，晚上睡前再回忆，当时年青，记忆好，在记忆过后，在长时间活动过后，回来时他仍能记忆犹新的认识来时路。以致到后来灵活结合指南针，平面图，等高线图等他都一一掌握。他想切割到那里就切割到那里，在森林游击活动中机动灵活，纵横驰骋。因他的脑子已经是一副非常实用走山路的地图。

带了一支队伍（多是没有森林生活能力，尤其新兵又多）游击在深山老林里，粮食成为一个重要难题，除了起程时准备的一点粮食，或到某个长屋补充一些米、油、盐、糖之类，其他的就得靠自己向森林要。初时没经验，也没把精力放在伙食上，只顾开路行军，战士们生活是很艰苦的。后来积蓄了生活的经验，拨出精力来搞好伙食，队伍的精神好了，身体也健康了。三明他放下队伍扎营，自己就和生活能力较强的朋友去打猎钓鱼。队伍休息下来时，他也总想办法找路，所以他从不会狩猎到后来很少空手回，从不会钓鱼到会钓大鱼，甚至学会织网网鱼，还学会装“邦约”装了许多小动物，如山鸡、豪猪、山猫、山狗之类的。

1983-1984年间的某些时间，我曾和他相处活动了一段时间，当

时他虽然身体不大好，还是经常为队伍出外狩猎，我吃了不少他猎到的猎物 and 鱼类。我呀，还跟他去钓鱼。由於肩负重责，對於粮食的处理他很敏锐。有次黎家文从群众中得知邦督也能像硕莪般制成粉，他一听，真是个好消息。他想果真如此，那么游击队伍就能像潜水艇般潜游在林海里，想要到那里，就到那里。如果有敌情怕暴露，则可以轻易的避开群众潜藏到有邦督地方去做邦督粉，等有了邦督粉后再出击。菜类，反正路上能解决，可采邦督芯，可狩猎，可钓鱼，可装“邦约”。如果是果子季节时，更加不用顾虑。后来在 OMT 单位，首个去实践做邦督的朋友虽然不是他，但他也总结一些经验，比如在森林里，大概走多久就能遇到邦督区（7 天左右），邦督生长在怎么样的地势，他 1982 年进边区，就把这一技术带进边区，解决了边区的粮食荒。在边区，他还尝试做船……

建基地

我们单位也尝试建基地，最初试建是在混合区，是在 OYA 河的支流河尾。其实，我们的所谓建基地，就是在搞生产，搞口粮，只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又谈何容易。这除了与敌斗之外，还要与天斗，我们搞生产一个最大的难处就是不能大搞，但不大搞，老天就不让长出粮食来。在我印象中，最先去搞基地还是三明和家文夫妇打头阵。

有一次，我和阿禄两个人到他们的生产点，只有他们夫妇在点，到他们点时，是有看到种点木薯、番薯之类的，但长势很不好。因他们只砍小树，不砍大树，因为怕空旷会被敌机侦察到，但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吃饭时，三明对我们说，真对不起，我们没什么好招待的，真的是没什么吃的，只有稀粥配水煮晒干了的番薯叶。

Ulu Balingian 建基地，海燕不幸被压伤

Ulu Balingian 是比较深入内地了，这次是打算砍约十依甲的山坡地种稻，因此搞来链锯锯大树、小树一起锯掉。三明是链锯手，他故意从山下往山上砍树，而且每棵只是锯一半，他想等刮风时，利用大树

压下来，全部一起倒。那天其余的同志出外背汽油、搞粮，只剩三明夫妇在住点。厨房是建在稻芭边，隔着一座独木桥，和住点相对。由于开始起风了，三明吩咐海燕不可去厨房，可她说只是过去拿东西马上就倒回来。那知当倒回独木桥时，山上的树排山倒海的一片压下来，海燕被树枝击中掉到桥下去。

这时的海燕已昏死过去，他没命的找，才看见海燕昏死在树枝丛里，头部都是血。他赶紧把她抱到“朗高“处，一直敲打她，才把她敲醒。在细心检查下，发觉树枝把一片头皮撕开了四五寸。他找来一块布，两块布，三块布的压在头部都不止血，后来他只得用手掌和着布用力压在伤处才止了血，接着他又用针把它缝上了。我说你也会缝？他说在紧急时，只能这样处理，之前他已经为他人缝过两次了。

刚处理了头部的缝合手术，海燕肚子又骤然痛的不行，他估计是绞肠纱，大概是流血过多，又没补上水份造成吧，他没经验医，只得在肚脐周围全面拔痧，拔到不痛为止。

这些都是走在前头付出的代价呀！

做邦督粉为粮食

我听娇芳说，为了砍邦督，他还两次被邦督树压过，满身都是邦督刺，我听了为他害怕。因邦督刺有毒，被刺伤后是会发恶发脓的，平时被刺一针就已很痛了，可他是被邦督树压到，那痛楚可以想象。

他走出森林之前，和我一样也是第二次上砂印边区，和老洪他们相处，边区做邦督便是他传来的，在他传、帮、带之下，我们边区也开始了吃邦督粉的生涯。因那时我们边区的战备粮，已在敌兵空降围剿下大部分被破坏殆尽，是邦督养活了我们的。

最后我要说的是，他是有策略头脑的。

(一) 他之所以下决心学走山路，是为了能拥有机动灵活的战术。在莽莽的森林里，长距离的远离领导，要搞民族工作，首先自己必须能生存。而要生存，最重要的莫过于要能走路，许多流血的经验告诉他，不会开路，只走老路是要继续不断付出流血牺牲代价的。因此，他悟出许多灵活机动的办法予以应对。比如，上长屋，我并不事先暴露，而且隐蔽接近。他采用的是突然出击，那叫做掩然而至吧。上了长屋宣传搞粮后，必定隐蔽起来，估量着，如果群众去报兵，大概多少时间敌兵会来行动，则这段时间不联系原有的群众了，可以隐蔽，或行走他处。第二次，或是倒回头要再去这座长屋时，他就不再依老路走了。本来上回是从西边出击，这回可从东、南、北出击，会走路了，方法就多了，就能应变自如了。过去走老路和太相信群众而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他深有体会的说道，在我们单位这非常广大森林的民族区进行工作，“能走”要提到战略上来对待，我们游击在民族区就如进入大海般，海水多，敌兵是奈不了我们何的。不论是队伍去搞粮，不论是进行宣传群众的工作，不论是去开发新区，都要能“走”。能走在辽阔的森林里，就如鱼得水，就能避开危险，节省时间，生活愉快。过去铁轨似的路线走向，一定要即早弃之夭夭。

(二) 在长途行军中，他制定出他的一套生活制度。其实，长期脱离领导，少数人马活动在森林里，这原本对思想情感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为么？因前路茫茫，说不出的未知数之多；孤单、寂寞。如若再加上物质生活差，体力劳累过度，尤其是如果遇到敌情，那确实是莫大的考验。他就有这样的对细节的觉查：一次一位朋友背粮，他，没错，是个好体力的同志，吃苦耐劳，他背得很重，朋友们都称赞他能背。可是三明的眼帘就摄入这样的一幅景象，在大雨淋漓之下，他在沉沉的重负之下，站在雨中，筛糠似的抖栗。三明心里着实痛惜，他以为这并不是好现像，至少他不希望他的队友有这种现像。

一次，初时进入民族区活动，他为了找路，为了学开路，经常是快步捷飞的走，他的脚力好，体又轻，走起路来是很快的。在心急着要找路（因森林路不好走，经常要认山脉，看河流，有者要爬高树远眺

观望，有者还得走很远的路去确认准确的去向，尤其是找暗堑时更费劲）时，他就最好能飞。有次有两位新兵，据他说，是两位很好的新兵，至少他很满意，跟他去开路（找路），他拼命走，新兵拼命跟，也许那次有跟上吧。但只此一次，两位新兵就再也不想跟了，他们离开队伍了。这说明太过劳累是会怕人的，新兵走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和疏忽，他痛心不已，自己是怎么带兵的。这一而再的觉察和事故，他悟出长途行军，必须要有长途行军的生活制度，自然的他带头制定并实践了。这点他做的好，至少我很有体会，因为我后期很长时间里都跟着我的老公（阿禄）活动，我们人少，只有两、三个，三、四个人。我们是在混合区东南西北，大距离走，大圈圈转，可我们太苦了，我老公并不意识到我会苦，苦不堪言。本来就对前途不乐观的我，下更大的决心不干了，这不是反效果吗？所以我认为三明的处理是很正确的。

三明他整体上规定了休息休整的时间，每天及时收工养息。同志们体力上适应，物质上能改善，晚上再学习，唱歌，精神上的营养再滋润，第二天出发时，又是一支抖擞精神的队伍，游移在苍茫的森林中。

（三）民族工作应该怎么脱离困境

他接上民族工作时，那是民族工作多事之秋，我们 OMT 单位接连出事故，那都是因为群众的落后、无知而出卖造成的，而中游地区的民族工作更是事故、伤亡连连，叫人心寒，叫人心痛。我当时脑子不会想，在心痛之余，只觉的对民族工作缺乏信心，也有着不少的恐惧心态。但三明他作为民族工作的尖头兵，自己是要去碰撞的。因此他想的特多。在一次开追悼会时，在大家都在喊要为烈士报仇的时后，一连串的思想意识活动在他脑际。他想，难道我们就这么被动吗？一定要等到人牺牲了才来报仇吗？不能在牺牲之前做点事吗？我们得争取主动，群众落后，出卖我们，我们就不应该太相信他们。对他们的落后要认知，活动时，要主动出击，群众他会出卖我们，我们要有对策，我们要宣传教育、劝告、警告、限制居处，严重者锄特。碰群众之前要预先策划，要避免牺牲，减少牺牲。於是后来就有了一连串的对付敌特的策

略。可以说，后来除了三明那次牺牲了六位同志后，在民族工作上减少牺牲了。

三明说，他之所以能有这许多的经验、觉悟，都是烈士们的鲜血教育出来的。他说，他体会面对危险和困难时，会出现两种景况，一种是脑子像是被掏光，一片空白。另一种则是：这时刻就会迸发出聪明智慧来，以为解困，以为创业。

几次切肤捶心的记忆

一、三明说，他有几次切肤捶心的记忆，不说不快。当他带的队伍过 Kemena 遇敌情，造成严重损失后，他的脑子像是被掏空。他极为痛苦，极为痛恨自己，极为自责，只是职责在身，他要求自己绝对的镇定，要把队伍安全的带回去。因此，他在左思右想后，猛然间想到自己的特点是擅长走路，干嘛不要灵活机动的靠“走”来变被动为主动呢？於是乎，好的应对方法，就涌涌不断的被想出来了。解决了困难，把队伍安全的带回。

二、三明还有一个极为深刻的体会。他说人到思想矛盾极为剧烈时，什么状况都会出现。他说，就在他把队伍休整好，从第四省倒回的时后，原本绷紧的脑袋，松了下来，这时许多活思想跑出来了。他是要承认错误的，但是怎么去面对领导，面对同志们呢？那张脸要往那里放呢？沉闷之余，他离开点出去走走。可是尖锐的思想矛盾，使他对周遭的一切，视若无睹，结果原本很能“走”的他竟然也迷了路，他烦躁的在一条河的一段路，走上走下，连续几次的往返，总找不到点。有趣的是，他一直看指南针，又一直在怀疑指南针是坏了，指错方向了（其实指南针并没有坏，而是他的脑袋坏了）。在身心俱疲下，他想停下来砍树枝树叶铺地过夜了（他没带地图，只有一枝枪，一把刀和一个指南针），因这时，夜幕已低垂了。

可就在他想要歇下时，他高兴的听到邻近有人砍柴声，因那一定是同志们在砍柴准备烧火做饭了。他赶紧朝声音的来处走去，却原来

只是不远的距离，他叹了口气真是离谱了，走样了。这是他战斗人生的又一次尖锐的思想矛盾。

三、他指挥的第二次埋伏战（老江、学习和阿华牺牲那次），对他也是极为痛苦的一次回忆。那次的撤退，他原本已撤到山顶，要从山顶的另一向撤了，但听到阿华的呼救声，他又撤下抢救阿华，但阿华的腿受伤不能走，他只好把阿华整个人打横的扛在肩背上，因他还背着背包，不能用背的形式背。而当时他必须再次撤向山顶，那距离是有几公里远，而且是非常阻塞的子青芭，他背着阿华死撑上山，到山顶时（他已越过山顶，来到另一个小山伏），他已精疲力竭，那是真的精疲力竭的走不动了，只好停在小山伏处。他们驳火是在下午2点多，而他到小山伏时已四点多，晚上已不能走动了。他在那等了一个晚上，眼看着阿华的脚步一直流血，是动脉被打到，血是喷射式的流，阿华一直昏迷不醒，他背又背不动，只好守着。直到第二天早上十点左右，敌兵搜到，本来他是还希望能避过敌兵的搜寻的，只是阿华在昏迷的情况下，不知觉的直呻吟。三明一直掩住她的嘴，但却掩不住，掩住了，又怕不透气，把她憋死，他真是矛盾到了极点，捶心的痛。这又是个慌乱之下的失误，我以为没掩鼻子，只掩嘴巴是能掩住呻吟声而不会憋气的，更简单的可以用衣服或布类塞住她的嘴。可这样的事，当时为什么会做的不好呢？结果是敌兵听到呻吟声，马上停止搜索的声音。这时三明估计敌人已经发现了具体位置，他只好非常无奈的撤到附近。不久就听到手榴弹爆炸声，他抽搐着一个心，无声的痛哭。这整个过程的苦楚，是不能说个明白的，那记忆是不可能磨掉的，至今还在啃蚀他的心。

四、另一次，那就是他用链锯清芭，一片未倒的树，在大风中整片倒下压到海燕那次。他说，那次也是磨不掉的记忆，当他意识到刮风树倒将会是什么后果时，他吼声如雷的，歇斯底里的呼喊海燕快跑。可是他眼睁睁的看到海燕并不能如他所愿的脱离险境，她还在那！还在那危险区里，一声巨轰，那宣判了什么？视力内老婆的踪影消失了，被掩埋了。他爆发一阵歇斯底里的呼叫，飞着奔赴险区，他苦楚呀，这不是自己亲手害死自己最亲的人吗？自己不是成了刽子手吗？他一边深责自己，一边没命的喊（他说他把儿时吃奶的力都用上了）没命的扒开树干树枝。找到了，但却是已昏迷了，他还是没命的喊，狠狠的敲打，抖

动海燕的身躯，压她的仁中穴，直到她醒来，心才从冰窖里透出一点暖意。到他发现头皮已被翻开一大片，露出白森森的颅骨，没的说的，他马上变成一个最有办法的大夫，拿起针线来（普通针线）就缝。他到现在还总是觉的自己欠老婆太多，要好好的补偿她。这次的事故，更是负了老婆满身债似的。

我之所以要为三明写下这一篇文章，是我以为在我们 OMT 单位，他是走在头里，做在头里的，他的种种事迹是值得留下痕迹。

他从一个文化底子浅薄的农民分子，为了寻找公平，尊严，公道，寻寻觅觅，找到了革命路，惊为天道，一路追随，一路忠贞。革命组织指到那里，他奔赴那里，而一路走来，在我们单位，他干的并不简单，因他往往都在打头阵。因这头阵的功夫，充斥着探寻、摸索、总结、成功、失败的经历，而更多的往往是失败的经历。他从初时的总是睁着炯炯有神的双眼，满怀壮志的风华青年，到后来的碰得头破血流，伤痕累累，真是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几许风流，几许沧桑。

他至今还以为他没有走错革命路，尽管有着深深的创伤，他还以为，怎么说，他得到的很多，失去的很少。在他心中仍然怀着风雨年代的情怀，尽管我也认为他有缺点、错误，但是我欣赏的是他这种胸怀。

他最大的伤痛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在他负责之下，因为战斗，因工作而先走了的同志、战友。每当清明时节，上山扫墓，他的心情往往沉重异常，至今他仍然没勇气面对死去的战友们，他还在深深的自责。

浪淘尽多少惊心动魄的往事，今天他对诸事诸情的担当是他的情怀。只是革命么，那能没有流血牺牲呢？再说许多事，和整个组织的年轻，和某些策略指导的失误，是有关系的，并不能全由个人来承担。

“……一路走来，他累积了深深的疲惫和深切的自省”，也有着一份蕴存在心底的自豪。

新區民族



来自“乌鲁”的一股暖流

- 雁飞



对这么一个“乌鲁”地区的少数民族柏基丹，我们所懂的实在太少了，上长屋前少不了的顾虑会多一些。可是当我们从长屋下来时，不但背包里装上了群众赠送的米、菜、鱼，心里更豁然满盛着群众的热情和鼓舞。

这里的群众多数不大懂伊班语，然而却温文有礼，尤其是妇女们，总是满面笑容；一个女同志走到一个老 Indai 跟前与她握手，老 Indai 握罢竟俯下头来在对方的手背上亲了一下；一个妇女与同志聊了几下要回自己的屋里去，毕恭毕敬的鞠了一个四十五度的躬；治病针灸后，许多群众马上口称谢谢，有者感激地与卫生员握手，有的更马上回去拿蕃薯、木薯叶来；医毕一个妇女，她竟问：“给你们一条鱼可以吗？”真难回答，可她却拿来了一条肥肥的“登卡拉”，那是她当晚撒网的唯一收获。让群众看过照片后，一位从遥远来的客人问道：“可以让我带回去给本长屋的人看吗？”

饭后，我们简单地向群众作了宣传，一讲完，一个群众就问宣传员：“你讲完了吗？”当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就用本民族语流畅，全面地作了翻译，接着他又对我们说：“首先让我向你们致意，同时也代表大家向你们讲几句话。对于你们的到来，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但由于处在穷山僻野，没有咖啡、白糖招待，吃饭也没有好菜配，请原谅。

“你们的到来给我们很大鼓舞，由于许多人还听不懂伊班语，刚才你们讲的话我也翻译给大家听了，这使我们更加认识到今天全砂拉越人民的处境。你们所努力做的是关系到全民的利益，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你们的斗争，同时我们也深信你们的斗争一定会胜利的，就如我们自己在斗争中（指与木山的斗争），几番被当局调去问话和受威胁，但是始终我们不承认有错，因为真理是在我们一边，不是我们去侵犯别人

的利益，而是别人来夺取我们的财富和扰乱民生，因此，我们的斗争和你们是一致的。”

“如今，全部老百姓还在沉睡，当局对群众的小恩小惠就像哄着小孩在摇篮里，使他们沉沉入睡。然而再过十年、二十几年，老百姓总是会醒过来的，因为今天树上已开满了花，到时结成的果子一熟透，是不可阻挡地要落下去的。我们的国家确实富有的，但却被外人掠夺去，人民根本不能得到应有的照顾，而资源却越来越少，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在你们的带领下，人民是一定会起来斗争的。”

“今天我们只能算四十巴仙属于你们的，六十巴仙还是属于统治当局的，因为我们还没有上山，身子还在外边，不过，总有一天，我们是会跟你们在一起的。”

“你们所做的事业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保证做好严密，决不透露给当局。你们到这里有什么困难，我们一定尽力帮助，以后你们经过我们的稻芭，需要什么菜类、薯类都可以拿，只要做个记号就行。最后，我们祝愿你们工作顺利并早日取得胜利。”

情比水长，情比春暖，这来自‘乌鲁’的暖流渊远流长。

美里省本南人点滴

- 李华健



关于本南（Penan）人在吃方面，每年种的粮食最多仅够吃 8 个月（极少群众），大部分才几个月，有的才 2、3 个月。其余时间要靠硕莪粉、果子、猎物等。他们一方面是只种小块稻芭，一方面是还不习惯做稻芭，体弱多病，不能适应大量的劳动活，加上缺乏其他伴种，日子十分难过。每当到了年底缺粮时，大人们经常一天只吃一餐，有时甚至只吃“乌伯”，为的是尽可能多留足硕莪粉之类的东西给小孩吃。小孩、婴

儿也吃得少，抱在怀里的婴儿有的只能在奶瓶里倒些开水充饥。由于粮食短缺，时常挨饿，群众的体质相当瘦弱，缺乏营养，皮肤病、贫血等相当普遍。在我们所了解的群众中，除个别体格还算过得去外，绝大部分都是瘦小的。

衣着方面，用衣衫褴褛来形容是绝不为过的。住方面，木山公司有帮助建一部分，但也是极为简陋、窄小，一部分还住在“风雨飘摇”的小屋中，可谓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苦辣。

关于本南人的医药卫生和教育的问题。就我们最近的了解，在接近 20 座本南长屋中，只有一座长屋有小学，其他的既无小学，也无诊疗所，小孩要念书必须到远离长屋的加央长屋那边的小学去念书。但由于他们不习惯于长期远离亲人，加上加央人较轻视及欺负他们，因此本南孩子上学率极低，许多长屋都找不到念书的孩子（过去较多，现在几乎是风毛麟角）。

长屋里如有人生病，而要求于木山的车时，经常遭到拒绝，甚至有的因不能得到及时的医治而死亡。他们根本没有得到像某些舆论所宣扬的那些利益，有的只是被歧视、欺凌和被发展计划排斥在外。

关于本南人对我军的态度方面，我们认为他们相当友善、热情，某些优点是其他民族所未发现的。在那些地区活动期间，我们曾发动本南群众帮助背东西，带路（包括夜路）等，群众不但积极做，而且有的还是屋长亲自带头，效果不错。

关于他们和木山斗争的情况。他们的目标是想阻止木山公司开伐森林，他们虽然也有向木山资方讨东西，但屡遭挫折，已对此失去信心。他们认为，拦路不是上策，但他们能够做的只能如此吧了。为了后代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他们的拦路斗争遭到当局的镇压，而感受无能为力。



军民鱼水情

—东北行军

- 雁飞

这次我们不但宣传了广大的第四省各族群众，还宣传了第七省布拉甲县的部分群众。事前，这当中的情况许多都是未知数，敌情、地形、群众的情绪如何，陌生的一切有待在实践中寻找答案。

实在是令人欣喜的一件事，我们这次竟然碰上了巴基丹族(Bakitan)、普南族(Punan)、诗加邦族(Sekapan)、肯雅族(Kenyah)、达乌族、马兰诺族、马来族、伊班族、华族九族群，其中六族属少数民族，据说达乌族已是几近灭绝的民族呢。这些群众仅极少数见过我们，但一般都对我们热情、友善，仅有一个伊班族校长一见面就讲政府好，愿送我们去投诚。有的群众确实是对我们太缺乏认识 and 了解，加上又受当局宣传的影响，突如其来的碰头会使他们惧怕、冷漠，但只要我们与他们相处久点，几个钟头的时间就会使局面产生变化。

XXX

XXX

有一天行军路上，当我们刚在一个群众作了古怪记号的地方歇下时，就听到前面山腰有人杂声。不一会儿，一群老老少少出现了，突然打个照面，有的群众愕然，我们用伊班话叫他们不必害怕，当缓过气来时他们的态度已自然了。仔细一打量，发现这些群众面貌、肤色略有异于伊班人，某些装饰也较怪，如老妇女的耳环不是戴在耳垂，而是挂在半耳处，老 apai 双耳上边钻个大洞，不禁使我们好奇的问他们是什么民族。哦，原来是 x 族，这个名称许多同志连听都没有听过，而且这还是我们第一次碰到的少数民族呢！我们问一个读过书的青年：“你懂得我们是谁吗？”“懂，你们是共产党。”“会怕我们吗？”“不，我懂你们不会杀人的。”“你为什么懂呢？”“我听别人讲过。”我们略向群众作了宣传，群众捧出糯米粽和水果请我们吃，这粽子可有民族色彩，是用斗笠叶包裹呈扁形的地地道道的三角粽。我们也拿出山猪肉还礼，群众毫不约束的拿起就吃。“可惜我们现在是过路，没有余粮给你们，若你们须要米可到 x 长屋去取。”临别还一再表示道歉，船太小

不能载我们，不过附近有“朗高”可宿夜。握别了，还语重心长的嘱咐我们：“打到猎就过夜，遇到坏鸟叫就不要再跑，刮风时可得小心树杈跌下来哦。”才认识一个钟头多嘛，就使人感到军民鱼水融的气氛，这才真的是一见钟情。少数民族给我们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么美，这么好。

平平坦坦的一片片稻芭，在夕阳的余晖中镀上了一层金，沿着稻芭边的小路走一段后过了河，就到了巴基丹族的长屋，这长屋和伊班人的略有不同，没有客厅，只有细长的走廊。当我们一踏上楼梯，群众热情的围拢过来。才坐定，一个群众很快就讲：“我的兄弟的脚关节痛很久了，上次在山垄顶碰到你们，给你们针灸就好了，我腰痛，也请帮忙针灸。”“我也要”，其他的也争着要求扎针。一边针灸，一边聊天，不久群众请吃饭了，这家叫，那家也叫，没办法，只好请他们把饭菜集中在一处吃，结果三家端来了，其中一家是最先前带路的壮年人，他家已缺粮吃硕莪粉过活，看到我们来竟然借米煮饭请客，还想杀鸡作菜，只是没抓着，结果在夜过三更后还是送来一只大肥公鸡，最后还把几罐借来的米送给我们，真是情难却，意难忘啊！

已是八点钟了，有的群众还恋谈，舍不得回去吃饭，在我们一再催促下才回去。等群众都吃饱集中起来了，我们就开始宣传，我们的宣传搏得了群众的热烈掌声和附和声，一个群众当场主动把我们的宣传内容以他们自己的语言翻译给其他不会听伊班话的群众听。过后，一个青年人激情昂扬的发表了篇演讲，他说：“看到你们，我感到很愉快，万分感谢你们的斗争，希望你们取得成功。即使我这一辈子看不到你们事业的成功，但我的子孙后代能看到也是好的，他们以后生活就不用这么苦了。说到生活，我的父老前辈在殖民地时代反比我今天好，什么发展、提高生活水平，名不符实”他还说：“你们从河尾到这边来，有看到树胶树吗？都没有，我们长年累月住在这里，却申请不到土地，现在除了长屋外，其余的土地都不属于我们”提到大选，他表示不满 x 反对党的候选人临阵退堂，说是被收买。最后他还说：“我们心里是想反不合理的统治，只是没有出路。真是激昂群情的肺腑之言，引起了在场群众的共鸣。这个起来，还把自制的鱼枪刻上“made in China”。

一提到共同欢乐，群众马上搬来了录音机，播着自己灌录的沙贝音乐，乐声优美动听，比伊班人的更胜一筹。音乐一响，一个才不过五、六岁的小女孩情不自禁的坐在地上舞着双手，经身旁的母亲稍一推，她就徐徐站了起来，翩翩展开舞姿，只见她双脚灵巧的踏着拍子，转着身子，双手轻柔的翻扬，这时全场沸腾起来了，喝彩声、掌声如雷贯耳，然而小女孩似乎整个人已陶醉在舞蹈和音乐中了，她毫不在意，依然故我，轻咬着下唇，鼓起红润润的双腮，专心地舞她的一套，这个样子可爱极了。当她一曲完毕，就去拉另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这个也十分慷慨，伴着音乐，就势舞了起来，只见她舞姿更为熟练、美妙。紧接着又是一个约十岁大的女孩上台，头上还戴着一顶羽冠呢。群众是这么的热烈，没留一点空隙，一个紧接着一个，妇女、小伙子。壮年汉都来了，又是舞蹈又是拳术，在场的肯雅族兄弟也不示弱，也展示了他们民族的舞蹈，我们间中也穿插了些舞和唱几首歌，值得一提的是大人们每次上台都十分礼貌的向客人行个礼，下台时还一一握过手。欢乐间递来了酒，“美酒飘香歌声飞”，美酒助兴更浓，一个同志藉着舞蹈，向一位长者敬杯酒，只见老人乐得扬起脖子，一饮而尽，紧接着，他就来了个回礼，又见他端一杯酒坐这个同志的跟前，一边唱起敬酒歌来，歌中唱道：“看到我们的朋友到来非常高兴，……敬你一杯酒。”随着他双手把酒递过来，全场的群众配合的长长“呜”了一声，然后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一直闹到半夜，这令人难忘的军民联欢才结束。一家群众还特地煮来米饭给我们宵夜，另一家群众又抱来了一只鸡。

这座长屋的群众并不富裕，但却十分合作的卖给我们不少的米。一夜少眠，第二天凌晨，一些群众还摸黑顶寒的驶船去帮我们购物呢。

天亮了，我们表示该走了，送我们的群众可真多，得分乘两只船。半路上，我们还拜访了宿夜稻芭“朗高”的群众，昨夜不在场的群众端出甜酒请客，还送了米和菜。群众一直把我们送到不能用船的地方，才依依回头。这那里是初次谋面，简直是送别多年老友啊！

这里的群山长得那么婀娜多姿，天天对着镜子似的江水自我骄傲，今天哪，一抹紫红色的晚霞从天边掠过，更增添了它几分姿色。这是一副美不胜收的大自然画面，正对着这副美画，是小市镇似的长屋群，里面住着诗加邦和肯雅少数民族。上长屋该上哪？还得请人带路。我们先上诗加邦长屋，我们这边才坐定，那边已有好些群众自动送米给站岗的同志。“吃饭了”，一个青年人操着厦门话叫我们吃饭，这时有个群众从外面抱来了半打的罐头请客。入夜，送米的人越来越多了，还得专门由一个同志接收才来得及，某头人[注一]更是慷慨的送给我们半包米（一包米为100公斤），这还是第一次见到群众送这么多米。某头人叙古说：“日本时期，其他地方的华族不少惨遭杀害，而在我们的保护下，这一带的华族没有一个被杀，不信你们可向这一带的华族了解。”接着又当群众面前向我们发誓说：“你们不用怕，我们是决不会害你们的。”

吃过饭，群众要求医病，人实在太多了，两个卫生员各被一大圈人圈住，足足忙了两小时，宣传员那儿又是另一个大圈，包围住的尽是群众，大概有二百人吧，（这个数目只是全长屋人口的一小部分）要找个同志可真费力，还得扯着嗓子喊，甚至必须劳驾群众走一趟。不久，忽见门外有一条长长的火龙阵，带头的是一盏大气灯，后面则是几十把的手电筒。怎么一回事？原来是隔邻的肯雅族闻声赶来求医、探望，这个民族肤色较白皙，许多少女长相挺像华族呢。

讲个笑话，这座长屋有的人对我们毫不了解，我们刚到时，有的群众偷偷的问那里的教师说：“这是些什么人呢？是不是日本兵呀？”那教师反问：“你看呢？”回答说：“很像呢。”这也难怪，因为他们一辈子只见过日本兵而已。更有一个受过中等英文教育的青年看到我们到来，忧虑得没心吃饭，以为我们要去攻打布拉甲市镇，要求让他把孩子、兄弟召回来先，他找这个谈，找那个讲，几乎所有的同志都向他解释过了，他才安心回去吃饭，分手时，他热情的说：“以后请写信给我。”还介绍了他的通讯地址呢！

认普南族还是这次碰面才开始的，但奇怪的是她们却先认识了我们。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 Panang 莖顶针灸好了我亲戚的脚关节痛（其亲戚为巴基丹族）”。这么快，一处传一处，一族传一族，竟然又传到了这偏僻寂静的河尾，可见不但少数民族给我们留下了美的印象，我们也在他们的心印上了好的影子。一见面，就像款待老友似的谈笑风生，并端出咖啡、饭菜请客。

几天的相处，把军民感情给融在一块了，连小孩子都俏皮的作弄起我们来了。几天里，我们和群众一起吃饭，一起撒网捕鱼，我们帮群众劈柴、照料小娃娃，群众撑船载送我们；我们住这家，那家就送鱼、送菜，甚至还特地送来一只鸡。这儿生活费十分昂贵，而且不管去市镇购物还是回长屋路程都十分遥远，但群众还是三餐甜茶招待，我们还天天听群众讲神奇故事，真是亲如一家。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对岸的群众冒着激流洪水过来送别，脸上现出难舍之情，船远去了，一群大大小小还是不住的招手示意。一个壮年人握别时还恳切的说：“我们这儿很偏僻，政府兵不会来，以后要来这里找我们啊！谢谢了，大阿哥，您的盛意我们心领，您的热情我们牢记，再见！愿您工作平安，年年丰收。[注二]

这次几遇少数民族，无一不给我们留下既深且美的印象，别了，阿玛、因娜、咿呐们，祝你们健康长寿！

[注]：阿玛、因娜是巴基丹与诗加邦语，意为爸爸、妈妈、咿呐是普南族语，意与上同。

我们所碰到的伊班族大多数也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们表现得相当热情。有一个地方，一见面，一个老人就说：“看到你们这么勇敢，我很高兴。”并说：“我这一生没见过兵，今天可真荣幸，早上走了政府兵，下午又来了你们。”还说：“现在兵已跑了，你们要去别地方的

话，我们可用船送你们一程。”我们婉言谢过就离开，几个妇女、少女把我们送到路口，我们上了半山腰，回过头来还与她们饱含感情的目光相遇。

XXX

XXX

一天，几个同志在河里嬉水，碰上了两个拉藤的群众。一见面，Apai 亲诺的举起拳头，作状要打一个同志，接着就笑呵呵的把臂共行，似乎跟我们很熟悉，其实还是初次见面。得知群众已两天以“阿扁”芯充饥，我们赶紧煮饭请客。傍晚时，Apai 带着两位同志冒雨撒网，打来了十多斤的鱼，全给了我们，其中一条足有四斤多重呢？那晚，他们就和我们一块儿宿夜，雨是下得这么大，瓢泼似的，但油灯下军民欢谈至夜半才罢，凌晨不到五点，老 Apai 又把同志拉起身畅谈。

XXX

XXX

副总司令 Ubong 的亲戚可真多，在第四省我们也遇到呢。一听到“Ubong”群众就关切的一连串问道：“他在那？有来吗？家里人呢？”他们为副总司令感到高兴和自豪，一个老 indai 还说：“我的丈夫过去是和他一起参加反对党的。”

许多华族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积极捐物质、捐钱，有的在政治上关心、古舞我们。

在一个工地宿舍里，当同志们一踏进屋子，热哄哄的笑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难道他们遇到了家乡的老相熟？！”站岗的我心里这样的猜想，可是当我也进屋子里时才发觉到全是陌生的面孔，这些工友可关心政治，而且十分健谈，由国际到国内都谈，一个群众诚恳、真挚的讲：“我看过了，xx 一带地形很好，很适合你们建基地。”“你们该学中国打坑道战嘛”又一个说：“请向领导上代转我的意见，处死特务一枪毙掉就算...”话还没落音，另一个就抢着说：“也请反映我的意见，不能像他讲的那样，罪大恶极的家伙要让他慢慢的死，才会起杀鸡敬猴的作用。”旁边的一个风趣的附和着说：“哼！走狗还会走，就把

他的脚板割掉一层，手还会抓就把他的手砍掉，一步一步来。”这时“两派”激烈的争论了起来，好象非把累积多年的心里话全都倾出来不可，当看到自制军用枪时，对他们古舞就更大，一个群众更是马上回房间拿出一本有关武器的书籍来给我们说：“里面有很多种枪的材料，你们拿去作参考”。

这次所碰的群众给我们留下的初步印象是：华族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比较消极看待，对我们则满怀希望，而其他民族一般在政治上是比较无知的，但我们给他们刻下了“好人”的印象，他们在人情上、道义上是支持我们的，经过教育，是会成为我们的同盟军的。

[注一] 后来，某头人逝世，我从报章刊载的新闻上得知原来他的头衔是“天猛公”，当局还专派直升机运载他的尸体。《拉让江遇险记》一文所述即是天猛公安排一个巴基丹族老伯(Apai Kita)送我们到下游靠近巴拉固斯险滩附近上岸。

[注二] 这里是达斗河尾 Kakus 河，住着专门靠采燕窝为生的普南族，他们讲的神奇故事就是有关石洞及采燕窝的，就是这里的一个普南族带我们深入一个石洞即《新奇的游览》一文所述。

情意绵绵源水长

一雁飞

我们飞艇遨游巴南河；我们征服砂州第二高峰——姆禄山；我们代表北加人民军首次巡礼汶莱；我们泛舟婆罗洲第一大淡水湖——罗干布奴(Lozan Bunut)；我们漫步在弄拉玛(L. Lama)的街灯下……。正当老区及第一省革命失利的消息频传时，我们在北加革命史上写下一页又一新记录，这除了靠同志们的奋斗与胆识外，群众是我们精神与物质的支柱。且看！

一次，我们急须某种药物，找到一家群众请他们帮助购买，由於家长不懂情理，家庭成员徒有热心肠也不敢帮忙。于是，再找过一家，家长却不在，年青人不敢作主，我们好说歹说就是说服不了他。第二天，家长从巴刹回来了，一听之下，不客气地训斥了青年人，为了我们之所急需，他马上乘船到小市镇，然后改搭飞机火速到美里去购药，然后再搭飞机回程到小市镇，接着乘船回来。原本起码两天的路程，他却一天来回，不但不收分文，另外还捐了一些钱和物质给我们。为替我们购买东西而专程搭飞机，这在我们的群众工作史上恐怕还是头一遭吧！

xxx

xxx

这一家子还是头一回看到人民军，可是却表现得很热情，为我们保干了一星期，期间不但买菜给我们，还捐了鸡、衣服及钱等。同志们在他家吃几顿饭不算，单单是到他家喝的美禄、豆浆等甜茶就接近四十杯（有时竟一天内三次献茶），更可贵的是，还为我们与远地的群众会面引线、带路，甚至冒着危险帮我们做了一件很难得的事，途中果然遇到了难关，不过他还能硬着头皮闯了过去。

xxx

xxx

这次我们又多碰了一个少数民族——巴拉旺族(Barawan)。

有一个巴拉旺姑娘听说我们来到，很想见我们，来了一次又一

次, 后来还亲手烘制了三个大奶油蛋糕送来, 真是吃在嘴里, 甜在心头。

在与亲人聊天的过程, 她感到我们的生活很苦, 她的亲人就跟她说: “那你还有什么东西送给他们?” 找来找去, 终于把母亲送给她的一筒糯米和二包椰浆粉专程送来。为了纪念, 她还特向我们要照片。要分手时, 她十分的不舍, 与女同志一握再握手, 最后站在窗前, 从黑暗中一直目送我们离开, 由于我们是前后分组乘船走的, 所以她至少站了半个钟头。

xxx

xxx

有一个没读过华文的英校生群众, 在其友人带领下匆匆赶来会晤我们。在十五分钟的会晤中, 同志问他: “你看我们这样做会好吗?” 他很直率地回答: “有好也有不好, 好的是你们的坚持使有关当局不敢那样马来沙文主义, 不好的是你们的主义太残忍了, 乱杀人。”我们问他: “你怎么会懂得我们乱杀人呢?” 他说: “伊兰的科梅尼不是动不动就杀人吗?” 他把共产主义革命和科梅尼的革命混为一体了(这位仁兄也是够可以的, 既然认为我们那样恐怖, 怎么竟忘了他的出言岂不是要遭杀身之祸吗?)。第二天, 他又偕一班友人来口沫横飞地大谈特谈长达四、五个小时, 我们再问他: “我们会像科梅尼吗?” 他不好意思地答道: “那是误会。”

这个群众非常健谈, 也很诙谐, 还挺关心我们地说: “像你们这样的生活, 维他命 C 最重要, 跑芭的时后多吃些糖, 能增强体力。对了, 泻肚时盐加糖泡水喝, 止泻神效, 还有森林里冷, 多吃辣好……”别以为他只是瞎吹牛, 除了落力帮助我们办事外, 还拿来家里吃的马铃薯、茄子、包菜及数斤姜母呢, 这个变化多快?

xxx

xxx

有一个木山的群众特别喜欢与我们聊天, 他们有时是专程结伴前来聊天的, 一聊就是几个钟头, 最久的一次是八小时(间中只是回去吃晚饭、冲凉而已), 有时甚至是站在烈日下谈上两个钟头。由于不让个别群众跟来, 他们还要施展声东击西、调虎离山计等, 要不是怕这群

众生疑，他们还会多来几次。扳着指头算一算账，在两次碰头的数天时间里，共聊天约三十数个钟头，真是破记录。到底聊些什么呢？什么都是聊天的内容；什么心中的苦闷；家史；找对象的难题、打猎趣闻、对现实的不满，再不然来个对联等。其中笑话还真不少，聊时有时是“团体赛”，有时是一对一，真是融洽得像一家人。可是他们竟意犹未尽，本来已一两晚没睡好，而当天又工作得很累的群众，原已说定当晚得早点回去歇，可是一听说我们过两天就要走，就舍不得跑了，他感慨地说：“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老校友，这一别也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再相逢呢？”於是聊至半夜才归去。（果然，至今已过了二十年，我没有碰上这位当年因调皮而扬名全校的同学。）

我们特别感激的是，这是在他们捎来第一省革命坏消息给我们的同时，为我们消除了不少烦恼，增添了对群众积极性的信心。

有一天，其他群众打到吠鹿，送半只给他们，可是拿到了家，却只剩下一腿了，另一腿则半途转送人民军去了。

还有一次晚间聊天，他们还特地带来饼干、可乐共享。除外，他们还帮我们做了不少事情和给予一定的捐助。

xxx

xxx

有一次，当同志正和群众交谈时，突然给其他人（为该群众之友）闯到，其实这新来者并不怀疑我们的身份（由于我们身着便装），但群众却主动对他说：“你懂他们是谁吗？他们就是我们的靠山。”当同志送相片给这群众时，他要求同志签名，并说：“将来有一天我进森林找你们的同志时，这就是证据”。

xxx

xxx

我们同志化白上一个华族群众家，当表明身份后，老头子显得不相信，一副冷漠的样子，问他有一句没一句的答着，他的妻子甚至讲：“山芭来的人？吓死人罗！”接着老头子索性不理睬同志们，自看自的电视，而且不时挪移椅子，越挪离同志们越远。至此，同志们也只好傻兮兮地陪着看电视。这老头边看戏还边偷眼瞧着同志们。一个多钟

头过去了，戏也演完了，同志们只好再尽力向群众宣传。这时，老头似乎开窍了，椅子又不断从远处向同志们靠过来，越谈兴趣越浓，已是半夜时分了，他还端出黄梨请客，他的妻子感到不恰当，又去泡来咖啡，同时还捐了米、罐头和一些难得的物质。当同志发传单时，老头子竟开起玩笑来：“拿去报馆登，不然贴在墙上让大家瞧瞧”。说罢还煞有介事地往墙上比划。

xxx

xxx

我们同志在一个群众家里与主人聊着，主人客客气气的不在意，可是当同志向他表明身份时，他忽地站起来紧握同志们的手，嘴里却不住地说：“啊，欢迎，欢迎”。然后就热情的为我们介绍情况，并摆上猪肉、鸡肉等丰富的菜肴请客。才吃饱饭半个多小时，他又摆上茶点和整十样的糕饼、糖果（时春节甫过）。同志要走了，主人叫其儿子相送。分手时，年青人先后紧握每个同志的手一再叮嘱：“再见啦，你们千万要小心噢！”

第二天，由于某种原因，同志们又倒回来，这次主人端出更多样的糕点请客，还捐了一些东西。

在一个素昧平生的群众家里，同志们与主人聊着，刚好隔壁的妇女到来，主人跟她讲我们是木山工人，她蛮相信的，过后，又有一个青年人到来，同志们只好躲避，可是主妇却过来叫同志们：“别怕，这个人很好，可以碰他...”当同志们走出去时，已听到主人在向年青人作宣传：“...他们是初次到这里，人不多，不过在加帛那里可就多啦，一班就有三、四百人，我弟弟在那边工作亲眼看到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人一点力量嘛.....”

果然宣传有效，第二天青年人捐来一百元，而这“宣传员”也不失诺言，花了近百元为同志们购物。

当我们把老区寄来的录音放给群众听时，女主人马上拿来另一架录音机，把歌曲录下来，说是要留着慢慢欣赏呢。

在一个群众家宣传后，要离开时，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手捧着笔，红着脸挨在女同志身边，真摸不清她想做啥，一问之下，原来她想与该女同志交笔友，正问明她的姓名、地址呢。

xxx

xxx

我们撑着木筏遨游布奴湖，很高兴又碰上一家布拉旺渔家，才走进屋来，Indai 就泡来咖啡。同时，两个老人家和蔼可亲地与同志们攀谈。介绍情况。他没问我们是否用过饭，可是入夜九时许，Indai 还煮来香喷喷的红米饭，并摆上六道菜请客，其中一道竟是整只的熏乳猪头。饭后，年青人回来了，一进门就问我们用过饭了吗？这是个很有讲话艺术的人，尤其是那奇特的比手划脚，更往往令“听众”精神为之一振。夜深了，我们表示要借长舟及挂尾车回航，群众爽快的答应了。为了让我们提神，年青人又特地泡了一壶咖啡，并说这是渔家熬夜的好伴侣。分手时，Apai 拿了一个饼珍要装鱼给我们，做儿子的见了说：“这怎么够，应该送他们一袋。”说着找来一个肥料袋。

鱼并非在屋边，还得乘挂尾车。於是青年人专程带我们去捞，来到沉于湖中的大鱼笼边，他一“捞基”，一“捞基”的捞着活蹦乱跳的鱼，在我们的一再制止下，才没捞那么一大袋，否则真又要创记录了。

除了送鱼，群众还送米、送刀、送子弹而不收分文。

xxx

xxx

“请问你会讲华语吗？”“不会”“那我们就用厦门话来说吧，不过，我的厦门话是半桶水的。”“不要紧，我会听得懂。”“我们是北加人民军”“啊！什么？”“我们是共产党”“哦，就是什么 komunis？”“是的，有听说过吗？”“我是什么都不懂的，你们做你们的，我管我的肚子”。因此，同志心里在盘算着，碰到一位只管肚子的人，恐怕难办了，应怎样跟他谈呢？正在这时，那群众又自我介绍说：“我姓 x，你有什么事吗？我可以帮你去找 x 先生，我决不会害你们的。我今天很幸运了，我听说共产党的名字已经二十多年，今年的今天（说到这他扳着指头，重覆说一遍，今年 198x 年 x 月 x 日）才第一

次见到，大概今年会有好运了。我是 xx 地方的人，那里的人最没有用了，没有一个当共产党的，我年青的时后，如果会找到共产党，一定会参加的，可惜现在不能够了。老实说，还好有你们在，要不然华族一定会更惨……”

这位“只管肚子”的老兄，对我们的革命事业却破例的关心，叫他介绍情况，他说：“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更清楚”，于是花了近二小时为我们带路，一路上他的话匣子始终没停过。

“你们应该找个大老板作后台，最好是一个国家，这样定时开张“卡”去“沙英”(sign)一下，经济就不愁了。你们的武器怎么来呢？应该去攻打小城市如弄拉玛市，那些警察不必打他，叫他们投降，武器拿来就可以，等力量大了再去攻打大城市。新年时，你们也应该去大城市走走，那里群众会捐钱的。现在的年青人不会想，那么失业的人应该联合起来签名，去政府那里找工作，告诉他有工作做吗？没有我们就去当共产党。假如你们有“乌必士”一定会有很多人去找工作的，你政府不给工作，我们就去做共产党的工，为什么不可以呢？”

当我们让他看枪支、照片时，他再一次连声道：“我今年好运了，会中万字票了。哎呀！你们也有女的？她们会受得了吗？你们实在厉害。”

这位群众还花了两天的时间，冒着雨和危险，落力的帮助我们克服困难。他一再强调说：“只要我们有能力办得到的，一定帮你们办到底”。同志们握着他的手说：“很感谢你！”，而他却说：“谢谢你们啦！”。

第一天见面时，几位年青人只是热情的和我们聊天，可是第二天，他们主动拿一些东西来。当听说我们要去 x 地时，又主动提出要帮忙带路。为了避免碰上其他人，几个年青人商量一番后，互相配合，顶着黑夜，一直把同志送到 x 地。其中一位年青人说：“我们昨天不懂应该怎么帮助你们，作晚看了你们给的传单后，才懂得怎么做。”

稿于 1987 年 2 月

头一遭接触汶莱伊班群众

雁飞
勘探



汶莱是婆罗洲北部三邦之一，同时也是北加革命烈火必将燃遍之地。这次我们翻开历史新的一页，对汶莱作了个小巡礼，这意味着北加人民军是有生命力，有战斗力的；意味着革命的发展是有希望的。这次到马来奕河的巡礼，使我们对汶莱有较真切的局部认识。

翻山越岭，长驱平原，我们深入汶莱境内，这里原始森林保存良好，据说极少有木山开伐。

走着，走着，不觉离长屋只有半天来远的路程了，这里山猪足迹很多，当我们稀里哗啦地走过一片平原密林时，一头山猪竟然肃立在近旁“检阅”我们的队伍，结果给最后一个同志“鸣炮”还礼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在汶莱境内十数天里，我们至少遇上 16 头猪和吠鹿（有意和无意），而猎取到手的为两只猪、两只吠鹿、和一只猴。两头猪还是蛮膘肥的呢，真是为我们今年大开斋。为什么这些野兽这么呆头呆脑的呢？原来自从“12.8”起义后，汶莱政府当局大为恐慌，民间枪支全遭没收，迄今还是全民无枪，偏远地区的农作物常受到野兽（尤其是山猪）的糟蹋，可群众除了装“邦肉”（即陷阱）外，也没法可施。

上长屋了，其实这长屋并不长，可是在码头边我们发现到很多挂尾车，而且一架架马力很大。原来这石油小王国里，汽油的售价十分廉宜，一加仑才不过二元半，与土油同价。

走过一座长桥来到长屋，这屋子建得结实、宽敞，我走进两间房间参观（两家摆设大致相同），其摆设更是在众多长屋中所没见过的。不知是节日将届还是平日也是如此，百叶窗悬挂着鲜明的窗帘，宽

敞的房间里不但铺上胶质地毯，而在拓为客厅之处更是铺上美仑美奂的绒地毯，其上更置有整套的沙发、小桌；小桌上摆着花瓶，沙发的靠背上则搭着绣花巾，旁边架上更有许多古董似的小摆设，数个玻璃橱内放满了五颜六色的玻璃杯；一架电风扇猛吹着两个熟睡的小孩。在厨房还置有一个冰柜，煮饭主要是用煤气炉（煤气一桶售价为十元）。其中一家的客厅还置有一个美丽的格架子，上面摆着的奖杯、奖牌至少十个。许多妇女、少女都戴着不少金首饰。在我们了解之下，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职业，有可能是因为物价便宜，所以群众的购买力才相应显得高。其实，这里的群众上街购物是很费时间的，这么大的一条河，并没有一艘快艇通行，只靠自家的挂尾车，没有宿夜，不用想往返。

据了解，在汶莱每人可得免费教育至九号。在长屋里，我们还看到一架话报机，据说是卫生局给的，以备当有孕妇临盆或有重病患时可通电。而当局直接派直升机运载，另外还有一架电视机，据说也是政府发给的。不过，汶莱的种族偏见还是明显的，例如：汶莱虽然也有相当数量的伊班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但却没有伊班学校，电台广播也没有伊班节目；学生要申请奖学金出国留学，除马来族外，其他民族鲜少，而且条件限制得相当严格。再说，政府最高的统治层，除马来族外，没有一个外族的。

长屋群众表示很高兴看到我们，他们热情地煮饭款客，端出传统节日的糯米酒来，还捐了糯米、粳米、盐等。而我们的回礼也不薄，二大包猪肉算是为他们贺节。他们很善谈，围成几个人圈和同志们攀谈。可是当一组同志向群众展示枪支时，忽的一下，其他圈的人全不见了，不管是妇女还是小孩全部涌到这一头来争看枪、瞄枪，爱不释手。这情景也是我在长屋中首次见到的。有的群众讲：“给我开一枪多好”，又一个讲：“能听一听枪声都爽快。”有的群众更劝我们不要走，明早一起去打猎，可见他们对枪枝是多么向往。离开长屋后，我们很想再打一头大猪送给他们，可惜慢了点，太远了送不到。

当我们离开长屋时，数十位热心的群众与我们步行了数分钟，到了码头大家依依不舍的道别。我们已上了船，群众还在不断挥手吩咐我们再来。

虽然离开汶邦已一段时间了，但群众热情的表现，一直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尤其是在短暂的集会上，当同志发言后，一位代表本长屋群众的老 Apai，他的发言更令人感到亲切和鼓舞。他说：“今晚你们的到访，我们是非常欢迎的，你们是一支人民的军队，是为维护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我们怎能不高兴和热情的迎接你们呢。”

诚如你们所说的，汶莱、砂拉越和沙巴原是统一的国家。如今你们为砂拉越的独立而斗争，为争取砂、沙、汶的统一而奋斗，是很令人钦佩的，我们是很支持你们的。其实，我们的祖先很多也是从砂拉越来的，如今许多亲戚仍在那里。我们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是最好的，我们希望你们能取得胜利。我们也尽我们微薄的力量帮助你们。由于我们处在深入地区，没什么收入，经济不富裕，因此如经常供应粮食、物质（指捐送）给你们是有困难的，若久久一次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这里与外界来往不多，可以说像今晚这样到这里是安全的。我们也会为你们保密，请放心，不过你们以后有到来时，也最好还是以平民装束先来探访，因恐万一有其他外人在，一方面也因我们这里以及附近的长屋群众对于武装都很少见，可能会害怕。

最后，祝你们珍重小心，和工作旅途顺利。

稿于 1987 年 2 月

苦難的伊班群眾



苦难的伊班妇女

山区的伊班兄弟生活够辛苦，世世代代过着半原始生活，难以摆脱饥寒交迫的命运、普通伊班妇女的苦楚比男人多。譬如种稻芭，除了砍大树外，其余的工作几乎是落在妇女的身上。在家还要负担起照顾孩子和各种家务工作，即使是休息时还得忙着做草席、篮子等手工、尤其在生育方面、卫生条件差、医药缺乏营养又不足，只好听天由命。故此，妇女的病痛也会较多，难于得到治疗、疾病痛苦缠身，加上文化落后，在对待婚姻问题上较随便，被男人抛弃的妇女是屡见不鲜的。

这里我简单的介绍二位妇女的不幸遭遇。

(一) 老 Indai 的苦处

在那山坡上，有座简陋破旧的小“兰高”，住着一位年过六十，皮包骨的老 Indai，皱纹布满她那黝黑的脸孔，颈项还长大泡颈，连转头都有困难。她那瘦小的身躯抵挡不住长期营养不足的折磨，造成经常有头痛、腰痛、风湿痛等毛病。但为了生活，老 Indai 仍拼尽全力的砍芭、种稻、拔草、割稻，几乎样样都是靠自己那瘦骨如柴的一双手。她一年至少有半载独自一人在稻芭小“兰高”。勤劳的老 Indai，每天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一天只吃两餐，有时还得以杂粮充饥。她痛苦的对我们说，不知多久没有尝到食油。她经常以盐头和野菜送白饭。

老 Indai 有个儿子，年青力壮，因长期受不良的环境影响养成了懒惰，经常呆在长屋，游手好闲，是个名符其实的懒惰虫。他那肯为母亲出力，帮助种稻芭呢？也不管其妈独自一人住在小“兰高”与蚊子、小狗为伴，也不管为母的病痛。可怜的老 Indai 忍住一切病痛挨饿，为了一家二口的生活，拼命的干活。

一年复一年，老人家不知付出了多少的血汗，吃尽了多少的苦。老人家本指望儿子长大能抚养她，她也可分享一点清福，现在这个

指望儿子长大能抚养她，她也可分享一点清福，现在这个指望已成了泡影。她老人家痛苦又信任的对我们说：“唯有希望你们能解救我们呵！”

（二）哑女吃尽苦中苦

傍晚我们来到大河边，看到河中远处来了一条小船，船上有两个人，前面站着一个人，后面坐着一位老 Indai 在掌舵，她们吃力的划着，与那急水浅滩搏斗，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好大的气力。小船渐渐的由远而近，我们仔细察看，哎！那个不是久别多年的哑女吗？是，是她，她俩汗水夹背，下气接不着上气，特别是哑女脸色苍白，豆般大的汗水不断的从脸上滴下，靠近她还会听到气喘的声音，多辛苦呵！多可怜！

我暗想，哑女身怀六甲，莫非她已找到了心上人？这回总算嫁给人家了，但愿如此。后来听老 Indai 讲述后，我感慨万千，哑女原来又一次受欺骗上当了，（她曾被人欺骗一次，并生下一个孩子）那些坏蛋早已逃之夭夭。哎！她独自忍受，这一切的痛苦，身怀六甲与往年一样，砍树、烧芭、种稻，样样都得靠自己，有谁会同情她呢？

她处处受人鄙视，有苦难言。因她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连带几分傻气，周围的人看不起她，坏蛋专门找机会玩弄她，欺骗她，他父母不理她，说什么“哑女可惜是人杀不得，若是动物早就杀掉她，留着一点作为也没有。”哑女只不过有几分傻气，为什么该受到如此的待遇呢？这个社会太不公道的了，其实哑女是善良、老实的，从小就热爱劳动。她很勤劳，在种稻芭方面是不输于人，她每年做一大片稻芭，收成不错，除了能自供自给外，还能供养一个小女孩。

刚过一个月，我们又去拜访哑女。感到突然，怎么她的肚子瘪了？留给给她的是那苍白憔悴的脸，更瘦更虚弱的身体，连背也有些驼了，好象老了几岁，令人同情不已！有个同志悄悄对我说：“哑女肚子并不大，为什么这么快生产了？可能是流产”，话音未落，隔壁房间传来哇哇的小孩哭声。啊！她是十月怀胎，只因营养不足生个皮包骨的小千金，好似小猴子，够可怜！

老 Indai 感慨的介绍哑女生产的经过。近来稻芭是进入拔草季节，勤劳的哑女天天忙着拔草，晚上在稻芭“兰高”过夜。没想到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哑女产期已到，它肚子一阵阵的剧痛，她想去大河对面稻芭“兰高”叫老 Indai 来帮忙，但屋外下着雨，她没有手电，土油灯又没有土油，去不得，怎么办呢？只好听天由命。

到了凌晨四点多钟，月婆婆过意不去，驱散乌云，发出朦胧的月光，哑女高兴了，这回可去找老 Indai，她忍着肚痛，在崎岖不平的小路慢慢摸索前进。到了大河边，她找个浅滩过大河，聪明孝顺的小生命不忍心让妈妈这么早在寒冷中涉水过河。她急着要出来看看这个世界为啥这么不公平。突然“哇”的一声小生命降临在沙滩上，多凄惨呀！多危急呀！若慢几秒钟小生命就要跌落在大河中，不去见海龙王也会闹出一场大病来。

可怜的哑女倒在沙滩上，唤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理，大声喊老 Indai，但老 Indai 经过一天的劳累正睡得深沉，加上耳聋，啥也没听到。哑女看到小女孩出世她很高兴，人也变得格外的聪明，她不知那里学来的功夫，也懂得护理并用沙龙将孩子包着，紧紧的搂在怀里。

此时，天渐渐的亮了，哑女忍着一切痛苦，拼尽全身气力，喊了几声老 Indai，然后抱着小女儿沿小路回“兰高”。老 Indai 在梦中好似有人在喊她，老人家赶忙起床跑到大河边察看，看到对岸沙滩上有血迹一片，还以为是山猪被人打伤留下的痕迹，她怀着好奇的心情过河去看个究竟，并跟着脚印来到哑巴女的“兰高”，听到小孩的哭声，老 Indai 才恍然大悟。我的天呀！原来哑女分娩了。

善良的老 Indai 抱着小生命，陪着哑女慢慢走到大河边划着小船回长屋。回到长屋，哑女已精疲力尽了。倒在草席上发出微弱的叹气，她自己的生命都难保，那有能力再养活一个小生命。她虽然有点傻气，但爱女之心还是有，最后只好含着泪水把小生命送给人家了。

所谓坐月对哑妹说，只不过在家休息一星期，她没有吃一粒鸡蛋和一只鸡，只有盐头配白饭，还得靠自己煮，唯一的是靠一把火在她

身后烘烘而已。仅仅七天可怜的哑女坐月已“满期”了。她背起背篮又上稻芭去了。她是多么的不放心其稻芭呀，因稻芭就是她的生命，没有它，她将活不了。她依然如往昔的日晒雨淋，无情的生活，不断的折磨和摧残，她那虚弱的身体，怎能抵挡得住呢？不能呀！若是这样下去，不用太久的时间，将会夺走她仍然年青的生命。

哑女虽然才三十多岁，但已历尽沧桑，吃尽苦中苦，有谁会理解、同情她呢？在社会里不知还有多少人像上述哑女与老 Indai 一般的在受苦受难！



急待救治的族群

-小溪

来到民族区，走进长屋，映进眼帘的是贫穷，钻进脑海的也是贫穷。文化落后、生活贫困、医药卫生知识贫乏，加上交通不便等造成绝大部分伊班人百病缠身，健康状况急待改善。目睹此景，真是百感交集。

(一)

有一次，我们拜访了某座长屋的部分群众。有个老 Apai 的脚板处不知被什么动物抓去了一块肉，深度几达骨头。这么严重的创伤既没有包扎，也没有敷药，整半个月了，还是一道深深的伤口。我们到访的前两天，他还与同伴到遥远的地方去打猎，打到了一头猪回来。大伙看到那被水泡得发紫的伤口，真不知要对他说什么好。此时心疼、可怜？还是赶快帮他解除痛苦吧。

有个中年人，一年前犯了肾炎去医院治疗过。他见到我们的前一星期，病复发了。可是他因缺乏医学知识，不懂得这病的危急性；由於缺乏医疗费用，只好一天拖一天。现在他腰部疼痛，尿里带血，身体发烧，小便稀少，又加上牙痛、头痛。他无奈地说：“可能没事吧！过些时后也许会好的，过去也有过类似的毛病。”看来希望上帝会另眼看待他，否则，他的病将如何呢？

由於一个群众诉说牙痛，叫她张咀一看，五、六个蛀齿，有的被蛀了大洞。难怪她痛得睡不着，饭也吃不下，问她为何不去找牙医拔掉时，她说：“拔一颗牙要四元多，还要路费，那来的这么多钱呀！尽管牙痛难忍，但到底还是死不了。”见到此情景，心想就来个调查，了解一下他们的牙齿状况。於是留心一查，哗！那半颗的、没门牙的、没大牙的、蛀洞的、……等多的是。他们多么需要一个能为他们服务的牙医呀！

一个中年妇女，她热情地招待我们，并向我们诉说她的病情。她於两年前曾因高血压病发，晕倒在稻芭里。幸好其他人将她送到医院去。医生告诉她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由於她是被遗弃的妇女，为了养活孩子和老母亲，她仍然要下地干那繁重的农活。试想，一个患有严重高血压的人，在那艳阳高照下，在那光秃秃的稻芭工作，再加上防治高血压的知识又缺乏，以及生活的忧愁等，其后果是严重的。她现在白天要顶着烈日割稻，收工时还要将那一个大“篓”的稻背回家。难怪她说感觉头晕、头痛、颈项僵硬、手脚软。

出院已是两年了，医生给她的降血压药早吃完了，又由於种种原因，她没能再去医院拿药。她的病是多么需要医生的治疗呀！

(二)

在 X 座长屋里，我们一组武装工作同志看到一位患半身不遂的老 Apai，他日夜躺在床上，既不能去医院医治，也没有药吃。用他的话说，他是算死了。见了这位病重无助的老人，一位同志就帮他按摩、针灸。经过约半小时的精心治疗后，他感到手脚有些感觉，接着便高兴地举起只手，又在同志的帮助下站立起来。他表示非常感激同志对他的救治。可惜我们不能为他提供更有效的治疗。若他有接受长期和有效的治疗，他是有希望恢复健康的。

二位同志正在一个伊班群众稻芭边休息，忽听有说话声，一看原来是十几个伊班群众打猎归来，路过这儿。大家相互交谈之后，几个群众要求医病。二位同志都不是卫生员，身上带的只有少许的药物。看到群众有病痛，他们拿出了能拿出的药品，分发给们。由於药品少，满足不了群众的需求，有的只分到一、两粒药片，有的一点都没分到。群众再三吩咐，以后要带卫生员和带多些药来。一位同志除了答应群众的要求外，随口反问群众：“你们这儿不是有飞行医生吗？”他们只是摇头，并不回答这一问题。

介绍两位伊班群众

伊民

一、可敬的 Apai

一天，几位同志带着旧地重游的喜悦心情上 X 长屋去。当我们与久别的伊班群众重逢时，大家都格外高兴，彼此互相问候之后，群众赶紧铺草席请我们坐下。

才坐下没多久，大人小孩一起来了，使我们有如回到自己家一样的亲切感。这时，Apai 关切地对我们说：“你们吃过晚饭了吗？”一位同志答道：“还没有”他马上叫他的女儿去煮饭。

我们和群众一起交谈起来，他们问我们，这么久你们去哪里呢？xxx 现在在那里？有什么消息吗？xxx 为什么要回家？等等，我们边宣传边回答他们的提问，把我们带去的相片给他们看。当他们知道，我们处在困难时期，并且开展其他省份的工作时，他们感到由衷的钦佩，同时他们讲这样做很好。

当我们讨论课题时，这位老 Apai 激动地说：“我们不知道怎么活下去，胡椒的肥料又起价，又没有价钱；可可又跌价；货物又很贵，电油也起价，去巴刹来回一次就要‘烧’掉几十块钱，那里会耐！现在的货币不如英殖民时期”。的确，伊班族的生活是很艰难的，难怪没多久不见，这位 Apai 的头发几乎全白了。

最近，巴刹传说要大选了。有的群众要投国阵的票，如果投反对党的票，政府就不要给我们津贴，等等。这位历尽沧桑的老 Apai 讲：“我就是投反对党的票，那一点点津贴有啥用”，这位 Apai 多真诚。当人联党反帝反殖反大马时期，他跟着人联党走；当我们武装小高潮时，他积极地同情支持革命，最后还为革命吃了苦。今天，他仍然还主动地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吗？谈到革命的前途时，他深情地讲：“我是看不到革命的胜利了。”我们安慰他讲“你过去为革命作的贡

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希望能保重身体”。他还讲：“前人种果后人吃，人类社会经常都是这样的”。

最后，我们要离开长屋时，遵照领导的指示，我们送一点钱给他买点补品吃。当我们把钱送他时，他望着土油灯，片刻后他才讲：“我没有给你们什么”，我们再勉励他，最后才收下。

第二次，二位同志有事情又到他那边，这位可敬的老 Apai 却把我们送给他买补品的钱，买东西回送给我们。

二、慈祥的 Indai

久别 10 多年的一位 Indai，当我们到长屋附近约定她见面时，她带着香蕉来见我们（我在伊班区活动 20 年了还是第一次）。她是苍老了许多，但她依然带着微笑的脸，向我们问寒问暖，有如回到妈妈的身边。她说：“去年，天气不好，稻谷欠收。今年，不够吃。”她还主动地捐米，还吩咐我们说：“若需要黄瓜或其他菜，可以自己去稻芭找，那么有两片是我儿子的稻芭。不过，拿后要做个记号（注）。”

当年武装小高潮时，我们曾在这一带活动，她对我们的感情很深。每当我们到长屋搞粮时，她总是带头卖给我们，她对我们的帮助是较大的。当时，叛徒的出卖，低潮的考验她仍然是热情接待我们，看过她依然是那么的慈祥。

（注）按伊班族的风俗，过路客可以从稻芭里采摘一些菜、果，不过离开以前必须在其“朗高”门口挂一些绿叶的枝桠向主人表明，否则就当是偷的。

编后话

民族工作是当年革命工作的中心一环，不做好民族工作，就不能推动革命工作的全面发展，以至取得斗争的胜利。从 1958 年开始，盟组织就高瞻远瞩地提出要重视开展民族工作，并大力组织干部，先后调派大批干部到各省份的混合区与民族区去开展民族工作。在前后 30 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为之不遗余力地艰苦奋斗，付出了相当大的牺牲代价。在此，我们谨向所有为民族工作而光荣牺牲的战友致以崇高的敬礼，也向所有参加过民族工作的同志致以崇高的敬礼！

尽管多年的艰苦奋斗与流血牺牲，并没有从根本把广大兄弟民族动员起来，但还是有可为与值得欣慰之处：可以使我们更好的认识伊班等族的民族性及其特点，可以更好的探讨民族工作的问题，吸取经验教训，更能提出符合民族利益的、更能广泛团结民族的口号和更能制定符合实际斗争需要的民族工作办法、政策与策略；尽管这一批批可敬的民族工作者，有的自始至终坚守民族工作的阵地，但没有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尽管有的牺牲，有的被捕，有的后来离队，但他们积极热诚、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艰苦奋斗、勇于牺牲的革命作风以及诚心实意的为苦难民族群众服务的精神，都永远刻骨铭心的留在我们及后人的心中。

我们所讲的民族工作，主要是指包括海达雅（又称伊班族）和陆达雅族（比达友族），和当年通过人联党而进行的马来民族工作，和培养了一些得力的马来干部。唯令人惋惜的是，革命组织未能把马来族工作列入革命重要的议事日程。除了当年汶莱人民党所发动的武装起义是以马来族（包括肯达央族，砂拉越的马来青年阵线领导人，前砂州元首阿末·再迪还过边境到印尼和阿查哈里及我们共组北加里曼丹合众国，并担任国防部长）为主之外，在砂拉越在我革命组织（未包括砂拉越马来青年阵线）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里，还未能吸收一位马来人来参军，而仅是在行军活动中偶尔遇见马兰诺族同胞时，向他们进行宣传。第三省下游武工队第四分区一次主动向马来诺族同胞地区去宣传时，却

不幸失败而退回华区。马来族是砂拉越的三大民族之一，民族工作未能包括马来族在内，这是很大的不足点。

在武装斗争的后期，我军向东北挺进，在新区广泛地接触了诗加邦族、巴基丹族、肯雅族、加央族、马兰诺族、达乌族、巴拉旺族、普南族等民族，获得他们的欢迎与支持，我军还吸收了普南族与柏南族青年来参军。看来新区的民族工作情势还好，唯惜这不是主流，不能从根本上扭回逆转的革命局面。唯惜，北加的革命斗争 40 年，未把武装斗争红旗插进沙巴（汶莱至少有进过一趟），未开展北加四大民族之一的卡达山族的工作，这又是一大不足点。

我们的民族工作是走过了 30 多年的艰难曲折之路，现今我们至少也要出一本，反映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文件与回忆文章。经过努力，在此辑，我们欣慰的看到，尚有保留部分当年民族工作历史性珍贵文件。从中，我们也窥见当时革命组织与领导人是重视民族工作的，并在工作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探讨、研究与总结。同时，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多位曾参加过民族工作朋友们介绍了当年的亲身战斗经历。他们是以武装的或非武装的形式，在边区或国内开展民族工作。这些民族工作的珍贵历史资料必将载入北加里曼丹人民的史册中。

二 00 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友谊丛书

1. 往事
2. 林中猎奇
3. 悠悠岁月话当年
4. 风雨年代
5. 砂印边界风云
6. 回忆1990年和平谈判
7. 心中有个宏大的世界
8. 追寻民族区的踪迹





《友谊丛书》之八

《追寻民族区的踪迹》
《Foot Prints In The Land Of Natives》

出版者：余清禄 Yu Chin Liik
736B, Taman Ecorich,
Jalan Tg. Batu, 97000 Bintulu,
Sarawak, Malaysia.

Email : everbase8055@yahoo.com

Tel : +60-86-333055

作者：卢友爱等

印刷：诗巫联成印务公司

初版：2007年1月10日

国际书号：ISBN 978-983-40483-9-6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每本定价马币16元

ISBN 978-983-40483-9-6



9 789834 048396